

苏联解密档案选

毛泽东文稿和言论集

苏联解密档案选
毛泽东文稿和言论集



二〇一七年·中国



毛泽东

www.mzdb1.cn



1949年12月21日毛主席和斯大林在莫斯科

说 明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俄罗斯陆续解密了大量历史档案，其中包含众多有关毛泽东的档案资料，对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位历史伟人的思想、言论和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从那时起，也翻译、编纂、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图书，但有关毛泽东的档案资料却和其它各种档案混编在一起，查找、阅读都十分困难。

本书就是把散见于各类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汇编”、“丛书”、“资料”等图书刊物中的有关毛泽东的档案及相关材料，单独编辑成册的初步尝试。

由于目前苏联历史档案并没有完全解密，我们所依据的又是国内出版的“选编”一类的图书，所以本书只能是“选编的选编”，并不包括有关毛泽东在这些时期的全部档案，这是需要注意的。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本书中的关毛泽东的档案资料大多来自苏联方面的会谈纪要、电报书信、报告日记等，不排除有恶意篡改和编造文件的可能性。其真实性和准确性请读者在阅读和引用时认真加以辨别。

本书的档案标题是我们拟加的，仅为提要，全部内容请阅全文。
本书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电子版原作者 诸夏怀斯社



网站编辑制作

www.mzdbl.cn

目 录

解放战争时期

国共谈判

- 关于国共谈判的进展和策略问题——毛泽东与彼得罗夫会谈纪要
 (1945年9月6日) 3
- 国共谈判和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毛泽东与彼得罗夫会谈纪要
 (1945年10月10日) 8
- 有关中国共产党近期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6年1月7日) 13

革命前景

- 上一年的作战总结和未来的战略方针——库兹涅佐夫转交毛泽东电报
 (1947年9月29日) 16
- 中国革命的进展和前景——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7年11月30日) 21
-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中共胜利后对其他政党应持的立场
 (1948年4月20日) 25
- 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8年12月30日) 27
-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不宜拖延建立联合政府
 (1949年1月6日) 29

联合政府可能在春季建立——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9年1月10日)	30
关于新政府筹建与国内状况——毛泽东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9年6月12日)	32
访苏周折	
要求访问苏联以及具体计划——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8年4月26日)	35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建议延缓来访时间	
(1948年5月10日)	37
同意延缓对苏联的访问——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8年5月10日)	38
关于访问苏联的行程安排——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8年7月4日)	39
附录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请毛泽东改变访苏日期	
(1948年7月14日)	41
附录 捷列宾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延期访苏	
(1948年7月14日)	42
附录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对推迟访苏的反应	
(1948年7月17日)	43
关于访问苏联的一些主要想法——捷列宾转告的毛泽东谈话	
(1948年7月28日)	45
按上次电报指定的时间到莫斯科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8年9月28日)	47
附录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关于毛泽东访苏的时间	
(1948年10月17日)	48
附录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访苏要求	
(1948年10月17日)	49
附录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关于派飞机接毛泽东事	
(1948年10月21日)	51
把我前往莫斯科的日期推迟一下——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8年11月21日)	52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推迟几天访苏是正确的 (1948年11月23日)	53
我准备到您那里去——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9年1月9日)	54
再次和谈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南京政府提出和谈建议 (1949年1月10日)	55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继续进行解放战争直到胜利 (1949年1月11日)	57
拒绝接受国民党的和谈建议——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9年1月12日)	58
附录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反对参加任何谈判 (1949年1月13日)	61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抓住和平旗帜这一重要武器 (1949年1月14日)	62
同意举行国共和谈的八项条件——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9年1月14日)	65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问题应该认为是解决了 (1949年1月15日)	66
苏联来客	
欢迎联共（布）政治局委员来华——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9年1月17日)	67
联共（布）代表到达的时间和地点——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9年1月28日)	68
已委派朱德和任弼时迎接联共（布）代表——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9年1月28日)	69
附录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到达石家庄及与毛泽东的会面 (1949年1月30日)	70
中国的军事状况和中共的历史情况——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纪要 (1949年1月30日)	71

当前的工作方针和对外政策——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纪要 (1949年1月31日)	76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要问题——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纪要 (1949年2月3日)	84
关于民族问题和对外关系问题——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纪要 (1949年2月4日)	91
中共的历史和目前的任务——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纪要 (1949年2月5日)	99
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纪要 (1949年2月5日)	108
关于苏中条约和新政府的结构等问题——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纪要 (1949年2月6日)	112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问题——中共领导人与米高扬会谈纪要 (1949年2月7日)	121
附录 米高扬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回顾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 (1960年9月22日)	123

中苏结盟时期

签订盟约

附录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9年11月10日)	134
关于中苏条约及撤军、贷款、援助等问题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 (1949年12月16日)	136
关于签订新约及中长铁路、旅顺、大连等问题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 (1950年1月22日)	142
附录 中方提交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 (1950年1月24日)	148
附录 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补充协定的草案 (1950年2月12日)	150

筹备毛选

- 关于筹备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情况——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0年10月4日) 152
- 附录 尤金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完全采纳了我的建议
(1950年10月4日) 153
- 附录 联共（布）政治局派遣尤金再次前往中国
(1951年6月30日) 154

互助合作

-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请帮助苏联购买天然橡胶
(1950年11月21日) 155
- 同意为苏联购买天然橡胶——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0年11月22日) 156
-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为苏联代购天然橡胶事
(1950年11月24日) 157
- 在中国内地种植橡胶树的计划——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8月17日) 158
-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计划
(1951年9月10日) 159
- 必须建立国营的橡胶种植园——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9月16日) 160
-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是否赞同朱德组建中苏橡胶股份公司的建议
(1952年3月15日) 161
- 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不太合适——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2年3月28日) 162
- 橡胶种植及苏方提供设备和专家的清单——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2年3月28日) 163
-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种植橡胶树协议及有关物资供应等问题
(1952年4月4日) 165

通告中国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2年3月28日)	166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苏军撤出旅顺和修建中蒙铁路问题 (1952年4月2日)	170

抗美援朝时期

支持朝鲜

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派去中国士兵——金日成通报的毛泽东谈话 (1949年5月15日)	173
朝鲜必须让本国军队做好准备——李周渊报告的毛泽东谈话 (1950年4月10日)	175
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什特科夫报告的毛泽东谈话 (1950年5月12日)	176
同意朝鲜同志对北南朝鲜形势的估计——毛泽东与罗申的谈话 (1950年5月14日)	177

决定出兵

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0年10月3日)	178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国际形势与中国出兵的关系 (1950年10月5日)	180
中国部队急于出动是不合适的——罗申致斯大林电 (1950年10月7日)	182
现在派中国部队去朝鲜是有利的——罗申致斯大林电 (1950年10月13日)	185

武器援助

急需苏联提供海军武器装备——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0年10月28日)	187
请求研究供应步兵武器装备问题——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0年11月7日)	189

同意您关于加强空军力量的建议——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0年11月15日)	191
关于军事贷款支付差额的问题——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1月14日)	192
感谢无偿提供372架米格-15飞机——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5月25日)	194
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补充申请单——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6月9日)	195
关于提供武器装备的问题——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9月20日)	197
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飞机的问题——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2年4月22日)	199
关于补充炮兵弹药和器材的问题——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2年7月4日)	201
协力作战	
关于第四次战役的作战计划——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1月28日)	203
志愿军准备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3月1日)	205
关于在朝鲜修建机场等问题——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3月18日)	209
近期对英美军只打小歼灭战——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5月27日)	210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打英美军的战术问题 (1951年5月29日)	212
请派遣军事顾问到志愿军部队——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9月8日)	213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不同意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 (1951年9月12日)	214

请再派 5 名军事顾问到兵团司令部——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 年 9 月 20 日)	215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军事顾问不能派遣到兵团	
(1951 年 9 月 26 日)	216
给兵团的军事顾问可以不派——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 年 10 月 4 日)	217
关于提供军用物资的发货时间问题——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 年 10 月 4 日)	218
请求增派高炮部队入朝等问题——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 年 10 月 24 日)	220
关于进行局部战役的问题——罗申转发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2 年 3 月 10 日)	222
停战谈判	
关于停战谈判等问题——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 年 6 月 30 日)	223
请您亲自领导这次谈判——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 年 6 月 30 日)	225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	
(1951 年 6 月 30 日)	226
停战谈判期间的军事部署——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 年 7 月 3 日)	227
停战谈判中的我方建议——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 年 7 月 3 日)	229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停战谈判中的我方建议问题	
(1951 年 7 月 3 日)	232
停止朝鲜军事行动协定草案——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 年 7 月 5 日)	233
停战谈判的策略问题——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 年 7 月 13 日)	235

关于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7月20日)	237
关于敌人在中立区的挑衅行为——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8月27日)	240
我们有关邀请中立国代表的意见是不适宜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8月30日)	242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和中国国内状况——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11月14日)	243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在谈判中采取灵活战术，实行强硬路线	
(1951年11月19日)	246
关于中立国观察机构等问题——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2年1月31日)	247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您在停战谈判上的立场完全正确	
(1952年7月17日)	251
关于是否接受敌方建议的问题——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2年7月18日)	252
关于墨西哥的建议等问题——周恩来转交毛泽东致斯大林的信	
(1952年9月16日)	255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墨西哥人的建议不可接受	
(1952年9月17日)	257

谈谈打打

关于停战谈判形势和武器供应问题——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2年12月17日)	258
我们准备派出海军作为志愿军——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3年1月7日)	264
请求苏联提供阿芒拿炸药——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3年1月29日)	266

苏联生变

附录 苏联政府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	
(1953年3月19日)	267

敌人被迫停战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原因——与库兹涅佐夫的会谈 (1953年7月28日)	271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答谢电 (1953年7月30日)	273

后斯大林时期

一重新起步

感谢苏联对中国制定五年计划的意见 ——毛泽东与库兹涅佐夫谈话纪要 (1953年5月7日)	275
确认细菌武器报告的真实性是困难的 ——库兹涅佐夫致莫洛托夫电 (1953年5月11日)	278
关于贝利亚事件和王明问题——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纪要 (1954年1月4日)	280
高岗事件与党内团结——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 (1954年3月26日)	282
中苏协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毛泽东与瓦西科夫谈话纪要 (1954年7月5日)	286
中国的思想教育和对外政策——毛泽东与尤金会谈纪要 (1955年1月8日)	288
关于党的代表会议和南斯拉夫等问题——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纪要 (1955年3月8日)	293
再次访问苏联和准备召开党的八大——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纪要 (1955年3月30日)	297
胡风、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纪要 (1955年5月25日)	301

二十大后

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 (1956年3月31日)	306
关于国内外形势及斯大林问题——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纪要 (1956年5月2日)	316
附录 关于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方针(十大关系) ——利哈乔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6年8月22日)	322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波兰问题——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纪要 (1956年10月23日)	331
关于弹道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纪要 (1957年10月11日)	332
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修改意见——尤金报告毛泽东的谈话 (1957年10月30日)	334
中共代表团对莫斯科会议安排的意见——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纪要 (1957年11月9日)	340
中国的外交政策与斯大林的错误等问题 ——毛泽东与葛罗米柯谈话纪要 (1957年11月19日)	345
与金日成谈彭德怀——南日转告毛泽东的谈话 (1957年11月26日)	364
中苏的外交政策和中国的国内形势——毛泽东与尤金会谈纪要 (1958年2月28日)	365
拒绝出席南共联盟代表大会——毛泽东与尤金会谈纪要 (1958年4月5日)	374
中国同意出席经互会高级会议——毛泽东致赫鲁晓夫信 (1958年5月9日)	385

中苏分歧

关于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记录 (1958年7月31日)	386
---	-----

关于国际形势和两党关系的讨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记录 （1958年8月1日）	412
关于国际形势及两国的教育制度改革等问题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记录 （1958年8月2日）	434
关于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等问题——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记录 （1958年8月3日）	464
对巴西记者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科托夫报告毛泽东的谈话 （1958年9月10日）	469
与社会主义六国代表团谈话记录——安东诺夫报告毛泽东的谈话 （1958年10月2日）	476

反修防修时期

关于台湾问题和中印关系的争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记录 （1959年10月2日）	486
关于全面裁军、台湾问题和中印关系——毛泽东与安东诺夫谈话纪要 （1959年10月14日）	507
对1960年莫斯科会议文件的评论——毛泽东与契尔沃年科谈话纪要 （1960年12月26日）	516
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反应——毛泽东与契尔沃年科会谈纪要 （1963年2月23日）	522
关于中苏关系及国际形势等问题——毛泽东与柯西金会谈记录 （1965年2月11日）	541
附录：本书档案资料来源	561

苏联解密档案选

毛泽东文稿和言论集

解放战争时期

关于国共谈判的进展和策略问题

——毛泽东与彼得罗夫^①会谈纪要

(1945年9月6日)

机密

九月六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王若飞同志拜访了我，我们之间进行了如下内容的会谈。

在回答我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谈判进行得如何时，毛泽东讲述了以下内容。

目前可以认为谈判的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在这个阶段，概括地讨论了政治和军事方面最重要的问题。在交换意见过程中，双方仅仅涉及原则问题，而把一些具体问题先搁置一边。

谈判非常清楚地表明，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极力追求彻底保留自己从前的政治立场，确保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并争取获得中国共产党的让步，然后借助于武力，实现对共产党所在的地区和军队进行封锁。在与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以及蒋介石本人进行会晤和会谈时，国民党方面没有提出任何不同于国民党以前立场的新提案。

毛泽东说：“我们赞成立即召开（在谈判结束之前）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以便讨论和解决国家最迫切的问题。但是，国民党的代表坚持在国共两党谈判结束之后召开这样的会议。与此同时，他们还力求发表一个专门的公报，在其中将阐述我们之间谈判的结果，然后允诺召开各党派间的代表会议。”

^① 彼得罗夫，时任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对于国民大会，国民党仍像从前一样要求保留旧的代表，这些代表都是在十年前选出和指派的。蒋介石只是同意从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中增选一定数量的代表。

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断然拒绝了对国民大会的代表实行普遍选举。蒋介石打算保留原有的代表作为参加大会的主要人员。他只同意将很少的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代表列入会议代表的名单里。换句话说，蒋介石指望保持国民党在国民大会里的统治地位。”

毛泽东说，准确地讲，正如谈判所表明的那样，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被取消。这指的是保留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和允许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一些代表加入政府机关。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不愿意建立名副其实的联合政府。顺便说一句，张群曾经声明，他们只能够同意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代表加入政府。但是，只有当国民党在政府中占领导地位的时候，这一点才能够实现。

在谈判期间还触及了关于改组最高国防委员会的问题。但是，正如已经清楚的那样，只有在保留国民党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才能够设想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使其他党派合法化的问题，被国民党归纳为所谓的“政治建设”。在会谈期间，国民党代表没有反驳中国共产党关于使各政治党派合法化的要求，但是，也没有表示赞成。他们提出了一个不明确的措词“政治建设”，认为在这一政治建设过程中，这个问题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

在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毛泽东说，我们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也就是说，我们想争取大赦。但国民党则坚持先提出共产党特别希望释放的政治犯名单。由此可见，他们想把事情归结为仅仅释放一小部分人。

毛泽东说，当谈判涉及取消特务机关时，张群和国民党其他代表

企图证明，秘密工作机关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制度，世界各国都有各种不同的秘密警察，因此，未必需要完全取消特务机关。

毛泽东强调说：“他们打算保留特务机关，给他们以新的名称。国民党准备称这些机关为秘密警察局。当然，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会采取一切措施，保留目前仍然起着作用的盖世太保制度。”

还初步讨论了领土和行政管理问题。

毛泽东指出：“如果国民党同意将除特区以外的五个省——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热河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同意放弃华南和华中的解放区，那里共计有四千多万居民和我们的三十多万人的军队。我们还允许国民党对一些重大的城市，如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以及一些重要的交通干线实行监督。同时还规定国民党的代表可以参加上述省的行政管理机关，而同样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应该参加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青岛和其他城市的市政机关。”

在会晤和会谈期间，双方还就军事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共产党争取保留四十八个师（或者是六十万人）。但是，蒋介石声明说，他最大限度只能同意中国共产党保留十二个师的兵力。

毛泽东说：“借口防止发生国内战争，蒋介石要求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都要进行裁员。因此，他只同意保留共产党的十二个师，而当时我们说出的数字是四十八个，这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毛泽东指出：“在最万不得已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做出让步，同意保留二十五个师。但是，这个数字是我们的极限，低于这个数字是不可能答应的。”

谈到关于拖延在华日军投降书的签署问题时，毛泽东强调指出，目前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做出结论：在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存在着默契与合作。不应该怀疑，这种合作的首要目的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同时，国民党当局还使伪军的地位合法化，把他们变成自己的正规军部队。

毛泽东指出，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将同加倍的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目前，蒋介石已将这些军队装备完毕。

在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参加接受日本投降的问题，但是，时至今日，国民党方面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同志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今后谈判中的做法，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的战略原则。

“我们早就知道，我们的许多要求不可能被国民党接受，我们已经准备做出让步。但是，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不得不做出让步的话，那么，我们也将尽可能慢地、带着巨大的抵触情绪去做这种让步。这种让步只可能在基本条件，即我们的具体利益不受到损失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出。我们将不会偏离我们切身利益所在的那些界线。这样一来，我们的策略可归结为：进攻和退却同时进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让步是受我们事业的具体利益制约的。

在会谈期间，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尤其是王若飞同志，都很关心我们对于一系列问题的评价和看法。例如，他们极其关心在中国爆发国内战争的情况下，美国的行为将会如何：美国将坚守中立呢，还是积极地给予国民党军事援助？他们还非常关心苏联方面的立场：如果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的话，那么，苏联将会采取何种步骤？在会谈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多次强调了业已形成的局势的复杂性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目前进行的谈判的极其重要性。

毛泽东指出，目前正确地确定方向对他们来说非常困难，因为他们既不了解在中国爆发国内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方面的立场，也不了解苏联方面的立场。毛泽东还说，朋友们的忠告和建议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在会谈期间我多次强调说，苏联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两党的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 H. B. 罗申和 H. 费德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 彼得罗夫

1945年9月6日

文件共三份，送：

B. M. 莫洛托夫同志、

C. A. 洛佐夫斯基同志、

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9月17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77页（起始页，下同）

国共谈判和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

——毛泽东与彼得罗夫会谈纪要

（1945年10月10日）

因毛泽东要回延安，我于十月十日设宴为他饯行。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周恩来、王若飞。苏联方面出席宴会的有：使馆参赞米克拉舍夫斯基同志、武官罗申少将、一等秘书费德林和列多夫斯基同志。在宴会前和宴会上，我们就各种问题进行了畅谈。

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如何评价蒋介石和中共代表谈判的结果，毛回答说：“不能说结果很好或好，但也不能说结果很糟。结果要比伦敦外长会议好一些。”

毛泽东说，关于谈判的联合公报将于十月十二日发表。他还强调指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他说：“如果国民党食言，联合公报将是我们进行宣传的某种依据。”

接着，毛泽东介绍了谈判的进展情况。他说，谈判过程可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谈判基本上正常，已经决定发表联合公报，但是这时美国大使赫尔利干预谈判，发表联合公报一事就告吹了。第二阶段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其特点是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紧张。蒋介石的代表采取了拖延谈判的方针。看到这种情况，在第一个阶段对国民党代表保持克制态度的共产党代表，开始采取了进攻的方针，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

在政治方面，延安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开始尖锐地抨击国民党。在军事方面，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重大军事行动，结果击溃了胡宗南将军的7个师。采取上述措施的目的是给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它在谈判中做出让步，这一目的最终达到了。通过争论，在一系列问题上，

达成了协议，但是国民党是否履行协议还要走着瞧。有些问题没有解决，还要进一步谈下去。毛泽东离开后谈判将继续进行。周恩来同志留在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继续谈判。

我问：延安的情况怎么样，那里是否知道谈判的情况和结果？毛泽东回答说，延安的同志了解情况，但不是全部，二十个师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还不十分清楚。同时，这个问题又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主要让步。

毛泽东说，他认为能够使人们相信而且能够证明，为了胜利让步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毛还说，除此之外，我们代表团还有一个重要的论据能够说服同志们赞同做出的决定。这一论据是：关于改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让步是形式上的让步。我们同意将师的数量压缩到二十个，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裁减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一份文件、没有一次谈话讲我们的师应是什么编制，应有多少人，因此，我们可以组建任何编制的师，可以是一万人的师、两万人的师，也可以是三万人的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师就编什么样的师。

罗申同志问：如果蒋介石发现中国共产党组建的师比他的师人多，他能同意吗？毛泽东回答说：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将成立一个由总参谋部、军事部和第十八集团军代表组成的专门军事小组。

罗申同志又问：蒋介石是否会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提供军需？毛回答说，中国共产党将力争，但对结果不抱希望。

接着，我问，蒋介石从西昌回来后表现如何？毛泽东回答说，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明显好转，他变得比较客气、和善、坦率，不再固执了，这一次他同意就谈判的初步结果发表联合公报。

毛泽东还说，蒋介石在和他单独谈话时说：“国家的命运操在我手中（即操在蒋介石和毛泽东手中），若我们之间不能达成协议，那我们就有罪于后人。”在这次谈话中蒋介石称：“共产党不拥有自

己的武装力为上策。今后它只用政治手段就能在国内赢得政治权利。”毛泽东回答说，共产党人从不拒绝由国家统一军队（如果蒋介石的话是指国家统一军队的话），还说，如果允许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拥有像美国民主党那样的地位，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可以放弃武装力量。

我又问毛泽东：目前蒋介石依靠国民党中的哪个政治派别，其中哪个政治派别在他身边占有更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不能说蒋介石不论在对外政策方面还是在内政方面都依靠某一个政治派别，这是因为目前他还没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政治目标，或者说还没有一个能够左右其他一切的主心骨。在内政方面，蒋介石自己也不知道该走哪一条道路：是走独裁的道路还是走国家民主化的道路。在外交政策方面，蒋介石不知道倒向谁：倒向美国还是倒向苏联。考虑到苏联的国际影响力，蒋介石还没有拿定主意完全倒向美国。尽管如此，他也不可能完全倒向苏联。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由如下因素确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力量、苏联的国际地位、新疆的状况和驻在东北地区的红军。在对外政策方面，蒋介石求助于“政学系”，他和这一派解决与对苏关系有关的问题。在内政方面，特别是在对付我们方面，他利用CC派和黄埔系。在解决其他问题时，他谁都会利用。因此，无法得出蒋介石现在依靠哪一个政治派别的结论。

我问，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政策今后会是什么样的政策？他回答说，他的政策将带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他表面上竭力妥协，而另一方面是他会继续进行反共的军事准备。他正在搞军事准备，而且很快就能准备好，到了那个时候，在领土、军事和政治问题上，蒋介石显然会试图逼迫共产党接受他的条件。毛泽东说，国民党军队会试图把共产党从他们占领的地盘上挤出去。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也正在三个主要方面加紧做应战的准备。毛接着又说，蒋介石不会履行达成的协议的，那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共产党不得不消灭国民党的几个

师，譬如胡宗南的七八个师，共产党能够做到。

罗申同志问，如果蒋介石继续让他的军队向前推进，以实现包围共产党的军队，以切断共产党军队通往东北道路的计划，具体地说，共产党的军队怎么办？毛泽东同志回答说，共产党不怕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蒋介石并不拥有足以打垮共产党的力量，如果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地盘进行军事进攻，那么共产党就要应战国民党军队。

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说，蒋介石的武装力量会沿各个地区分散。例如，胡宗南的军队集中在主要的方向上，他的十六个军部署在从新疆到东北的沿线上。只有两个军的主要力量越过了黄河，并前往太原地区。十一个地区的部队将集中在两个地区：近十一个师的兵力将在平汉铁路沿线向北集结，第二个地区是在徐州集结并向北推进。其中一部分向山东地区分散。要集结这些部队，使他们形成一个拳头，需要时间。

罗申同志问，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空投到天津和北平的美军先头部队作掩护，蒋介石率兵北上，津浦线和平汉线成为蒋介石军队的主要运动方向。毛泽东回答说，这将是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公开干涉，这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担心的一件事。毛泽东接着询问在场的人，美国人会不会公开和共产党的军队作战。

我和罗申同志回答说，现在很难说美国人会不会公开干涉中国事务，因为从国际方面考虑，这样做，对他们不利，他们这样做，只会失败。

然后毛泽东问，如果美国开始出兵共产党占领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我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和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我又补充说，与此同时，必须在报刊上报道这些事实，进行反对美国公开干涉中国事务的宣传。

对于我的问题——国民党会不会向东北派兵，毛泽东回答说，蒋

介石这样做会遇到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是在华北地区有共产党的军队。只有在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就所有未决问题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才能到东北去，否则，中国共产党是不会让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去的。

对于罗申同志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蒋介石的军队何时能够结束镇压共产党人的准备工作，毛泽东说，在他们看来，蒋介石的军队将在十一月中旬完成准备工作，十一月份就应该预防蒋介石的重要进攻行动了。毛泽东接着补充说，在此之前我们将完成自己的全部准备工作。

对于我的问题——总的来说，国民党在谈判中表现如何，毛泽东回答说，国民党代表对谈判没有准备，他们没有自己预先准备好的方案，倡议和唱主角的基本上是共产党，是他们提出了经过斟酌和认真研究的建议。国民党扮演的角色归结起来就是千方百计地竭力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建议。美国大使赫尔利扮演了主要角色，他是蒋介石的常务顾问。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83页

有关中国共产党近期工作的情况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6年1月7日）

亲爱的菲利波夫^①同志！

顺利抵达延安的毛岸英已向我转达了您给我的良好祝愿。为此，也为了您所发来的诸多礼品，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另外，我也非常感谢您和联共（布）向延安派来两位医生！

我的病是神经极度疲劳症。这主要是由于自己二十多年来缺乏足够的休息所致。近一段时间我休息了两个来月，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如今再有苏联医生的医治，我相信自己的病会好的。我打算休息更长一段时间。

在我休息期间，我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同志接替。他完全可以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五位书记之一，也是我党建立二十五年来未犯过原则性错误的人之一。十五年前他曾两次到过莫斯科，在我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

一九四五年四月间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其间就我党若干历史问题通过了决议。孙平（弗拉基米罗夫）同志随身带走了一份全会决议，如果像他说的那样，他现在应当已经将该决议转交给您了。而您，在看了这份文件之后，将对中共各个时期的政治路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您可以把这份文件让一些可靠的中共党员看，但请警告他们不得将其中内容向外人泄漏。

最近五个月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规模与去年相比扩大了两倍，

① 菲利波夫，斯大林的化名。

我们急需工作骨干。据毛岸英说，您打算将所有现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发送回国。为此，我向您表示感谢。但我请求，只派遣那些业已成熟——有工作能力的同志回来，而那些你们工作上仍需要的同志，请继续留在莫斯科。请转告李立三同志，让他经张家口回延安。请将其他同志派往满洲里、齐齐哈尔、哈尔滨，以便他们找到中共中央北满地下机关，后者将为他们安排相应的工作，那里特别需要他们去。据毛岸英说，高福，即袁牧之，想暂且留在莫斯科。那么，可以暂时不派他回国。年轻人，正在上中学，暂时让其继续在苏联学习吧。

经过几个月艰苦的斗争，目前以和平方式停止中国内战和解决各种问题的希望越来越大。我们在重庆的代表团正在努力使这一希望变为现实。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是一样的。如果国民党要继续这场战争，即使他将在一些地区赢得一些胜利（如在位于两军交界的沈阳、热河和河北省等我党群众基础薄弱地区），但在中国其他广大地区，他就不敢肯定会战胜我们。因此，还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国民党同意我们关于停止内战的建议。总体来看，中国问题依然跟从前一样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仍要走很多弯路和曲折，中国共产党仍面临很多艰难险阻。对于这一切，我们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和思想准备。我们尤其应当对美国亲自插手国共两党间实际问题后所导致的后果有充分的预见。不过，我们党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那就是在极力团结国民党的同时，与其展开坚决的斗争。我们党的和平——民主路线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三大强国莫斯科会议之后，国际形势也越加有利于我们。中国定将会有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对这一切充满信心。近几个月来我们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今后我们应巩固这些成绩。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党已做了整体性的安排。国民党报纸上宣传说，贺龙、萧克和其他一些同志都被打死了，这真是一派胡言，根本不可信。

委托楚查耶夫少校将此信当面转交给您。收信后，请确认。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

延安市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121页

上一年的作战总结和未来的战略方针

——库兹涅佐夫转交的毛泽东电报

（1947年9月29日）

机密

兹报告如下：

我收到了毛泽东于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致中国特区全体党、政、军组织的电报，该电报系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捷列宾从毛泽东那里收到并转给菲利波夫的。

在战争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的军事行动中，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九十七点五个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部队以及地方军队三十四万人。总计一百一十二万人。

我们这一伟大胜利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致使敌营人心惶惶。我国全体人民为此胜利而欢欣鼓舞。这一切已经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力量和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

1，战争第一年的军事行动：

国民党从自己正规军的二百四十八个旅中派出二百一十八个旅，人数为一百六十万和约五十万人的特种军队（海军、空军、炮兵、坦克和工程部队）、伪军、警察部队和保安部队来对付中国的解放区。我们的军队由于在内线作战中正确地选择和运用了战略方针，不惜牺牲，以超过三十万人的伤亡以及损失大片土地的代价，在各处掌握了主动权，因此它能把一百一十二万人的敌军分割开来并予以消灭。

不但如此，我们的东北部队在热河省、河北省东部、山西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开始战略反攻后，收复了一些老区和占领了大片新区。

2, 我军在战争第二年的基本任务:

实施全国总反攻, 即在外线打击敌军的任务, 将战争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区去。

在内线尽可能地多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彻底破坏国民党的反革命战略——它要在解放区的土地上作战, 目的是破坏和消耗人力和物力资源, 使我们没有可能进行持久战。

将战事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区将会遇到一系列困难, 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新的根据地需要时间, 要不断进行运动战来消灭敌人的力量, 要动员群众进行土改, 建立新的政权机构, 要把人民武装起来。这些困难可以也必须克服。敌人迫不得已将更高度地集中自己的力量, 而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在广阔的领土上开展运动战。在那里, 运动战将会成功, 因为这些地区的人民群众同情我们, 憎恨国民党制度。

3, 保证在国民党统治区作战成功和夺取彻底胜利的根本条件:

(1) 要善于选择攻击的决定性时刻。要以不屈不挠的坚定性和勇敢精神去进行胜利的战争。

(2) 坚定地贯彻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政策, 满足他们的需求和利益, 使他们支持我们的军队。如能贯彻这些条件, 我们一定会胜利。

4, 至今年八月底的敌军状况和我们的武装力量: 在南线有一百五十七个旅, 在北线有七十个旅, 在国民党后方有二十一个旅。总计仍是二百四十八个旅。正规军一百五十万人。特种部队、伪军、交通部队、警察部队、保安部队一百二十万人。

非战斗的军事机关编制 一百万人。总共为三百七十万人。(在南线顾祝同指挥下有117个旅, 程潜等人指挥下有7个旅, 胡宗南指挥下有33个旅。)

顾祝同集团军的 117 个旅之中被消灭和遭重创的有 63 个旅。其中部分军队尚未进行补充。

顾祝同集团军的这些部队中, 仅有 54 个旅没有遭受到重大损失,

没有受到过毁灭性打击。目前顾祝同的军队只有 32 个旅可用于运动战。余下的全部用于防卫。

程潜等人指挥的集团军——7 个旅只有打保卫战的能力。他们之中有 1 个旅在和我军的战斗中遭受了重创。

在胡宗南指挥的集团军的（其作战区域在兰州以东，宁夏—榆林偏南，临汾—洛阳偏西）三十三个旅中，被消灭和遭受重创的有十二个旅。只有七个旅能打运动战。余下的只能用来防御。

北方前线有国民党军队的七十个旅。在东北的二十六个旅中，被消灭和受到重创的有十六个。

在孙连仲集团军的十二个旅中，有八个旅被消灭或受到重创。在傅作义集团军的十个旅中，有两个旅受到了重创。

在阎锡山的十五个旅中，有九个旅被消灭或受到重创。余下的也只能打防御战。

国民党在后方只有二十一个旅。其中八个旅在新疆和甘肃省西部，七个旅在四川和西康，两个旅在云南，两个旅在广东（被消灭的第六十九师），两个旅在台湾。

在湖南、广西、贵州、福建、浙江和江苏没有一个国民党正规军的士兵。

今年国民党为了补充自己的军队，借助美国人的援助计划动员了一百万人，同时训练了几个重新组编的旅和团。

如果我军依然照战争上一年那样，能够继续平均每个月消灭八个旅，那么战争第二年就将消灭九十六个旅的国民党军队（今年七月和八月里已经消灭了十六个半旅）。这种情况将会进一步削弱敌军，并使它的战略机动能力跌落至最低点。这将迫使敌人在国内全线转入防守。他们将到处遭受到我军的毁灭性打击。

动员百万新兵和训练旅、团新军都挽救不了国民党。抓壮丁和买壮丁，这就是他们动员的方法。国民党采用这种途径未尝能达到如愿

的结果。大批士兵开小差和战争转移到国民党地区，将削减它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5，我军作战行动的性质依然如故，即主要打击孤立的敌人，一个战役消灭一个或几个旅，就如同二月在莱芜、七月在山东省西南部曾发生过的情况。紧接着要集中大规模的兵力消灭强大的敌人，控制中小城市和大量的农村。

最后，夺取大城市，彻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这就是我军作战的主要特点。集中优势兵力来保证每一次战斗的胜利，包围敌人，不让他们逃出一个，并将他们消灭。

在特殊的情况下，允许全力迎头进攻敌人。同时包围进攻敌人的一翼或两翼，以使用局部消灭和彻底歼灭敌军的方法，我们便有可能快速重新部署自己的兵力，来消灭敌人其他的部队。

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为了达到成功，必须在每一仗的力量对比上占有优势。

要大力发挥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

要尽最迫使敌人来回奔走，这会让我们有可能进行运动战。同时，必须更加重视教会部队打阵地战和进攻设防点。

为了保证夺取城市 and 敌人的主要据点，要组建大量的炮兵和工兵部队。

要坚决进攻和夺取所有防御薄弱的城市 and 设防地区。对防御力量一般的中等城市，则要在有利的形势下才发动进攻和夺取。

暂时不动敌人防御力量强大的大城市。

利用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武器装备充实自己的力量，利用俘虏的士兵（80%—90%）和有限数量的尉级军官。

通过国民党统治区的资源和俘虏来补足自己军队的同时，部分利用老解放区的人力和资源。这点特别同南方前线的部队有关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无论在新、老解放区都要进行土改。（这是夺取全国持久战胜利的基本条件。）

发展工业生产，厉行节约，加强军工建设。动员一切为了前线，为了保证胜利。

只有遵守这些条件才能顺利地进行持久之战并取得胜利。

6，以上所指各点是上一年的作战总结和我们未来的战略方针。

希望全体领导同志把这封信发下去：军队里发到团级指挥官及以上各级，党组织里发到区委委员及以上各级，政府机构里发到行政管理处级以上各级，为的是要让所有同志了解自己的任务并坚决地、丝毫不动摇地去完成任务。（此信系密件，阅后烧毁。）

上将库兹涅佐夫（签名）

1947年9月29日

文件共10份，送：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马立克、档案室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一卷第206页

中国革命的进展和前景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7年11月30日)

绝密

致 И. В. 斯大林同志

现报告：

我们收到的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日给菲利波夫^①同志的电报，这份电报是由侦察总局工作人员捷列宾^②同志从中国特区发来的：

1. 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四个月的反攻（七月至十月），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三十八个半旅。包括非正规部队在内的敌人有生力量的损失是四十五点二万人。这个时期俘虏五十三名将军。因此敌人平均每月损失九个半旅，或十一点三万人。前几个月，即今年七月前，敌人每月损失八个旅，或九点三万人。

2. 在南部战线和北部战线的所有地段上，敌人的进攻已被阻止。我们的军队掌握了主动权。人民解放军的五十个旅四十万人进入了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全面支持。我们以为，在保证军队冬装方面会遇到困难，但这个问题我们较好地解决了。军队粮食的供应是靠当地居民和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储备粮。军队的武器弹药主要由战利品来保证。有生力量的充实基本上是靠俘虏，部分要靠我们后方的后备力量。

3. 在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区域，我们的军队活动在以下地区：

① 菲利波夫，斯大林的化名。

② 捷列宾，奥尔洛夫的化名，联共（布）中央派往延安的医生和联络员。

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活动在大别山区，陈（毅）粟（裕）大军在苏鲁皖边区，陈（赓）谢（富治）大军在鄂豫陕边区。

它们最近几个月的任务是：

（1）切断平汉、津浦和陇海铁路，将与它们相毗连的地区连成统一的整体。

（2）在明年秋季之前为下一步向长江以南的进攻准备好条件。

4. 西部的三省，即陕西、甘肃和宁夏和东部的山东和江苏是南部战线的侧翼。这里的战局已大有好转。

整个西北地区，除了甘肃东部的两个县和与宁夏接壤的三个县，以及榆林、延安、甘泉和富县，我们都清除了敌人。在战线的这个地段，我军十个旅经过一个月的休整后将转入向甘南的渭河方向进攻。

在江苏北部的苏北游击区，我们有六个正规旅，它们不仅能够牵制敌人，而且能够一直把他们排挤到长江下游的北岸。

山东大部分地区，我们已收复。山东东部的形势得到了根本改变。在这里，我们有十五个正规旅。明年它们要收复我们在山东和江苏失去的地区。

在山西南部的和河南北部的南部战线上，敌人还占据着少量的城镇。在这里，我们有两个旅，封锁着这些城镇。

5. 总的说来，在南部战线上，敌人有一百六十二个旅。其中多数已被我们击溃。这些军队的士气很低。军官中笼罩着一片慌张的气氛。

这些军队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是蒋介石军队的第五、第十一和第七十四师、桂军的第七师和青海军队的第八十二师。在这些军队中，只有第七十四师已被我们歼灭。其余四个师（十一个旅）没有参与同我们进行的大规模战斗。南部战线的国民党军队，尽管装备精良，但无力阻止我们的进攻。

在北部战线上，在中长、平奉、平绥铁路和平汉铁路北部的地段，活动着国民党军队的七十个旅。最近几个月，这些旅受到很大损失，

近期不会被用来作战。在上述地区，我们有五十五个旅。它们的任务是切断平奉、平绥铁路，把满洲和华北连成统一的地区。

国民党在后方地区，包括新疆在内，共部署了十六个旅。还有二十个旅在由美国人进行训练和武装。

6. 人民解放军有一百四十个正规旅，九十万人。地方军队有六十万万人，后方部队和机关有五十万人。总共有二百万人。

国民党军队有二百四十八个正规旅，一百五十万人，地方军和特种部队，包括海军在内，有一百二十万人，后方部队和机关有一百万人。总共三百七十万人。

7. 我们在国民党地区大城市中的党组织，顺利地领导着工人和学生的群众性斗争。在我们党领导下，在海南岛、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省和在安徽省南部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

8. 美国人和蒋介石打算通过宋子文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这是一个花招，目的是要迷惑群众。无论美国人还是蒋介石都对我军可能渡过长江感到不安，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个打算。

在香港的李济深将军、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和其他具有反对蒋介石情绪的人士都与美国人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将来他们可能被美国人为着美国和蒋介石的利益所利用。我们对这类人的策略是，对他们不寄予大的希望，为了革命的利益利用他们。

9. 随着民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已不复存在。民盟中有同情我们党的人，虽然它的多数领导人是动摇分子。他们迫于国民党的压力解散了同盟，从而表明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10. 鉴于美国人和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已在中国人民面前被彻底揭露，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我们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土地改革

纲领，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过去，处于蒋介石影响之下的中小资产阶级，有一些错误的观点，并且它们寄希望于美国对华政策将会有所改进，认为国共两党都只想仅通过武力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政权问题，在这场战争中，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共都不会被消灭。因此在中国将形成两个政权的局面，中共将统治北方，而国民党将统治南方。再有，在他们看来，还有解决现实危机的第三条道路。现在这些错误的观点已不再存在。国民党失去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广大群众现在支持我们党。现在的形势是：在最近的四年间，蒋介石政权将会被消灭。中国已走上了新的革命高涨之路。

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Ф.库兹涅佐夫^①

1947年12月[10]日

印9份

送：1-斯大林同志，
2-莫洛托夫同志，
3-日丹诺夫同志，
4-贝利亚同志，
5-马林科夫同志，
6-米高扬同志，
7-沃兹涅先斯基同志，
8、9-存档，
10-布尔加宁同志。

载于《中共党史研究》

2002年第1期第85-86页

① Ф.库兹涅佐夫，时任苏军情报部部长。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中共胜利后对其他政党应持的立场

（1948年4月20日）

绝密

致捷列宾转交毛泽东：

我们收悉了毛泽东同志于1947年11月30日和1948年3月15日寄来的两封信。我们没有立刻对这两封信做出反应，因为我们需核查对于我们的答复所必要的一些材料。现在我们已经核查了这些材料，可以对这两封信做出答复了。

第一点，对1947年11月30日来信的答复。我们非常感谢毛泽东同志的情况通报，同意毛泽东同志对形势所作的估计。信中只有一处让我们疑惑不解，即“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中国革命”。

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之后，中国政府，按照自己的政策至少在胜利之后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时间长度现在还很难确定）内将是民族民主革命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这意味着，暂且还不必实行整个土地的国有化和废除土地的私有制，没收从小到大的所有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资产，以及不仅没收大地主的资产，而且没收靠雇佣劳动生存的中小地主的资产。有必要等一个时期再进行这些改革。

谨告知您的是，在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其他党派存在，这些党派都是人民阵线的成员。

第二点，对毛泽东同志1948年3月15日来信的答复。我们非常感谢毛泽东同志非常详细地通报了有关军事和政治问题。我们同意毛泽东同志在这封信

中所作的所有结论。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及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的考虑是完全正确的。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斯大林

1948年4月20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251页

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8年12月30日)

斯大林同志：

1. 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电报我早已收到。我将按照这个电报行事。到那时，等两个大战役阶段结束之后，我就到莫斯科去。

..... ①

10. 在政治协商会议和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下，各民主党派团体和香港、上海、北平、天津及其他大城市的人民组织的领导和活动分子，纷纷来到或将来到我们的地区。这些人中大多数是我们曾经邀请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

11. 美国政府毫不掩饰的侵略政策已经失败，现在美国人企图由积极支持国民党转为支持地方上的国民党的军国主义者和南方当地的军阀，以使用他们的力量来抵抗人民解放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组织并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并在那里组建反对派联盟，从内部破坏人民革命阵线，其目的是使革命不能进行到底。

这个新的阴谋已有一系列表现。例如，他们派了一些外交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到中国民主同盟右翼的领导人——罗隆基、张澜、黄炎培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李济深（此人正在来解放区的路上）那里去。为的是在他们中间进行挑拨离间和诱骗工作。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我们要做到不能让美国人的阴谋得逞。

① 关于军事态势的内容略。——本书制作者注

12. 我们已经把一些同志，如高岗（东北局书记）、饶漱石（华东局书记）、薄一波（华北局书记）、刘伯承（华中军区司令员）、陈毅（华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东北军区政委）、林伯渠（陕甘宁政府主席）等召到中央来开会，讨论一九四九年所有的策略问题（哪些部门或部队应该负责哪些方面，及其他准备工作），讨论了有关在一九四九年春准备召开的中共中央二中全会及其他问题。

不久，在会议结束之后，我就能动身到莫斯科来，并与您讨论所有的问题，然后，从莫斯科回来之后，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

大约，明年春天要召开各个民主党派、团体和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并且将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现在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这样的政府，完成这件事的所有条件已经成熟。

恳请您把这份电报向大老板和联共（布）中央报告。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329页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不宜拖延建立联合政府

(1949年1月6日)

致捷列宾

复第1号文件

请转达毛泽东：

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感谢您提供的有关中国局势的报告，并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在目前条件下建立这样的政府会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崩溃，促使中国民主力量更进一步，有更大的发展。

您在电报中提到民主联合政府成立的日期定于夏季之事，我们有些疑问。是否可能产生这种情况，即国民党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会掌握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动权，在夏季到来之前先建立自己的联合政府，将中国的一些民主政治人士吸引过去，以此影响他们团结在中国北方人民解放力量的周围。国民党可能会走这一步棋，特别是当他们感到企图让自己的爪牙参加民主协商会议以及以后的民主联合政治的阴谋遭到失败的时候。

因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之事不宜拖延到夏季，而应该在解放北平之后立即着手进行。这样就会把一直在策划建立联合政府的国民党和美国人的如意算盘彻底打乱。

斯大林

1949年1月6日

请电告执行情况。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338页

联合政府可能在春季建立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9年1月10日)

菲利波夫同志：

1. 你一月六日的电报已收到。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完全失去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因此也失去了各种真正的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建立联合政府，不会有重大影响力。我们的联合政府可能在夏季建立，也可能稍稍提前一些，即春季，这样做不会有很大的困难。

2. 我军已彻底消灭了被围困在徐州附近的杜聿明指挥下十九个师的国民党精锐部队。

3. 占领天津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现决定：一月十三日攻打天津，占领天津后开始进攻北平，然后进攻太原和大同。

4. 今年春季我军主力将作休整，夏季可以南下，最迟七月底或八月初，一百五十万解放军正规军将横渡长江。他们在战斗意志和技术装备方面都将超过国民党军队。

到秋冬季我们有九成的把握，可以占领九个省，即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陕西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并占领以下城市：南京、武汉、宜昌、长沙、杭州、南昌、九江、安庆、芜湖、镇江、苏州、无锡、福州、西安。

至于上海，问题不在军事方面，我们深信，定能在今年冬季占领上海。问题在于燃料、粮食的供应和保障方面。是否采用强攻，我们还得考虑。

5. 代表团由毛泽东、任弼时和高岗等二十一人组成。我们期待您派飞机来接我们去莫斯科。现在我们急需前往您处。向您——我们

的大老板和联共（布）中央汇报，并听取您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345页

关于新政府筹建与国内状况

——毛泽东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9年6月12日）

绝密

兹报告：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委托我将他的报告转交给您。

下面是报告的全文：

一、您五月二十六日通过科瓦廖夫转来的电报收到。

除了已经请科瓦廖夫同志转交给您的报告外，我再给您写一份正式报告。从今年三月十九日和二十一日给您写了报告以后，已经过去两个半月了。现在还有一些问题向您汇报，请给予指示。

二、关于建立政府的问题。

现在我们决定在今年八至九月份建立政府。一切筹备工作在八月中旬完成。八月中旬或下旬可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政府。

筹备工作的内容如下：

1. 全国范围内有四十四个党派、社会组织、团体和无党派人士。这些组织中将选出五百名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和来宾。

2. 制订协商会议组织条例和权力。

3. 编制协商会议一般政治纲领草案，并预先进行讨论。

4. 在事先交换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协商会议的结构、组织基础和组成。由于长江以南区域的许多省份很快将归入我管辖地区，参加协商会议的代表和组织会比我们过去想象的更广泛。因此，协商会议将代表中国一半以上的地区和人民。

由于战争即将结束，过去根据以夺取战争胜利为重点而制订的一般政治纲领应该重新审查，在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基础上进行制订。

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组成应该围绕解决这个任务进行研究。一切筹备工作将在八月中旬加紧完成。因此，协商会议可以在九月中旬或下旬召开。从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来看，这个时间是合适的。

各界人士希望这次会议开得顺利，开得圆满。他们对这次会议寄予很大的希望。有些民主人士过去认为，会议应该在夺取广州和重庆之后召开，现今他们不再坚持了。

三、从国内外形势来看，有可能也有必要在今年冬季占领广州、南宁、昆明、贵阳、重庆、成都、青海、宁夏等城市和地区。为了防止帝国主义大国可能采取经济封锁和武装干涉，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1. 尽快消灭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残余。这是最主要的。如果中国大陆消灭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帝国主义将难以或无法实现经济封锁和干涉。

2. 建立沿海地区的防卫。

3. 做好经济自助的工作，摆脱一切可能的经济封锁。

.....^①

十、目前我们不但不能削减军队的人数，相反，由于在新解放的省份需要进行土地改革，还要建立地方部队，地方部队的人数要达到一百五十万。

因此，如果加上直属中央的部队和北方老区地方部队二百一十五万人以及常规部队一百五十万人（包括后勤部队、军事机关），在一定时期内我军的总人数可能会达到五百万人。达到这个数目之后，我们就可以逐步缩减部队的数量。到那时，中国有三百万人的部队（包括常规军和地方卫戍部队）就够了。

目前我们要缩减的不是部队，而是军事工业。

在长江以北的老解放区我们拥有一百六十个军工厂，有十万名工人和职员。

① 有关军事态势的介绍部分略。

从国内战争的需要来看，现在不需要生产武器和弹药。我们野战军打仗完全可以依靠战利品和从国民党手中夺来的军事工业满足战争的需要。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干涉，我们就可以逐渐地开始缩减军事工业，将军事工业转入生产民用产品。否则生产不需要的产品对我们没有好处。

为了建立国家的永久国防，需要在经济总计划中考虑列入建立符合国防目的的新军事工业的适当规划。这方面我们希望得到您的专家们的帮助。

十一、目前我们暂时没有大规模宣传和展示中苏友好关系的计划。我们的意见是：趁各民主党派代表赴苏联和东欧新民主国家之际，让他们深切地感觉到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以便消除他们中间某些错误的观点。

这样在民主政府成立之后，便于正式办理贷款和苏联专家工作的合同手续，同时将促使苏联专家们能名正言顺地在华工作。

政府将在八月成立，而民主人士要和我们一起在六至七月份召开协商会议，政府成立的筹备工作（十分紧张）。因此，赴苏事宜只得推迟，到政府成立之后再行。此事我们还没有与他们交换过意见。

十二、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未来的中国政府经济领导核心的结构不宜庞大，要灵活，应该适合中国国情。

十三，关于我们需要的苏联专家人数及其专业清单，我们六月九日已通过电报给您寄去。

致以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一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2卷第64页

要求访问苏联以及具体计划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8年4月26日）

斯大林同志：

1. 我已收到您四月二十日的来信^①，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

2. 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已经迁至河北省石家庄附近，并已经与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在一起。

3. 我们行经陕西省北部和河北省西北部，在那里，我们与来自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中共中央晋察冀局的同志以及群众进行了会谈。一路上我们看到，整党工作、土地改革工作、重建工作以及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工作，还有支援前线、救助难民的工作，无党派进步人士的工作，等等，都在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日本投降后的两年中在地方出现的“左”的倾向，已经得到了彻底纠正，到处都能感受到一种新的工作作风。

4. 我决定提前去苏联。我计划在月初离开河北的阜平县（石家庄以北一百公里），在军队的掩护下穿过北平—张家口的铁路（在这条铁路沿线，国民党已经集中了十万军队）。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在七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您那里。

陪同我前往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他曾多次去过苏联，对俄国比较了解。到哈尔滨后，我将再带上一位政治局委员陈云同志，他现在正在主管东北的工业和劳工运动，一九三六年他去过苏联。

除他们之外，我还要带上两名秘书、几个密码译员和无线电报务员。

① 见本书第24-25页。

我为这次访问苏联组织了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是因为我想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另外，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计划在苏联实地考察有关军事，经济、政府及政党的问题。

此外，如有可能，我想到东欧和东南欧访问一下，以便研究一下他们的人民阵线工作及其他工作。

我们计划访问一至三个月。如果您同意这个计划，我们就照此行事。当然，如果不能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自己来。

5. 我的身体不太好。我希望住在这里的两名俄国医生（其中一人会说汉语）陪我一同前往苏联，然后再随我回来。捷列宾的电台和我们同行。到达哈尔滨后，我们将把电台留在那里。

以上可否，请给我指示。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253页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建议延缓来访时间

(1948年5月10日)

毛泽东同志：

鉴于您行经的几个地区事态可能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傅作义的军队开始进攻蔚县，也就是您打算上我们这儿来访问必然经过的一些地区的那个方向。使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您的出访是否会影响事态的发展，而且您的旅程是否有安全保障。

根据这一点，您是否应该把来访往后延缓一下。如果您决定不延迟动身日期，请您通知我们，在您的旅途中我们是否能协助一下。我们把我们的飞机派给您，这样做，您是否认为合适。如果同意，请告诉我们，何时把飞机派到何处。

等待您的回复。

菲利波夫

1948年5月10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255页

同意延缓对苏联的访问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8年5月10日）

菲利波夫同志：

今天收到您的来信，非常感谢您。

鉴于目前形势，把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日程往后挪一小段时间是合适的。

为了我上你们那里去的旅程，请你们派飞机或轮船到山东半岛来。但是，最近几天我身体不好（头晕，脑袋很不舒服），不能经受飞机里发动机的震动声，需要作短时期的休整，然后才能坐飞机飞过来。飞机场和港口的地点待我问清楚后再告诉您。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257页

关于访问苏联的行程安排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8年7月4日)

致斯大林同志：

我的健康状况比前两个月好多了。我决定近期到您那儿去。

到你们那里去的路线有三条：航空、海路和陆路。但不管怎样，我们应该途经哈尔滨，因为我要和东北来的好些负责同志谈话。

我希望能坐飞机去，因为这样比较快捷，同时对我的健康状况比较合适，坐飞机可以使用石家庄和潍县的两个机场。

在潍县的那个机场离大连比较近，也比较安全。这个机场在潍县的南面，在二十里堡站上，即潍县和坊子之间。

机场的资料：从北到南长两千二百二十四米，从东到西宽三百六十八米，起飞跑道长两千米，宽九十六米。

但这里，敌人的运输机每天从早到晚一昼夜从青岛、济南飞越潍县及邻近地区往返六、七次之多。

你们让飞机从大连到潍县的机场来接我们会有什么困难吗？飞机降落在机场后，要停十五到二十分钟，必须停留这段时间，以便我们能乘坐上去。

如果你们认为在潍县机场运送我们出去不合适，那么在石家庄的机场还要困难些，因为距离你们更远，而且国民党的运输机同样常从那里飞过。

在这种情况下，请考虑是否有可能派船只到山东半岛的一个港口，荣成、俚岛或石岛，把我们载到大连。

如果在海上运送我们也有困难，那只好考虑走陆路。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即目前傅作义的主力部队正陷在河北省和热河东部的交界处的几个战役中，而平绥路上感觉相对较空，可以在部队的掩护和陪送下穿越平绥路，穿过热河省的解放区到哈尔滨。但是那段路我们要走一个月时间，在大热天里，可能因为我的病而在路上产生麻烦。如果能用飞机把我们从潍县的机场经大连（或其他点）送到哈尔滨，那么，我们就打算本月十五日左右乘汽车从石家庄附近的驻地出发，大约过一周后到达潍县，在那里逗留两到三天。我们希望，飞机能在本月二十五日飞到潍县来运送我们。

飞机来的具体时间（日、时）可以在我们来到万县之后，用无线电与你们一起确定。

如果你们决定走海路来接送我们，那么希望船能在这个月底到达指定的港口。我们在这个月十五日左右从石家庄邻近的驻地出发。

如果航空和海路接送我们都不可能，我们还是要在本月十五日左右出发到北方去，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到八月中旬才能到达哈尔滨。我们一行共有二十人（包括密码译员、无线电机务员、秘书），合计重量三千多公斤（包括这里所有人员）。因此，如果使用航空路线，那必须派两架客机（运输机）来。以上所列的几条路线，哪一条最适合，请你们决定，并通知我们。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七月四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266页

附录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请毛泽东改变访苏日期

（1948年7月14日）

捷列宾：

请将下列情况转告毛泽东：

由于粮食收购工作已经开始，领导同志们自八月起分赴各地，要在那里一直工作到十一月，为了有可能和所有的领导同志会面，因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行程改到11月底。

斯大林

1948年7月14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267页

附录 捷列宾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延期访苏

(1948年7月14日)

兹报告：

7月14日当地时间14时30分我将斯大林的电报转交给毛泽东。任弼时作了翻译。

毛泽东微笑地听完后说道，“好，好”，然后请求把以下文字转交给您，此文是他口授，由任弼时翻译的。

“斯大林同志：

同意您在7月14日来电中讲述的意见，把到您那里的行程延期到10月底至11月初。

毛泽东

七月十四日”

然后进行了短暂的谈话，将另文转告。

捷列宾

1948年7月14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267页

附录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对推迟访苏的反应

(1948年7月17日)

Φ. 库兹涅佐夫同志：

向您报告，当我把斯大林的电报转交给毛泽东时我个人的印象和观察。

听了任弼时翻译的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后，毛泽东问：“难道在苏联把粮食收购工作看得这么重要么？连党中央的领导人都分赴各地去干这项工作？”我作了肯定的问答，任弼时也说是这样的。毛泽东又问：“苏联的农业收入占多大百分比？其收益比工业多，还是少？”我回答说：“确切地说，怎样一个百分比，我现在也不知道，但不管怎样，这个百分比是很大的。”我又补充说：“在苏联，粮食收购工作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后来，毛泽东和任弼时都说，大概，不久大老板要去休假了。

这句话他们是用自己的语言^①说的，但我听懂了。这之后，毛泽东口授了这份给斯大林的回电。

据我6年多来对毛泽东的了解，他在听任弼时翻译时的微笑和说的“好，好”，并不意味着他对电报满意。这一点看来是很清楚的。

依我个人看法，毛泽东认为最坏的情况是拒绝给他派飞机和船只，但这一点对他来说也不大可信，特别是派飞机是莫斯科提议的。

他深信，他必须现在出访。看来，出访对他本人来说是必需的，他急切地等待着回音。

7月13日，按纯粹中国的习惯，他口授完自己的信后，我问他什么时候发出这信，是否可以等一天。毛泽东回答，他请求7月13日发出。

他已经完全准备好动身了。

近日，我开始知道，现在他们为莫斯科准备了一系列材料，如国民党军队在前线的布阵地图、国民党军队编制的资料。据我看，还有关于自己的材料，有对国民党的侦察情报，有关它的结构的资料，有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和其他的资料。毛泽东的手提箱已收拾好了，还买了皮鞋（他和这里所有的人都是

① 自己的语言，似指方言。——本书制作者注

穿布鞋的)，缝制了厚呢大衣。问题不仅是出访本身，而且日程他们也已决定，剩下的就只是如何走的问题。这样一来，他外表上现在很安详，有礼貌，并且很关切，这完全是中国式的客气。他内心真正的感受难以看到。从任弼时的整个外表看，令人清楚地感觉到他没有意料到要推迟出行。

梅利尼科夫对我说，7月15日毛泽东也同样问过他关于粮食收购的问题。

捷列宾

1948年7月17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268页

关于访问苏联的一些主要想法

——捷列宾转告的毛泽东谈话

（1948年7月28日）

致库兹涅佐夫同志：

我把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一小部分谈话转告您。

毛泽东说，如果在一九四七年，他本来并不急于到莫斯科去，现在在一九四八年，形势变了，他想快点到莫斯科去。在那里他有很多事情要谈一谈，有一些问题他想请求给他出些主意，另一些问题需要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他提供一些帮助。

毛泽东要在莫斯科谈的几个问题主要是：

1. 关于与小的民主党派和团体（及民主活动家）的关系：关于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2. 关于同东方的革命力量的联合，同东方的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之间的关系。
3. 关于对美国及蒋介石斗争的战略计划。
4. 关于恢复并创建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包括军工、采矿业、道路交通——铁路和公路。到那里谈谈我们（中国共产党）需要些什么。
5. 关于价值三千万美元的银元贷款。
6. 关于与英、法建立外交关系方面的政策（路线）。
7. 还有一系列重要问题要谈。

综上所述，毛泽东着重强调：“必须谈妥，以便我们的政策方针要与苏联完全一致。”

关于会谈的其他方面，我将另文简要地向您转达。

捷列宾

1948年7月28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269页

按上次电报指定的时间到莫斯科来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①

（1948年9月28日）

.....

9. 由于一系列问题需要亲自向联共（布）中央及大老板报告，为取得其指示，我打算按上次电报中指定的时间到莫斯科来。现在我暂时简单地报告以上这些。请您务必把这转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真诚地希望他们能给我们作指示。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283页

① 该档案在俄国出版物中公布的是节录。

附录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关于毛泽东访苏的时间

(1948年10月17日)

致捷列宾：

请转交给毛泽东下列内容：

您 1948 年 9 月 28 日的来信收悉。向联共（布）中央通报了这封信件，这里的领导同志们会很高兴于 11 月底在莫斯科与您相见，这是事先已经讲好了的。那时，可以对所有的问题交换意见。

斯大林

1948 年 10 月 17 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 1 卷第 286 页

附录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访苏要求

(1948年10月17日)

库兹涅佐夫同志：

看完师哲的译文，毛泽东马上问我：“是否可以认为，将会派飞机来？”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件事，电报里没有提及这件事。以后，毛泽东说，如果不派飞机来，那他不可能按时到达。接着，他说，在7月份，他写过，有三条路，现在两条路——走陆路和水路已不可能了，只剩下一条路线——航空。他请求我问您，是否会派飞机来。

对我试图回避以我的名义来询问这个问题，他不满意。他这样说：“那就请您写上：毛泽东请求通知他，是否将派飞机来。”接着，他详细地说明了为什么那两条路已不能走的理由。

然后，他逐字逐句地口授，并由师哲译出下列内容：“请写下，在会谈时，毛泽东请求我（捷列宾），以我（捷列宾）的名义把与毛泽东关于赴莫斯科访问的会谈转达给您：

1. 陆路仍旧很艰难，这条路被敌人截断了，并且路途很长。水路，由于国民党的舰队加强监视和侦察，同样是不安全的。因此，决定请求派飞机来。

2. 在胶东铁路附近危险少一些，特别是，那里有一个很好的机场（毛泽东指的是潍县机场），时间在11月中旬是最适合。

当飞机已准备就绪时，请通知我们，那时，我们从石家庄附近的地区出发到机场去。这可以完全不用在哈尔滨停留，而直接飞到莫斯科去。”

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在平绥路地区有战事，路途很长，又不方便，天气也对出行不利。

他强调说，在哈尔滨他不仅无事可做，还不好露面。言下之意，指的是在那里有许多非党民主活动家。

他再三指出，启程的日子根据飞机的准备程度，由你们来定。他会在指定的日子到达机场的。

他估算，一共应去18人，如果只来一架飞机，那将只能少带一些人去，这不太方便，但总归可以成行。

他建议把人和行李的数量与任弼时确定一下，人和行李的数量还和7月时确定的一样。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但未必会有变化，他会马上报告的。决定不带陈伯达去，而叶剑英可能去。

总而言之，在最近的半个月里。每逢相遇，在方便的场合，毛泽东就再三强调，他必须出发，他已准备好出发，他将准时到达。

任弼时直接问，我是怎样看的，飞机是否会来，什么时候来。他说，毛泽东写信说，飞机会在指定的日子抵达，他们知道，没有飞机，他们不可能在这个日期到达，等等。

10月17日发来的电报更进一步坚定他们的信心，他们把“事先已经讲好了的”这句话看成是会来飞机。他们的问题以及建议我自己以我的名义来向您询问，飞机是否会来，什么时候来，令我实在尴尬。

同时，他们准备在这里过冬，毛泽东和任弼时都已准备了取暖设备。对此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没有飞机，他们是不会走陆路去的。

我再次请求您，如果有可能的话，请就这个问题给我指明行动方针。

捷列宾

1948年10月17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283页

附录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关于派飞机接毛泽东事
(1948年10月21日)

致捷列宾：

请转告毛泽东，您收到莫斯科的指示并要求转告他，11月中旬将派来两架客机，他和他的随从人员将被送往莫斯科。飞机飞来的日期和航线适当的时候会明确告知。

库兹涅佐夫

1948年10月21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288页

把我前往莫斯科的日期推迟一下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8年11月21日)

斯大林同志：

近日我偶染微恙，在苏联大夫的帮助下健康状况已略感好转，但尚需休息几天。此外，徐州城下的战斗正处于最激烈的阶段。同时还须组织唐山—天津—北平一带地区的战役。

为此，只能把我前往莫斯科的日期推迟一下。原先确定在十一月中旬启程，在十一月底能到达莫斯科，而如今预定在十二月份动身，即十二月中旬或十二月底才能到达莫斯科。

是否可行，盼您回复。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300页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推迟几天访苏是正确的

(1948年11月23日)

绝密

毛泽东同志：

您 11 月 21 日来信收悉。

由于前方战事，情况有变，您把到我处访问的日期推迟几天，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的。

当形势允许您能实现来莫斯科访问的愿望时，请提前几天把日期和地点通知我们。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飞机给您派过去。

祝您早日完全康复。

菲利波夫

1948 年 11 月 23 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 1 卷第 301 页

我准备到您那里去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9年1月9日)

斯大林同志！

最近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闭幕了。

我准备到您那里去。^①

为了缩短时间，我希望您派两架飞机到石家庄，最好是四引擎的。来石家庄的飞机可以在十八、十九、二十日中任何一天到达。

如果您认为技术准备时间不够，可以延后几天。飞机到达的具体日期最后由您决定，然后告诉我。

为了安全起见，飞机到达上述地点的时间最好是清晨。与我一起访问的有二十一人。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九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341页

①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出所谓“国共和谈”呼吁，并于1月9日要求苏、美、英、法等国充当调停人。为反击这一“和谈”阴谋，毛泽东这次访苏没有成行。参见本卷第55页。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南京政府提出和谈建议

(1949年1月10日)

毛泽东同志：

1月9日收到南京政府照会，建议苏联政府充当南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停战和签订和约的调停人。类似的建议也同时发给了美、英、法三国政府。南京政府尚未得到上述三国政府的答复。苏联政府也还未予答复。一切迹象表明，南京政府的建议是在美国人的授意之下搞出来的。该建议的用心乃是要宣告南京政府赞成停战，主张实现和平，而中国共产党若是断然拒绝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那就是主张将战争继续打下去。

我们考虑这样回答：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向赞成在中国实现停战和和平，但在同意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共方面是否愿意接受苏联充当调停人。因此，苏联希望中共方面得到中国政府关于和谈倡议的通知，并征得中共方面对苏联充当调停人的同意。我们考虑这样回答，是否同意，请告知。如果不同意，请告诉我们更为合适的答复。

我们还认为，如果征询您的意见，您应做大致如此的回答：中国共产党赞成在中国实现和平，因为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后者应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谈判，但是不能让挑起中国内战的那些战犯参加。中国共产党主张直接同国民党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调停人。中国共产党尤其认为，那个派遣军队和舰只直接参与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外部大国不能充当调停人，因为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采取中立和客观的态度来结束中国内战的。我们认为，你们的答复大体上应该如此。

如你们有不同意见，请将你们的意见告知我们。

至于说到您的莫斯科之行，十分抱歉，我们以为，鉴于上述情况，您还得将启程的日期再推迟一些时日，因为在此种情况下您的莫斯科之行会被敌人利用来败坏中国共产党的声誉，攻击中共是依附于莫斯科的附庸力量。当然，这无论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苏联都是不利的。

早复为盼。

菲利波夫

1949年1月10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346页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继续进行解放战争直到胜利

（1949年1月11日）

如前电所述，我们草拟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方案，其用意在于阻止和平谈判。十分明显，国民党不会在没有外国列强，尤其是美国充当调停人的情况下进行和平谈判。同样明显的是，国民党也不愿在没有蒋介石及其他战争罪犯参加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此，我们料想国民党会拒绝按照中共提出的条件举行谈判。其结局是，中共是赞成和谈的，因而他们不能污蔑中共蓄意继续国内战争。于是，国民党就成了破坏和谈的罪魁祸首。这样一来，国民党与美国的和谈花招就会被戳穿，你们也可以继续进行解放战争直到胜利。

早复为盼。

菲利波夫

1949年1月11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347页

拒绝接受国民党的和谈建议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9年1月12日）

菲利波夫同志：

一月十日电收悉。

一、我们认为，对南京政府建议由苏联出面调停以结束中国内战的照会，苏联政府似应作如下答复：

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但是，如何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停是不可接受的。

二、我们认为，美国、英国和法国，特别是美国，尽管对参与结束中国内战的调停工作极感兴趣，从而达到使国民党政权保存下来之目的，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已经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信誉扫地，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取得胜利已为期不远，国民党政权的覆亡也已成为定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强是否还愿意继续扶植南京政府，从而继续与人民解放军作对，看来都成为问题了。

只有苏联在中国人民当中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如果苏联在答复南京政府照会时采取您一月十日电文中陈述的立场，那么这将导致美国、英国和法国认为参加调停是义务（苏联参与调停是应当的），导致国民党找到借口诬蔑我们是好战分子。

而对国民党不满和指望人民解放军迅速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会失望。

因此，苏联如果从国际关系的整体利益考虑，在复照中能够采取

我们提出的立场，则我们殷切希望您能接受我们的建议。您若能这样做，那将是对我们的巨大帮助。

三、关于是否允许南京政府人员，包括战犯在内，与我们进行和平谈判，还需斟酌一番。目前，我们倾向于采取这样的立场：为使中国人民能够尽快地得到真正的和平，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

战争是由南京政府挑起的，它犯下了滔天罪行，全国人民已不再信任它。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和实现和平，南京政府应该将政权交给人民。它没有任何理由存在下去。

我们认为，如果现在与张治中、邵力子等人进行和平谈判，并且以这些人的名义与我们一道组成联合政府，那么这刚好符合美国政府的心意。

而这样做却对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造成很大的混乱，也会使我们现在所坚持的完全正义的立场遭到严重损害。

自一九四七年七月以来，我们一直细心地注意到谈判的欺骗性，只要国民党在军事上遭到失败，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就必然要求进行谈判，我们还注意到这种骗局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何种程度的影响。

令我们深感忧虑的是：这种骗局将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影响，将迫使我们再一次做出政治上的妥协，也就是说不能不同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我们暂缓建立联合政府。这样做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要使美国人和国民党分子打出他们所有的王牌，而我们则是在最后时刻才打出自己的王牌。

不久前，我们公布了战犯名单，共计四十三人，是以非正式形式（权威人士声明）公布的。人民解放军尚未发出缉拿这些战犯的逮捕令。

一月一日，蒋介石提出了和平建议。对此我们同样还是以非正式的形式（记者评论）作了回答。

总之，我们已为转折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看一看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对国民党的和谈骗局作何反应。

现在我们有理由拒绝接受国民党和谈，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形势也不利于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就可渡江进攻南京。

我们似乎不再需要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在现在的形势下，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弊多利少。

四、感谢您就如此重大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若您不同意我的上述意见，或您对之有何修改意见，请告知。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二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347页

附录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反对参加任何谈判

（1949年1月13日）

Φ. 库兹涅佐夫同志：

这是答复的最重要内容。

毛泽东谈得很尖锐。他反对各种形式的调停，并反对中共参加任何谈判。

现在国民党会同意一切条件，但是谈判还是无法进行。

关于莫斯科之行。

看来，如果毛泽东在近期，最早1月底前，不能成行的话，可能他就无法去莫斯科了。

师哲讲得直截了当。

捷列宾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352页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抓住和平旗帜这一重要武器

（1949年1月14日）

致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南京政府和谈建议的长电收悉。

一、倘若南京政府根本没有提出和平建议，倘若美国搞的这套和谈花招根本都不存在，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显然，这套花招是不符合我们意愿的，因为它可能会给我们共同的事业造成麻烦。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花招出现了，它的存在是个事实，对这一事实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而必须予以重视。

二、毫无疑问，南京方面和美国人的和平建议是一种欺骗政策。这是因为，首先，南京方面事实上并不想同中共和谈，与中共和谈就意味着国民党要放弃其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基本政策，而放弃这一基本政策，就会导致国民党领导人在政治上的灭亡和国民党军队的彻底崩溃。其次，他们懂得，共产党不会与国民党和谈，因为共产党也不会放弃其消灭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基本政策。

那么，南京方面的企图究竟是什么呢？他们的企图不是与共产党实现和解，而是与共产党休战，暂时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利用休战作为喘息之机，整顿国民党军队，加强长江南岸的防卫，从美国调运武器装备，积蓄力量，然后再撕毁停战协议，向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并将破坏和谈的罪名转嫁到共产党的头上。最起码他们的企图是要阻挠共产党将国民党军队彻底击垮。

这就是南京方面和美国人目前所推行的欺骗政策的核心。

三、如何对付南京和美国的这种手法，可以有两种答复。第一种，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拒绝南京政府的和平建议，并宣布必须继续内战。但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意味着，你们在桌子上亮出了底牌，把和平旗帜这一重要武器交到了国民党分子的手中。其次，这意味着你们帮助我们在中国国内外的敌人，让他们诬蔑共产党是继续内战的拥护者，而称颂国民党是和平的捍卫者。第三，这意味着你们给了美国在欧洲和美洲大造社会舆论的可能性，说无法与共产党进行和谈，因为它不想要和平，说在中国实现和平的唯一手段是组织大国的武装干涉，就像1918年到1921年的4年时间里对俄国所进行的干涉那样。

我们认为，对待忠诚的朋友采用直截了当、毫不掩饰的方式是恰当的，可是，如果与南京政府这样的政治骗子打交道，直截了当、毫不掩饰的回答可能是危险的。

是否可以采用另一种回答方式。这便是：第一，表示愿意在中国实现和平；第二，国共双方应在没有外国调停人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为中国是个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外国调停人；第三，谈判应当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进行，而不是与挑起内战并因此而失去民心的南京政府进行谈判；第四，一旦双方就和平与中国的领导权问题达成协议，军事行动就应当立即停止。

国民党是否会接受这些条件呢？我们认为不会。一旦国民党不接受这些条件，那么人民就会明白，继续打内战的罪魁祸首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这样，和平的旗帜就落在了共产党手里。这一局面目前尤为重要，因为中国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厌恶内战的人，他们愿意支持那些主张实现和平的人。

但假定——我们认为这种假定是根本不可能的——国民党接受了这些条件，共产党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计划呢？

第一，不能停止军事行动，要建立中央联合政府机构，并将五分之三的政治协商会议席位、三分之二的政府部长职位留给共产党，而将余下的议员席位和部长职位分配给其他民主党派和国民党。

第二，应当把总理，总司令并尽可能地把总统的职位，都留给共产党。

第三，应当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这样建立起来的联合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而其他任何妄想篡夺中国政府地位的政府都是欺世盗名的叛乱集团，应予以取缔。

最后，应当通过联合政府，不但向你们的军队，也向国民党军队发布命令，要求军队宣誓效忠联合政府，并保证立即停止对那些已宣誓效忠的军队采取军事行动，而对拒不宣誓的军队继续采取军事行动。

国民党方面未必会接受这些措施，但是只要他们不接受，事情就会于他们更为不利，因为那样他们将会被彻底孤立，而这些措施也将在没有国民党人的情况下执行。

四、以上便是我们对事情的理解及给你们的建议。或许我们在前电中没能把我们的建议完完全全地表述清楚。

请你们把我们的建议仅仅看作是建议，而不是要求你们必须做这做那，你们可以接受这些建议，也可以不接受。你们尽管相信，拒绝这些建议是不会影

响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地做你们的朋友。

五、至于说我们对南京方面调停建议的答复，我们将根据你们的意愿来起草。

六、我们依然坚持认为，您最好暂缓您的莫斯科之行，因为目前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如您愿意，我们可以马上派一位政治局负责成员到你们那里去，在哈尔滨或其他什么地方就你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商谈。

菲利波夫

1949年1月14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352页

同意举行国共和谈的八项条件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9年1月14日）

菲利波夫同志：

一，一月十一日续电收悉，我感到十分欣慰。在基本方针上（利用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与您是完全一致的。

今天，我们公布了我们同意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这些条件是针对蒋介石一月一日在其和谈建议中提出的五项反动条件提出来的。

几天以前美国人已经试探过我们的反应，想了解我们是否愿意在没有四十三个战犯参加的情况下举行谈判。可见，仅这一项条件，即在战犯参加的情况下举行谈判，已不足以戳穿国民党和平谈判的阴谋。

二、因捷列宾同志的无线电台很忙，请您吩咐你们在沈阳的同志把我们的声明转交给您。

三、在国民党发表和谈建议之后，国统区出现了极大的慌乱，人民大规模地要求国民党恢复和平，谴责国民党提出的条件甚为苛刻。

国民党的宣传机关匆忙出来解释国民党为什么必须维护自己的合法地位和为什么必须掌握军队。我们认为，国民党内部的这种混乱局面还将进一步扩大。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问题应该认为是解决了

（1949年1月15日）

毛泽东同志：

我们刚收到了您发来的简短电报，知悉我们对南京政府和谈建议的看法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了“和平”运动。就是说，问题应该认为是解决了。

菲利波夫

1949年1月15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355页

欢迎联共（布）政治局委员来华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9年1月17日）

菲利波夫同志：

1. 您一月十四、十五日拍发的两份电报均已收到。
2. 我决定暂时推迟苏联之行。
3. 我们非常欢迎您派政治局委员到中国来。

石家庄是他到达的最合适的地方，这个地方比较隐蔽，由此可直接到达我党中央驻地。在那里可以就一系列问题（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有关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五位同志进行交谈。

石家庄到山海关的铁路交通尚未恢复，石家庄到哈尔滨一个来回至少需要二十天。有许多民主党派代表住在沈阳，如果途经沈阳的话，势必不能做到保密。因此你们的同志乘飞机来石家庄比较容易保密。

如果您同意这个方案，最好让他在一月底或二月初来。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359页

联共（布）代表到达的时间和地点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9年1月28日）

绝密

斯大林同志：

特别请求你们的代表于二月二日至五日抵达石家庄。这样较为妥当，因为有一个民主党派代表团来到我们这里，他们将在二月一日前离开石家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364页

已委派朱德和任弼时迎接联共(布)代表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49年1月28日)

绝密
急电

斯大林同志：

根据您指定的时间，你们的代表即在一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到来。

关于民主人士的访问计划，我们可以另行安排。

中央书记处已委派朱德和任弼时同志迎接他。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十七时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365页

附录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到达石家庄及与毛泽东的会面

（1949年1月30日）

斯大林：

抵达石家庄

今天，一月三十日，一大早就在石家庄附近的机场着陆了。机场是带水泥跑道、日军样式的。飞机马上就向远东地区返航了。

朱德总司令，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主任任弼时和毛泽东的翻译师哲迎接了我们。

同毛泽东的会面

在乡间土道上颠簸了六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指定地点。

毛泽东在询问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志的健康之后，把政治局委员叫到了自己这里，向我介绍了他们。他说：中央书记处由在座的五位政治局委员组成，除了他一个人之外，其余各位同志都在不同时期到过苏联。

除了毛泽东，书记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

此外，在吃饭期间和饭后进行了会谈。关于会谈的内容另行告知^①。

米高扬

1949年1月30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366页

① 米高扬在西柏坡期间，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和中共历史、军队状况、对外政策等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并将会谈内容及时电告了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

中国的军事状况和中共的历史情况

——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纪要

（1949年1月30日）

绝密

第一次与毛泽东会谈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以及毛泽东的翻译师哲。我方И.科瓦廖夫^①和E.科瓦廖夫^②也参加了会谈。

几句有关旅途情况的简短问答以后，毛泽东主动详尽地谈起了中国的军事状况。

中国的军事状况

毛泽东声称，中国革命的军事阶段实际上可以算是结束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人口有二点六亿人，解放区有二点一亿人。共产党军队有二百二十万人，其中一百二十万人在南京地区，九十万人（林彪部队）在北平、天津地区。国民党总共只有一百一十万人，而且分散在从乌鲁木齐到上海等地区，因此机动部队很少。除了四个师之外，国民党各师都被我们打败过数次，因此战斗力是较弱的。被美军人装备起来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或者已被消灭，或者已缴械投降。在武汉驻军的白崇禧曾派自己的代表到共产党的三个地方代表驻地进行谈判，已经达成了协议。白崇禧将两个师派到上海和南京，要求李宗仁罢免孙科的行政院长职务。我们知道，蒋介石将行政院长的职务交给孙科，

① И.科瓦廖夫，1948年被派到东北帮助修复长春铁路，后任驻华苏联经济顾问组组长，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

② E.科瓦廖夫，米高扬访华时的随身翻译。

是为了将来他退休后,可以在幕后操纵政府。从共产党掌握的文件资料来看,蒋介石在退休之后还会继续指挥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在西安。国民党将在南方和浙江沿海地区组织反抗,不会再坚守南京和上海。

按照毛泽东的看法,从南京和上海的资本家、舆论界的情绪来看,可以按照北平的道路获取这两个城市,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不经战争夺取,而不使这两个城市遭受破坏。但是,共产党人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是从最坏处着想的。他们在进行着准备,在进行休整和军力准备之后夺取这两个城市。北平的和平解放使这些军队缩短了休整的时间。不仅需要时间休息,还需要时间:

1. 来消化数十万最近加入解放军的国民党俘虏,对其进行教育。
2. 整顿后方,恢复被破坏的、向前线提供供给的铁路。
3. 把现在生产的子弹和炮弹集中起来,因为储存的很少。对美式、日式、捷克斯洛伐克式和苏式武器的弹药的需求使得事情复杂起来。
4. 也需要时间培训一些干部,对上海和南京地区进行管理,因为不能完全依靠当地的干部。目前在对两万人进行培训。还需要一些条件来废除在华北的傅作义军队的国民党管理机构。
5. 还需要时间对上海和南京地区的经济管理进行准备。这里的粮食太少了,应当储存。我们还来不及为这些地区印制货币。

人民解放军对南京的占领要推迟到四月份。当然,可以现在进攻,但成功的机会只有80%,到四月份成功的机会是百分之百。为了在南京、上海地区取得必定的胜利,需要把林彪的部队——最优秀的部队从北平地区向南部和西部派遣,以便使国民党没有机会从这里向南京地区增援。北平的情况较复杂要一段时间来好好巩固。

傅作义的军队还没有撤出北平。我们想,明天、后天他们将会撤出。暂时仍然需要国民党军队守护仓库,维护城内秩序。最近几天,我们将把我们自己的四个师开进北平,逐步替换国民党的防守。任命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市联合管理处,其中4名共产党员,主任为叶剑

英（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傅作义的部队有二十万人，将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调到南京^①的东北方向，另一部分调到南京的西南方向，在那里对他们进行改编。因为这些部队没有在战斗中被击溃，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我们投诚的，进行改编的进程将是复杂的、有阶段的。第一阶段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阶段不会进行任何的改编，所有的力量都用在宣传方面，从内部对其进行分化。第二阶段，将反动透顶的军官清除出各师，声名狼藉者开除出军队，其他人送到政治训练班，一部分用于培训后备力量，大部分人将被遣送回家。第三阶段进行真正的改编，目的是将被改编队伍中的国民党分子打乱，掺和到人民解放军队伍中，每三个原国民党分子安排八名人民解放军战士。在这样的改编基本完成之前，把我军的主力调遣进入北平是危险的。

我提出如下问题：暂停进攻二至三个月能否使国民党得到喘息，以使其消除恐慌、积聚力量和组织抵抗？因为南京对和平条件的同意表明，他们是多么需要喘息的时间。对此毛泽东的答复如下：国民党的和谈企图不仅不会削弱共产党人，反而会使其力量得到了加强，并使国民党队伍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以致其再也无法恢复过来。国民党还会组织抵抗，但不会组织起任何有力量的抵抗。一旦共产党结束准备并有把握地发动攻击，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就将被消灭。

关于共产党对待自己的错误问题

接下来毛泽东说，他想跟我讨论对外政策问题、军事问题、经济问题和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关于这一点，他说：“请注意，中国是如此地落后于俄国，我们是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会犯很多错误，如果以俄国的标准来看待我们的工作，那么，我们就一无是处。”

我回答说，或许这些话证明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谦虚，却难以让

^① 原文如此。应为北平。

人赞同。如果是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领导中国国内战争二十年的时间，并使其走向这样的胜利。至于错误，则是每个积极活动的党都经常会犯的。我们的党也犯错误，但是，党要坚定地遵循无情揭露自己的错误的准则，以便吸取教训，不再重犯。

毛泽东补充说，他们经常犯错误，但也经常改正错误，并举了一个例子。一九四六年中共中央在开展土地改革的时候犯了错误。当时才明白，原来他们早在一九三三关于土地改革时记录下来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在一九四六年却忘了。如果在一九四六年再看到关于这些错误的材料，就不会再犯这些错误了。他们在一九四六年再版了一九三三年关于土地改革的材料，公开向农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因为领导要对基层干部的错误负责，尽管领导自己没有犯下这些错误。

我指出，不能同意毛泽东的如下论断：如果用俄国的标准来看待中国革命，那么就一无是处。第一，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第二，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而运用俄国的标准是不正确的。

为证明这点，毛泽东说，一九三六年^①中共在苏区表现出了教条主义，照搬了苏联的方法，这在当时造成了重大的失败。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话：“尽管中国比俄国落后，但我认为，中国的农民比美国所有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都觉悟。”

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共干部

他接着说，中共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以前他们认为，干部应当读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现在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干部在学习这些著作的同时，在进行大量的实践工作。因此，他们决定要求自己的干部读完十二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举出了这些著作（宣言、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等）之后，他没有再举出一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① 原文如此。应为1934年。

我就问毛泽东，在对中共干部进行党的教育的十二部著作中没有一部是中国领导人的、对中国革命经验从理论上进行阐述的著作，这是否正确。

毛泽东回答说，作为党的一名领导人，他没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什么新的贡献，也不能把自己放在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同等的位置。为斯大林健康干杯时，他强调指出，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是现今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斯大林不仅是苏联人民的导师，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导师。关于自己，毛泽东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不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有多重要，它们只是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对其没有任何的丰富。此外，他还亲自向各地发送了措辞严厉的电报，禁止把他的名字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相提并论，尽管在这一问题上他不得不同自己最亲近的同志进行争论。

我回答说，这说明了毛泽东的谦虚，但不能对此表示同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不是被机械地加以运用的，而是考虑到了中国的具体条件，并以此为基础的。中国革命有自己的道路，它表现出了反帝革命的面貌。因此，对中共经验的阐释不是没有理论价值的，不会不丰富马克思主义科学。难道也能够否认有关中国经验的概括对于亚洲革命运动的理论价值？当然不能。

毛泽东指出，在他们那里，为反对党的路线，王明的支持者对中国特点进行了强烈的抨击。

对此，我指出，通常民族分子会利用自己国家具体的历史特点，使他们的党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改造，马克思主义者也应该利用这些特点，以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式领导革命。毛泽东没有对此进行争论。

会谈就此结束。

当前的工作方针和对外政策

——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纪要

(1949年1月31日)

与毛泽东的第二次会谈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和翻译师哲。我方И.科瓦廖夫和Е.科瓦廖夫也参加了会谈。

毛泽东谈了下面的事：

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准备工作

……（这方面内容基本上与一月三十一日致斯大林信一样，故略）

关于联共（布）中央在中共中央的代表机构

稍稍休息后，毛泽东提出了联共（布）中央在中共中央设立代表机构的问题。他要求派遣政治上成熟的同志作为代表，这样可以与他讨论双方感兴趣的问题。他要求给该代表处配备 10 人，其中有懂得汉语的同志，以便能够对中共中央发送的材料进行研究。

我回答说，我们的中央原则上同意设立这样的代表机构，现在正在挑选干部。

接下来毛泽东说，我在这里待四至五天时间太短了，他们要我在他们那里待上十天。但我回答说，争取在五天之内同他们结束所有问题的讨论。这时我告诉毛泽东，有两名定时炸弹和窃听装置的苏联专家同我一起到来，以便为中共提供帮助。毛泽东对我的这一通报非常满意，并感谢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关心。

国内战争前线的局势和中共的武装力量

在谈到在汉口战场上的白崇禧部队时，毛泽东说，白崇禧是一个

最阴险的将军，跟他斗比跟傅作义斗更复杂。但是我们准备战胜他，况且他对蒋介石采取两面派的政策。为了保住自己的脸面，他想在离开汉口时不被人认为，他是撤退或者投降了。因此在我们包围他之前，他会自己把汉口地区让出来，撤到广西省。他的代表与我们有联络，我们对白崇禧的心态有所了解。

后来毛泽东指着地图给我们讲述了一些战场的战斗情况，重复了昨天会谈中的一些事实。他说，目前他们的武装力量人数超过三百万，如果加上经过政治训练的被俘的傅作义的部队，他们武装力量总人数达到三百一十万人。其中二百二十万人是正规军。驻扎在北平—天津的林彪部队共有九十万人，约有一百三十万人在南京战场上。

在回答我提出的关于何时准备拿下太原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他们将在今年二月底攻打阎锡山部队。

我问，他们何时准备强攻西安，毛泽东回答说，他们打算在攻占太原之后再进攻西安。他补充说，他们在前线的个别地区可以强攻，并很快夺取城市。但使情况复杂的是，他们急缺在政治上训练有素的干部，以便通过他们控制新的地区。

毛泽东说，他们正着手强攻长江的准备工作。打算调九十万兵力到上海—南京战场，汉口战场也调九十万人，三十五万人调到西安。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组建军事行政机关他们是如何考虑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他们准备建立军事部。

毛泽东继续说，今天，他们有3条战线：林彪部队作战的华北战线，陈毅领导的南京—上海战线，陈赓指挥的西安战线。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是哪个组织协调各战线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是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

毛泽东又回到前线的问题，他说，三条战线共有四个野战军，其中包括十四个兵团或五十七个军。每个兵团平均由三个军组成，每个

军有三个师，而东北各军除外，在那里每个军有四个师。总共有一百八十一一个师。军中的政治工作由军事委员会领导。每个军、师和团里都有党的委员会。部队里中共党员的人数约占30%。人民解放军的士气和政治状况是健康的，没有发现有转向国民党的现象。当然，部队中也有缺点，表现在无纪律和无政府主义方面。这是因为受到国民党的影响。现在我们正在对此进行强有力的斗争。我们召开党的会议，对发现的缺点进行尖锐的批评，不管对威望是否会有所损害。

军区的领导

毛泽东说，他们有五个中央局。

1. 中共中央东北局；2. 中共中央华北局；3. 中共中央华东局；4. 中共中央华中局；5. 中共中央西南局。

根据对党组织的这种划分，组建了五个军区，以便于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军区的领导工作通常由中共中央相应的局来抓。

国民党的海军力量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福摩萨^①的局势问题，毛泽东回答说，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正在建立海军基地。但是蒋介石的这种企图遭到岛上六百万人民的反对。为了巩固自己影响，蒋介石把以陈诚省长为首的备受信任的人员派到了台湾。毛泽东相信国民党的海军和空军迟早会转到人民解放军这一边。他说，已经派代表到国民党海军，特别是长江海军部队。已经有八架国民党飞机转向我们，其中有一架B-34型的重型轰炸机于晚间在石家庄地区降落。在轰炸机的指挥人员中有三名共产党员。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在葫芦岛上是否有国民党海军的问题，毛泽东做了否定的回答，他说，现在国民党的海军基地在青岛、上海、广东、福摩萨和福州。

① 原文如此，即台湾。

工人状况及其作用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他们是否有从事地下工作的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在上海和广州都有，但人数不多。

我问起上海的工人状况及其作用，毛泽东回答说，共产党在农村中有深远的影响，在那里没有竞争者。但城市中情况不是这样，如果说在学生中共产党的影响很大，那么，在工人阶级中国国民党的影响要超过共产党。例如，日本在上海投降后，共产党开始合法地工作，它对上海工人的影响是这样的：在上海的五十万工人中有二十万人受共产党的影响，其他三十万人则受国民党的影响。

干部

现在主要问题是干部。我们挑选了约五点三万人，打算把他们派往前不久解放的地区。由于缺乏干部，我们无法管理城市的经济，因此不必急于占领上海。

我说，他只看到管理上海的困难，没有发现占领上海后的许多益处，到时候中国工业中心的一支五十万人的工人大军将为共产党工作，他没有看到，这一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会从自己的队伍中推选出许多宝贵的、对党忠诚的干部来加强党和革命的社会基础，对落后的中国产生影响。对此，毛泽东无言以答。

工会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在中国，工会工作由谁领导，毛泽东除了指出工联主席陈云之外，还指出了他的副手李立三。毛泽东说，李立三在过去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有自己的派别，但现在的表现很好。托洛茨基主义者目前在我们这里没有任何的影响。

我说，在对工会的领导中，应当支持那些完全忠于党、同工人紧密联系的干部，不能允许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担任工会的领导。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表现良好，这一事实证明不了什么，因为中国革命现在处于高潮。一旦出现谁都无法保证避免的困难，托洛茨基主义者就

会利用工人中的落后分子，用他们来反对共产党。现在不能让国民党在工人阶级中取得这样的优势。如果共产党能够在农村基本上取得独一无二的地位，那么它就更加应该在工人中得到独有的影响，并把它们中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国民党头子排除在外。我的这些话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青年、妇女工作

我问起了青年、妇女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回答说，这是他们工作中的最薄弱的部分。

借此机会，我援引苏联的经验强调了青年和妇女工作对革命的重大意义。

对此，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说，他们将采取一切措施加强青年、妇女工作。

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

随后毛泽东提起了即将与南京政府进行的和谈问题。他说这件事不急，代表团尚未选派，成员名单也没有通知国民党政府。因为谈判的地点确定在北平，北平的傅作义投降部队还未清理完毕，整顿城市的秩序还需两周时间。事实上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在2月底可以开始。代表团将全部由共产党员组成，但他们打算与参加联合政府的其他党派协商，这是以前预先商量好的。中共中央大约在2月20日前迁到北平。

毛泽东说，去年十一月份他们曾向联共（布）中央通报，人民解放军将在两年半时间内消灭国民党。就在最近六个月内，虽然我们还没有全部消灭国民党，但国民党已经处在灭亡的边缘。国民党彻底脱离了人民，威信扫地。它的和谈建议，是不得已而为之，要手腕，是要得到暂时喘息，以便积蓄力量与我们对抗。我们真诚地提出了八项和谈条件，他们不会接受这些条件，蒋介石跑到奉化，李宗仁接替他的位子，就是明证。国民党政府已名存实亡。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分别

逃往各处，如在上海的孙科。CC派在加强对国民党的社会舆论的操弄。至于美国，似乎可以感到，他们不倾向支持蒋介石，将希望寄托在李宗仁、邵力子和张治中身上。国民党政府领导人逃离的这个事实，使英国、美国和法国只得声明不再干涉中国内政，尤其是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声称，他们在等待人民解放军的到来。民主党派的领袖们已站在我们这一边。

国民党想与我们谈判，但和谈的第一个条件，也就是关于战犯的问题就吓坏了他们，在战犯名单中列出了一百多人，而且还不限于名单中的这些人。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八个条件（李宗仁说他会接受），我们就委托他们执行这些条件。如果他们不接受关于战犯这一条，就免谈。

为了塑造出民主的形象，讨好我们，李宗仁提出了出版自由。但我们不会上当，我们清楚，斗争在继续，蒋介石背着李宗仁，通过参谋长顾祝同继续与我们作战。汤恩伯指挥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仍然部署在上海—南京战线，陈诚在福摩萨岛准备军事基地，胡宗南部部署在西安，白崇禧部在汉口战场。我们知道，国民党不能组织起坚强的战线，但我们不能不估计局势，做好应付各种情况的准备。

关于外贸

毛泽东说，未来的联合政府将面临对外贸易的问题。他说，我们打算与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签订合同。

我说，这种考虑是正确的，并补充说，我们必须在经济方面相互帮助。过去这个问题没有提出来，因为我们不想让人理解为这是干涉民主国家的内政。可结果是民主国家在市场上相互干扰，直到他们请求我们通过相互签订条约的方式来调整贸易关系。我简要地谈了莫斯科六国会议取得的成果。

回到贸易问题时，毛泽东着重指出，虽然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愿意，但对外贸易要被垄断。我们首先要与苏联和新民主国家进行贸易，只

有这些国家不需要的产品，才出口到资本主义国家。

中共的对外政策问题

后来毛泽东转到中共的对外政策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原则是在相互平等和相互帮助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

谈到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对外联系，毛泽东指出，当时这种联系局限于与在延安的外国记者，特别是与美国记者的被动交往。现在情况变了，因为人民解放军占领了诸如沈阳、天津和北平这样的城市，那里实际上面临着如何与所有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外国领事馆建立关系的问题。我们暂时不把他们当做是与我们有一定外交关系的国家的机构的代表。因此我们只限于保证领事馆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把他们当侨民来看待。

此后毛泽东提到在中国境内限制外国电讯社和出版社的权利的问题。禁止电讯社独自活动，外文报刊不得自由出版。现有的外国出版社必须向政府部门登记注册。

毛泽东指出，这些限制牵涉到苏联出版社在中国的利益，因此他想跟我们商量，以便使这些出版社的领导在名义上是中国的，实际工作由苏联公民负责。

在讲到外国企业时，毛泽东强调说，外国企业必须慎重对待，因为它们的资本和中国人的利益紧密交织在一起。他提醒说，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没收外国资本和资产的决定。原则上这个决定仍有效，但实行时必须采取灵活的方式。

毛泽东说，毫无疑问应该禁止外国人使用无线电台，但个别情况可以例外。他举了一个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无线电台的例子：电台的密码我们已经掌握，再禁止使用对他们已经不利了。

毛泽东说，随着南京的占领会产生外国列强承认新政府的问题。问题在于立即接受承认还是拖上一年半载之后。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延缓时间对我们有利，这样我们可以放手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使

我们更加巩固起来，而接受承认则使美国、英国更便于进行破坏活动。为了赢得时间，我们不会要求美国、英国立即承认。

在继续谈论关于外国列强承认新政府的可能性的想法时，毛泽东说，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毛泽东补充道，有消息说，美国准备承认我们，英国肯定跟在他们后面。这些国家承认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反对我们的工作，同时为了和我们做生意。承认的益处到底何在？这将为我们打开通向别国和通向联合国的道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倾向第一种道路，即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拖延一些时间，巩固自己。

最后，毛泽东请我根据共同事业的利益来阐明苏联对中共对外政策的实质问题所采取的立场。

会谈就此结束。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375页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要问题

——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纪要

（1949年2月3日）

绝密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晚上与毛泽东举行了例会，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和朱德，翻译师哲也参加了。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科瓦廖夫和E.科瓦廖夫等同志。

关于国共谈判中外国调停的问题

互相问候之后会谈开始。我说，我们知道，英国、美国和法国曾同意担当国共谈判的调停人。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他们得知，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反对外国调停。这些大国怕丢脸，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放弃了调停。因此，必须认真做好保密工作，必须明白，在中共周围是否有一些多嘴多舌的人，通过他们，这一信息会被美国人知道。

毛泽东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因为，正如他所说，如此大的问题，包括同莫斯科的通信，通常只有在座的五位中央委员、翻译师哲和捷列宾同志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靠的，他不会怀疑他们。至于这种情况，他说，在得知我们的立场之前，英美就公开表示，苏联和中共反对调停。

我回答说，这可能只是他们的假设。但是，西方大国在得到了关于我们的立场的可靠的情报之后，就匆忙放弃了调停。

毛泽东再次说，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是，消息是从中共周围的人透露出去的。

南斯拉夫问题

然后，应毛泽东的请求我阐述了南斯拉夫问题。毛泽东问，南斯

拉夫人是否在妨碍欧洲的共产主义工作。

我回答说，他们是不会妨碍的，因为他们已被完全孤立。各共产党无一例外都反对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一反苏主义。毛泽东说，铁托就是张国焘，张国焘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叛徒。

关于亚洲国家共产党行动的协调

随后，对于我提出的关于亚洲国家共产党之间协调行动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对于这一问题他们还没有确定看法。他们支持与印度支那、暹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马来亚和朝鲜共产党的联系。我们与印度支那和朝鲜共产党的联系比较紧密些，和其他共产党的联系较少，与日本共产党基本上没有关系。与各共产党的所有联络工作都是通过在香港的专门人员进行的，但是工作做得较差。因此，毛泽东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应尽早成立像欧洲共产党局那样的亚洲国家共产党局，这个问题可以在我军占领了中国南方地区，局势稳定以后再讨论。

毛泽东继续指出，北朝鲜、印度和中国共产党力量较强，其后力量较强的属日本共产党。在谈到日本共产党时，毛泽东说，众所周知，一九四六年日本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冈野（野坂参三）坚持错误观点，认为可以通过议会斗争来夺取政权。日共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反对这种观点。最近日本共产党的情况有所好转，虽然日本资产阶级还支持美国，但日本人民中的反美情绪高涨。

毛泽东回到成立亚洲国家共产党局的问题，他告诉大家，据他们所知，暹罗和印度支那共产党表示赞成成立这样的机构。先由几个亚洲国家，不是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例如中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菲律宾共产党的代表建立亚洲国家局比较合适。至于日本共产党，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量还不够，而且我们同日本共产党没有联系。关于日本共产党加入这个局的问题，毛泽东说，要事先与其交换意见，得到他们的同意。

我说，按我党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应参加共产党情报局，而应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最初可以有三个政党：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组成，以后逐步吸收其他政党。这时毛泽东提问，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否应该是直接的，对此我作了肯定的回答。然后我提醒说，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暹罗和缅甸这些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会中有许多美国和英国间谍，因此中国共产党与他们交往时要小心谨慎。

毛泽东同意这个意见，然后问道，是否可以就成立东亚国家局的问题与日本及朝鲜的共产党进行联系，我作了肯定的回答。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要问题

后来毛泽东开始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要问题。他把党史分成四个阶段：

1. 北伐；
2. 苏维埃运动；
3. 抗日战争；
4. 战后的国内战争。

在谈党史的第一阶段时，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十月革命直接影响和联共（布）的帮助下于一九二一年成立的。如果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在一九〇三年伦敦代表大会形成的，那么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形成的时间要晚许多，即一九二一年。我们拥护布尔什维克党和民主集中制的纲领。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们和国民党合作进行了北伐。一九二四年前，列宁领导的苏联帮助了我们，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也给了我们帮助。在这一阶段斯大林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当时我懂得不多，但学习马克思主义很努力。虽然中国共产党英勇战斗，得到工农的支持，但是它的基础不牢固。那时以陈独秀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掌握了领导权，这导致了这一时期

中国革命的失败。一九二七年八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才摆脱了机会主义的领导。

我党历史的第二阶段是一九二七到一九三六年。这个阶段，我们吸收了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的教训。在第一阶段（1921—1927年）党员的人数是五万人，而一九二八年党员的数量缩小到了一万人。党的一些不坚定分子跑到敌人阵营去了，其他人在战斗中牺牲或者脱党了。虽然当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党在政治上得到了巩固。首先要指出的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党的对内对外工作都是不正确的。一九三〇年年李立三一直坚持这种观点。众所周知，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受到共产国际的谴责。中国共产党相信共产国际，拥护对李立三处理的决定。反对李立三的有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

年后周恩来和斯特拉霍夫^①到过莫斯科，在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开始筹备党的工作。回到中国以后，他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会上李立三路线受到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者不同意这个决议，要求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他们的举动使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大受影响，况且，他们没有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讨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他们反对一切，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他们称刘少奇为机会主义分子，因为他是工会运动的领袖。在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条件下，为了保存工人阶级的力量，要求作组织上的撤退。

年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手里。他们甚至夺取了地下党组织和苏区的领导权，指责我（毛泽东）是机会主义者，把我

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到第七次代表大会

^① 斯特拉霍夫是瞿秋白的笔名。

（一九四五年）经历了十七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至今只剩下三个人。其他人是在中共中央第三、第四次全会上增补进中央委员会的，增补的委员中有同王明集团保持联系的非法钻进中央的博古和洛甫。

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这个集团发表了小册子，断言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起源于他们。后来在我们的批评下，这个集团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虽然并不彻底。但这没有影响我们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把他们选入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六年博古参加了与国民党的重庆谈判，同年四月他与叶挺和王若飞在飞机失事时遇难。洛甫现在东北。他的主要缺点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另外他这个人喜欢饶舌。

关于王明，毛泽东说，至今他没有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我们对他采取怀柔政策，尽力以说服的方法来影响他。毛泽东说，他有资产阶级的习性。抗日战争期间他犯了特别重大的政治错误。中共中央第三次全会后他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没有正确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活动。他硬说，当时我军力量很强大，但实际上还是很弱的。他夸大了党的力量，没有考虑那个时期的具体形势。抗日战争期间，王明主张将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那种地位。他坚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完成重大的政治任务，转而信任国民党，这在实际上就放弃了中国共产党独立的政治路线。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他从莫斯科回到中国，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就召开了武汉会议。一九三八年三月印发了小册子，号召党脱离中央的领导。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三七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中国，给我们带来了共产国际纲领性的方针，而王明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王稼祥带来的材料对我们非常珍贵，非常有益。这些纲领性的方针有助于我们制订好自己的具体任务。

在继续对党史的第二阶段进行描述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时他们还得跟叛徒张国焘和其他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在斗争中以及后来，

苏联党的思想帮助了我们。例如，1946年斯大林就军事历史问题给拉辛上校写了一封信，指出撤退也是一种合理的斗争形式。但是在我们党历史的第二阶段，按“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看法，撤退被认为是机会主义的做法。现在看来，他们犯了极大的错误。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遵义（贵州省）召开了与“左”倾分子斗争的会议。会议的形势非常不利，因为张国焘带六万人的军队进攻我们。我们并没慌乱，结果消灭了他们三万多人。那时才知道，张国焘是王明的好友，当在莫斯科要求他就这个问题进行解释的时候，他避而不答。

抗日战争前夕我们的武装力量遭受很大的损失，只剩下了三万多人。因此，王明肯定地说，这些力量和日本斗是不够的，坚持要将他们融入到国民党部队里。现在清楚了，这是一条错误路线。正是由于这三万人的骨干，后来造就了目前三百万人的人民解放军。

王明的这些错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都知道，并引起了代表们极大的愤慨。代表们还知道李立三、博古和洛甫的错误，他们要求不把他们选进中央。可是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变化。过去许多曾经犯过错误的人认识到了错误，退居第二线。党内开展了马列主义的学习，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虽然代表大会上有许多争论——是否将王明、李立三、博古和洛甫选进中央，但是为了团结一切党的力量，还是推选了他们。

现在李立三在搞工会工作，他在这方面经验丰富，他对革命的贡献比王明大。他同刘少奇一起在上海领导过工人运动。从苏联回到中国以后，他从未讲过苏联一句坏话，现正在努力使自己不辜负对他的信任。但是，中共中央与王明之间仍有隔阂。

后来毛泽东说，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拥有四万名党员，其中大部分是在苏维埃运动时期入党的。目前党内已有三百多万党员，中央委员四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三名。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现在党的队伍里是否存在不稳定情绪？毛泽东回答说，当然，还发现有，但在党的领导层里要少一些。

会谈就此结束。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409页

关于民族问题和对外关系问题

——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纪要

(1949年2月4日)

绝密

一九四九年二月四日与毛泽东举行了例会，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和朱德以及翻译师哲。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科瓦廖夫和E.科瓦廖夫。

民族问题

我转告毛泽东说，我们的中央建议中共不应通过让少数民族独立而在民族问题上炫耀自己，这样会因共产党的上台而使中国的国土缩减。应当给予少数民族自治，但不是独立。

毛泽东对这一建议感到高兴，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无论是谁，他也不打算让其独立。毛泽东主动问道，我们怎么看待内外蒙古的合并。我说，我们不支持这样的建议。于是他问，为什么我们不支持合并。我回答说，我们不支持是因为，这样的合并会导致中国失去大片领土。

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合并，并加入中国。当然，如果外蒙古和内蒙古的领导人都支持的话，这是可以的。他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比如说，两三年后，当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更加稳固的时候，一切都会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到时候外蒙古宣布，它脱离中国是由于国民党统治中国，现在政权在共产党手中，外蒙古愿意加入中国，同内蒙古合并。

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外蒙古早已独立。对日胜利之后，中国同苏联一样，也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外蒙古有自己的军队，自

己的文化，在文化和经济繁荣的道路上迅速发展，它早已尝到了独立的甜头，未必会自愿在某时放弃独立。如果有朝一日它与内蒙古合并，它将成为独立的蒙古。

此时任弼时插话，内蒙古有三百万人，而外蒙古只有一百万人。最后毛泽东大笑起来，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新疆问题

因为毛泽东前一天通知我，他想跟我讨论新疆问题。我问他想就这一问题谈些什么。毛泽东说，隶属于乌鲁木齐政府的新疆伊犁州在进行独立运动。那里有共产党。

我回答说，对伊犁州的共产党我不知道，但知道当地部族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的起因是中国政府采取错误的政策，不考虑这些部族的民族特点，不给他们自治权，不允许发展民族文化。

如果让新疆的部族自治，那么无疑将不会存在独立运动的土壤。我们不支持新疆部族独立，也不覬覦新疆的领土，我们认为新疆是，而且应该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我们赞成与新疆的经济合作和贸易，正如现在进行的，以及正如国民党政府新疆代表张治中建议的签署条约那样。

这时毛泽东说，一九四五年他在重庆见到白崇禧时，白崇禧说，在伊犁州，当地的暴动者拥有苏联生产的大炮、坦克和飞机。

我回答毛泽东说，这事我不了解，没有什么能够说的，我只知道，我们没有对这个运动提供帮助，虽然这是一场反压迫的民族运动。

这时，毛泽东说，他们想让新疆像内蒙一样完全自治，内蒙古已经是自治区了。

毛泽东特别想知道，新疆的石油是多还是少。

我说，在盛世才时期，我们开采和加工过大量石油，这被用于满足新疆内部的需要，因为没有交通来运出。

关于新疆的铁路建设

毛泽东提出是否可以通过新疆建造连接中国和苏联的铁路，任弼时非常支持这个看法。如果发生新的战争，这条铁路对共同防御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如果发生这样的战争，中国毫无疑问会和苏联站在一起。假如满洲遭到袭击，这条铁路将是向作战的中国军队提供供给的一条重要渠道。可以向多山的甘肃、陕西、河北、四川等省提供供给，为组织牢固的防御提供很大的便利。

我说，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令人感兴趣的，是有前途的，但费用昂贵，决定建造之前，必须事先精确计算。

这时任弼时提出，为什么我们不建设连接乌兰巴托和张家口的铁路。此段距离不长，它对连接华北有很大意义。

我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但我们还没有考虑过。

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的联系问题

接下来毛泽东转入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的联系问题。

他强调说，中国共产党需要联共（布）的全面援助。我们需要两方面的顾问：经济方面的和财政方面的。

我回答说，И.科瓦廖夫同志是苏联部长会议经济问题的特派代表，他的工作范围包括东北和华北。我补充说，他完全听从毛泽东同志的指挥。虽然他名义上属于中长铁路的编制，但实际上他的活动遍及全中国。

毛泽东对И.科瓦廖夫同志将听从他的指挥表示感谢。他继续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迁到北平以后，我们的关系将在党和外交这两方面发展。他希望在苏联大使馆里有党务工作的顾问。

参加会谈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党务工作顾问时表示，希望他能更加接近中共，以便可以经常同他交换意见，虽然对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会直接与联共（布）中央联系。就像周恩来所

说的那样，“主要问题应在莫斯科解决”。

关于驻苏大使候选人

关于周恩来提出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将定期和短期派人到莫斯科，以便得到相关的建议。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作为未来的大使将在那里负责日常工作。

毛泽东在评价王稼祥时说，过去他与王明集团一起犯过错误。一九三七年在莫斯科治病，并担任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七年七月他带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我们这里。这些指示与我们的政治路线是符合的，有助于我们克服错误。

关于苏联的援助

毛泽东强调说，苏联过去和现在都给中国共产党巨大的援助，对此中国共产党非常感谢联共（布）。毛泽东继续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每当我们求助于苏联的时候，我们始终考虑到这一点。如果苏联无法援助我们，我们也不会有怨言。在去莫斯科前，罗荣桓问我，如何向苏联提出援助的问题，我对他说，不应把自己的处境说成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但也要强调，说我们希望得到你们对东北的援助。一九四七年起林彪经常向莫斯科提出这样和那样的援助。毛泽东说，我指示高岗，苏联援助的一切一定得偿还。除此之外，还得靠国民党地区解决某些物资缺乏的问题。中国的同志应该合理地使用苏联的援助。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未必能取得今天的胜利。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你们对东北的军事援助占苏联对我们全部援助的四分之一，这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关于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

以后毛泽东把问题转到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方面。他说，中国共产党不同国民党谈判，而是同国民党政府谈判。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新现象。我们应当同政府达成协议，毛泽东强调说，而不是同国

民党达成协议，因为同国民党的谈判会提高其在舆论界的威望。将来国民党将解散，假如我们现在承认它是谈判方，它必然会觊觎未来联合政府中的地位。现在我们加强宣传，目的是揭露国民党，以后解散国民党，像当年列宁召开立宪会议和解散立宪会议一样。

毛泽东说，我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八项条件。这些条件都是谈判的基础。如果国民党员同意我们的第一项条件，我们就委托他们抓捕战犯。我们的条件中规定改编国民党军队，成立没有反动分子的政府，废除国民党的法律，特别是废除关于国民党地位的法律。当然，国民党员在与我们谈判过程中会坚持要参加政府，但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都会反对。现在不会有人再保护国民党。它已不能独立成立联合政府，实际上，国民党已经陷入孤立的境地。甚至美国、法国和英国都公开反对它。这样的局势客观上有利于我们。关于个别党的领导人，像白崇禧，我们可以利用他来为我们的利益服务，但他的军队必须完全消灭。

毛泽东说，许多人认为，战犯名单的公布会使我们孤立于其他政治党派之外，但我觉得，这张名单会给国民党有力的打击。面对这张名单，他们不敢联合起来，担心自己的性命。譬如说，白崇禧声明，他赞成与我们谈判，李宗仁也坚持这个立场，他准备派代表到我们这里来。众所周知，傅作义向我们交出了部队。我们把他当做战犯。如果他协助我们改编这些部队，我们可以对人民说出谅解他的理由。

关于张治中，毛泽东说，我们没有理由把他归入战犯名单，虽然他是蒋介石信赖的人。

谈到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策略时，毛泽东赞成中断与中央政府进行的总的谈判，支持地方谈判。对待国民党要采取分散打击的办法。我们知道，原驻苏大使颜惠庆准备到北平进行和平解放上海的谈判。毛泽东说，这一切说明国民党屡次遭到失败，许多国民党地方政权已经开始独自与我们联系。例如，当傅作义与我们谈判时，北平派来了

一个十人代表团，其中有市长、CC派分子何思源和立法院成员。我们友好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对此非常满意。

回到张治中的立场问题，毛泽东说，有关他以及与他类似的人的问题是：该不该把他们吸收过来。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就是说他们背叛了国民党，可以吸收。譬如，如果张治中向我们交出了部队，那可以考虑吸收他进入我们的政权机关。如果邵力子转到我们方面，我们也可以考虑，让他参加未来联合政府的工作。但是，毛泽东强调说，这些人不得人心，人民不喜欢他们。

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

接下来毛泽东转入关于成立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的问题。参加委员会的23个组织名单尚未公布，但已与有关党派协商过。名单中有下列组织：

- 1， 中国共产党；
- 2， 人民解放军；
- 3，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 4， 民主促进会；
- 5， 中国民主同盟会；
- 6， 救国会；
- 7， 第三党（工农民主党）；
- 8， 上海民主促进会；
- 9，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 10， 中国民主改造协会；
- 11， 中国工会代表大会；
- 12， 中国农民联合会；
- 13， 中国青年组织；
- 14， 中国大学生联合会；
- 15， 全国妇女联合会；

- 16, 中国民主人士联合会;
- 17, 上海工业企业联合会;
- 18, 教育工作者;
- 19, 无党派人士代表 (郭沫若);
- 20, 少数民族代表;
- 21, 中国东南亚华侨代表 (陈嘉庚等);
- 22, 美国华侨代表;
- 23, 孙逸仙研究会。

上述组织和团体选派三至四人备委筹备委员会, 但不管代表人数多少, 每个组织只有一席投票权。委员会里共产党员将有九名, 共产党的支持者五名, 中间分子四名, 民主人士五名。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二席位。筹备委员会在三月初召开, 准备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名额和会议的日程。政治协商会议上将讨论两个问题: 一是通过共同政治纲领; 二是成立联合政府。

接着毛泽东说, 在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前他们在民主人士中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

我们向他们公开解释我们的政策 (对外政策、土地政策、对内政策等), 他们喜欢我们的坦诚。这就保证了他们对我们的支持。

未来政权的性质

谈到未来政权的性质毛泽东说, 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专政。

毛泽东说, 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实行领导。我们说, 人民专政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是因为工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这个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 反对中国人民的敌人, 这些我们要向我们的民主人士进行解释, 他们还害怕专政这个词。

关于与外国列强的条约

毛泽东说, 在与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谈的时候, 他们向这些人士解

释了他们对废除蒋介石卖国条约的考虑。他们要求废除的不是蒋介石签订的所有条约，因为其中有些条约具有爱国主义性质。例如：

- 1，关于废除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条约。
- 2，废除所谓的八国列强条约。
- 3，关于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苏中条约。

关于苏中关系

我问毛泽东，在会谈中他提到的苏中条约的爱国主义性质的根据是什么。毛泽东笑着说，这个条约不是我签的，而是蒋介石签的。毛泽东说，我向他们解释说，苏联到旅顺港的目的是保卫自己，保卫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因为中国太弱，没有苏联的援助就不能保卫自己，苏联不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势力，而是作为维护共同利益的社会主义力量来到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

在回答为什么共产党反对美国在青岛的海军基地，而保护苏联在旅顺的基地时，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为了压迫，而驻扎武装力量在旅顺港的苏联是为了反对日本法西斯。等中国将来强大了，能自己保卫自己免遭日本威胁的时候，苏联自己也就不需要旅顺基地了。此时，毛泽东说，有一位中国妇女——国民党立法院委员声明，如果共产党能为中国从俄国人那里收回旅顺港，那将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毛泽东说，这个妇女不懂得政治。

最后，毛泽东强调说，他们将公开表示亲苏。他援引了庆祝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所说的话，他们强调说，中国应该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中。我们没有中间道路。毛泽东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会谈到此结束。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420页

中共的历史和目前的任务

——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纪要

(1949年2月5日)

绝密

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白天与毛泽东举行了例行的会谈。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和翻译师哲。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科瓦廖夫和E.科瓦廖夫。

关于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作用

毛泽东说，中国是世界列强的压迫中心，自一八四〇年以来的一百年中，中国受到诸多国家的压迫，它不同于印度，那里主要是英国的压迫，也不同于印度支那，那里是法国的压迫。

在此期间，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在寻求摆脱现状的出路，太平天国的起义以及后来的孙逸仙，都提出了把中国从外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目标，可是当时的党派在人民面前没有经受往考验，只有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在我国取得了胜利。

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毛泽东指出，外国资本不断地对其进行腐蚀。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代表都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接受过教育，他们无意中成了这些国家在中国产生影响的渠道。毛泽东说，许多知识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他们的思想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这就是在我国工作的两名苏联医生感到孤立的原因。他们过去和现在为我们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是他们不能同我们的知识分子进行很多的交往。当然，他们汉语讲得不好也是一个原因。

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

随后毛泽东说，他们已经把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

的决议译成了俄文，并将通过奥尔洛夫转交给我们。毛泽东说，这个决议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近期的政治纲领。地方党组织要求对许多迫切的问题做出答复，因此我们要召开这次中共中央全会^①。

我说，虽然这次全会应使党对当前中国政治形势提出的新任务做好准备，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将具有转折的意义。

毛泽东同意我的看法，并说，最近一次中共中央全会是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召开的。已经过去三年多了。现在开始进行全会召开的筹备工作。高岗、林彪、陈毅、林伯渠、薄一波都参加了关于全会问题的政治局专门会议。会议开了四天。现在他们都回去了，只留下了林伯渠一个人。林伯渠已经六十三岁了，当年他曾跟孙逸仙一起工作过。他到过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他起的作用，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有点像已故的加里宁同志。林伯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会议的还有政治局委员董必武以及现在的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高岗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有十三人。

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用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历史问题时，毛泽东把其分为四个时期：

1，北伐；2，土地革命；3，抗日战争；4，国内战争。

我党在这些时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毛泽东说，在所有这些历史时期，我们都特别重视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因为我们认为这是马列主义最尖锐的武器。可是，迄今为止我们党内还存在任人唯亲、裙带关系，这些都是国民党的思想残余。在我们军队中有时有军官殴打士兵，遇到这些情况，我们会向人们解释说，他们的行为跟国民党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地方干部有时脱离群众，开展的土地改革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党内坚持全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定期检查党员的思想修养和工作作风的目的。在我们党的会议上

^① 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5—13日在西柏坡召开。

我们提出这些问题，使得下级可以对上级进行监督。

我说，毛泽东所讲的这些，说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存在，其威力就在于此。富有朝气的集中制是布尔什维克所应有的检验的基础，对此，斯大林同志曾多次指出过。

毛泽东说，党通过开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了统一。

我指出，各种小资产阶级分子从外部对党施加压力，如果在应有的高度上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如果党脱离群众，党的个别队伍就有瓦解的危险。

毛泽东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说由于近来许多大城市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反动派在积极活动，企图对党施加压力。他强调说，现在党的任务更加艰巨，工作范围不仅触及农村，还需顾及城市。

党在军队中的任务

谈到党在军队中的任务时，毛泽东说，在国内战争中我们对我们的武装力量逐步实行民主化。我们的基层指挥人员是选举出来的，但由上级指挥机关批准。每个连有士兵委员会，军官也参加，战争需要训练有素的干部。军队是人民很好的政治学校，战后我们准备派部队干部到国民经济和政治各个领域中去工作。我们的军队基本上是农民的军队，土改时领到土地的战士是我军可靠的支柱。我们也没有忽视国民党士兵，他们作为战俘，我们在努力从政治上对他们进行改造。人民解放军战士在原国民党士兵的大会上讲述了他们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是怎样生活的，在我们的条件下他们又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着重讲述了新民主政权分配给他们土地，这对原国民党士兵产生了巨大影响。除此之外，我们还印了各种小册子，其中提供了我解放区和国民党地区的比较材料，我们在利用一切机会揭露国民党的专横。我们在用这些方法对国民党士兵进行改造。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在军队中的民主政策让士兵甚至可以批评军官。例如，经常会发生如下情况，在战役开始之前召开基层战斗单位

的会议，对即将进行的战役计划进行讨论。会上指挥员有时提出撤退计划，而战士则相反，提出进攻计划。在战士批评意见的影响下，指挥官会采纳进攻的计划。

毛泽东继续说，我们的军队在人民中享有较高的威信。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我军开进北平，几乎全城人民都出来欢迎。进驻北平的军队全副美式武器装备，这次，我们不用苏式武器，完全用美式武器装备军队，这是为了强调，蒋介石是在如何向我们提供美国装备的。人民也欢迎开进天津的人民解放军部队。这一切都说明，人民支持我们，同时也反映出人民解放军的良好形象。

中国工业发展的水平

后来毛泽东谈到中国经济状况，他强调指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他说，帝国主义利用中国作为自己的原料基地，这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指出，现在中国经济上出现对比悬殊的现象，例如大工业中心的上海与落后的农村。在苏联国家建设之初也出现过这样的悬殊，但在苏维埃政权存在期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它们。

毛泽东同意我的看法，并继续评述中国的经济状况。他说，工业在中国整个经济中占百分之十，东北除外，那里的工业占百分之五十三。

利用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我强调指出，工业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只有在工业发达的情况下才能比较容易地提高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农村的土地改革扫除了农业发展的障碍，但没有解决国家技术和工业的发展问题。

毛泽东同意这点，他说，在中国，向资本主义进攻的速度将比苏联慢一些。

我说，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存在的条件下，中国工业发展的过程将比苏联工业发展来得快，因为苏联在成立初期不得不将大的资金投入国防，抗击外国侵略者。

毛泽东同意我的说法，他说，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说，日本和国民党促使资本集中到国家手中，例如，东北的工业占百分之五十三，其中百分之四十七在国家手中，百分之六在私人资本手中。总之，毛泽东说，中国工业的主要部门都掌握在国家手中。

关于对待外国资产的态度

我问他们有没有工业国有化的计划，毛泽东回答说这样的计划还没有。

根据提出的问题，我阐明了我们对在中国的外国资产的态度。我说，在外国资产问题上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必须对日本、法国，尽可能包括英国的资产实行国有化。对美国的资产要采取谨慎的政策，要让美国人产生一种看法，新政府会考虑他们的利益。当以共产党为首的政府控制了中国的局势以后，可以再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根据形势和美国人的表现再作决定。

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性质

我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按其性质是反帝国主义的，它应该摧毁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阵地。消灭地主和国民党并未解决消灭帝国主义的问题，因为前者，即地主和国民党，都是外国帝国主义的爪牙。我说，在摧毁国内的外国阵地的同时，你们也因此会改善民族资产阶级的处境，他们当然会感到高兴。

然后我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性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以及人民民主国家革命的区别阐明了我党中央的观点。

我说，俄国革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道路对中国并不适合，因为中国的条件与俄国和欧洲的条件不同。我指出了促使欧洲国家人民民主胜利的两个因素：

- 1， 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勾结德国占领者，因此红军打进这些国家，资产阶级逃跑了。

- 2， 红军的进入并把这些国家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使得共

产党人更容易建立起民主制度。

我说，在中国没有这些因素。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都是靠自己内部的力量推进的，应该考虑中国和俄国的另一个不同点：俄国没有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俄国革命不具有反帝的性质，而在中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是长期的，因此中国革命具有反帝的性质。

谈到中国未来的制度，我说，它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未来的制度是没有苏维埃的人民民主。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提出过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问题，但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没有实行过这一制度。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一九一七年十月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或许，在中国能实现纯粹的没有苏维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思想。中国未来的联合政府应该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专政。

我说，在新民主国家里，政权履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履行。这些职能是用来镇压资产阶级的。而你们没有这些职能，更适合你们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专政。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也会这样想的。

毛泽东完全同意我党中央的意见。他说，这个意见非常有助于他们形成自己的关于革命性质的看法，并确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请我转达对我们中央和斯大林同志的感谢，感谢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帮助。

此后毛泽东说，在中国苏维埃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了工农专政的纲领，但把欧洲国家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套机械地照搬到中国的资产阶级身上。因此，尽管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里只提到没收外国资本，但我们执行的却是没收一切民族资本的政策。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赞成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专政，赞成人民专政，因为工人和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0%。这样的制度会保证对人民的民主，保证对地主、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的专政。我们称

我们的制度为：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制度。

毛泽东继续说，近十年来，我们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其中我们指出了中国革命与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去了，但是最完善、最进步的民主即苏维埃民主，暂时还不能为我们所接受，所以我们称我们的制度为有别于苏维埃制度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称我们的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人民民主革命。我们的革命按其性质来说是人民革命，它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切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按照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整个政治纲领都在于此”。

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许多人都劝我们说，不要提及，也不要强调中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以便不吓跑知识分子。近来我们没有顾及这些，并强调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甚至是从沈阳到这里的自由民主党派的代表在自己的宣言中也声明，他们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

接着毛泽东说，关于上述所讲的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他早在一九四〇年就写过，但当时对这一表述没有展开，他近期想再次谈谈这一问题。他就此强调，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他依据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前后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主张。

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和批判南斯拉夫西米奇^①的指示对他来说特别珍贵。毛泽东多次强调，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坚持“亲苏的方针”。

关于提高共产党员的理论水平

毛泽东也援引了他在各个时期所写的小册子，特别是有关军事战

^① 西米奇，时任南斯拉夫外交部长。

略（一九三六年）、党的任务（一九三九年）、新民主主义（一九四〇年）和中国革命的根本方向（一九四五年）的小册子。在谈到最后一本小册子时，毛泽东说，在斯大林同志给拉辛上校的信件中能找到“撤退是合理的进攻”的指示，这使他非常满意。毛泽东说，“我们马上把这封信在广播中播出，在各部队中对其进行研究”。毛泽东接着说，对他们而言，了解苏联对德波林和布哈林错误的哲学观点批判，对巩固党的队伍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我党的心目中，这次批判把列宁和斯大林提升到最伟大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的高度。对德波林哲学观点的批判有助于我们与唯心主义者的斗争。总之，毛泽东说，我们对党员教育的要求落后了，因为我们掌握一定政权之后，首先抓的是政治和经济问题。可是在这次战争期间，我们还是为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此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进行了准备。当我们组建了党校以后，其中不断出现意见分歧。我处于这样一种境地：身在中共中央机关却无法对其加以控制。中央各部门都有自己的意见。这种情况我曾经特别在一九四〇年向党和中央提出过警告，但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我清楚，要团结中央委员会必须认真处理这一问题，我们这样做了，并以此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代表大会前夕，我们召开了中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非常详细地阐述了过去党内小团体和派别（陈独秀、李立三等人）的政治错误。由于这些小团体和派别的错误，我们失去了十分之九的受我们控制的苏维埃地区和十分之九的党员。为什么会这样？其原因是我党有些领导人动摇不定的思想作祟。后来在对待这些领导人的问题上，我们坚持了同他们进行有原则的思想斗争的政策，但在组织结论上我们采取谨慎的态度，我们并没有因为有错误言论就采用开除出党的办法，而这促进了我们最近的团结。现在党内没有争论了，虽然在前不久的土改时和城市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中央很快就纠正了错误。这就是为什么说批评和

自我批评是我们团结的出发点。

会谈到此结束。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431页

当前的形势和任务

——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纪要

(1949年2月5日)

绝密

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晚与毛泽东举行了例会，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和翻译师哲，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科瓦廖夫和Е.科瓦廖夫同志。

关于党内形势

毛泽东继续谈论白天开始的关于党内形势问题。他再一次强调指出，在党内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斗争的时期，苏维埃丧失了将近十分之九的领土和党员。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期间党员的觉悟大大提高了，为一九四五年召开团结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基础。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纲领目前仍在执行，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毛泽东说，诚然，在党的队伍中还存在无纪律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情况，但这仅仅是个别现象。总的来说，党内已经没有针锋相对的意见和相互竞争的派别。这一切为自己作为一个团结的党登上当今政治舞台做好了准备，不然，工作会很难做。知识分子不再跟我们竞争。国民党仍然在和我们竞争，但它在政治上的分量正变得越来越小。

工人问题

利用间歇时间，我传达了菲利波夫同志关于工人问题的电报内容。我说，不要禁止罢工，否则中国共产党会失去工人的信任。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不在于其数量，而在于工人阶级是新的阶级，是最先

进思想的代表，是最有前途的阶级，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作用将不断扩大。

关于不应禁止罢工的问题使毛泽东和参加会谈的政治局委员们感到困惑。

电报建议要在工人、青年、妇女中进行工作，要培养中国干部，其内容我已向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作了传达。总的来说，这些电报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传达电报内容的时候，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连声说是，毛泽东也说，将会执行这些建议。

军事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此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入军事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把军事形势分成两个阶段：

- 1，现阶段的国内战争。
- 2，国内战争以后的防御措施。

谈到现阶段的国内战争时毛泽东说，目前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大战役阶段可以说已经结束。现在，纯粹的军事作战逐步被和平地向国民党的大城市进行进攻所代替。他援引解放北平的和平结局作为例子说，在那里我们建议傅作义的军队投诚。毛泽东说，我们不会在南京、杭州、上海和广州进行大规模战役，但并不是说我们今后不作进攻战役的准备。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主要是财政方面的困难。军事开支对价格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会引起通货膨胀。应该注意的是，我们从未有过这样庞大的军队，也没有打过像现在这样的大战役。当然这需要一大笔开支，这会对解放区的经济产生影响。况且现在所有力量都放在先粉碎敌人，后搞经济方面。这一政策的结果是，我人民解放军从一九四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共歼灭了一百三十万国民党精锐部队。表面上看，我们尚未完全取胜，因为只占领了中国的一半，但是事实上战争正在结束。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党的主要工作将是经济建设。要彻底消灭敌

人，必须在经济方面壮大。所以现在应该对我们的计划作相当的调整，紧缩开支和稳定财政状况。我们应当以最少的牺牲结束战争，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无所事事。我们的军队应当继续进攻，夺取城市，对各种情况做好准备。但是不能忘记，在采取军事措施的同时，要培养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干部，解释我们的政策措施，准备解决工人问题、市场关系，对新条件下的农村工作做好准备。我们说，我们的军队不仅应该会打仗，而且也应为和平时期的工作做好准备。

在继续陈述军事措施的时候，毛泽东说最近两三个月内我们要为满怀信心挺进华南，夺取华南广大地区和经济上有价值的地区做好准备。再过一两年我们就能在经济上、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国。应该在从北平到广州的战线上开展战斗。

将来我们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城市，近20年来，我们在城市居民中的工作经验很少。最近，当我军开始占领大城市的时候，在城市方面面临的问题就多了起来。我们现在有了大工业城市，（苏联）红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感谢红军，感谢它把哈尔滨和东北的其他城市归还给我们。苏军不仅帮助我们收回了城市，而还在城市的恢复工作中向我们提供了帮助。现在我们应该开发长春、本溪、鞍山、张家口、芝罘、北平、天津等其他城市。近期在西安、上海和汉口我们面临的是同样的任务。或许，今年冬季我军就能攻克广州和桂林。

关于李敦白和马海德

利用间歇我讲了关于李敦白的电报内容，这份电报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参加会谈的政治局委员任弼时说，李敦白是经记者斯特朗介绍留下的。毛泽东说，一九三六年起还有另外一个叫马海德的美国人住在他们那儿，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弼时补充说，马海德是经记者斯诺介绍留下的。

我对毛泽东说，难道你不明白，这个美国人是美国间谍机关的间谍头子，应该把他抓起来。有关李敦白的这一消息引起了惊奇的呼声：

是的！是的！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请我通报苏联情况和国际局势。我满足了他的要求。对我通报的信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听得非常仔细。

会谈就此结束。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437页

关于苏中条约和新政府的结构等问题

——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纪要

(1949年2月6日)

绝密

一九四九年二月六日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举行了例会，参加会谈的有翻译师哲和我方 И. 科瓦廖夫、E. 科瓦廖夫同志。

关于外蒙古

我向毛泽东传达了有关外蒙古和苏中条约电报的内容。

我说，外蒙古的领导人赞成中国所有蒙古地区与外蒙古联合，但是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因为这个计划意味着一系列地区要脱离中国，虽说这对苏联利益并不构成威胁。我继续说，我们并不认为外蒙古为了中国某个组成部分的自治会放弃自己的独立。

毛泽东说，我们尊重外蒙古想成为主权国家的愿望，如果它不愿意与内蒙古联合，会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也不会反对。毛泽东补充说，我们不赞成大汉族主义政策。

关于苏中条约

关于苏中条约问题，我说，我们认为苏中关于旅顺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缔结条约的目的在于阻止国民党勾结日本、美国反对苏联和中国的解放运动。这个条约，我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国的解放运动是很有利的，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我继续说，苏联政府决定废除这个条约，一旦对日和约签署，马上就从旅顺撤出自己的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应立即撤军的话，苏联愿意这样做。关于中国东北铁路条约，我们不认为

是不平等条约，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靠俄国的资金建成的。可能，我说，这个条约没有完全体现平等的原则。我们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同中国同志同志般地解决这个问题。

把这个条约看作是不平等条约的评价使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非常意外，使他们坦称惊奇。

之后，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现在，不能从辽东撤军，不能撤离旅顺基地，我们这样只会帮助美国。毛泽东说，苏联从辽东撤军这件事，他们将保守秘密，只有当他们粉碎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动员人民去没收国外资本的时候，只有在苏联的援助下，“我们可以管理自己”的时候，才会去重新研究这个条约。中国人民，毛泽东说，感谢苏联签订了这个条约。当我们壮大以后，“你们可以离开中国”，那时我们签订一个类似苏波条约的苏中互助条约。

随后毛泽东说，在确定中长铁路的资产归属问题上有些小问题，可以就地解决。例如，国民党部队夺走了中长铁路的部分企业，人民解放军来了以后又把这些企业归还给中长铁路。人民中有些传言，说过去国民党根据苏中条约夺走了这些企业，而人民解放军违背了条约，将这些企业交还给中长铁路。毛泽东提出，让高岗和 И. В. 科瓦廖夫研究这个问题，然后报告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状况

毛泽东说，我们承认伊斯兰民族，从不赞同国民党压迫中国伊斯兰民族的政策，因此我们认为，应该让他们在中国范围内实行自治。中国共有三千万伊斯兰教徒，主要居住在宁夏、青海、甘肃和西藏，语言是汉语，文字不同，经书是用阿拉伯文写的。

个别少数民族居住在西康省，他们受到当地封建主的奴隶般的剥削。

我们准备给居住在中国西南部的西藏人民以自治权。

少数民族中苗族居住在贵州和云南省，中国的地方当局与他们关

系紧张。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间我军经过这些省份的时候，苗族支持我们。我们认为，苗族应该在这些省政府有代表资格。

瑶族分散在广西和湖南，他们总是反抗汉族。

四川省五千万人口中有一些不大的民族群体，可以组成个别的民族县。

黎族居住在海南岛，人口大约三百至四百万。少数人还处在未开化阶段。

台湾岛的六百万人口中只有几十万是当地的民族。

东北有二百多万朝鲜族人。

西藏问题很复杂。实质上西藏是英国的殖民地，只是在形式上归属中国。近来美国千方百计讨好西藏人民。

新疆约有十四个民族，三千多万人。新疆有很大的战略意义，在经济上把我们和苏联连在一起。按我们的计划，我们将在一九五一年进驻新疆。

毛泽东回到西藏问题上说，当我们结束国内战争，着手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以后，当西藏人民感到我们不是用侵略来威胁他们，而是平等地对待他们的时候，我们将解决这一地区未来的命运。对待西藏我们应该谨慎耐心，要考虑到那里复杂、麻烦的宗教事务以及喇嘛教的势力。

在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方面，毛泽东说，我们要向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学习。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问题

接着毛泽东转入叙述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问题。他说，在中国的经济中工业占百分之十，有工业就意味着有民族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如果我们不注意到这一点，就会犯错误。中国经济的其余百分之九十是个体农民经济，它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全中国农民人数三点六亿，农户有九千万，其

中百分之六十七是贫农户，解放区的农民得到了土地，他们受工人阶级领导。如果我们不发展工业，不供给农民工业品，我们就不能保证工人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领导。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仅应该给农民土地，而且还要供应城市商品。最近三个月来，在这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开始抓城市的工作，抓工业的发展。我们毫不怀疑，苏联会在发展工业方面帮助我们，那时我们就可以给我们农村提供帮助了。

回到中国经济中工业比重的问題时，毛泽东说，这百分之十里包括国家的垄断组织和私人资本，官僚资本占这百分之十的最大部分，公路、矿山、航运等都被官僚资本控制。

私人资本在这百分之十中占的比例不大。我们对私营工业企业的政策不应该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以便不吓跑民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目前不会没收私人资本和私营企业。我们是这样解释的，俄国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我们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便是在俄国，它在十月革命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只是在过了十二年之后才开始消灭富农。而我们的情况不同，我们对国内的资产阶级要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我们不怕资本家，也不会迎合他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采用孙逸仙的口号：节制资本，平均地权。

要限制什么？

要限制放高利贷的银行，限制不生产日用品的珠宝工厂和丝织工厂。

应该给予矿山企业出口产品的机会，但条件是要由国家控制。市场上允许自由竞争，但不可以忽视国家的监督。例如，国家有许多粮食，它可以盘活市场为工农利益服务，这样的控制可以限制资本主义的膨胀。

在城市和农村应该鼓励发展合作社生产，不允许私人资本和地主过分剥削工人和雇农。在私营企业里资本家可以获得合法的利润，但同时应该保护工人的权利。跟过去不同的是：允许资本家和工人有自

己的组织，例如，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工会。

在允许资本家从自己企业中获得合法利益的同时，应该调整这些企业的发展，使它有利于国家。要发展能使国家富强的工业部门。

毛泽东说，因此，在我们实行这样的经济政策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有别于苏联的经济，但我们也反对以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为样本。我们主张加强国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成分。国有经济按其性质来说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但我们不会大喊大叫，以免吓跑一些人。国有经济将变得强大，因为政权和军队都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这就是为什么国有经济在新中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原因。

合作经济按其性质来说是半社会主义的，它建立在联合私人利益的基础上。现在我们还不能走集体农庄的道路，虽然许多人都想这样。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条件。

国家政权的结构

在转入关于国家政权结构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不准备采用议会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有自己的军队。国民党将被击溃，其他小党在国内没有影响，因此就以另外一种方式提出了关于政权的结构问题。它将不同于苏维埃。我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选举政府，在各级代表大会上选举村政府、区政府、县政府和省政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

在各级省政府建立厅。东北将成立若干部，因为东北联合了九个省。中国将成立九个行政区，即：

- 1，东北局，中心在沈阳；
- 2，华北局，中心在北平；
- 3，华东局，中心在南京；
- 4，华中局，中心在汉口；
- 5，华南局，中心在广州；

- 6, 西南局, 中心在昆明;
- 7, 川康局 (四川西康), 中心在成都;
- 8, 西北局, 中心在西安;
- 9, 新疆局, 中心在乌鲁木齐。

行政区不设部 (除东北外)。

我们需要这样的结构, 毛泽东说, 目的是发挥地方的主动性, 不把一切都集中在中央政府身上。这种制度的益处还在于, 与民主人士相比更能提高共产党员在当地的作用。

华北政府已经组建, 并将在其基础上筹建以北平为首都的中央政府。

在未来的政府中, 看起来, 共产党员和左翼民主人士将占据三分之二席位。从形式上看, 共产党员占的席位不太多, 但实际上他们将占多数席位, 因为有些席位为隐蔽起来的共产党员所占据。政府中还会有右翼党派参加, 但只是少数。

关于政府首脑

中央政府的结构类似苏联政府。为首的是以主席为首的主席团, 总理还没确定, 但看来, 毛泽东说, 应该是周恩来。

至于自己, 毛泽东说, 他给自己留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以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参加政府。

主席团主席由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来担任。毛泽东说, 她完全服从我们, 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参加会谈的任弼时说, 按他的意见, 主席团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担任为好。周恩来支持这个意见, 他说, 孙逸仙的遗孀仍然会使他们感到不安, 虽然她接近共产党, 但从来没有泄漏过从他们那里了解的共产党的秘密, 尤其当时是她把共产国际的钱款转交给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说, 如果毛泽东不当主席团的主席, 人民会不理解。后来周恩来继续说, 国民党对宋庆龄监视得很严, 他担心她会被他们强行带走。

周恩来最后说，不管怎样，如果宋庆龄当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应该当总理。

毛泽东继续说，主席团主席还有三个候选人：朱德、董必武和刘伯承（Л ю Г о ч э н）^①。确定主席的问题要考虑国内外的形势。

新形势和干部问题

谈及最近中国共产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毛泽东着重指出，这次会议将在如下条件下召开：国内战争尚未结束，进攻不能放松，蒋介石还有一百万军队。现在的局势不同了，虽然还不完全明朗，但需要我们做出估计。现在的新情况是，以前我们只掌握了长江以北的土地，我们首先占据的是农村，其次是城市，一般采用包围的战略，而现在随着我们越过长江，我们不得不夺取大城市。军事行动的规模明显扩大，我们将面对的工业问题增多，即上海、南京、芜湖、汉口和其他城市的经济问题。因此干部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尖锐。现在我们培养的干部有五点三万名。干部的来源是我们的军队，复员军人将被派去担任城乡的领导工作。培养干部的工作委派给了康生。如果考虑到，在上海—南京战场上我们有九十万人，武汉—广州战场上也有九十万人，西安战场上有三十万人，这么一大批经得起战争考验、受过政治训练的战士将成为我们紧缺干部的补充力量。

关于苏联给中国的贷款

此后毛泽东转入财政问题，他问，能否得到贷款和印刷纸币的纸张。他说他们的白银不超过五百万美元，他们想在三年内得到总额为三亿美元的白银（主要用于发行硬通货）、石油、原料、设备及其他贷款。他们想从一九四九年起借贷这个数额，每年一亿美元。

谈到贷款，毛泽东说，三亿美元是我们需要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借给我们这个数目，或者多一些，或者少一些。即使不借，我们

^① 原文如此，疑应是林伯渠。

也不会有什么怨言。我们并不要求无偿援助，因为这样就是中国在剥削苏联。我们请求的是支付相应利息的贷款，这些款项中国将来能够支付。这一点对中国的工人来说很重要，他们会知道，贷款是要归还苏联的。

毛泽东继续说，至今我们得到的武器是无偿的。但是我们清楚，生产武器需要苏联工人付出劳动，他们的劳动是应该补偿的。

我们需要的武器清单暂时不会扩大，用于目前作战的武器已经够用。但是还得说明，我们需要三千辆汽车和汽油。对这些以及所需的其他汽车和物资我们已经拟定了请求书，但不知道价格是多少，其总价是否包括在贷款中，用什么方式来偿还贷款，我们也不清楚。如果贷款解决得顺利的话，我们将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签订有关协议。为处理贷款问题，我们还想派一个工作组到苏联了解苏联银行的工作。关于印刷纸币的纸张问题，我们需要1万吨纸。

中共中央一九四九年二至三月的计划

此后毛泽东转入叙述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二至三月的计划。在这段时间要熟悉天津和北平的行政工作，对傅作义的部队进行改编，把领导机关迁往北平，召开中共中央全会（三月份上半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开始工作，可能与国民党政府开始的谈判。尽管我们事先知道，我们提出的谈判条件，特别是关于战犯问题，他们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战犯名单中我们也将日本战犯列入其中。

计划还规定，四月份上海—南京战场上九十万大军转入进攻，夺取南京附近的一些城市。四月份计划夺取南京，可能此时林彪的部队将到达汉口，并占领了它。那时陈毅的部队应该占领西安^①。

三月份召开妇女代表大会，四月份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

^① 原文如此，应是上海。

关于青年运动

毛泽东说，青年运动组织分为两个时期。首先，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然后建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其中包括各青年组织（大学生联盟、农民青年联盟等）。

我提出如下一个问题：上次会谈时他们同意菲利波夫关于青年工作，特别是组织类似中国少年爱国者联盟的广大青年联盟的意见，而现在在他们陈述的计划中，没有这样的组织，而是几个青年联盟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类型）、马克思主义青年联盟、基督教青年联盟、大学生联盟等组成的联合会。

在存在这样的组织的情况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的进步青年会被孤立，其他联盟仍然掌控在资产阶级政党手里，可能成为他们的后备队。

我问，他们是否考虑到各联盟成员的资格。

毛泽东回答说，将来他们准备取消基督教青年联盟，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青年组织联合会，大学生联盟保持独立。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周恩来和任弼时的支持。

我说，如何对待青年组织，他们当然看得比较清楚，但是我还是请他们好好考虑，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以便正确执行斯大林同志的建议。毛泽东和其他同志都同意这一看法。

会谈到此结束。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441页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问题

——中共领导人与米高扬会谈纪要（摘录）

（1949年2月7日）

绝密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问题

毛泽东请我与政治局委员们谈谈经济政策问题，他们将对中国共产党今后的经济政策计划作详细的通报和阐述。

在几个小时的可间里我们听了两组政治局委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一组是刘少奇和任弼时的经济政策问题，另一组是任弼时和朱德的实际经济问题（贸易、财政）。

然后我们在毛泽东那里与政治局其他委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

毛泽东对中国经济政策做了概括，他说，中国工业只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是个体、分散的半宗法式的经济，这些经济在解放前受到三座大山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

中国有九千万农户，三点六亿农民，其中百分之十是贫农，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给农民分发了土地，但没有为他们提供急需的商品，可是这些商品我们自己也很少。

如果我们不发展工业，我们无法供给他们商品，这意味着我们会失去对他们的领导。

苏联在向我们提供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对此我们很高兴，但只靠外来的帮助，是不能胜利的。因此，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通过工会；通过国家对商业的干预，以便降低物价；通过向工人和城市居民出售粮食、燃料和商品）和农村贫农的利益（通过吸收他们参加生产和消

费合作社），我们也应该允许私人企业得到发展。

我们打算使用孙逸仙提出的两个口号：

- 1，用控制达到节制资本；
- 2，排挤危害人民的高利贷资本。

毛泽东说，我们认为，可以而且必须加强中国国内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因为我们在经济方面还不强大，还落后，我们应该利用私人资本，但不能犯急性病。

俄国在革命前有相对发达的工业和七万多公里铁路，而我们四点七亿人口的中国只有二点六万公里铁路，因此我们的过渡时期要比苏联长，苏联在废除专制制度十二年以后才创造条件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富农。

为了缩短过渡时期，我们需要经济援助。我们认为只有从苏联和新民主国家才能得到这种援助。我们需要为期三年（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每年一亿美元、总额为三亿美元的付息贷款。我们也想得到用于购买部分设备、石油和其他商品，以及用于稳定人民币所必须的白银的借贷。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1卷第449页

附录 米高扬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回顾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

（1960年9月22日）

绝密

苏共中央：

鉴于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分歧业已明朗，且目前正在讨论这些问题，我认为有必要致信中央主席团各委员和候补委员，对我1949年1-2月访华期间向中央所作的报告和在此期间中央给我的指示作一介绍。

这些报告都是在西柏坡时通过密码电报传送的。当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驻在那里。电文没经任何改动或补充，是原复制件。当时毛泽东身边有两名苏联军医：捷列宾（后在苏联乘飞机时遇难）和梅利尼科夫，他二人为毛泽东本人及其家属看病。他们有无线电台，负责通讯任务。

我认为有必要谈一谈我的这次中国之行和谈判进程中的一些情况。

1947-1948年，我中央和毛泽东就他来莫斯科一事交换过意见。他没来过莫斯科。我方的邀请1947年6月就转交给他了^①，表示愿意接待他，并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共军事胜利后面临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苏中关系问题。

然而，由于毛泽东所处地方遥远，交通不便，他身体有病，军务缠身和其他原因，启程日期一拖再拖。

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发展迅猛，胜利在望。在华北进行了决战，得到70万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的中国革命军队（这些武器装备是我们一手交给中国的）开始向中国中心北京^②方向进军。

1949年1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答复毛泽东来访一事时，

① 指1947年6月15日，时任苏军情报部部长库兹涅佐夫致联共（布）中央驻延安联络员捷列宾的如下电文：“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他不需要任何邀请书前来莫斯科。如果毛泽东认为必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最好通过哈尔滨来办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派飞机前往。请电报告知同毛泽东的谈话结果及他的愿望。”

② 原文如此。当时称北平。

斯大林说了这样的想法——毛泽东当时来未必合适。他当时是游击战争的领导人，尽管计划让他秘密访问，但做到保密是不可能的。他离开中国的消息很可能泄露出去。他的来访，毫无疑问会被西方说成是谒见莫斯科，并从苏联那里讨取指令，而他本人将被讥为莫斯科的走狗。这将会损害中共的名誉。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对此又会聒噪一阵，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人。

同时，由毛泽东领导的正式的中国革命政府可能很快就要建立了。那时他就不必秘密访问，而是正式作为中国政府的首脑来邻国谈判。这反而会提高中国革命政府的威望，从而具有更大的国际意义。

尽管毛泽东延期来苏推迟了对已臻成熟问题的讨论，但这一消极方面可通过派我中央政治局一名委员去中国来消除。

那时，接待毛泽东来访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政治局讨论了这一问题后赞同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当即口授了给毛泽东的电报，其中谈到：“我们大家都主张您暂时推迟访苏日期。因为目前您留在中国非常必要。如果您愿意我们可立即为您派去一名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其他地方以商谈我们感兴趣的问题。”

毛泽东通知说，他决定把赴莫斯科的启程日期暂往后推，他们欢迎派一名政治局委员去中国，同时表示希望该同志在1月底或2月初抵达他们的驻地而不是哈尔滨。

斯大林提议我去中国。

为了避免在中国谈判时出现困难和做好充分准备，以免过多地向莫斯科请示，我把中国人可能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列成提纲并考虑了各种回答方案，然后同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进行了讨论。

这时出现了两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对这两个问题有不同看法。

一、我党中央不同意中共的下述观点：中国革命胜利之后，除中共外，所有党派都应退出政治舞台。毛泽东在1947年11月30日的电报中说：“在中国革命彻底胜利时期，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所有政治党派，除中共外，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将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对此，我党中央在回电（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签发）中写道：“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

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

显然，由于这一建议，中共改变了自己对待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

二、关于对待国民党政府建议苏联政府充当南京政府和中共之间停战和签订和平协定的调停人的问题。

1949年1月9日收到了南京政府的照会。南京政府建议苏联政府（还有法、英、美政府）充当南京政府和中共之间停战和签订和平协定的调停人。

我党中央用电报通知毛泽东说：

“我们考虑这样回答：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赞成停战并在中国建立和平，但在它同意充当调停人之前，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共方面是否愿意接受苏联充当调停人。因此，苏联希望中共方面得到中国政府关于和谈倡议的通知，并征得中共方面对苏联充当调停人的同意。我们考虑这样回答并请电告您是否同意。如果不同意，请告诉我们更为合适的答复。”

“我们还认为，如果征询您的意见，您应作如此回答：中国共产党赞成在中国实现和平，因为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后者应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谈判，但是不能让挑起中国内战的那些战犯参加。中国共产党主张直接同国民党谈判，不要任何外国调停人。”

对于1月10日的这封电报，斯大林在1949年1月11日又作了补充解释：

“如前电所述，我们草拟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方案，其意在于阻止和平谈判。十分明显，国民党不会在没有外国列强，尤其是美国充当调停人的情况下进行和平谈判。同样明显的是，国民党也不愿在没有蒋介石及其他战争罪犯参加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此，我们料想国民党会拒绝按照中共提出的条件举行谈判。其结局是，中共是赞成和谈的，因而不能指责它欲将内战继续下去。于是，国民党就成了破坏和谈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与美国的和谈花招会被戳穿，你们也可以将必胜的解放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早复为盼。”

1月12日毛泽东回电，其中谈到苏联政府最好这样答复南京政府的照会：

“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但是如何达

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停是不可接受的……

“……只有苏联在中国人民当中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如果苏联在答复南京政府照会时采取您1月10日电文中陈述的立场，那么这将导致美国、英国和法国认为参加调停是义务，导致国民党找到借口诬蔑我们是好战分子。而对国民党不满和指望人民解放军迅速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会失望……

“现在我们倾向于用全部事实戳穿国民党的和平骗局。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形势也不利于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就可渡江进攻南京。

“似乎我们不再需要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在现在的形势下，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弊多利少。”

对此，斯大林于1月14日又复电毛泽东，其中特别指出：“如何对付南京和美国的这种手法，可以有两种答复。第一种，直截了当地拒绝南京分子的和平建议，以此宣布必须继续内战。但这意味着什么？首先，这意味着，您在桌子上亮出了底牌，把和平旗帜这一重要武器交到了国民党分子的手中。其次，这意味着您帮助我们在中国国内外的敌人，让他们诬蔑共产党是继续内战的拥护者，让他们赞扬国民党是和平的捍卫者。第三，这意味着您给了美国在欧洲和美洲大造社会舆论的可能性，说共产党不会有和平，因为它不想和平，说中国实现和平的唯一手段是组织大国的武装干涉，像1918年到1921年的4年时间里对俄国所进行的干涉那样。”

往下又谈到第二种灵活的答复方案，其精神是第一次电文中阐述的苏联建议。当天，1月14日，毛泽东说收到了上面谈到的1月11日的补充电文，他在电报中宣称：“在基本方针上（利用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与您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又通知说，当天他们公布了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于是，再次通知毛泽东，说他最后一次电报中，“清楚地看出，在对待南京分子的和平建议问题上，我们之间已达成一致看法，中国共产党已开始‘和平’运动。这表明，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了。”

我去中国用的是安德烈耶夫这个化名，签署发给菲利波夫（斯大林化名）的电报也用的是这个姓。这是按斯大林的意见办的，以防万一在中国泄露出我在那里的消息。

我1月26日飞往中国，1月30日抵达那里，一直停留到1949年2月8日。同我一起前往中国的有原交通部长科瓦廖夫（当时是我党驻中共中央的代表）一名翻译，一名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他也姓科瓦廖夫。

凌晨，我们从旅顺起飞，拂晓飞抵石家庄附近的原日本军用机场。到场迎接的是朱德总司令、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翻译师哲。从这里乘缴获的汽车行驶160-170公里来到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位于山沟里的西柏坡。

头两天毛泽东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在中国共产党内曾发生过的派别斗争。在后几天会晤中，他也常常提起中共党史上的这些问题，讲了许多他怎样艰苦地同“左”右倾作斗争，因为王明的行为，党和军队怎样受挫（王明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后来又怎样纠正了错误，宗派分子怎样杀害中共党员干部而他本人如何幸免于难。他曾被开除出党，曾有人想杀掉他等。但从王明和李立三被揭露以后，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话讲）与自己的同志们一起工作得很好终止了杀害党的干部。他一直赞成在党内要讲宽宏大量，认为不应该因意见分歧而被赶出中央，不应该进行迫害。

毛泽东讲，就是这个王明起了不好的作用，但我们仍把他留在中央委员会里，仍住在中央驻地，尽管实际上没有任何工作。他非常详细地讲述了王明的错误。显而易见，他想试探一下我们怎样对待王明，我们有没有意图依靠王明或听取他的意见。我清楚毛泽东和王明之间的分歧，所以就没有过多谈论他。还在莫斯科就已商量好，我不同王明见面。在同毛泽东谈话时，他一次也没参加，也不想和我见面。

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政治局委员所讨论的某些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一、当我问毛泽东他想什么时候夺取中国主要工业中心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时，他回答说不着急。他说，“还需要一两年时间，我们才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掌握中国”，表示在此之前战争不会结束。

同时，他表示了这样的想法，他们避免夺取大城市而努力占领农村，如不想夺取上海。他说上海是大城市，而中国共产党没有干部。中共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上海的党组织很弱。最后，上海生活依靠运进原料和燃料。如果他们夺取上海，燃料却无法运进来，工业停顿，失业增加，这将使居民生活变得很糟。中共必须培养干部，而且已着手做了。等干部准备好了，他们即将夺取上海和南京。

根据我离开莫斯科之前我中央确定的立场，我反驳了这一点。我指出，他

们夺取大城中越快越好，干部是在斗争中成长的。至于上海的粮食和原料问题迟早会提出来。况且，夺取上海会严重削弱蒋介石而为共产党人提供一个无产阶级的基础。

二、毛泽东对共产党组织中的无产阶级成分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共对城市和工人阶级的关注不如对农民重视。这种立场同以前共产党和军队在山区活动远离工人阶级中心有关。时代变了，而对工人的态度依旧。

这一点，从会谈记录中可以看出，比如，毛泽东曾满意地指出，“共产党在农村有极大的影响，在那里没竞争对手。在这方面，蒋介石对待农民的政策帮了共产党人的忙。在城市则是另一回事了。在城市的学生中间，共产党有很大的影响；在工人中间，国民党的影响大于共产党。比如上海有 50 万工人，在打败日本之后，共产党活动已经合法，可它只在 20 万工人中有影响，其余都站在国民党一边”。

毛泽东以下的谈话也值得注意：“中国农民的觉悟比所有美国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都高。”

三、遵照中央指示，我劝说毛泽东不要拖延建立中国革命政府，应在联合的基础上尽快建立，这样有利。比如，占领南京或上海之后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这在国际关系中也有利。建立政府之后，共产党就不再是游击队而是作为政府在行动了，这样会有利于进一步对蒋介石的斗争。

毛泽东认为，不应急于建立政府，甚至说，没有政府他们更便于活动。说什么如果有政府则是联合政府，这意味着要在其他党派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使事情变得复杂。现在他们行动就像一个革命委员会，不依赖于其他党，尽管同其他党派保持着联系。毛泽东强调，这将有助于肃清全国的反革命分子在这件事情上，他很固执，并证明说，不能在夺取南京后（预计在 4 月）立即成立政府，而应在 6 月或 7 月。我则坚持说，过分拖延成立政府会削弱革命力量。

众所周知，政府于 9 月 30 日成立。

四、关于旅顺口。毛泽东说，一位女资产阶级活动家找到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说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之后，对苏联来说再继续保留旅顺口的海军基地已无意义，对中国来说收回这个基地则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说，他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正确的。这位妇女不懂政治。中国有共产党，苏联也有，但这并不排除而是完全可以让苏联的基地继续在旅顺存

在。因此，他们（中国共产党人）赞成继续保留这个基地。美帝国主义待在中国是为了压迫，而苏联留在旅顺是为了保护中国防御日本军国主义。当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能防御日本侵略时，苏联就无须保留旅顺基地了。

我中央和斯大林对此有另外的立场。如果中国政府是共产党的政府，则苏联在那里不需要有基地。我向中国同志陈述了这一立场。斯大林收到我关于中方对这一问题立场的汇报后，于1949年2月5日致电毛泽东：

“随着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形势会发生根本变化。苏联政府已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军从日本撤走，即取消这一不平等条约。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军立即从旅顺地区撤走为宜，苏联将准备满足中共这一愿望。”

毛泽东坚持自己的意见，但看得出，他有自己的策略考虑，只是没有明说。

五、关于新疆。这一问题也同样引人注目。毛泽东怀疑我们在新疆的意图。他说，在新疆伊犁地区有独立运动，不受乌鲁木齐政府支配，那里存在着共产党。他说，1945年在重庆会见白崇禧时，白告诉他，伊犁地区的起义军拥有苏联制造的大炮、坦克和飞机。

我向他明确地宣布，我们不赞成新疆地区的独立运动，而且，我们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我们认为，新疆也应是中国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提出了中苏之间修建途经新疆的铁路的建议。作为一种方案，任弼时提出中苏铁路经过蒙古修建。后来在莫斯科讨论这一问题时，斯大林表示希望这条铁路经过蒙古修建。因为这样走路线短，省钱，把经过新疆的路线作为下一批工程。

六、关于蒙古。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对待外蒙古和内蒙古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联合起来并入中国版图。我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已享有独立，日本投降之后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文化以及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它早就领略了独立的滋味，任何时候都未必会自愿放弃独立。如果什么时候它和内蒙古合并，那一定是成立统一的独立的蒙古。出席会谈的任弼时这时也插了话，他说内蒙古有300万人，而外蒙古才100万人。鉴于我的这一信息，斯大林给我发了电报，让我转告毛泽东，电报指出：

“外蒙古领导人主张按独立统一的蒙古国的原则将中国所有蒙族地区同外

蒙古合并。苏联政府表示反对这一计划，因为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去许多地区，尽管这一计划没有威胁到苏联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是所有蒙族地区都统一成一个自治地区，外蒙古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独立而在中国版图内实行自治。自然，这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古自己。”

看了这一电报后，毛泽东说，他注意到了电报的内容，并说“他们当然不保护大汉族沙文主义路线，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

七、关于其他国家承认未来革命政府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希望外国首先是苏联立即承认中国新政府。另一个方案（毛泽东显然更欣赏这一方案）是不希望新政府立即被承认。如果外国政府宣布承认它，那也不拒绝，但暂不予以同意。这种政策要实行一年。中国人指出第二种方案好因为这样可使新政府放开手脚，便于对在华外国人施加压力，而不必理睬外国政府的抗议。

毛泽东总是说，他们中共中央等待着我中央的指示和领导。我回答说，我中央不可能干涉中共中央的活动，不能给予任何指示，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我们每一个党都是独立的。当请教我们时，我们只能提出建议，不能给予指示。

毛泽东坚持说，他等待我中央的指示和领导，因为他们缺乏经验。他故意贬低自己作为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的作用和意义，说他只是斯大林的学生。他不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有什么意义，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新的贡献。

我认为，这是东方人表示谦虚的一种方式，并不代表毛的本意和他对自己的认识。

为了证实上述说法，我摘录一些当时毛泽东的重要谈话记录。在第一次会谈时他就说：

“请注意，中国大大落后于俄国，我们是贫乏的马克思主义者，犯过许多错误。如果用俄国尺度衡量我们的工作，那我们就什么也没有做。”

我回答说：“这些话只能证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谦虚，但很难让人同意。若是贫乏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无法领导中国内战达20年之久，并取得如此的胜利。至于错误，所有进行积极活动的党都有。我们党也犯错误，但它坚决坚持无情揭露错误的原则，以免重犯并从中吸取教训。”毛泽东补充说，他们是好心犯错误，并诚心诚意地纠正错误。他还举了一个例子。1946年中共中央在土改中犯了错误，后来在分析这一错误时发现，早在1933年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决议就写得非常正确，而到1946年却忘了。倘若1946年重温一下，那就

不会犯错误了。于是，1946年他们重新印发了1933年的土改决议，向农民公开宣布了自己的错误并把错误的责任承担下来。因为领导人要为基层工作人员的错误承担责任，尽管这些错误不是领导人本身犯的。

我指出，不能同意毛泽东的下述意见：如果用俄国尺度衡量中国革命，那么它什么也没做。第一，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第二，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使用俄国尺度衡量中国革命是不正确的。

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点，毛泽东说，中共1936年在苏区表现出了教条主义，照搬苏联的做法，当时导致了严重的失败。

后来毛泽东说：中共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以前他们认为，干部应该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文献。现在确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干部一边学习，同时还要做大量的实际工作。所以，他们规定了干部必读的12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列举了这些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等），但没有提到一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我当时问毛泽东，在教育干部的12本著作中没有一本中共领导人从理论上阐述中国革命经验的著作，这是否合适？

毛泽东回答说，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东西，不能把自己同马、恩、列、斯相提并论。

在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举杯时，他强调说，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是现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各族人民的导师，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导师。毛泽东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没有意义，只不过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用之于实际，一点儿也没有丰富它。

而且，他亲自给地方发了电报，严格禁止把他的名字同马、恩、列、斯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尽管为此他不得不同他最亲密的同志们进行争论。

我回答说，这表明毛泽东谦虚，但不能同意他的意见。马克思主义不应机械地运用到中国，而应考虑到中国的特点和具体的条件。中国革命有自己的路，它使革命带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特点。因此，阐述中共的经验必然具有理论价值必然会丰富马克思主义学说。难道可以否认总结中国经验对亚洲国家的革命运动的理论意义吗？当然不能。

毛泽东强调说，王明及其追随者为反对党的路线就非常强调中国的特点。

对此，我回答说，民族主义分子通常利用本国具体的历史特点，企图把党引上资产阶级化的道路，而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这些特点则是为了按马列主义领导革命。对此，毛泽东再没有争论。

我在1949年2月5日的电报中通知说，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强调，“在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他根据的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说的意见和他后来写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

“毛泽东说，对他来说最为宝贵的是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指示以及他对南斯拉夫西米奇民族主义的批评。”

“毛泽东几次强调，他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坚持亲苏方针。”

在2月7日最后一次会谈时，毛泽东对最重要的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表示满意，并热情地感谢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关怀。

当我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波斯克列贝舍夫受斯大林委托来电话说，对我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政治局表示满意。政治局每天都阅读和讨论我的电报。斯大林要求我尽快回到莫斯科作详细汇报。

回到莫斯科，我确实了解到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都感到满意，并认为我很好地完成了使命。

附上我从西柏坡所发电报和我在那里所收到的莫斯科复电的文稿。

A, 米高扬

1960年9月22日

阅后退回苏共中央总务部一局

发至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

и.п. 2375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9卷第220页

中苏结盟时期

附录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9年11月10日）

摘自 H. B. 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1日

第111号

绝密

今年11月10日下午5时，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主动来大使馆拜会了大使，在礼节性的寒暄之后，他受毛泽东委托谈了以下情况，并要求转告苏联政府：

一、毛泽东早就有访问苏联的愿望。今年夏季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要赴莫斯科时，毛泽东就想亲自率团前来，但是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刚进北京，还没有组建政府，面临大量的组织工作，若毛泽东不在就无法进行，因此毛泽东留在了北京。此外，刘少奇之行带有非正式性质，是以高岗的东北代表团作掩护的。

刘少奇在莫斯科时，在与斯大林同志谈话中转达了毛泽东想会见斯大林同志的愿望。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他在任何时候都高兴在莫斯科会见毛泽东。科瓦廖夫在今年11月5日的谈话中也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态度。毛泽东在会见科瓦廖夫时，通过科瓦廖夫同志转达了他想于今年12月在莫斯科拜会斯大林，以便亲自向斯大林同志祝寿的愿望。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同志70寿辰这一天，全世界对苏友好国家的代表团都将到莫斯科，因此，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带有完全公开的性质。

11月8日，毛泽东亲自给莫斯科发了类似内容的电报。

今天，毛泽东委托周恩来拜会大使，将毛泽东想拜会斯大林同志的愿望通知大使，并请大使将此事转告莫斯科。

我问，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属什么性质，中国政府人士中谁陪同他。周恩来回答说，访问时除了与斯大林同志建立个人友好接触外，看来毛泽东同志还想提出中苏条约问题。政府成员中没有人和毛泽东一起去莫斯科，如果毛泽东同

志访问时要制订新的中苏条约，那么他（周恩来）可以立即坐飞机去莫斯科签署这一条约。

接着周恩来问大使，大使是否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大使回答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将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去做。

.....

使馆参赞 C. П. 齐赫文斯基同志谈话时在座并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H. 罗申（签名）

共 6 份，送：维辛斯基、葛罗米柯、拉夫连季耶夫、第一远东司各 1 份，档案室 2 份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 2 卷第 155 页

关于中苏条约及撤军、 贷款、援助等问题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

(1949年12月16日)

在互致问候和寒暄后，进行了下述内容的会谈。

毛泽东同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卫和平。中国需要3-5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了解世界和平将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能得以保证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中国是在为和平而战。苏联也首先致力于和平问题，虽然它实现和平已有四年。至于说中国，现实并不存在对它的直接威胁：日本还没有站起来，因此它还没有准备好打仗；美国虽然在叫嚣战争，但它最怕打仗；欧洲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难道金日成会到中国去打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和睦相处，和平的保证可能不仅五至十年，而且可能二十至二十五年，也许更长的时间。

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需要弄清的是：是否有必要宣布保留现有的一九四五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

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 and 英国同

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根据中方的要求，可以做这样的修改。

至于中长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中方的愿望，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协议的有关条款。

但是，如果中国同志不满意这个设想，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毛泽东同志：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中国还不足以单独地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此外，中长铁路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同志：撤军并不意味着苏联拒绝援助中国，如果中国需要这种援助的话。问题在于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在别国的领土尤其是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是完全不合适的。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说，如果苏军可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为什么，例如英国人能不能驻军香港，美国人能不能驻军东京呢？

如果双方一致同意苏军撤出旅顺，那在国际上我们将博得好评。同时，苏军的撤出也给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以重大的帮助。所有人都将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共产党人做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尊重民族资产阶级。

条约保障了苏联驻军旅顺的权利，但是，苏联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和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撤军。但如果这样做不合适，那么，驻旅顺的军队可以留下两年、五年或十年，就看对中国如何做有利。别让人们以为我们想从中国逃跑。我们也可以把军队留下二十年。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

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眼下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由旅顺撤军一样。

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呢？

斯大林同志：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毛泽东同志：希望能解决苏联给中国贷款的问题，也就是说，苏联政府同中国政府之间签订一个贷款三亿美元的协议。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如果您想现在就签订协议的话，我们同意。

毛泽东：是的，正是现在，因为这可能会在中国引起好的反响。

与此同时，必须解决贸易问题，特别是苏联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虽然我们目前无法提供这一地区的准确的贸易业务计划。

斯大林同志：现在我们需要知道中国需要哪些设备，正是现在，因为我们没有备用设备，必须预先向工业部门提出申请。

毛泽东同志：在编制设备订单方面，我们感到有困难，因为工业情况我们还不清楚。

斯大林同志：希望尽快提出订单，因为设备订货在我国工业部门至少要提前一年安排下去。

毛泽东同志：我们非常想在建立空中航线方面得到苏联方面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我们已打算好给予这方面的援助。空中航线可以经过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有专家。援助将有保证。

毛泽东同志：在建立海军方面，我们同样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可以在旅顺为中国海军培养干部。你们出人，我们出船。完成学业的中国海军干部，可以开着这些船返回中国。

毛泽东同志：国民党人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

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拿下台湾。

斯大林同志：有可能给予援助。但援助形式需要考虑周到。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干预提供借口。至于参谋和教官，我们随时都有。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

你们有登陆部队吗？

毛泽东同志：有一个原国民党的陆战团，现在已转到我们方面来了。

斯大林同志：可以选一个连的陆战队员，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将来派往台湾，并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

毛泽东同志：我们的部队已进抵中缅和中国与印度支那的边境。因此，英国和美国担心我们的部队是否会越过边境。

斯大林同志：可以放出风去，说你们打算越过边界，并以此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某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上，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但我们认为，我们不必急于承认。我们必须整顿国内秩序，巩固自己的地位，尔后再同外国帝国主义者谈判。

斯大林同志：这是正确的政策。然而，不必亲自出面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发生冲突。例如，如果需要对英国施加压力，那可以采用广东省与香港冲突来做到这一点。而为了解决这类冲突，毛泽东可以作为调停人出面。主要的是不要匆忙行事和避免冲突。

外国银行是否仍在上海营业呢？

毛泽东同志：仍在营业。

斯大林同志：它们为谁服务呢？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企业服务，这些企业我们暂时还未触动。至于外国人的影响，在经济和商业领域，主要是

英国人的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美国人占主要地位。

斯大林同志：日本企业的情况如何呢？

毛泽东同志：已将它们收归国有。

斯大林同志：海关在谁的手中？

毛泽东同志：在政府手中。

斯大林同志：必须注意海关，它通常是国家巨额收入的来源。

毛泽东同志：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我们已取得完全的成功，至于文化和经济，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摆脱外国的影响。

斯大林同志：在外国企业、银行等处，你们有稽查人员和谍报人员吗？

毛泽东同志：有。我们在研究和监督外国企业方面（开滦矿务总局、上海的电厂和水厂等），进行了相应的工作。

斯大林同志：必须有按照法律行事的政府稽查人员。对外国人征税必须多于中国人。

钨、钼、石油的开采权在谁的手中？

毛泽东同志：在政府手中。

斯大林同志：必须发展矿物开采。尤其是石油开采，可以先建兰州以西至成都的输油管，然后再由水路运输燃料。

毛泽东同志：我们还没有决定，中国哪些地区必须首先发展——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因为我们尚不清楚和平的前景。

斯大林同志：石油、煤炭、金属总是需要的，不论将来是否打仗。在中国南方能否栽培橡胶树呢？

毛泽东同志：到目前为止，尚未成功。

斯大林同志：中国有气象服务吗？

毛泽东同志：没有，还没有建立。

斯大林同志：应该建立。

斯大林同志：我们想从您那里得到您的著作目录，这些著作可以

译成俄文。

毛泽东同志：我正在审校自己的著作，它们是由各地的出版社印刷的，有很多错误和曲解的地方。我打算在一九五〇年春季以前看完材料。但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同俄文译者一起对文字做些润色；第二，在中文原著的校订上得到帮助。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但您在您的著作编辑方面需要帮助吗？

毛泽东同志：需要，并请您为此指派一位适当的同志，比如说，一位联共（布）中央委员。

斯大林同志：如果需要，这也可以做到。

出席会谈的有：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维辛斯基同志、费德林同志和师哲（卡尔斯基）同志。

费德林同志记录。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2卷第175页

关于签订新约及中长铁路、 旅顺、大连等问题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

（1950年1月22日）

互相问候、简短叙谈以后，举行会谈，内容如下：

斯大林：有两类问题需要讨论，第一类问题涉及中苏现有各项协定，第二类问题涉及有关东北、新疆等现实问题。

我想，最好不从现在的问题谈起，而是先讨论已有的协定。我们认为，这些协定必须修订，虽然以前我们曾经考虑，可以把它们保留下去。已有的协定，包括条约在内，必须修改，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对日战争的原则。既然战争结束了，日本被打败了，情况变了，那么，现存的条约就落后于时代了。

请对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发表意见。

毛泽东：我们还没有具体拟定好条约的草案，仅有一些设想。

斯大林：我们可以交换意见，然后起草有关草案。

毛泽东：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认为，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已经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在友好同盟条约中应当把保障我们两国繁荣的内容固定下来，还应规定必须防止日本发动新的侵略。既然两国的繁荣对我们有利，那么就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阻挠这件事。

斯大林：对的。日本保留了干部，特别是在美国继续奉行他们目前政策的条件下，日本必然会重新抬头。

毛泽东：我所说的两点是要把我们未来的条约同现存的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情况变了，也具备了建立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

此外，如果过去说的是在进行对日战争时的合作的话，现在说的应是防止日本侵略。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

斯大林：要不要保留写入原友好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呢？即“在联合国应缔约国双方的要求承担起防止日本今后侵略的责任以前，本条款继续有效”。

毛泽东：我想，这一条就不必保留了。

斯大林：我也认为不必了。在新条约中应规定哪些条款呢？

毛泽东：我们认为，在新条约中必须规定在国际问题上协商的条文。把这一条列入条约将增强我们的地位，因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还存在着在国际关系上反对向苏联靠拢的意见。

斯大林：好的。在缔结友好合作条约时写上这一条是理所当然的。

毛泽东：对。

斯大林：委托谁去起草草案呢？我想，应该让维辛斯基和周恩来去做这件事。

毛泽东：同意。

斯大林：现在转到中长铁路协定上。您对这个问题有何建议？

毛泽东：也许可以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旅顺口协定也这样办，而实际上做一些修改。

斯大林：就是说，您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但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

毛泽东：我们必须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利益，也要考虑到苏联的利益。

斯大林：对的。我们认为，旅顺口条约是不平等的。

毛泽东：但是，改变这个协定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

斯大林：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

我们不得不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是担心，这会给苏联带来不良的后果。

斯大林：大家知道，我们是在对日战争时期签订的现有条约。我们不知道蒋介石会被推翻。我们的出发点是，我国军队驻旅顺将对苏联和中国民主事业有利。

毛泽东：这个问题是清楚的。

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否认为可以接受这样的方案：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港协定依然有效，此后俄军撤出旅顺。或者可以提出另一种方案，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从旅顺撤军。哪一种方案更合适，就采纳哪一种方案。我们同意任何一种方案。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考虑。我们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应继续有效，签订对日和约后失效，苏军撤走。但是，希望在旅顺我们进行军事合作，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的海军。

斯大林：大连问题。我们不打算在大连保留苏联的任何权利。

毛泽东：大连是否保留作为自由港？

斯大林：既然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中国应当自己决定大连问题：它是自由港或者不是。当年罗斯福曾坚持让大连成为自由港。

毛泽东：这么说，保留自由港是符合美、英利益喽？

斯大林：当然，其结果就是门户开放。

毛泽东：我们认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苏中经济合作的基地。大连有许多企业，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没有能力经营。我们要在当地发展经济合作。

斯大林：就是说，旅顺口协定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依然有效。签订和约以后现协定失效，俄国撤走自己的军队，我可以把说过的意思这样归纳吧？

毛泽东：核心就是这样，而且我们想写在新条约里的正是这一点。

斯大林：继续讨论中长铁路问题。请按照共产党人的态度告诉我们，你们有哪些疑问？

毛泽东：基本想法是，在新协定中要写明，共同经营和管理今后还要继续下去。但是，说到管理，那么中方在管理中应起主要作用。然后，要研究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问题和规定双方的投资规模。

莫洛托夫：在涉及两国合作和共同管理某项企业的情况下，通常规定双方平等参与以及轮流担任领导职务的办法。在旧协定里，铁路管理归苏方，但今后我们认为必须规定轮流执行管理的职能。例如，可以每隔两三年轮流一次。

周恩来：我们的同志认为，现有的中长铁路理事会以及铁路局长的职务应该撤销，建立铁路管理委员会代替它，而且要规定，委员会主席和局长职务要由中方担任。但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这个问题必须再考虑一下。

斯大林：如果是说共同管理，那么，领导职务就必须轮换担任。这样做更合理一些。至于协定的有效期，我们不反对缩短。

周恩来：要不要修改双方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51%，以代替现行的平均投资？

莫洛托夫：这与现行的双方均等原则相抵触。

斯大林：我们确实有同捷克和保加利亚的协定，规定了双方均衡、平等的原则。既然是共同管理，那么就要平等参与。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要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

斯大林：那就讨论贷款协定吧。对已经达成的一致意见，要赋予国家间协定的形式，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军事装备供货是否纳入贷款额之内？

斯大林：这可由你们自己决定：可以用贷款支付，也可以按贸易协定办理。

毛泽东：如果军事供货用贷款来支付，那么，我们为工业剩下的资金就不多了。因此，看来军事供货只能部分靠贷款来支付，部分用商品来支付。不能把工业设备和军事装备的贷款供应期限从五年缩短到三至四年吗？

斯大林：要看我们的能力如何，要看我国工业的订货情况。然而，毕竟可以把贷款协定的有效期提前到一九五〇一月一日，因为实际上现在就应开始供货。如果在协定中从一九四九年七月就开始提供贷款，那么，国际舆论就会不理解，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政府，怎么能同苏联达成协议呢？^① 我想，你们应赶快提交工业设备订货清单。应当考虑到，这种清单提交得越早，对事情就越有利。

毛泽东：我们认为，贷款协定的条件对中国十分有利。为这笔贷款我们总共只付百分之一的利息。

斯大林：我们为各人民民主国家提供贷款的协定，都规定收百分之二的利息。斯大林同志开玩笑说，如果你们情愿，我们可以给你们提高利率。当然，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从接到的电报中看到，中国政府正准备把军队用于经济建设。这很好。当时，我们也曾把军队用于我国经济建设，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毛泽东：对的，我们正在利用苏联同志的经验。

斯大林：你们提出中国要为新疆弄到一定数量的粮食吗？

毛泽东：小麦和纺织品。

斯大林：为此，你们要提供一个相应的申请数。

毛泽东：好的，我们起草一个。我们怎样起草贸易条约？

斯大林：你们有什么意见？至今只同东北有贸易条约。我们想要

^① 在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期间，1949年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已经分别代表中共和苏共签订了关于贷款的协定。

知道今后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是同新疆、东北和其他省签订单独的条约还是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

毛泽东：我们希望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但同时新疆可以有单独的协定。

斯大林：只是新疆，东北呢？

周恩来：对东北则不签订单独的协定，因为中央的条约基本上要靠东北供货来保证支付。

斯大林：我们希望，同新疆或东北的协定要得到中央政府批准，并且中央政府要对这些协定负责。

毛泽东：同新疆的条约必须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签。

斯大林：对，因为省政府考虑不了那么多，而中央政府总是了解得更清楚。还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恢复和发展东北的经济。

斯大林：我想，我们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和李富春同志准备一下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我想指出，您派到中国的航空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共运送了将近一千人。请允许我，斯大林同志，感谢您的援助，并请您把这个航空团继续留在中国，为给准备进攻西藏的刘伯承部队运送食品提供帮助。

斯大林：你们准备进攻，这很好。必须把西藏拿到手。至于航空团的事，我们同军方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

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

出席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和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师哲（卡尔斯基）。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2卷第265页

附录 中方提交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 (1950年1月24日)

И. В. 斯大林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我们从周恩来处得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

A. 维辛斯基

1950年1月26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
等同志

译自中文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希望通过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途径，共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与日本结成联盟的其他一些国家重新发动的侵略战争，根据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加强远东以及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并深信这是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由此，中苏两国政府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

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合程序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威胁。如果缔约国中的一方同上述国家发生战争，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缔约国双方均重申，它们愿以最真诚的态度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此崇高任务的尽快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不经互相协商不单独或同其他国家一起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愿以友好合作的精神，本着平等、互利以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相互给予一切尽可能的经济援助和实现必要的经济合作，以利于减轻困难和加快中苏国内的经济建设，并为全世界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七条

本条约签字后立即生效；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本条约有效期为 30 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条约有效期将延长 5 年，并以此原则顺延。

翻译：克鲁季科夫、费德林、库尔久科夫。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 2 卷第 274 页

附录 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补充协定的草案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签署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了保障两国的国防，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达成本补充协定：

无论是在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北和新疆境内，都不给外国人提供租让权，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

1950年2月__日签订于莫斯科，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附：维辛斯基与周恩来会谈纪要（摘录）

（1950年2月12日）

.....

周恩来告之，2月10日中国代表团收到了莫洛托夫转交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的协定草案。

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以下几处不大的意见。比如，从汉语的角度来看，这个草案的标题必须这样表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协议草案第一段的结尾俄文是：“协议如下”，按照中文必须写成：“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

协议草案第二段俄文是“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按照中文必须写成“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

……这些修改并没有使草案的意义和实质发生变化，……。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2卷第313页

关于筹备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情况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0年10月4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4日16时25分收到

现将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呈上：

菲利波夫同志：

尤金^①同志来华两个月期间给予了我们很大帮助。但他所参加的《毛泽东选集》出版筹备工作目前尚未结束，尚需一个多月时间才能完成。

此外，我们还拟请尤金同志访问山东省及南京、上海、杭州、南昌、汉口、长沙、广州、两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城市，使他在了解这些城市的同时，给我们的领导干部作报告。这约需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他在华还需再待约四个月左右。请允许尤金同志留华工作到一九五一年一月底或二月底。

可否，请复。

毛泽东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3卷第78页

① П. Ф. 尤金，苏联科学院院士、哲学家。

附录 尤金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完全采纳了我的建议

下面是尤金同志致菲利波夫的电报：

“菲利波夫同志：

我已就整个3卷的《毛泽东选集》提出了300多条意见和修订及各种文字上的修改。对于头两卷，毛泽东已详细地研究了 my 建议，并完全采纳了我的建议。对于第三卷的修改意见，目前正由毛泽东审订。已转告我：他将于近日内约见我，以研究我的意见和建议。

正如我以前报告过的，毛泽东又选出了一批过去未译成俄文的新的文章。这些文章约有30-40个印刷页码。

对于由翻译译出的300多页新的译文，我已收到了（约有一半为新的文章），也研究过了，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目前我还没有把这些意见和建议交给文章的作者。翻译要将余下的文章译出，约需用1个半月的时间。

毛泽东多次请我到一些大城市（上海、南京、广州等）走一走，并请我给党的积极分子作报告。

我认为目前有可能到一些城市走走，因为翻译正在译那些新的文章。这次到这些城市旅行，约需用2至3周的时间。待我返回北京以后，再用2至3周的时间即可完成对余下文章的审订工作。

由此看来，到12月底，我根本无法结束在中国的工作和返回莫斯科。等待您的指示。

尤金”

H. 罗申

1950年10月4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维辛斯基同志、葛罗米柯同志、格里戈良同志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3卷第78页

附录 联共（布）政治局派遣尤金再次前往中国

（1951年6月3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5 月 18 日至 7 月 30 日会议第 82 号记录
1951 年 6 月 30 日

第 368 项 关于派遣 П. Ф. 尤金同志去中国。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请求，派 П. Ф. 尤金同志前往中国出差，期限为 3 个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附件：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把如下电文转交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根据您的请求，尤金同志将于今年 7 月中旬前往北京，为期 3 个月。

菲利波夫”

收到请回复，执行情况请来电告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 3 卷第 336 页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请帮助苏联购买天然橡胶

（1950年11月21日）

致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我对您有个请求。我们感觉天然橡胶严重不足。我们生产了足够的人造橡胶，但是用其来生产橡胶制品的话，每百万吨人造橡胶需要混合30万吨天然橡胶。不进行这样的混合的话，人造橡胶就不适合于工业应用。

前不久我们向垄断天然橡胶的英国人购买了天然橡胶，但是，现在英国人不再向我们出售天然橡胶了，哪怕是最少量的规模。这就为我们的汽车、航空工业的发展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同时将使我们的工业面临缺少橡胶制品的威胁。

我的请求是，请您和您的中国朋友们利用私人的形式和其他合适的途径购买天然橡胶并将其转给苏联。如果最近能购买50000吨天然橡胶就很好了。我们当然会支付所有的费用。如果通过香港或者其他方购买，那么至少需要购买8000吨和10000吨。

能否满足我的这一请求，请告知。

菲利波夫

1950年11月21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3卷第128页

同意为苏联代为购买天然橡胶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0年11月22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

菲利波夫同志！

收到了您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来信。现在我们有一千八百吨天然橡胶。我已经向贸易部下达了命令，要他们按照购买的价格立刻向苏联政府提供八千吨天然橡胶。

我们希望从苏联获得与我们提供的天然橡胶等值的新闻纸和棉布。

如果情况不发生变化的话，在生活在东南亚国家的华侨的帮助下，我们可以继续购买天然橡胶，并将其运往天津市。我们现在可以为苏联政府购买五万吨其急需的天然橡胶，甚至更多，达七万吨，但需要用美元或者英镑支付。现在天然橡胶的价格提高到了每吨一千二百美元。

供应天然橡胶的期限近几个月会确定下来。

关于天然橡胶的供应及其今后的采购问题我们将责成对外贸易部的叶季壮同志同苏联政府的贸易代表米古诺夫同志直接进行谈判。请您就这个问题下达相关的指示。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3卷第129页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为苏联代购天然橡胶事

(1950年11月24日)

毛泽东同志：

第一，您通报说，已经命令中国贸易部立即从自己的储备中以购入价格向苏联提供 8000 吨橡胶，我们已经收到了这一通报。我对您做出的这一决定表示感谢。我们同意向中国提供新闻纸和棉布，来补偿中国向我们提供的天然橡胶，其中天然橡胶价值的三分之一用于提供棉布。

第二，我们希望，除了向苏联供应 8000 吨天然橡胶之外，不是购买 5 万吨，而是购买 7 万吨的天然橡胶，购买的这些天然橡胶只能用英镑支付，因为我们的美元不足。您通报的价格我们认为可以接受。

我们提请注意的是，在以小批量组织购买的时候，要尽量避免出现投机行为。必须特别注意，所购买的天然橡胶主要都应该是上等品——特等品、一等品和二等品，三等品的数量不超过 20%—30%，因为我们可以用人造橡胶来替代低等的天然橡胶。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购买一些四等品和五等品的天然橡胶但这类橡胶的供应量不应超过 5%—10%。

橡胶的质量问题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请求对于购买的天然橡胶应该进行质量检查，因为在供货的时候橡胶投机者可能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欺骗手段。

第三，将就购买天然橡胶问题向商务代表米古诺夫同志下达必要的指示。

菲利波夫

1950 年 11 月 24 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 3 卷第 134 页

在中国内地种植橡胶树的计划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8月17日）

菲利波夫同志！

根据您的提议，中国政府就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问题召开了会议。会议的结果制订了计划。我们打算立即着手完成该项计划。

我把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以及副主任薄一波同志在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一日向我提出的计划发送给您。

请您审核该计划，并做出相应的指示。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七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3卷第435页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计划

（1951年9月10日）

毛泽东同志：

收到了您关于阐述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初步计划的电报。

1. 为了使我们在天然橡胶这一重要的战略原料上一起最终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我们认为，计划中应该考虑，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规模至少应能保证每年得到 20 万吨橡胶。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考虑的是中国、苏联和部分人民民主国家的需要。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尽快采取措施种植橡胶树，以便尽快得到天然橡胶。

2. 计划草案中提出了关于橡胶种植园的所有制形式问题。橡胶种植园应该属于谁呢？属于国家还是农民？我们认为，首先应该着手建立国有的橡胶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考虑是，在短暂的时间内，在未开发的土地上建立橡胶种植园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进行改良土壤的工作，需要实行机械化，而这些都是农民所做不到的。在组建国营的橡胶种植园的同时，应该尽力鼓励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橡胶树。有适合种植橡胶树的农业用地，也有足够数量的农业劳动力，在国家提供的相关帮助下，这将能够生产出大量的橡胶。

至于需要栽培的橡胶树苗，则应掌握在国家手中，为此，应当进行特别的组织工作，应该组织专家对种苗的培植工作进行领导，并大规模使用机械化。

3. 从你们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海南岛以其自身的自然条件可以成为生产橡胶的最为重要的基地，而且近年就可以生产出橡胶。因此，我们需要尽快制订计划，着手在海南岛建立大面积的橡胶种植园，这一点非常重要。

4. 准备地块，准备在近年大面积地种植橡胶树所需要的一些机械：拖拉机、耕地机、中耕机等机械。在此方面我们愿意给予必要的帮助。

5. 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我们可以向中国派遣一组熟悉林业工作和国营农场工作的苏联专家、熟悉对多沼泽的土壤进行改良的专家、熟悉种苗机械化种植工作以及树木种植工作的专家。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10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第4卷第45页

必须建立国营的橡胶种植园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9月16日)

菲利波夫同志：

您关于种植橡胶树的电报我们收到了。

您提出的意见非常好，我们完全赞同。

我们种植橡胶树的计划可以保证每年得到二十万吨天然橡胶：海南岛可以保证十万吨，中国大陆性气候地区可以保障十万吨。其中的大部分天然橡胶将会供应给苏联和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对于我们自己，有很少一部分就足够了。

我们正在研究如此大规模地种植橡胶树以便得到二十万吨以上的橡胶的可能性。

您提出的如下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主要在于，必须建立国营的橡胶种植园。我们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研究。橡胶种苗的培植将会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

我们非常需要苏联和苏联专家提供技术帮助。

十月下旬，我们打算在广州召开会议，对关于种植橡胶树的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并解决这些问题。希望苏联专家能够在十月中旬到达北京，以便参加十月下旬在广州举行的会议。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那么我请求您及时把苏联专家派往中国。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六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4卷第47页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摘录）：是否赞同朱德组建中苏橡胶股份公司的建议

（1952年3月15日）

毛泽东同志：

第一，前不久听取了从中国归国的苏联代表团主席科尔达诺夫关于橡胶问题的报告。得知，橡胶一方面将从农民那里得到，另一方面将从国家经营的橡胶园得到。科尔达诺夫通报说，种植的橡胶面积完全足够完成通知给您的关于橡胶生产的计划。中方需要技术、拖拉机、汽车和俄罗斯专家。在提供技术和派遣专家方面我们可以提供帮助。1951年10月，朱德同志在同尤金进行的谈话中表示，如果能够组建中苏橡胶股份公司就好了。如果您赞同这一看法的话，那么我们也不反对。或许您希望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合作。请把您的看法通知我们。

.....

斯大林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4卷第193页

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不太合适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

（1952年3月28日）

.....

六、种植橡胶树问题。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多次研究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急需苏联专家方面的援助以及技术援助。但按中苏合资公司形式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

因此对种植橡胶树问题，我们建议同苏联政府缔结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的协定，该协定规定保证以提供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给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且按优惠价格提供，即按世界市场价打一定折扣。

.....

毛泽东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4卷第201页

橡胶种植及苏方提供设备和专家的清单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2年3月28日)

菲利波夫同志！

以科尔达诺夫同志为首的苏联专家小组在对广东和广西省的橡胶种植区进行调查之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书面的形式向我们提出了关于发展橡胶业问题的可能性的建议。

我们同意了这些建议。

现在已经派出了一千名农林学院的大学生和教授，他们将到橡胶种植区进行具体的研究，并确定一些土地，以便建议在这些土地上开辟橡胶种植园。我们决定，要在三年的时间内使橡胶的种植面积达到一千万亩，以便每年得到共计二十五万吨的橡胶。

为了完成上述计划，同时根据您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十日日的电报中的指示，我们向苏联政府请求援助一些汽车、拖拉机、可燃烧的材料、耙、犁以及其他一些机器（见附表）。这些设备的清单由中国专家根据汇总的材料拟定。由于经验不足，该清单也许很不准确。

如果您同意向我们提供设备，那么我们将派一些专员到莫斯科，在您指定的相关机构的帮助下由这些专员来审议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做出相应的决定。如果今后我们还有一些需要的话，我们将再次向您请求帮助。

至于就供应的设备达成协议，我们是期待的，在今年五月和六月份有两批设备运往中国，以便在今年下半年开始着手进行开垦荒地的工作。

我们在七至八年以后偿还这些技术设备的价值，您认为是否可以？

到那时候中国政府已经能够生产橡胶，以便使这批设备的价值能够以分期供应橡胶的形式偿还。

请您审议我们的建议。

同时，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向我们派遣三十一名专家和二十六名技术工人（共计五十七人）帮助我们。

这些专家和技术工人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二名机械专家、三名机械工程师，共计五人。希望这组专家在四月底到中国，以便参加拖拉机站的场所、修理场所和燃料库的计划工作。第二组：一名种植橡胶树的高级专家、一名育种专家、三名育苗专家、四名组建国营农场的专家、一名研究橡胶的科学工作者，以及四名树苗栽培专家，共计十四人。希望这组专家在五月底到中国。第三组：二名机械专家、十名机械工程师、二十六名技术修理工，共计三十八人，希望这组专家在六月底到中国。

请对我的这份电报进行审议并把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附件一：

必需的机械和物资清单

附件二：

拖拉机以及其他的农业机械引进计划

（清单和计划共计三十四个项目，此处略。——本书制作者注）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4卷第203页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种植橡胶树协议及有关物资供应等问题

（1952年4月4日）

毛泽东同志：

……^①

第三，根据您最近就种植橡胶树问题发来的电报，我作如下通报。我们同意签署种植橡胶树的协议，其中规定苏联以贷款的形式提供技术和物资、派遣苏联专家、把中国每年开采的50%以上的橡胶以优惠的条件供应给苏联，供应给苏联的橡胶同国际市场价格相比要打一定的折扣。

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谈判可以在莫斯科举行，正如您所建议的，在5月中旬举行。

关于贷款的条件，我们的设想如下：贷款年利率为2%，3年以后开始偿还，10年以后偿还清，每年偿还的金额相同。

贷款以向苏联提供在中国生产的橡胶的形式进行，而在中国能够生产自己的橡胶之前，以向苏联提供精钨矿、钼矿、锡矿、锑矿等商品的形式进行。

苏联专家的派遣将会根据您的请求进行。

技术和物资的供应将会根据您的请求在如下的期限内进行，每批的供货量相同：ДТ-54 拖拉机、载重汽车、油罐汽车、拖挂工具以及移动发电机在1952年第二和第三季度供应；С-80 拖拉机、掘树机、灌木铲除机、维修器具和润滑油在1952年第二、第三和第四季度供应；移动维修站、维修站的设备以及拖拉机的备用零件在1952年第四季度和1953年第一季度供应。

菲利波夫

1952年4月4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第4卷第208页

①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

通告中国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2年3月28日）

发自北京，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您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关于中国海军建设问题的电报和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关于中蒙铁路建设问题的电报已收到。

非常感谢您对中国建设问题的关心和帮助。

制定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总体规划以及计算为此所需经费和外汇实际总额等问题，我们一向希望待到朝鲜谈判前景较为明朗的时候来搞，情况一旦明朗，我们将立即向您提出关于总体规划的报告，以便您对我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有个清楚的概念，尔后根据需要和可能决定给我们提供援助的数额和方式。

现在可以认为，朝鲜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如果在四月份可以达成协议，那我们就在十一月中旬派某些负责同志到莫斯科向您提出关于国防和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基本建设五年计划初步方案的报告，请苏联政府在派出专家及提供技术、设备和材料等方面给予系统援助，并给予贷款。

您如果同意，我们就开始准备该报告需要的所有材料。

关于您在电报中提到的各种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援助，现通告如下：

一、旅顺港海军基地问题。由于非法的美日和平条约特别是美日安全条约的缔结，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有理由也有必要请苏联政府让苏

军留在旅顺港地区，并在一九五二年底不撤出旅顺港。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委派代表准备于今年五月中旬抵达莫斯科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二、为了加强中国的海岸防御，我们完全同意您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和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的电报中所作的指示。根据这两份电报所提出的计划，我们进行了初步计算并得出结论，需要向苏联订货的总额约为十八亿卢布。为了完成中国海军人员训练计划，上述订货必须在一九五五年底以前全部到位。

但中国政府在这三年内无力偿还这笔外汇。因此我们请苏联政府对中国国防建设包括海军在内以提供贷款的方式予以援助。至于具体计划，我们打算由我国代表于今年五月中旬抵达莫斯科时当面提交。

考虑到关于中国海军建设问题的谈判推迟进行是不适宜的，因此我们打算于四月上旬派出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同志及其参谋长罗舜初同志和两名中国海军的工程和造船专家到莫斯科与苏联海军部的同志进行谈判。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下达指示，派这些同志前往莫斯科。

三、按我们计算，从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开始，你们按提供军事贷款协定条件三次提供的军事贷款总额的剩余额是四亿多卢布。我们打算用这四亿多卢布购买我们的空军所必需的飞机、设备和弹药。详细申请单另行电告。

用这四亿多卢布购买飞机和航空物资之后的余款购买其他武器装备的申请单只能在上述物资的价款结算清楚之后才能提出。

四、给六十个步兵师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问题。除一九五一年给四个师提供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以外，按修改后的计划，另一批物资提供应在今年四月开始。国内军队整编也将在今年四月开始。

如果没有新的变动，我们希望在九五二年获得十六个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九五三年获得二十个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九五四年获得二十个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在我们所获得武器装备的四个师

中，有三个师的武器装备将转交前线朝鲜人民军。

至于六十个步兵师武器装备的军事贷款，我们也打算委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就其办理的具体程序进行谈判。

五、从中国北部开始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铁路修建问题。如果您认为修建这条铁路比修建从中国西北部通往苏联的铁路更为紧迫而且更有必要，考虑到苏联同时开始修建该铁路从乌兰巴托向中蒙边境延伸的这一段，则我们准备于今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勘察工作，于一九五三年开始修建。至于这一铁路的运行路线，我们认为它始于集宁站或包头站进入中国的绥远省，经中蒙边境的哈顺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兰巴托，比从张家口延伸到乌兰巴托要好。当然，最后决定要在对该铁路修建路线进行预先勘察之后才能做出。

顺便说说，如果修建一条从中国西北部的兰州经玉门、哈密、乌鲁木齐到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总长两千公里，与苏联的突厥斯坦—西伯利亚干线相接的铁路，则这对苏联和中国都更为有利。

我们不知道苏联政府对此问题的意见及苏联政府在修建这条铁路方面能否给予我们铁路设备的援助。

六、种植橡胶树问题。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多次研究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急需苏联专家方面的援助以及技术援助。但按中苏合资公司形式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

因此对种植橡胶树问题，我们建议同苏联政府缔结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的协定，该协定规定保证以提供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给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而且按优惠价格提供，即按世界市场价打一定折扣。

对上述两个问题，如果您同意，我们将委派代表于五月中旬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进行具体谈判。

至于我们对栽种橡胶树的专家和设备的需要，我们将给您另发电

报告知。

请对上述所有问题给予指示。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4卷第201页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苏军撤出旅顺和修建中蒙铁路问题

（1952年4月2日）

密电，1952年4月2日11时12分收到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请将下列各点转告毛泽东同志：

“第一，迄今为止，我们认为，苏军尽快撤退出旅顺港完全符合您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在1950年根据您的愿望缔结条约时已做出决定：即使不缔结对日全面和平条约，苏军也不迟于1952年撤出旅顺港。

您3月28日电报提出的问题完全不同了。您现在抛开条约而认为苏军应不定期或在1952年以后留在旅顺港，说是因为日美缔结和平条约而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如果您坚持这一点，则我们同意满足您的要求。但这里必须注意，这种违约应合理地给外界提出论据，以免得出印象，认为是苏联做出这样的决定来束缚您。

可能需要缔结新的旅顺港条约。

关于这一切，应当同您或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

第二，我之所以在电报中曾提醒您不要忘记乌兰巴托—张家口铁路问题，不仅因为朱德同志提出过这个问题，还因为1950年当您在莫斯科时您本人也曾把这条铁路的问题作为中国的重要事情提出过。我们认为，从中国的利益来看这条铁路是最必要的，因为：（1）它是迅速通往中国首都给它提供援助的最短路线；（2）修建这条铁路要比修建新兰铁路快好几倍；（3）由海路给您供应液体燃料不可靠，于是乌兰巴托—张家口或乌兰巴托—集宁铁路就是运输液体燃料最短最有保障的路线。

从您的电报中可以看出，您不相信铺设这条铁路线是适宜的，因为您把它同新兰铁路加以对比。既然这样，我们可以撤销修建乌兰巴托—中国的铁路线问题。

至于铺设新兰线，则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个新问题，如果您愿意，那我们就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对其他问题，过几天再答复。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4卷第207页

抗美援朝时期

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派去中国士兵

——金日成通报的毛泽东谈话

（1949年5月15日）

发自平壤

致安·扬·维辛斯基同志：

我5月14日与金日成会晤，他向我通报了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金一（中央委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到北平访问的结果。金一派往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立联系，并谈判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内的朝鲜师问题（朝鲜师系指由满洲朝鲜人组成的师）。

.....

在北平，金一会见朱德和周恩来4次，会见毛泽东1次。金一向毛泽东转交了一封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请求必要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

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中，有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参加进攻战役。毛泽东说，他们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他们只有等战斗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并至少也得一个月后才能调回。同时，毛泽东提醒金一，上述师同他们的整个军队一样，都不是正规军，军事训练较差。他建议朝方对这些师的军官进行军事训练。

金一问毛泽东，由于上述朝鲜师使用的是日本武器，中方今后对这三个师所需弹药能否给予支援。毛泽东回答说，他们能制造弹药，朝方需要多少，他们就能给多少。

毛泽东和朱德详细询问了朝鲜形势。毛泽东说，朝鲜随时可能发

生军事行动，金日成应估计到这种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

毛泽东说：在朝鲜的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持久战对你们不利，因为这样日本就可能卷进来，并帮助南朝鲜“政府”。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有苏联在旁边，有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毛泽东又补充说，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毛泽东对朝鲜政府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询问得很仔细。他告诉金一，中共中央收到了四个共产党（其中包括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信，他们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毛泽东很想知道，在朝鲜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是否会谈到过这个问题。毛泽东问，朝鲜劳动党中央对此问题持何意见。金一回答说，对此问题他一无所知，但他会将这次谈话报告金日成。

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成立情报局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鲜局势又紧张，如果成立情报局，会被认为是成立军事同盟。

但是，毛泽东说，这个问题要仔细考虑一下。

毛泽东希望在中共中央和朝鲜劳动党中央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并说有关这些问题朝方可找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他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

最后，金一告诉毛泽东，朝鲜劳动党中央想在中国解放并成立政府后，立即承认这个政府和向中国派出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毛泽东回答说，他们不急于成立政府，他们打算拿下广东，整顿好秩序后再成立政府。

什特科夫^①

1949年5月15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上册，第187页

① 什特科夫，时任苏联驻朝鲜大使。

朝鲜必须让本国军队做好准备

——李周渊报告的毛泽东谈话

(1950年4月10日)

发自平壤

致维辛斯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通知我以下事项：

一、接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李周渊给金日成的报告，其中谈到，1950年3月底，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李周渊。

在毛泽东与李周渊会谈时，根据后者的提议，讨论了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对会见金日成一事持肯定态度，并将会晤时间定在今年4月底或5月初。毛泽东把预期的会晤同朝鲜统一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就必须秘密进行；如果还没有统一朝鲜的计划，那么就可与金日成进行正式会晤。

对于会晤的时间和方式问题，李周渊藉口金日成现在正在治病，未作具体答复。

在与李周渊交谈中，毛泽东进一步说，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不可避免也要参战，因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必须让本国军队做好准备。

.....

伊格纳季耶夫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上册，第336页

www.mzdb1.cn

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

——什特科夫报告的毛泽东谈话

（1950年5月12日）

发自平壤

致维辛斯基：

5月12日，应金日成请求与他和朴宪永会见。在交谈时，金日成通知我，他刚从莫斯科回来便接到李周渊（驻华大使）一封信。李周渊在信中谈到了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会见。在此次会见中，讨论了金日成要与毛泽东会见的问题。

周恩来建议正式会晤。毛泽东像是对李周渊提出问题说：打算什么时候统一国家？但未等得到答复，便说，如果你们想在近期对南方发起军事行动，那么，就不要进行正式会晤。在这种情况下应进行非正式来访。

接着，毛泽东又补充说，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对于美国人，不要怕他们。美国人不会为了这样一块小地盘就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

什特科夫

1950年5月12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上册，第381页

同意朝鲜同志对北南朝鲜形势的估计

——毛泽东与苏驻华大使罗申的谈话

(1950年5月14日)

机 密

发自北京

急件

特件

菲利波夫同志：

5月14日14时40分，我拜访了毛泽东，并将您的电报面交给他。毛泽东同志对回电表示感谢，并说，5月13日晚，朝鲜同志同他交谈时详细地向他通报了国内局势以及同您谈话的情况。他同意朝鲜同志对北南朝鲜形势的估计，同意他们对北南双方力量对比的估计。

毛泽东继而指出，他告诉朝鲜同志，（朝鲜统一后）有可能按照中苏条约的模式缔结《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只有同菲利波夫商量之后，中国政府才能作出缔结这种条约的最后决定。

罗申

1950年5月14日

分送下列同志圈阅：斯大林、斯大林^①、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维辛斯基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2卷第412页

① 送斯大林的电报为两份。

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0年10月3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3日12时15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

呈上毛泽东对您第4581号电报的答复如下：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

当然，我们不派兵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境地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

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利，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将出席。对此问题尚未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想同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刻让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到您的休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形势。

盼复。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日”

.....

罗申

1950年10月3日

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576页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国际形势与中国出兵的关系

(1950年10月5日)

北京

苏联大使：

转交毛泽东：

您的复函已收到。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最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一、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二、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三、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四、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企图。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将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

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对此应该害怕吗？我认为不应该，因为我们联合起来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对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在您的答复中，谈到了关于中国国内的状况，这对于我来说是新的情况。您肯定地说，在由于朝鲜事件而出现新战争的情况下，中国国内将会出现极大的不满情绪，因为国内非常渴望和平。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作为中国联合政府组成部分的资产阶级党派，在出现战争的情况下，将利用国内的不满情绪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当然，您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国内的形势。而是否能够克服中国国内局势的这些困难，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同志来决定。

至于周恩来和林彪同志前来我处事宜，我将非常高兴欢迎他们并与他们交谈。

敬礼

菲利波夫

1950年10月5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581页

中国部队急于出动是不合适的

——罗申致斯大林电

（1950年10月7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7日11时55分收到

第1份

优先拍发

致菲利波夫：

答复您的第4676号电报。

10月6日北京时间22时30分，我拜会了毛泽东，并向他转交了您的答复。

毛泽东在听完我的话之后，说：

一、他完全同意您对国际形势及其今后可能发展的前景所做的评价。

二、他对于您在答复中谈到中国和苏联共同进行反对美国人的斗争，感到非常高兴。他强调指出，如果谈到打仗，那么，毫无疑问，现在就应该打。同时他还说，类似的想法他刚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说了。

三、涉及到派中国军队到朝鲜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最适宜的并不是派出五至六个师，而是最起码要派出九个。但是，这些师的技术装备非常差，他们只有一百零八门大炮，一辆坦克也没有。

与此同时，毛泽东援引了从朝鲜朋友处得到的资料说，美国的一个军（三个师）就有大约一万五千门各种口径的大炮，还有坦克。

毛泽东认为，要摧毁美国一个军的部队，中国人应该拥有比其多四倍的兵力和两倍的技术装备。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由于拥有后备力量，关于步兵的问题他们很容易解决，而这些部队的技术装备，他们完全指望苏联的援助。

毛泽东还说，目前他们还不具备培训好的炮兵、坦克兵和其他技术兵的专业人员。

关于中国军队到达朝鲜的时间问题，毛泽东指出，他们准备在最近几天出动自己的部队，但是，他认为急于出动是不合适的，应该给美国人机会，使其将自己的部队向北方集结，分散驻扎，这样中国人便能顺利地将他们分批歼灭。

四、毛泽东极其关注有关空军的问题。他指出，根据朝鲜朋友通报的情况，美国人在朝鲜地区拥有大约一千架飞机，中国人暂时还没有自己的空军部队。在毛泽东看来，必须要有空军部队，这是因为：

（一）为了掩护派到朝鲜的中国地面部队。

（二）为了前线地区的作战行动。

（三）为了掩护中国重大的工业中心：上海、天津、北京、沈阳（鞍山和抚顺）。

毛泽东认为，美国人首先将利用空中打击来摧毁中国的工业中心，破坏经济生活，毁坏交通干线。毛泽东说，这种局面有可能会引起国内，首先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政府的不满情绪，并将人民政府置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毛泽东声明说，中国政府本身没有能力从空中对部队和工业中心进行掩护，因此，必须有苏联提供的技术装备。

五、毛泽东还提请注意，朝鲜境内的交通线路已经被破坏，这使得部队的物资供给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所能依靠的，只有苏联方面提供的运输工具。

六、毛泽东说，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空军所必需的武器和弹药。一九五一年度的整个财政预算是二十二亿美元，其中只有两

亿美元可用于为部队购买武器。

七、鉴于上述所说的内容，毛泽东认为，必须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向您汇报有关情况以及中国朋友的全部打算。周恩来和林彪十月八日即可动身。他们可以乘飞机从北京出发抵达伊尔库茨克。我们必须派专机到伊尔库茨克迎接他们。

毛泽东希望，师哲和费德林与周恩来一同前往。

会谈时在场的有：周恩来、伍修权和费德林。谈话持续了1小时45分钟。

请您下达指示。

罗申

1950年10月7日

第2318号

译电：阿拉乌什金 第9-10号，第8处

1950年10月7日，13时00分

列印：切列金奇娜

1950年10月7日13时50分

第8609号

第1份送：斯大林同志

第2份送：斯大林同志

第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

第4份送：马林科夫同志

第5份送：贝利亚同志

第6份送：米高扬同志

第7份送：卡冈诺维奇同志

第8份送：布尔加宁同志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588页

现在派中国部队去朝鲜是有利的

——罗申致斯大林电

（1950年10月13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14日1时38分收到

1950年10月14日2时译出

1950年10月14日3时30分送出

致菲利波夫同志：

作为对我的第2406号电（包括在第25612号电内）的补充，毛泽东还谈到：

我们的领导同志认为，如果美国人打到中国的边境，那么朝鲜就是我们的一块心病，而且东北将处于经常的威胁之下。

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

毛泽东指出，现在派中国部队去朝鲜是有利的。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

暂时先派出由9个师组成的第一梯队，虽然装备差，但他们能够打李承晚的军队。在此期间，中国同志将抓紧准备第二梯队。

毛泽东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能够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能够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

毛泽东同志接着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目前无法为提供的装备付现款。他们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

这样，就不会动用 1951 年的预算，他们也容易向民主党派解释此事。

最后，毛泽东说，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中国人应该在朝鲜同志进行艰苦斗争时帮助他们，为此，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新的指示已送周恩来。

罗申

第 2408 号电

10 月 13 日

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 597 页

急需苏联提供海军武器装备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0年10月28日)

急电。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28日19时50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

我于十月二十七日收到毛泽东致您的如下电报：

“菲利波夫同志：

鉴于目前中国军事形势的发展，我们急需苏联提供下列海军武器装备：鱼雷快艇、漂雷、装甲舰、猎潜艇、扫雷器材、海军岸炮和鱼雷歼击机。

因此，我拟派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和顾问库兹明同志一起乘飞机赴莫斯科，以便就申领上述武器装备问题及中国海军未来建设问题同苏联海军负责同志进行谈判。随萧劲光同志一同前往的，还有中国海军参谋长罗舜初和海军后勤部副部长秦亦津两同志。

上述事项请您研究，并给予适当答复。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备注：扎哈罗夫^①同志看过该电报后认为，海军司令员随同库兹明一起赴莫斯科谈判是必要的。

罗申

第2623号电

1950年10月28日

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607页

① 扎哈罗夫，时任苏联军事部副总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后，任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1951年4月回国。

请求研究供应步兵武器装备问题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0年11月7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1月8日0时2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由于人民解放军陆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战利品，因此造成步兵武器口径种类繁多的情况。

这一状况给弹药生产特别是步枪和机枪子弹生产带来很大困难，此外我们的工厂目前所能提供的这种子弹为数甚少。

志愿军部队直接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为十二个军，计三十六个师，仅有六个步枪和机枪弹药基数。今后，随着军事行动的发展，我们在保障军队弹药方面势必出现很大困难。如果军工生产方面不出现变化，那么，改装工作可能要到一九五一年下半年方能开始。

为克服目前困难，我请求您研究一下关于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和二月这一时期给三十六个师供应步兵武器装备的问题，其具体品种名称和数量如下：

(略——)

请您将你们对我的这一请求的研究结果告我。^①

祝您身体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七日

① 11月9日，周恩来会见扎哈罗夫，得知斯大林复电同意供给中国所需的步兵武器，并将于翌年一、二月内交货。

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华西列夫斯基同志、什捷缅科同志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616页

同意您关于加强空军力量的建议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0年11月15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

我完全同意您的建议^①，通过给中国补充两批共一百二架米格-15飞机来加强别洛夫空军师的力量，并建立航空兵指挥部。

至于东北各机场全面加强防空措施的问题，我们将与扎哈罗夫同志一起解决。

苏联飞行员在空中表现出了英勇气概和强大威力，他们在最近十二天内，击落了二十三架入侵的美国飞机，为此，我向他们表示谢意，我认为，此事值得向您报告。

祝您一切顺利！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622页

① 11月15日晚，扎哈罗夫向周恩来转告斯大林的建议：为增强苏联空军在中国后方对美空军的作战，拟增派120架米格-15飞机，分两批来华，增加到别洛夫空军师中，并成立空军军一级指挥部。

关于军事贷款支付差额的问题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1月14日）

发自北京

1951年1月16日14时30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电报已经收到。

我完全同意您的电报中所做出的所有安排，感谢您和苏联政府给予我们的援助。

二、我们已对军事贷款协定草案进行了研究。

我们完全同意该协定草案，但第3条第三和第二款除外，我们根据您今年一月四日电报已对两款做出了修改，并请扎哈罗夫同志转告您。

有关该协定的签订问题，将由周恩来同志会同扎哈罗夫同志加以解决。

三、您在您的电报中称，在一九五〇年前十个半月期间，苏联根据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贷款协定，已向中国提供了总价值为一点四亿卢布的军用物资。

不久前，王稼祥同志带回了二月和五月军事物资申请单，这两份申请单，他是从外贸部军事工程局得到的，其总价值为237,548,103.64卢布，其中二月申请单为114,415,274.67卢布，5月申请单为123,132,828.97卢布。

我方电报中所列出的军用物资供货总价值为 9,750 万多卢布，因此这一总额低于二月和五月申请单中军用物资的总价值。

由此可否认为，申请单中所订购的军用物资尚未完全到货？这一差额是否将于一九五一年补上？请您将此告我。

四、您已确定了一九五一年军事贷款数额，这非常好。待我们对前两份申请单作一分析研究之后，我们将拟定一九五一年军用物资申请单，并对这些军用物资的价值作仔细核算，以使其总价值不致超过您所确定的 4 亿卢布的数额，使苏联政府不致因完成我们的军事订货而负担过重。

五、对您做出的关于根据军事贷款协定，用军事贷款方式向我们提供铁路设备，并将这种设备减价百分之二十五的决定，我深表感谢。

六、我们同意对一九五〇年已提供的五千辆汽车及将于一九五一年提供的一万二千辆汽车要按商品流通付款的意见。我希望，您对我的请求进行研究，并对提前提供其余一万二千辆汽车，以满足前线需要一事做出答复。

七、请告知我们，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发出的军用物资申请单中所列用于军事目的的汽车汽油和航空汽油，是否已将其列入军事贷款协定所规定的军用物资之中？军事贷款协定是否适用于上述汽油？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四日

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缅希科夫同志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 661 页

感谢无偿提供372架米格-15飞机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5月25日）

发自北京，1951年5月26日0时15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一九五一年5月22日电报，已经收到。我对您关于无偿提供给我们三百七十二架米格-15飞机，用以改装六个米格-9歼击机师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对您关于将这些飞机运送到中国的计划及支付其运费一事，亦表同意。

我十分感谢您对中国空军建设工作的关怀。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第 2586 号电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送：斯大林同志（2份）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 770 页

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补充申请单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6月9日)

发自北京

1951年6月9日19时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六月五日和六月七日两封电报，均已收到。

您一九五一年六月九日派出的专机已抵北京。

高岗同志和金日成同志定于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乘机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如果您不反对，我们希望现在莫斯科治病的林彪同志能参加会谈。

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补充申请单，由高岗同志随身带去。

请您对此做出决定。

周恩来同志因病目前正在大连治疗，申请工作因而延误了一些时间。现在编制申请单的工作才刚刚结束，因此延误的过错应由我们来承担。

由高岗同志带去的申请单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加以编制的。这次申请单所列总价值相当大。

请苏联政府按这些申请单供货，并按半价计入军事贷款，还请延期支付此一款项。请您和高岗同志讨论这一问题之后，将您的决定通过高岗同志告我。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志愿军聘请苏联顾问的问题，由高岗同志当面向您报告，因此我在这里就不谈了。

祝您身体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六月九日

第 2893 号电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 805 页

关于提供武器装备的问题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

（1951年9月20日）

发自北京 1951年9月20日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二日发来的电报已收到。

感谢您满足我们提出的给我们提供六亿卢布军事补充贷款和向驻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

.....

我们知道，为了生产和运输今年九月八日电报申请单所提出的军用物资需要一定的时间^①，因此，这批物资不可能与原先订好的用来装备十个师中六个师的武器装备和物资同时运到。

根据原先规定的给十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的期限，我们制定了按照新的编制组建的十个师的战斗训练计划。这一计划从八月份开始付诸实施。

如果给这十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的计划不变，那我们的战斗训练计划就可无须改变而如期进行。

^① 9月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今年2月1日中苏关于军事贷款的协定所规定的贷款和4月10日来电所增加的军事贷款，至6月均已用完。鉴于中国“财政赤字甚大，战费极巨”，请苏联政府考虑按照2月1日军事贷款协定的条件，再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并希望新的军事订货能于1951年底以前全部交付。12日，斯大林复电说，同意按以前规定的条件给中国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但追加的军事订货最早也要在6个月内交付。

这样，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就可完全结束按照新的编制组建起来的十个师的训练。如果战争继续进行，这些师到时候就可投入战斗。因此，我们认为改变给这十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战斗物资的计划是不适当的。而且，为了满足今年最后两个月内前线的需要和加强朝鲜境内交通线的对空防御，我们要求苏联政府于一九五一年年底给我们提供价值大约相当于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申请单提出的军用物资总值五分之一的弹药和军用物资。我们主要需要高射炮炮弹及其他弹药。详细的申请单附于本电报之后。

价值相当于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申请单所提出的总值五分之四的军用物资和满足军事需要的汽车，请苏联政府于一九五二年上半年提供给我们。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补充提出详细的申请单。

请您研究我的电报，并将您的决定告诉我们。

申请单（略）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第 4726 号电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日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 1040 页

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飞机的问题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2年4月22日）

发自北京

1952年4月22日19时10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一、我们同意苏联政府关于一九五二年向中国航空兵提供够装备十五个航空兵团的各型飞机的决定。

今年年底前，现有八个航校将有足够组建二十六个团的飞行和技术人员毕业。此外，现在还有一个轰炸机团没有飞机。

因此，除了已向苏联订购的装备十五个团的飞机、以及库存的装备四个团的米格-9飞机外，还有八个团有飞行技术人员而没有飞机。这些团可能被分配到各相应部队中去接受飞行训练（按每两架飞机三个飞行员分配）。

二、在我军航空兵现有十九个米格-15歼击机团中，有十五个团（配置在安东及其附近各机场）参加朝鲜作战。由于作战和训练中的损失，十九个歼击机团共缺少一百五十四架米格-15飞机（按每团三十一架飞机的编制计算）。

为了提高战斗力，保障继续作战，以及保障飞行人员有相应数量的飞机来继续提高飞行技术，我们请苏联政府除了您今年四月九日来电中所指的用于装备十五个团的飞机外，再允许中国政府在一九五二年从苏联政府那里获得一百架米格-15飞机。

我们希望您能尽快地把这些飞机派往中国。

请把您对这个问题的决定告诉我们。

三、一九五二年各型教练机所需数量详细申请单，已通过克拉索夫斯基同志向您寄出。

为了保障各航校飞行训练的正常进行，我们希望您同意申请单中的飞机数量。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 1170 页

关于补充炮兵弹药和器材的问题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2年7月4日)

发自北京 1952年7月4日13时25分收到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三日来电已收到。

有一些迹象表明，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敌方似乎会有转变（关于这一点另行通报），尽管如此，也不排除敌方将拖延谈判的可能。

六月份，敌人在朝鲜战场的某些地段上加强了军事行动。六月二十三日敌人对鸭绿江水丰水力发电站进行集中轰炸，结果发电站被毁。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敌人企图对我们施加军事压力，我们认为，敌人有可能发动新的局部进攻。

为了给予敌人坚决打击和反击，以及进一步巩固既有阵地，我们急需补充一些炮兵弹药和器材，以保证顺利完成上述任务。

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我给您的电报附件中，已提出了炮兵武器和弹药申请单。

请您研究一下提供炮兵弹药、燃滑油料和火炮零部件的可能性，这些都是我们在五月三十一日申请单提出，请在今年八月至年底提供并计算在军事贷款专案下的。这份电报也附有这类申请单。

请把您的决定通报我们。

申请单（略）

第 1947 号电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七月四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 1180 页

关于第四次战役的作战计划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1月28日)

发自北京

1951年1月29日18时40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

目前美军正企图向汉江南岸通往汉城和仁川的地区实施进攻。已形成的情况是：我军已无法继续进行休整，被迫立即准备第四次战役。现将我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给彭德怀同志的电报寄给您，请您一阅。这样做从国际形势的角度来看是否合适，请将您的看法告我。

“彭德怀同志：

一、你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七日的电报及给各军关于准备实施军事行动的命令，均已收悉。

二、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两至三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

三、在准备此次战役过程中，必须保持仁川、汉江南岸桥头阵地和汉城，还必须诱使敌军主力进入水原—利川地区。战役开始后，北朝鲜和中国军队必须突破敌在原州地区建立的防线，尔后向荣城—安东方向发展进攻。

四、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十五至二十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敌）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

五、结束第四次战役之后，敌人有可能同我们就解决朝鲜问题进

行和谈，那时再进行谈判将对中朝有利。但敌人现在就指望夺回汉城—仁川一线以南汉江南岸的桥头阵地，并对汉江进行封锁，以便使汉城处于敌方炮兵火力的威胁之下，进而迫使我们停止军事行动和开始和谈。敌人想借此使中朝处于不利地位，对此，我们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六、我部队尚未得到人员补充，调动转移也不够。在这一方面尚有很大困难。但我们能够做到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城方向突击，消灭部分美军和四至五个南朝鲜师。请你在高级指挥人员会议上做出解释。一定要把这一会议引导到准备第四次战役上来。

七、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地区以后，必须再进行二至三个月的准备，此后才能实施带有决定性的最后一次即第五次战役。从各方面来看，这较为有利。

八、第九兵团必须于最近转移到平壤、汉城、仁川、水原地区，以便进行休整。同时，该兵团必须担负防守该地区的任务，以防止敌军在仁川和镇南浦登陆。在第五次战役期间，该兵团必须参加前线西段的战斗行动。

九、在进行第四次战役期间，请您考虑一下：中国和北朝鲜军队主力分为两个梯队，这是否更好一些？第一梯队部队必须携带五天干粮。第一梯队部队负责完成突破，将敌军追击到一定地区，而第二梯队部队则负责继续追击敌人，以使战役能持续十到十二天时间，并利用这一时间尽量歼灭更多的敌军。

你意如何，盼复。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十九时”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第 478 号电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 673 页

志愿军准备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3月1日）

发自北京

1951年3月2日2时45分收到

送：斯大林同志（2份）

致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彭德怀同志来京时我们在讨论过程中所确定的一些意见告您。

一、从目前朝鲜战场的状况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消灭这些敌军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做两年的准备。

目前敌人的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一月当中，敌人当占住阵地之后，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进攻。其目的在于，一方面不容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整和补充，另一方面则利用其技术条件消耗我军。同时，敌军舰艇对朝鲜沿海地区实施积极的攻击，敌军航空兵不断对我交通线进行轰炸。我运往前线的物资补充，部队仅得到了其中的百分之六、七十，而其余百分之三、四十则因敌机袭击而被炸毁。

因我新军未到，老军未补充，在今后一个半月内，敌人有重新进入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

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准备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现已决定编成三番部队轮流作战。目前正在朝鲜作战的十个军（计三十个师）为第一番志愿部队。现正从中国国内调去的六个军和目前位于朝鲜的三个军（将于最近得

到补充，其中两个军正在元山、咸兴地区进行休整），共计九个军（二十七师），将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第二番志愿部队约于今年四月上旬全部进抵三八线地区，用以替换现阶段在汉江地区执行战斗任务的六个军。

此外，我们还拟使用将从中国调去的六个军及从志愿军编成中抽调四个军，共计十个军（三十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拟于六月上旬左右用于前线。

鉴于第三番志愿部队十个军中有四个军在五个月过程中已参加作战，需作休整，因此在第二番志愿部队抵达前线之后，这四个军将调到平壤和元山地区休整，并在此地负责完成沿海地带的防御任务。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其余两个军将撤回中国休整。

中国志愿军在前四次战役中的战斗和非战斗损失（阵亡、负伤和其他原因丧失战斗力）为十万多人。为了弥补此一损失，需要用十二万老兵和新兵。预计在今明两年还会损失三十万人。因此，还需要有三十万人用于补充，才能保障实行战争中轮番使用兵力的战术。

至于朝鲜人民军，彭德怀同志已根据您的建议，提请金日成同志将现有的八个军团缩编为六个军团。每个军团宜编三个满员师，每师为一万人。此外，还要组建五个警备旅，用以防守沿海地带和主要城市。

金日成同志对此原则上表示同意。因此，朝鲜人民军的六个军团也可采用轮番作战的方针，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

三、一至二月份的作战经验表明，当我三个军在汉江以北地区因损失较大而不得不进行休整时，在前线作战的只有六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因此，我由于没有后备力量而不能发动胜利的进攻，而当敌人派来援兵时，我又无法同其进行对抗。与此同时，随着我军向南推进，交通线也就日益延长，供给上的困难也就不断增大，我被迫留下部队以警卫后方。因此，如不大量歼敌，如无空军掩护，那么，当

敌过早地被压向南方时，我们将难以各个歼敌。目前的形势是：在第二番志愿部队编成内的九个军于四月上旬抵达前线之前，陆军方面的优势将在敌人那边，因此我们必须避免进行战役进攻。我们必须使用从第一番志愿部队编成内的六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四个军团，在南汉江以北地区实施防御，以迟滞进攻之敌。

但必须考虑到，在今后一个半月内，敌人有可能寻机进攻，逼我应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利的新战役。我们计划：在第二番志愿部队前出至指定地区以后，用两个半月的时间（四月十五日到六月底）在三八线地区歼灭美军和伪军部队数支正规部队，约数万人，尔后再向南汉江以南地区实施进攻。这样做将有利于我。彭德怀同志已就这一问题同金日成同志进行了会谈。如果敌人得以重新占领汉城和再次越过三八线，那么这在政治上必然会引起一定的风波，对此我们必须预作准备。

四、目前，在朝鲜作战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敌人拥有火力上的优势，而我方运力薄弱，我们因无航空兵掩护，在敌机袭击下，结果使运往前线的物资丧失了百分之三、四十；敌人则将定期获得补充（例如，到六月底将又有六至七万美军开抵朝鲜）。我们预计，在四到五月份，我们将可以使十个航空兵团参战，但至今我们在朝鲜领土上尚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土地尚未解冻，因此我们尚未对机场进行大修。此外，一个最为严重的因素是，由于没有可靠的航空兵掩护，我们在今后也无法进行修理工程。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苏联航空兵最好是担负起对平壤—元山及该线以北的机场的掩护任务，同时最好是将苏联航空兵从现在所位于的机场转到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

根据彭德怀同志的看法，如不采取上述措施，则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无法加以修复，中国航空兵不可能参加朝鲜作战，坦克和火炮的

转移将遇到严重困难。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视整个国际形势而定。因此，我们尚不知可否如此行动。

至于汽车问题，我们要求于今年下半年内通过商贸这一渠道向我们再提供六千辆汽车。

有无这种可能，盼复。

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以上意见，请您研究，并给以指示。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 706 页

关于在朝鲜修建机场等问题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3月18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第1462号电报及第1749号电报，均已收到。对您关于将两个苏联歼击机航空兵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转场到朝鲜境内的决定，以及关于再派一个大型歼击机航空兵师到安东以掩护中朝部队的决定，深表感谢。

您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第1462号电报中建议，我们在朝鲜再建四座混凝土跑道机场。我们现已会同扎哈罗夫同志和朝鲜同志们研究这一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完成这一工程。朝鲜同志现有一个钢板跑道机场。感谢您关于再提供两条钢板跑道的决定。

我们现正在计算需用多少数量的高射炮兵部队来掩护朝鲜机场和最重要的铁路桥。最后计算结果将由周恩来同志补充告您。

关于您已同意于今年下半年再向我们提供的六千辆汽车，其具体品种、名称将由周恩来同志拟定，并通过扎哈罗夫同志告您。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毛泽东

第 1368 号电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

送：斯大林同志（2份）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 722 页

近期对英美军只打小歼灭战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5月27日)

发自北京

1951年5月27日20时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给彭德怀同志的电报给您寄去，请您了解其内容：

“彭德怀同志：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敌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掉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但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①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

现在我第一线有八个军，每个军歼敌一个整营，共有八个整营，这也就给敌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两个整营，共有十六个整营，那对敌人打击就更大了。如果这样做办不到，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一个整营为适宜。

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

① 土军，指参加联合国军的土耳其军队。

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个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三个整师的计划了。

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战到大歼灭战的过程的。

我军入朝以来五次战役，已完成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

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

以上请你考虑并电告。”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毛泽东

第 2627 号电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 772 页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打英美军的战术问题

(1951年5月29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我看过了您给彭德怀关于打英美军战术的电报。

该电报中所述计划，我觉得是冒险的。这样计划仅能成功地实施一次或两次。

英美军很容易识破这种计划，从而他们会改变其战术，使你们不可能每次都受损失地把敌主力引到北面。

如果你们在前线后方有构筑很好的防御工事，能迅速将敌主力吸引到这里，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倒不妨再冒险试一试，采用这一计划。然而，据我所知，你们目前在朝鲜尚无这样的工事。因此，这里的危险性就在于，英美军一旦识破了你们的计划，就不会给你们以实施机动的可能性。而由于你们是第四次重复这一计划，那也就很容易被英美军识破。

此外，还应考虑到，英美军向北推进时，将一道接一道地建立起新的防线，从而使你们在一旦需要实施进攻时，难以不付出巨大损失就能突破英美军防线。这当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第一，你们现在所对付的是不同的军队；第二，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军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1个整营地歼灭其军队。

还应注意到，如果平壤再次落入敌人手里，这一方面会降低朝鲜人民和朝鲜军队的士气，另一方面将提高英美军队的士气。

看来你们将要准备一次重大的战役，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局部机动，而是为了给英美军以沉重打击。

菲利波夫

第284号密码电报

1951年5月29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774页

请派遣军事顾问到志愿军部队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9月8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

我在今年八月二十七日给您的电报中曾通知您，我们想请苏联政府派遣军事顾问到驻朝鲜的中国志愿军部队工作。

在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同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同志协商后，我们认为必须派出 83 名顾问：

一、志愿军司令部顾问共十人，其中包括：总顾问一人、参谋长顾问一人、作战顾问一人、侦察顾问一人、通信顾问一人、后勤顾问一人、军事交通顾问一人，炮兵顾问一人，坦克和自行火炮顾问一人、工程兵顾问一人。

二、五个兵团顾问共十人：每个兵团两名顾问，即兵团司令兼兵团参谋长顾问一人、作战顾问一人。

三、二十一个军的顾问共六十三人：每个军三名顾问，即军长兼军参谋长顾问一人、炮兵顾问一人、坦克和自行火炮顾问一人。

上述顾问最好于一九五一年九至十月取道北京前往朝鲜。

请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并将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第 4492 号电

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 1019 页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不同意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

（1951年9月12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在9月8日关于指挥人员军事顾问的电报已收到了。

我们同意为在朝鲜的志愿军总部派遣军事顾问，对此我们认为，有5名军事顾问就足够了。

关于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按照朝鲜的实际看是不适宜的，我们不同意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

在您同意的情况下，我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派遣指定的军事顾问前往北京，尔后到达指定位置。在得到您答复后，我们将通知军事顾问的名字。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12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1039页

请再派5名军事顾问到兵团司令部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

（1951年9月20日）

发自北京 1951年9月20日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二日发来的电报已收到。

感谢您满足我们提出的给我们提供六亿卢布军事补充贷款和向驻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

关于给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除您同意给志愿军司令部派遣五名军事顾问外，我请求你们研究是否可以在必要时再派五名军事顾问到五个兵团司令部工作。如果您同意这一点，那我希望这十名军事顾问能在今年九月底或十月上旬到达北京，尔后他们即将被派往前线。

.....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第 4726 号电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日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 1040 页

www.mzdb1.cn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摘录）：军事顾问不能派遣到兵团

（1951年9月26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对您9月20日关于军事顾问和提供补充装备的问题通知如下：

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关于5名军事顾问在朝志愿军总部工作问题，我们已下命作战部挑选和派遣相应的人选，于10月上旬到达北京。

关于军事顾问在兵团司令部工作问题，我们坚持我们以前的观点——军事顾问不能派遣到兵团。我们的根据是，特别是在作战条件下，在兵团任命军事顾问不利于兵团的指挥。因为军事专家在兵团要对其战斗行动负责，这样会不可避免走上代替兵团指挥员的错误道路，这是不能允许的。

.....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26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1045页

给兵团的军事顾问可以不派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

（1951年10月4日）

发自北京

1951年10月5日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今年九月二十六日发来的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军用物资问题的电报已收到。我们同意您的意见。

一、请派五名军事顾问于十月上旬到驻朝志愿军总部工作，给兵团的军事顾问可以不派。

……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第 4933 号电

一九五一年十月四日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 1056 页

关于提供军用物资的发货时间问题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

（1951年10月4日）

发自北京

1951年10月5日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今年九月二十六日发来的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军用物资问题的电报已收到。我们同意您的意见。

.....

二、请苏联政府于一九五一年底即十至十二月按照我在九月二十日发给您的电报所提出的申请单（该申请单所列物资价值约相当于九月八日申请单所提物资总值的五分之四）给我们发出一百二十门八十五毫米高射炮、七种火炮弹药、六种火炮轮胎和十万发反坦克手榴弹，这些都是目前我们所迫切需要的。

我们同意从十月开始暂停发出供余下的六个师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待到一九五二年四至六月全部发出这些物资。

三、请苏联政府于一九五二年一至三月给我们全部发出价值相当于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申请提供的物资总值五分之四的其他各项军用物资。

我们将用电报发出详细的申请单。

请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开始发出其余五十个师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

根据您原来的通知，全部60个师所需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应于

1954年上半年发货完毕。现在，由于发货期限推迟半年，全部60个师所需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发货的结束时间也推迟半年，即于1954年底发货完毕是否恰当。

请将您的意见告诉我们，以便我们对此做好准备。

四、今年六月高岗同志在莫斯科就六十个师所需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交货问题进行谈判时，曾达成一致意见，确定上述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总价值将由中国政府用军事贷款于八年内分期偿付。

不久前，我国商业部接到了驻中国的苏联商务代表处的通知，说相应的中国机构代表同它签订了提供三千五百一十辆汽车和一千九百辆自行车的贸易合同（这些汽车和自行车包括在第一批五个师的军用物资内）。

请苏联政府考虑，是否可以将汽车和自行车的价款列入六十个师所需军用物资项内用军事贷款偿还，如果这样做对你们有困难，则请将此通知我们，以便我国代表就上述数量的汽车和自行车同驻中国的苏联商务代表处签订贸易合同。

请您考虑我的电报，并将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第4933号电

一九五一年十月四日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1056页

请求增派高炮部队入朝等问题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10月24日)

发自北京

1951年10月24日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一、当前敌驻朝航空兵主要致力于破坏我军交通线。

洛博夫^①将军领导的航空兵部队和中国航空兵部队在过去的空战中取得了巨大成绩。苏联和中国的高炮部队在高炮射击中也取得了巨大战果，它们在掩护交通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但是，我们兵力数量不够，它们不可能更加可靠地保障交通运输，因此请您考虑能否由苏联政府再派一个由三个团编成的高射炮兵师到朝鲜北部，以加强对铁路运输和安州地区机场的对空防御。

二、已完成战斗准备的中国航空兵部队大部分集中在中国东北地区，准备参加朝鲜战斗，因此，在中国境内的防空兵器不够。此外，在一九五一年十一至十二月，中国的航空兵学校将有四百六十三名飞行员完成雅克-11的飞行训练。

根据您原来制定的计划，预定组建三个米格-9歼击机师、一个图-2轰炸机师、一个伊尔-10强击机师、两个拉-11侦察机团、一个拉-9歼击机团、一个里-2运输机团。

① 洛博夫，苏联空军中将，时任苏联第64防空集团军司令，负责指挥在朝鲜战场的所有苏联空军部队。

考虑到我空军现状，在组建上述师和团之后，中国同志自己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以前这个要求的期限内不能完成战斗机飞行人员的训练任务，因此请苏联政府给予下列援助：

（一）给中国派出三个喷气歼击机师和三个有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三个歼击机航空兵师和六个米格-9航空技术保障支队，同时也是为了北京、上海、广州的对空防御。

（二）给中国派出一个团人员（不带技术装备）和一个带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两个侦察团和两个拉-11航空技术保障支队。

（三）给中国派出一个团的人员（不带技术装备）和一个带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一个歼击机航空兵师和两个伊尔-10航空技术保障支队。

（四）中国空军自己可以胜任组建和训练一个图-2轰炸机航空兵师、一个拉-9歼击机航空兵团和一个里-2运输团，但到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则请给轰炸机师派出十四名顾问，给拉-9歼击机团派出五名顾问。

如果您许可的话，其余顾问则从训练师和团的人员中指派。

请告知您对上述问题的决定。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第 5281 号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 1069 页

关于进行局部战役的问题

——罗申转发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2年3月10日）

发自北京 1952年3月10日收到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

复您第325号电。现将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的电报转发给您。

“致菲利波夫同志：

三月九日，罗申同志转告联共（布）中央关于彭德怀同志计划对美军一个师进行局部战役以及这一战役在目前不适合的通知。我们没有从彭德怀同志那里收到该战役计划。如果他同苏联顾问谈过这个问题，那我们也认为现在进行这样的战役是不合适的。我们将此意见通知彭德怀。也将此意见通知您。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日”

罗申

1952年3月10日

说明：葛罗米柯同志指示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同志：收到通知说，彭德怀计划对美军1个师实施局部战役，认为现在进行这种战役会引起怀疑。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第1157页

www.mzdb1.cn

关于停战谈判等问题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6月30日)

发自北京

1951年6月30日11时20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一、您的两份电报（发自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和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收到了。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

（一）至于提供六十个师装备的期限，我们应该只依据苏联的生产和运输能力来办，即在三年内完成六十个师装备供应，而在一九五一年完成十个师的供应。

（二）您建议的现代化的中国陆军师的编制结构很好。我们采纳。在有了根据这种编制装备起来的六十个师之后，中国军队将比现在强大得多。

二、马立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我通过罗申同志收到了葛罗米柯同美国驻苏联大使柯克谈话内容的主要精神。谈话的最后说：“每一方应该只能有两个代表参加。此外，这些代表应该是有关军队的指挥员，而不是政府代表。因此中国志愿军的代表应该参加谈判，但不是作为交战方中国的代表。”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

金日成同志发来的电报收到了。他在电报中问：如果李奇微^①要求

① 李奇微，美国上将，时任驻远东美军司令和在朝联合国军总司令。

开始谈判，应该如何答复？我已通知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我们应该一边认真观察战斗形势，以便不使敌人有机会利用这个对其有利的时机：另一方面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应该讨论这个问题，并做好准备，在敌人要求开始谈判的情况下，派合适的代表进行谈判。

至于如何答复李奇微，在收到李奇微的要求后，应该讨论答复的内容和措辞。您对此问题是什么意见？

如果谈判开始，最好您亲自领导他们，以免出现不利的局面。我把金日成同志的电报发给您看。

毛泽东

第 3260 号电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 835 页

请您亲自领导这次谈判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6月30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

敌军司令李奇微今天发表声明，建议交战双方代表在元山港外的一艘丹麦医疗船上举行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同时他宣称要求此事立即有相应的停火的保障。

我现在通知您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请您研究并给予回复，还请您将此直接通知金日成同志。

一、金日成同志大概应在七月二日或三日答复李奇微。在这个答复中，他应当同意双方代表进行停战谈判，提出会谈的时间、地点和参加者人数的建议。

二、至于谈判地点，李奇微建议在元山港。

考虑到元山是北朝鲜海军基地，敌人打算在那里进行登陆，我认为不宜同意在那里举行谈判。可否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市举行谈判？

三、为了保证我们的代表有时间对会谈进行充分准备，我认为指定七月十五日为会谈开始日是适当的。

四、由于这次会谈时间紧迫而且非常重要，请您同金日成同志保持直接联系，亲自领导这次会谈，同时把情况通报给我。

毛泽东

第 3267 号电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十六时（北京时间）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 837 页

www.mzdb1.cn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

（1951年6月30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停战谈判问题的电报收到了。

我们认为，应立即通过广播答复李奇微，同意与其代表进行关于停战谈判的会晤。这个协定应由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和中国志愿军司令员，也就是金日成和彭德怀签署。如果没有中国志愿军司令员签署，那么，美国人会认为朝鲜单方面的签字不具有任何意义。应坚决拒绝把元山地区的丹麦医疗船作为会晤地点，应要求在三八线的开城地区举行会晤。正如您指出的，现在您掌握着停战的主动权，所以美国人将不得不在会晤地点的问题上做出让步。

您今天要给李奇微发出大致如下的答复：

“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

您 28 日关于谈判停战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命向您声明，同意与您的代表会晤，以进行停止军事行动和确立停战的谈判。我们建议以三八线的开城地区作为会晤地点。如果您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在 7 月 10-15 日同您的代表会晤。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在电报中，您建议从莫斯科派人去领导停战谈判，当然，这是不需要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最多，我们可以在某些问题上提一些建议。我们也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的联系。您应该同他联系。

菲利波夫

第 335 号密码电报

1951 年 6 月 30 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 839 页

停战谈判期间的军事部署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7月3日)

发自北京

1951年7月3日13时50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我把我致彭德怀、高岗和金日成同志的电报全文发给您。

“彭德怀、高岗和金日成同志：

同对方代表准备和进行谈判的时间大约需要10至14天。请你们认真地执行以下几点：

一、在现有的10天时间内尽一切努力增加一线部队的人员，尤其是武器弹药的补给。请高岗同志在10天以内将计划调运的人员、武器和弹药从后方调往北朝鲜，必须有这样的准备。在签署停止军事行动的协定后，上述人员和装备是不能调运的。

二、在此之前要提高警惕，一线部队应准备抗击敌人可能的大规模进攻和敌空军对我后方猛烈的轰炸。在谈判前或谈判期间，敌方可能会以此迫使我们签署对我们不利的协定。

如果敌人开始大规模的进攻，我军应转入反攻，并击溃敌人。

三、必须下命令给杨成武的两个军和第50军快速进入指定地区，防止敌人趁机在元山登陆。

我第38、39军和42军应准备抗击敌人可能在西海岸进行登陆。

四、请你们考虑一下在签署停止军事行动协定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并为需要做的所有事情做好准备。

毛泽东

1951年7月2日”

毛泽东

1951年7月3日

第3308号电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852页

停战谈判中的我方建议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7月3日)

发自北京 1951年7月3日13时55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在双方军事代表开会期间，我们打算主要提出以下五点：

一、“双方应该同时下达停火命令。双方的陆、海、空军部队在下达停火命令后，应该在朝鲜全境停火，并暂停一切其他敌对行动。”

这一点敌方是能够无条件接受的。

二、“双方的陆、海、空军应该撤离到距三八线十公里处，并在距三八线南北各十公里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非军事区的民政机关应该是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前的形式，即三八线以北受朝鲜人民政府管辖，三八线以南受南朝鲜政府管辖。”

对方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但我们认为，我们的建议是绝对公平的，敌方将难以驳斥。

三、“双方应该停止从外面运送装备、部队和补给（包括陆、海、空军的运送）到朝鲜，以及运送到朝鲜前沿地区。”

我们想，对方同样会就此问题提出建议，因而我们打算在这一点表现出主动，而拒绝我们这条建议的后半部分也许更好些？

四、“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以监督1、2、3点的执行情况。进入该委员会中立国的代表应未参加朝鲜战争，数量相等，并由双方挑选。”

我们想，对方也会提出类似的建议，因而我们打算在这方面表现出主动。但执行这一点会遇到许多困难。

对方提出的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将在中朝边境和朝鲜重要的交通站监督我们的军事物资运输。或者我们不要这个主动，等对方提出建议后我们再采纳？请告知您的意见，怎么做合适，完全拒绝成立监察委员会看来也不合适。

五、“双方应该把战俘遣送回国。在停止军事行动四个月内，分批办理战俘相互交换的全部事宜。”

对方可能会建议进行一比一交换。我们应该要求遣送全部战俘，但被对方俘虏的北朝鲜人的数量相比之下更多一些，这些人已加入南朝鲜的部队，所以这一定会引起争议。

我们提出的上述主要五点意见，应该在双方军事代表会议上得到准许。

此外还有几点：

一、“所有的外国军队，其中包括中国的志愿军，在规定的时间内（如在三至四个月内）应该分批完全地撤出北、南朝鲜。”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但对方的代表可能会认为，此问题与政治问题有连带关系，不应该在这个会议上批准。

请您研究并告知我方是否应该提出这一点。

二、“南北朝鲜的难民在规定的时间内（如在几个月内）应该返回到他们以前的居住地。”

金日成同志坚持提出这一点。但实现它很难。看来南北朝鲜的代表就此问题会产生许多意见分歧和争吵，有可能对其他重要问题的解决带来影响。

是否可以提出这个建议？

如果带来争吵，并得不到批准，那么把它拿到国际政治性大会上讨论。

请告知您对上述几点的意见。此外，昨天我们把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和他的助手派去了朝鲜。大约在 1951 年 7 月 5 日，他可到达金日成同志那里，并同他和其他同志讨论与和平谈判有关的各个问题。

此后他将前往开城附近，在那儿秘密地指导谈判。

我把金日成同志就此问题阐述意见的电报也发给您。

毛泽东

第 3305 号电

一九五一年七月三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 853 页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停战谈判中的我方建议问题

北京

(1951年7月3日)

致克拉索夫斯基：

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7月3日发来的电报收到了。关于你们建议的前两点我们没有异议。第3点的第2部分可以删掉，但如果美国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可以采纳它。第4点不必提出来。但如果美国人提出有关联合国监察委员会建议，那么这个建议应予拒绝，理由是联合国处于交战国的地位，而提出你们的关于由各方同意指定的中立国的代表组成委员会的建议。第5点应该提出来，并予以坚持。

至于您其他的两点（关于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和关于难民的问题），这两点建议应该提出来，并予以坚持。

菲利波夫

1951年7月3日”

第340号密码电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855页

停止朝鲜军事行动协定草案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7月5日）

第 21497 号

现送上停止朝鲜军事行动协定草案的文本，供阅。

“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协定（草案）

在朝鲜交战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为一方），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将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为另一方），授权派出代表参加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在朝鲜建立和平的会谈。

双方代表在以下问题达成一致：

一、一九五一年一月 日，双方同时发布停火命令，双方在朝鲜的陆、海、空军力量停止敌对行动。

二、双方陆、海、空力量从三八线各后撤十公里，在三八线向北和向南十公里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在非军事区的民政机关恢复到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前的状态。三八线以北属于朝鲜人民政府管辖，三八线以南属于南朝鲜政府管辖。

三、双方停止从外部向朝鲜调运装备，调动或补充人员（包括陆、海、空运输）。

四、双方遣送战俘。在停止军事行动后三个月期限内，每一方应分批全部交换战俘。

五、在朝鲜所有交战的外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二至三个月期限内应分批全部撤离南北朝鲜。

六、南北朝鲜难民在四个月内应返回从前居住的地区。”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七月五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 856 页

停战谈判的策略问题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7月13日)

密码电报第 21756 号

发自北京 1951 年 7 月 13 日 15 时收到

抄送：1. 斯大林，2. 斯大林

菲利波夫同志：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在两次会议期间，美国人为了拖延时间、制造舆论、摸清我们的计划，同时达到休会的目的，蓄意提出记者参加会议。但这是愚蠢的把戏。我们坚决坚持，没有双方同意，新闻界的任何记者或代表不得单方强行接近开城以南。

如果美国人一两天后来进行谈判，那么我们想恢复谈判后，首先确定谈判议程，然后确定双方同等数量的记者到开城地区，但不允许他们进入会场提问题。如果美国人无耻地破坏双方同意的纪律，没有记者就不来，那么，我们就不顾这些，将坚持自己的决定，不退让。

关于谈判议程的斗争，南日同志在第一次会议的发言中提出三条停止军事行动的建议，实际上是我们的倡议，因此，恢复谈判之后由于进一步的详细分析和斗争，我们想提出以下总的议程：

一、通过议程。

二、为了实现朝鲜的停火和停战，首先要接受解决双方军事分界线和建立缓冲区的决定。

三、为了防止在朝鲜再出现敌对行动，要接受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决定。

四、实现停止军事行动、停战和监督的具体措施。

五、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后俘虏的措施。

上述议程在讨论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时需要得到美国人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同意不具体地把建立三八线列入议程，而将这个问题留在讨论议程的具体问题时再谈。与此同时，关于进行监督的共同意见列入议程的第四个问题，而且在讨论它时可以补充其他具体问题。

如果美国人拒绝将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列入议程，那么我们就坚持首先对我们提出的五点议程不作改变。要知道，金日成同志告诉李克农，如果双方同意自己的军队撤离三八线，那时可将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放置一旁。

但是，根据总的形势，我们认为需要坚持三八线和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只是在表达这些问题时需要指出一个总的思想：在从根本上讨论这些问题时，需要解决三八线问题。

至于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这可在一个单独阶段实施。

履行监督可以委托没有参战的中立国家，而双方谈判代表团员应该只完成停止军事行动的任务。

关于交换难民的问题，金日成同志研究的结论是，这对北朝鲜不利，因此这一问题未列入议程。

上述是否全都正确？

请您研究之后做出自己的指示。

现在，我们的军队仍然紧张地同敌人斗争着。如果谈判失败，准备在几个月内采取军事行动，消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并使战争向有利于我们转化。

毛泽东

十三时七分

第 3511 号

关于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7月20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

在恢复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谈判后，在五次会议期间，我们与敌人在议程上已达成三项协定：

一、为建立非军事区，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作为减少朝鲜敌对行动的主要条件。

二、在朝鲜实施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包括建立监督履行停火和停战情况的机构、其权力和职责。

三、针对俘虏问题的措施。

关于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问题，敌人坚持反对列入议事日程，认为不应列入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讨论的范围，它在和平谈判解决之前应延缓。

虽然我们的代表多次驳斥敌人的理由，但是敌人像以前那样，看不出有让步的迹象。根据凯南和马立克的会谈、目前谈判进程以及与朝鲜和远东问题有关问题的发展，可以看出，敌人只打算在朝鲜就地停战，避免在战争中继续损伤和久延不决，至于其他一切问题，包括从朝鲜撤出问题在内，敌人是打算继续目前的紧张状况，以便更好地在国内强行动员和在国外进行扩张。

所谓和平谈判，这是一句空话。如果敌人把停止军事行动之后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提交联合国讨论，那么我们未必能同意。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和平谈判进行时，敌人仍会像以前那样，在争论的过程中把

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和其他问题搁置一旁。

如果朝鲜能真正实现停火，敌人可能会经过一段时间后单独撤军。但是如果在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协定中通过外国军队可以部分撤出朝鲜，那么在执行这一条款时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

但是在目前远东持续的紧张局势中，敌人在政治上已失去重要基础，因此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这样做。那么，看来我们应重新研究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以前为了恢复北、南朝鲜，我们建议和同意在三八线停止军事行动。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们的武装力量只能把敌人赶出北朝鲜，却不能把敌人赶出南朝鲜。

战争拖久了，可以给敌人以更大的消耗，但亦将给我们在财政上以很大的危机，而国防建设亦将难于增长。设使再拖一个时期，假定半年至八个月，即可将敌人赶出南朝鲜，我们仍愿付出这个会有危机的代价，但现在我们看不出这种可能性。

如果谈判破裂，我们想再打几个月。如果关于三八线的问题遭到破坏，那么我们有能力逐步把敌人驱逐到三八线以南。那时我们重新开始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主动权像过去那样还会在我们的手中。

如果关于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的谈判破裂，那么在战争进行数月之后恢复谈判时，敌人可能再次拒绝这一条款。如果那时同意不把此条款列入停止军事行动的会议议事日程，那么我们会陷入更为不利的状况。如果新的谈判又破裂，那么我们将被迫进行长期的战争，以解决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问题，即在实际上解决在目前条件下无法完成的将敌人赶出南朝鲜的任务。在做出这样的分析后，我认为需要说明我本人对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新的想法，即与其将来为撤兵问题而进行难以得到结果的长期战，不如不以撤兵为停战谈判必须立即解决的条件。

马立克同志说，以从三八线撤兵停战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将从朝鲜撤兵问题保留到停战后去讨论。

如果我们现在不同意，而将来同意不把这个问题列入停战谈判的议事日程，那么最好现在就同意，而把这个问题留给以后去解决，以便使它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就像外国军队撤出台湾、单独对日和约及重新武装日本的问题一样。

如果您认为我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正确，那么在收到您答复之后，经金日成同意，我给我方谈判代表下达新的指示。如果您反对，请把您的观点告诉我们，并给予指示。

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毛泽东

第 3656 号电

1951 年 7 月 20 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中册，第 903 页

关于敌人在中立区的挑衅行为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8月27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

敌人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因军事分界线问题相持不下，便采取了连续的挑衅行为。

八月十九日，敌人换上伪装，袭击了我在开城中立地区的军事警察部队，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在双方代表调查之后，敌人宣称他们无罪，这是我南朝鲜游击队所为，因此，他们对此不承担责任。

在这之后的八月二十二日夜，敌机对开城中立地区投掷了九枚炸弹，向我代表团居住的房屋射击。

虽然那天晚上来了一些美军联络军官进行调查，但是敌人厚颜无耻拒绝承认自己的行为，而坚持认为在那里找到的碎片和形成的弹坑不是空投炸弹所致。之后敌人一反常态，宣称袭击是来路不明的飞机所造成的。

敌人胆敢进行厚颜无耻的挑衅，是因为他们认为，我方不敢因此而使谈判破裂，所以他们想利用这一措施对我施加压力。

当然，这可能是南朝鲜谍报机关破坏谈判的计划，但是除非得到美国同意，否则李承晚不会派飞机袭击在开城地区——他自己主动要求进行谈判的所在地的建筑物。因此，敌人的挑衅行为已迫使我们做出了反击的决定。

我们宣布暂时停止谈判，直至对方对发生的行为承担责任。在我们得到满意的答复以前，不恢复谈判。同时我们还要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是我们不想主动宣布谈判破裂，我们认为敌人不敢公开承认

他们的挑衅行为。

拖延谈判有两个发展可能，一个是拖向破裂。我们已在加紧准备迎接敌人可能的正面军事进攻，同时也严防敌人从北朝鲜东、西海岸的港口登陆。在几天敌机侵入中国沿海城市青岛、上海、常州，这是有挑衅目的的。

与此同时，敌人想侦察我沿海地区的防空情况。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想加强我们在朝鲜的指挥和沿海地区的防空。在下次电报中通知您为在朝志愿军工作的军事顾问的派遣方案，同时请您提供需补充的炮兵装备。

另一个可能是，敌人在拖延中寻找转弯的办法，并在军事分界线的问题上求得妥协。

目前，我们准备在停会期间与敌人进行宣传战，以揭露敌人厚颜无耻的挑衅罪行。但是我认为敌人不会公开承认自己的挑衅行为。

如果一段时间之后，形势能够得到发展，那么，敌人可能想恢复谈判，这样，我们就主动提出一个能够使谈判发生转机的方法来恢复谈判，并且迫使敌人同意这一办法。

金日成同志建议为了开城中立地带的安全，邀请中立国家的代表作为谈判期间的监察员和证人出席谈判，并以此作为恢复谈判的必要条件。此外，这些代表还可以在将来控制执行停火的组织中发挥作用。

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您是否认为有必要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请您根据以上情况给予指示。

毛泽东

第 4279 号电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 984 页

我们有关邀请中立国代表 的意见是不适宜的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8月30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的电报收到了。

我同意关于我们在邀请中立国代表作为现阶段谈判的监督员和观察员问题上表现出主动性是不适宜的。

此情况我已通知金日成同志。

毛泽东

第 4358 号电

一九五一年八月三十日

送：斯大林同志（2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 987 页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和中国国内状况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1年11月14日)

发自北京

1951年11月14日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在恢复朝鲜停战谈判以后，由于近两个月来前线损失惨重，以及美国国内外的停战要求增强，美国方面接受停战条件的可能性增大了。但是与此同时，考虑到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美国政府仍然企图保持国际紧张局势，因此在谈判过程中，美国人积极打探消息并玩弄花招，力图拖延谈判。

确定分界线是谈判的主要问题。敌方要把分界线划在我军深远后方，而不是建议在当前战线的基础上确定分界线，对之做出某些改变，并将开城地区纳入缓冲地带。

目前，在签署停战协定时，敌方已提出要求确定以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没有把开城地区纳入缓冲地带。我们则坚持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并确定以双方军队当前的接触线作为分界线，在就全部议程达成协定时如有变化则对双方部队接触线做出改变。目前敌方正就这一问题同我们进行争论，但是我们认为，这一争论不会持续很久。

我们之所以建议在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我们之所以同意推迟解决以三八线作为分界线问题和在召开政治会议之前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等问题，不仅因为目前进行的谈判是停战谈判，以及敌方

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立即以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山区来交换三八线以南的西部低地，而且因为在敌方拒绝放弃东部山区的情况下，我们在那里也有有利于防御的山区。至于三八线以南的西部沿海平原地区，则它对我们有利，是因为那里居住着比东部地区多得多的居民，还因为那里有丰富的农产品。而且，开城地区是夺取汉城的前哨阵地。

金日成同志今年六月在北京讨论停战条件时会就此问题发表了这样的意见。这次，停战条件也是征得他的同意的。

关于对谈判监督问题的讨论，我们早就打算建议建立停战机构，双方代表均参加这一机构，由该机构承担对停战条件的执行进行监督和缓冲地带进行监督的任务。

但是，敌方一定会要求在双方后方建立监督，以便限制双方援军和军用物资的调遣。

我们打算同意在双方一至二个边境居民点建立监督，并同意您的指示，建议给中立国，即未参战的国家赋予监督职能，我们打算邀请苏联、波兰和印度这三个国家承担此项任务。

可能美国人一开始会反对。若是这样，我们就建议由瑞典和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派出代表。

至于交换战俘，我们反对按一对一的原则交换，我们建议按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交换。

我认为，该问题不难达成一致意见。

关于由有关国家政府召开高级会议问题可能有3种方案：

一、召开目前正在进行谈判的双方政治代表会议（可能美国提出这一方案）。

二、召开4国参加的会议：苏联、中国、美国、英国以及北朝鲜和南朝鲜的代表。

三、召开7国参加的会议：苏联、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埃及以及北朝鲜和南朝鲜的代表。

请您指示，从国际局势来看这三种方案中哪种是最佳方案，或者请您提出新方案。

目前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力求在今年达成停战。与此同时，我们应进行必要的准备以应付敌方拖延谈判和破坏谈判。从朝鲜战争还要拖延半年甚至一年着想，我们在朝鲜战场上正在节约兵力、物力和人力，争取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

在国内，我们正在准备整编军队，精简机关，厉行节约，增加生产，进一步加强抗美援朝工作，以支援朝鲜战争，并保证国内财政状况及市场物价继续稳定和国家建设主要是国防建设加紧进行。

今年因为抗美援朝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全年预算已较一九五一年预算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而总预算中的百分之三十二均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苏联政府给我们提供的军事贷款尚未计算在内。

因此，如果现在不立即采取紧缩的方针，则明年的预算必更膨胀，财政必受影响，物价必大波动，势必使前方战争大不好，后方建设亦搞不好。采取这种方针，正是为着在朝鲜谈判中，和固有利，拖也不怕，而打下去一定能打出一个结果来，国内各项工作均好做，并有把握争取政治和经济的继续稳定和发展。

请您就上述问题给予指示。

毛泽东

第 5631 号电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 1102 页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在谈判中采取灵活战术，实行强硬路线

（1951年11月19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电报收到了。我们同意您对谈判目前形势的评价。

近来谈判全过程表明，美国人虽然在拖延谈判，但是他们更需要尽快结束谈判。

这是根据总的国际形势得出的结论。

我们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中朝方面应继续在谈判中采取灵活战术，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躁和尽快结束谈判的表现。

在确定分界线和在 1-2 个边防站进行检查问题上，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

我们还同意关于履行检查职能的委员会人选问题。

在交换战俘问题上，您的立场完全正确，敌人很难对此提出异议。

至于在签订停战协定后，为进一步解决朝鲜问题而召开会议的可能方案，我们认为，召开目前谈判双方政治代表的政治会议是适宜的，但必须要有北、南朝鲜的代表参加。

菲利波夫

1951年11月19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 1108 页

关于中立国观察机构等问题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2年1月31日)

发自北京 1952年1月31日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由于敌方在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处心积虑地拖延谈判，至今未能达成最终协定。

但在停止军事行动的主要问题上，例如，在双方之间划定军事分界线和建立非军事区问题上，已达成三点协定。

在制定朝鲜实现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停火停战条件、观察机构的人员、权力和职能等问题上，已达成六点协定（协定全文附后）。

此外，对“战俘处理”问题，敌方原则上不可能表示反对释放全部战俘。因此，谈判不会拖延太长时间。尽管敌方在停止军事行动后限制进行恢复和建设机场以及“自愿遣返”战俘这种轻率要求的藉口下，力图拖延谈判，但由于我方坚决反对其建议，而且由于敌方很难制造在朝鲜继续进行战争的舆论，以及其仆从国和美国本身也都渴望停止朝鲜战争，因此，近日来敌方不得不放弃对限制在朝鲜恢复和建设机场问题的讨论，而开始讨论协定的细节问题。

从敌方所提停战协定的具体条款来看，该协定仍然不是最终协定，亦即敌方仍然把限制在朝鲜进行恢复和建设机场以及自愿遣返战俘列入协定条款，同时还声称，这些条款只能通过，没有商量的余地。由

由此可见，最后达成停战协定的可能性已在增长。毫无疑问，我们从来没有、现在依然没有只从这一种可能性出发。

同时，我们警惕地注视美国统治者由于其国内外矛盾的发展，仍有利用谈判拖延甚至破裂以紧张国际局势的某种阴谋。但是我们已准备好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给敌人以坚决的打击，不使敌人得逞。当前，双方在谈判中已开始讨论细节问题。

为了达成最终停战协定，必须得到您对下列问题的具体指示。

一、关于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观察机构。

美方提出双方各自邀请其武装力量没有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三个国家，每个被邀请的国家指定一名高级军官作为建立中立国观察机构的代表（双方中立国共六人）。

我们打算同意这一程序，并邀请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派出代表，以便他们能够平等地同美国邀请的三个国家的代表商讨问题，并且享有否决权。

二、上述每个中立国均应派出1名副代表，他们可以以其代表的名义参加观察机构会议。所有的代表都可从其本国公民中挑选其作为顾问的助手。所有被邀请的中立国都可提出必要数量的行政工作人员来建立秘书处，负责保存纪录，分发文件和译本。

三、中立国观察机构的职责是：

（一）实际监督和观察双方遵守协定——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不得通过双方协定规定的后方卸货点，把用于增援的物资、军事人员、战斗飞机、装甲车、坦克、武器装备和弹药从外面运入朝鲜；双方军事人员的轮换应按协定规定的规模，并按同等数量进行。

（二）报告任何一方所发现的在非军事区以外发生的破坏停战协定事件的发生地点，并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机构应根据停战委员会双方或一方的要求，立即派出中立国观察小组进行检查和观察，并将检查结果报告停战委员会。

四、同时根据第3项协定第1款有关的职能的规定，美方还提出，在停止军事行动后，双方都应提供关于在朝鲜参战的地面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准确地点的情报资料，并且不得变更己方军队的配置位置，也不得集结己方兵力。我们打算不同意这一点，因为这不是已达成的协定条款所规定的。

五、至于在按规定应进行观察的后方卸货点，美军提出确定在南朝鲜的汉城、仁川、襄阳、原州、忠州、堤川、安东、晋州、群山、大邱、顺天、釜山——共十二处。在朝鲜北部相应规定为新义州、满浦镇、江界、惠山镇、会宁、清津、新安州、咸兴、金口、平壤、镇南浦、元山、碧潼、城津、海州——共十五处。

每一处都应规定，在从该卸货点中心向外三十里半径范围内为中立国活动区。

我们认为，敌方提出的点太多，活动区面积太大，而且开放点的数量不相等。我们拟同意双方都开放三-五个点。在朝鲜北部为新义州、清津、咸兴、满浦镇和1个机场；在朝鲜南部为釜山、仁川、水原、丽水、葫口岛。我们还打算提出，中立国小组活动半径应规定为由卸货点中心向外五公里。

六、中立国观察机构属下应设若干中立国观察小组。每个小组应至少由四名中级军官（上校——少校），即由每一方所邀请的中立国代表中的两名军官组成。必要时可在观察小组属下设立分组，由双方从其代表中各派一人，共两人组成。

美方提出建立四十个中立国观察小组。我们认为这一数量太多。如果可以达成协定，双方各自开放五个后方卸货点，为履行观察机构职责建立十六个中立国观察小组足够了，其中十个小组常驻互相议定的卸货点，六个小组作为派往出事地点的预备小组。

七、中立国观察机构和停战委员会应设在同一地点。中立国观察小组在执行检查和观察任务时，无权研究各种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结构

和性能。

关于报告中立国观察小组的工作结果，我们认为，正式报告应由该小组的大多数成员所通过。未被大多数成员所通过的报告或个别人员的报告不能作为正式报告，只能用作参考资料。

八、中立国观察机构及其下属各小组的物资供应由双方的军方保障。双方应给观察小组提供运输工具，将其成员运往各卸货点和发生破坏停战协定的地点。

所有上述八条都涉及到中立国在双方后方地区内非军事区以外进行观察的问题。

请您考虑，我们的观点是否正确，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如果您同意我们的意见，您认为是否有必要事先将此通知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同志。

请予答复。

附：关于第2项议程所达成的协定全文，另电告您。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第326号电

一九五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1144页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您在停战谈判上的立场完全正确

（1952年7月17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请将以下复电转告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我们认为，您在停战谈判上的立场完全正确^①。今天我们收到平壤的报告，据说金日成同志也同意您的立场。

菲利波夫

1952年7月16日”^②

执行情况请电告。

第303号密码电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1186页

① 7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通报朝鲜停战谈判的近况和中方在目前阶段的立场和方针。中方于7月3日和6日提出双方均应遣返全部或绝大部分战俘，但对方于7月13日提出了83,000人的遣返数字，其中朝鲜人民军76,600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近80%，而中国志愿军仅6,400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32%。“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收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我方亦对扩大战争有所准备。

② 斯大林这封电报应是17日发的，该电报的档案原件最后注有“7月17日确认”的字样。

关于是否接受敌方建议的问题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摘录）

（1952年7月18日）

发自北京

1952年7月18日12时15分收到

致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七月十五日三时我致金日成同志的电文和金日成同志今年七月十六日二十一时给我的回电，供了解情况。

“致金日成同志，并抄送李克农同志：

我们给李克农同志写好电文后，接到您今年七月十四日十八时的电报。

对该问题经过两天研究之后，我们一致认为，目前正当敌方对我们狂轰滥炸之际，接受敌方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的、具有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我们来说是极不利的。

我们可以看看这一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

不接受敌方建议只会有一弊，就是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然而，战争已经开始了，中国已经开始帮助朝鲜，朝鲜人民也已经确实站在了保卫全世界和平阵营的最前线。

朝鲜人民牺牲的代价是取得了在三八线地区阵地的巩固，保卫了北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

朝鲜和中国人民，尤其是两国的武装力量，在同美帝国主义斗争中得到锻炼，并获得经验。

在斗争进程中，朝鲜和中国人民增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促使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得以发展。这也迫使美帝的主力被牵制在东方，并蒙受着连续不断的损失。同时，作为全世界和平支柱的苏联得以加紧自身建设，并对全世界各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给予影响。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发生。如此强大的运动正好说明，朝鲜人民不再是孤立的。

首先，中国人民愿意竭尽全力确保朝鲜人民渡过难关。因此我们现在请求您坦率地向我们提出朝鲜局势要求迫切解决的各种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至于接受敌方建议一事，肯定会带来巨大危害。

首先，在敌方狂轰滥炸压力之下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建议将使我们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其次，敌方会不断地利用我们这一弱点向我们继续施加压力，并导致敌方新的挑拨行径。那时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再想向敌方施加压力时，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上述的优势也将失去其自身意义。这是糟糕的一步，并会因这一步而输掉全局。

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接受敌方建议必然会使敌方更加自负傲慢并有损于我们的威望。如果我们表现出坚决不接受敌方的建议，并对敌方破坏谈判做好准备，敌方就不敢贸然破坏谈判。在谈判进一步推迟过程中，由于我方果断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敌方会做出新的让步。

如果敌方不让步或者谈判破裂，那么我们应继续军事行动以便在敌方无法取胜的战争进程中去寻找改变目前状况的出路。

关于这一建议和我们的方针，我们会告知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

得到他的回复结果，我们会告知您。

此致
敬礼！

.....

毛泽东
今年七月十五日三时”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八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 1187 页

关于墨西哥的建议等问题

——周恩来转交毛泽东致斯大林的信

(1952年9月16日)

约·维·斯大林同志：

送上我收到的毛泽东同志来电的俄译文。

请您阅示，并安排在您方便的时间接见，以便得到您的亲自指示。

顺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周恩来（签名）

1952年9月16日

附件：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

周恩来同志：

一、根据我们现有情报，朝鲜问题将在本届联合国大会上讨论。关于战俘问题，墨西哥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双方要立即进行交换声明愿意返回祖国的战俘；第二，其余战俘转交给联合国成员国临时保护，并应当根据即将达成的协定予以遣返回国；第三，在朝鲜建立正常秩序后，保证这些战俘返回祖国，并对此提供可能的条件。在恢复正常状况之前，如果战俘要求送其返国，有关政府应采取措施并向他们提供回国的一切可能。

看来，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朝鲜问题的提议是美国倡议的。墨西哥的提议是根据美国的倡议。美国已经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愿意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打算反对这种做法。

请征求菲利波夫同志的意见，对该问题我们应持何立场。

二、印度和缅甸已暗示，他们想同我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且还希望你去访问这些国家。实质上是尼赫鲁想来中国访问，随后由你对印度进行回访，这一情况我们是从我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处得知的。我认为，印度和缅甸这些问题完全可以提出来交换意见。如果印度和缅甸正式提出这些建议，我们要拒绝是不妥的。

请征求菲利波夫同志的意见，中国与印度和缅甸签订这些条约是否适宜。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五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 1224 页

附录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墨西哥人的建议不可接受

（1952年9月17日）

致毛泽东同志：

我们同意您的看法：墨西哥人的建议不可接受，因为它反映了美国在朝鲜谈判中的立场。很明显，由于在朝鲜谈判中没取得成果，美国打算目前要在联合国取得对其立场的赞同，并且要以联合国的名义提出同样的要求。墨西哥人只是美国的代言人。

如果墨西哥人向联合国提出自己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将因其不符合在朝鲜停战的利益而否决这一建议，并将补充下述提议：

“一、双方立即停止陆、海、空的军事行动。

二、依据国际法准则让全部战俘返回祖国。

三、外国军队（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在2-3个月内撤出朝鲜；在直接有关各方和其他国家（其中包括未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参加的委员会的监督下，由朝鲜人自己本着朝鲜统一的精神去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关于双方各自暂时留下20%的战俘并让其余战俘返国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将不会涉及此项建议，它将留给您机动处置。

同印度和缅甸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我们完全赞同您的看法。

菲利波夫

1952年9月17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1226页

关于停战谈判形势和武器供应问题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2年12月17日)

发自北京 1952年12月17日16时30分收到

致谢苗诺夫^①同志：

由于朝鲜停战谈判的中止以及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损失尚未达到使美国人面对停战的程度，我们认为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比方说一年之内），朝鲜的军事行动要更加频繁。

目前艾森豪威尔正在准备其上台掌权后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仅仅根据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可以预计敌人将有可能在我后方西海岸和东海岸一带发动登陆作战，而不大可能对前线的我方阵地前沿和后方较坚固的工事发动进攻。所有的迹象表明，敌方当前正加紧训练和加强李承晚的傀儡军队，敌海军部队在北朝鲜水域不停地进行演习，敌方间谍亦积极地在西海岸和东海岸一带搜集情报。

至于敌方军事力量，总共有十九个师、四个旅和七个独立团，这包括美国的七个师，英国、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的四个旅，李承晚军队的十二个师和七个独立团。

目前在战场上作战的有十四个师、四个旅和五个独立团。

如果敌方要采取在西海岸和东海岸地区登陆作战，那至少要从南朝鲜后方地区调出四至五个师，还要从日本和美国调出4个美军师，只有这样敌方才能够组织大规模登陆战役。否则，由于兵力不足，只能

① 谢苗诺夫，斯大林的化名。

在靠近我后方地区采取战术性和牵制性的登陆战役。

战术性的登陆地点可能在东海岸的通川地区和西海岸的瓮津半岛和梦金浦里半岛。

对空降兵登陆具有战略意义的登陆地点可能在东海岸的汶山、咸兴、镇南浦地区和西海岸的新南州地区和铁山半岛。

在西海岸地区的战略性登陆对于我们有更大的威胁，因为我们的主要运输线路通过这些地区。

也许敌方采取的登陆战役会在明年的春季，但也可能更早一些，在明年二月份就开始这些战役。为了配合登陆战役，敌方也许会对中国大陆采取牵制性军事行动，如轰炸在中国领土安东地区的军用机场；让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军队在中国沿海地区搞军事活动；援助在缅甸领土上的中国李弥匪帮军队，以加剧中国边境的军事行动。

然而，朝鲜战争仍然是关键问题所在。如果我们成功地捍卫住在朝鲜我军后方的东海岸和西海岸，破坏敌方登陆计划和战场上的战术性协同进攻，使敌方有生力量遭到更大损失，那么朝鲜的军事形势将会更加稳定，并将朝着更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在回答“如何能完成上述任务”这一问题之前，请允许我报告当前军事形势及其特点。

在粉碎敌人去年秋季攻势之后，朝鲜战场的形势开始相对稳定。我方军队利用这段时间加固了前方和沿海岸地区的防御工事，并且在与敌空军作战取胜的同时，于今年九月份为粉碎敌方当时即将发动的秋季攻势，恢复了铁路交通和公路交通，从而我们保证了对军队的不间断供应。

我方军队首先开始了战术性进攻，结果是敌方军队的 58 个据点被清除。

在九至十一月的三个月时间里，我们使敌人有生力量遭到的损失死伤达十一万多人，其中美国人有四万多。

十月中旬，敌人以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开始连续进攻位于金化以北四公里的约占3万多公里面积的两处据点。这场战役一直持续到十一月末，敌人被毙伤达两万多人，敌人每日消耗炮弹两万多发，有时多达三万发。坦克和飞机每日都参加战斗。然而，最后阵地仍在我方手中，而敌人未能占领一寸土地。

由于进行如此激烈的阵地战，我军和敌军的炮火都十分集中。为了消灭敌人的一个连，平均要集中三十门火炮，发射约一万多发炮弹。在最近三个月时间里，我们消耗了二百四十多万发炮弹（其中有一百一十万发是苏联型号的），其中迫击炮弹占的比重较大。苏联型号的炮弹（如152毫米榴弹炮弹、122毫米榴弹炮弹、76.2毫米炮弹、85毫米高射炮弹、37毫米高射炮弹、“卡秋莎”火箭炮弹以及122毫米、85毫米、76.2毫米坦克炮弹）起了极大的作用。

我方军队在今年秋季战役中取胜不仅仅是由于战士和指挥员的英勇、加固的工事、正确的作战指挥和不间断的供应，胜利的最重要因素实际上是强有力的炮火和炮兵的准确射击。

至于我方炮兵与敌方炮兵的对比，敌方有一万四千门各式炮，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部队有一万三千门各式炮。然而在我方的火炮中轻型迫击炮和火箭炮占多数，几乎超过全部火炮的半数。敌方的榴弹炮和坦克炮则比我方多得多。缺少炮弹，尤其是缺少苏联型号的炮弹，是我方的一大困难。人民志愿军部队只有两千门苏联型号的炮。虽然在今年我们得到了各式苏联型号炮弹一百一十二万发，但在朝鲜前线的消耗巨大，多种苏联型号的炮弹在仓库内早已告罄。

不久前，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还下令从正面第一线撤下一些由苏式大炮装备的榴弹炮兵师。采取这一决定的前提是：敌方不会组织大规模的冬季攻势。假如一旦敌方获知我方的真实情况并提前开始自己的攻势，就会使我方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所以请求提供苏联型号炮弹是我这封电报中向您提出的最紧急请求。

为了击退敌方的登陆战和我们设想的其可能提前开始的攻势，目前我们采取了各种备战措施。

目前在朝鲜战场有人民志愿军十六个军、四个榴弹炮师、四个坦克团、五个“卡秋莎”火箭炮团。在正面第一线有人民志愿军七个军和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人民志愿军的其他几个军在第二线，并同朝鲜人民军部队一起担负着朝鲜东海岸和西海岸防御任务。

为了加强军事力量，我们决定于一九五三年一月份从中国内地再往朝鲜调四个步兵军、一个榴弹炮团、五个坦克团、两个“卡秋莎”火箭炮团，并保持五个军去守卫平壤以北的西海岸地区。此外，还决定沿海岸线和铁路线加固并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以保证供应中朝部队的运输线在这一狭长地区的安全。

与此同时，还必须在东海岸和西海岸其他重要据点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

为了使后方沿海岸地区发生的战斗不影响对前线部队的正常供应，我们决定修建新铁路线和改善现有铁路线的状况，并决定修建新公路和加宽现有公路，以便改善对前线食品和弹药的运输与供应，建立起尽可能多的储备。

为了给人民志愿军部队补充兵源，我们开始在国内征新兵，并打算在明年给人民志愿军部队送去二十五万补充人员。

我们认为，明年的军费开支可能要增加，军工生产必须扩大，所以一九五三年的建设资金将只投给最重要的工程，而某些能够延缓的建设专案将被削减。

鉴于朝鲜同志在这场战争经费上的困难，除修建铁路线、公路和建造工事完全由中国方面负担费用外，我们决定三年内每年向朝鲜无偿地提供价值六千万美元的产品和食品，并接纳大批朝鲜孤儿、难

民、工人和职员，以减轻朝鲜的重担。

为了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朝鲜成功地进行战斗，我们准备竭尽全力去打赢这场战争。然而，取得胜利不是没有困难的。

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一九五三年我们还不能生产出朝鲜战场急需的所有苏联型号的武器，尤其是不同规格的苏联型号的炮弹。只有在春季之后，我们才能开始生产供应朝鲜战场的某些苏联型号的武器和弹药，即使这样，数量仍然不足。

由于这一极其紧张的状态，恳切地请求您和苏联政府满足我们一九五三年朝鲜战场军需品申请单和一九五三年军工生产材料贸易额申请单。第一份申请单已于一九五二年九月六日由周恩来同志交给莫洛托夫同志，第二份申请单已由目前正在莫斯科的外贸部长叶季壮同志提交给苏联外贸部。

随这封电报我们附上最急需的军用品申请单。

请您依据所附清单加以审核，对您能向我们提供这些军需品寄予希望。

一、我们请求于一九五三年第一季度供给不同型号的火炮六百二十门以及这些炮的牵引车和配套零件：

（略）

二、请于一九五三年一月份提供给我们不同型号的炮弹805,000发：（略）

三、请于1953年2至4月份提供给我们不同型号的炮弹1,550,000发：
（略）

.....

请把上述炮兵武器列入军事订货账户内。

如果您同意按我们的申请单供应，请将上述炮兵武器从一九五二年9月6日的申请单中扣除。

至于二十个步兵师的炮兵武器和弹药，以及一九五三年将向其提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我们请求仍按原先协定的计划供应，不要有任何变化。

四、请于一九五三年第一季度提供给我们军工生产的六种材料：
(略)

请将上述军工生产材料记入贸易额账户内。如果您同意按我们的申请单供应，请将这些材料从已提交的一九五三年贸易额申请单中扣除。此外，为了保证在朝鲜前线作战的坦克团有成套的修理材料，请您给苏联外贸部以相应指示：根据一九五二年九月三日签订的坦克修理材料合同（23109号的80%和23119号的80%）应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向我们提供尚短缺的1,166种坦克修理用材料和六十二种供日常维修用的成套紧急材料，特别是自控系统用的修理材料，希望能尽早地提供这些材料以解急需。

请您审核上述一切，并希望您先告知自己的意见。

致敬礼！

毛泽东

第 3541 号电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 1251 页

我们准备派出海军作为志愿军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3年1月7日)

发自北京 1953年1月8日11时10分收到

送：斯大林同志、马林科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致谢苗诺夫同志：

根据朝鲜形势，为了击退敌人可能发动的新进攻，当敌人在安东至平壤一线的朝鲜西海岸地区实施登陆战役时，我们准备向朝鲜派出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作为志愿军。

请把您的意见告诉我们，这样做是否适宜。为此，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在一九五三年二月根据一九五二年海军器材申请单向我们提供以下武器：

一、鱼雷快艇及水雷和鱼雷：

(略)

二、海岸炮兵：

(略)

三、海军航空兵：

(略)

四、顾问和教官。请向中国派遣以下专家：

(略)

上述顾问和教官最好能在发运武器的同时派到中国来，以便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兵团能在进行两个月战斗训练后派往朝鲜参加战斗行动。

请研究我们的请求，并把您的决定告诉我们。

此致

敬礼！

第 62 号电

毛泽东

一月七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 1262 页

请求苏联提供阿芒拿炸药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1953年1月29日）

致谢苗诺夫同志：

为了保证顺利击退敌人可能发动的登陆战役，中国志愿军部队正在朝鲜西海岸和东海岸修筑防御工事，所以我们急需阿芒拿炸药。

目前我们的阿芒拿炸药还无法满足工业和军队的需要。虽然我们在工业上已采取措施节约阿芒拿炸药，并把一部分供应军队的阿芒拿炸药运往前线，但今年第一季度的生产仍不能保证军队需要。

为了保证在二至三月份完成朝鲜沿岸的防御工事，经我们估算，我们不得不请求苏联政府在今年二至三月份分两批向我们提供三千吨阿芒拿炸药、两千四百万支雷管和九百六十万米导火线。

请苏联政府研究我们的请求，并告知决定。

敬礼！

毛泽东

第 223 号电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 1274 页

附录 苏联政府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

(1953年3月19日)

苏联政府注意到前一时期朝鲜事件发展全过程，全面研究了当前情况下朝鲜战争的问题。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中朝三国人民关心世界和平的巩固，一直寻找尽可能快地结束朝鲜战争的可行途径。

无需详细谈论侵略者在朝鲜战争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在全世界诚实人们的心目中，英美侵略集团在朝鲜的作为，越来越暴露出这个集团特别是美国侵略势力，是一种推行准备新的战争并企图扩大战争的政策国际因素，其目的只是强迫人民服从他们的帝国主义侵略意志，即妄图建立起对全球的统治，并迫使人民屈服于这些帝国主义者的目的。

苏联政府认为，对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情况应该如以往那样予以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目前情况下，对朝鲜战争问题上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直推行的路线，而不试图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不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不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脱离战争的出路。

鉴于以上所述，并考虑到最近时期有关朝鲜战争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急需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即：

一、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2月22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给予肯定的回答。

二、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应在北京发表声明，着重表明对待交换伤病战俘建议的积极态度，同时指出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

三、与北京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上述声明的正确性，并表示充分支持。

四、我们认为这样做也是恰当的，即紧接上述北京声明和平壤声明之后，苏联外交部表态，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表态。

五、配合上述四项措施，苏联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应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支持和推进以上新政策方针的实施。

我们认为对以上所述需要作下面几点说明：

第一，对克拉克将军的答复。我们认为，在金日成和彭德怀致克拉克将军的复函中，应表明完全同意克拉克将军关于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指出这里考虑的是按照日内瓦公约第109条积极解决这一问题。

在给克拉克的答复中应指出，交换伤病战俘对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从而对解决停战问题和缔结和约问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建议恢复停战谈判主要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的会谈。

建议由双方联络官确定上述谈判的日期。

在根据日内瓦公约第109条规定：“对任何一个伤病战俘的遣返，都不能违背他在战争期间的意愿”进行的交换伤病战俘的谈判过程中，应力求获得美军司令部的如下保证，即对上述战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采取强制手段阻拦他们返回祖国。

还应建议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的代表们组成委员会，促使伤病战俘返回祖国。

在交换伤病战俘的谈判中，应该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即任务不仅在于使上述问题获得积极的解决，而且还要使整个战俘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从而消除达成停战协定和缔结和约的障碍。为此应运用日内瓦公约第109条，特别是这一条的第1段，其中规定缔结“有关遣返或在中立国扣留已长期被俘的健康战俘的协定”。

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

对这些战俘应像金日成和彭德怀1952年10月16日给克拉克将军的信中建议的那样，按民族和居住地分类。

战俘分类后，立即获得返回自己祖国的权利，这样使有关各方便于协助。

第二，关于北京声明。此声明应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共同讨论了克拉克将军提出的问题，两国政府同样得出一致的结论，即命令自己的代表，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开始与克拉克将军谈判，考虑

按照 1949 年日内瓦公约第 109 条积极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考虑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声明应指出，在开城和板门店的双边谈判过程中，已经就战俘问题以外的所有问题达成了协定。

例如，就停止军事行动达成了协定：双方武装力量司令员发出命令，命令其属下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地、海上和空中的所有部队和人员，停止在朝鲜的各种军事行动，命令将于停战协定签字 12 小时后生效，并保证该命令得到执行。

还对停战的下述重要条件取得了一致意见：

（一）关于建立军事分界线：该分界线应沿停战生效时作战双方部队的接触线（即前线）划分。“为组成非军事区，双方部队从分界线向后撤退两公里”（停战协定草案第 1 条）。

（二）关于成立由 10 名高级军官组成的停战军事委员会，其中 5 名由联合国军总司令任命，5 名由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任命（第 19 条）。

该委员会应监督停战协定遵守情况，包括监督战俘遣返委员会的工作和通过谈判解决破坏停战协定的问题（第 24 条和 25 条）。

（三）关于建立中立国停战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经联合国军总司令任命的瑞典与瑞士代表，和经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任命的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组成（第 36 和 37 条）。

该委员会可建立由上述四国代表组成的观察小组。

中立国观察小组将分驻新义州、清津、兴南、满浦和新安州（以上属北朝鲜）；仁川、大邱、釜山、光州和群山（以上属南朝鲜）。

此外还达成了如下协定：双方司令员应“建议双方政府在停战协定签订和生效 3 个月期间里召开双方最高政治会议……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平解决朝鲜争端等问题”（第 60 条）。

还在协定草稿有关战俘（除遣返战俘问题外）的许多条款上取得了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遵循自己维护和巩固和平的政策，力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全力以赴争取立即停止战争，主张全面解决战俘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准备从自己一方采取措施，消除这个问题中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目前是缔结停火和停战协定的唯一障碍。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

府) 建议, 立刻遣返全部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 将其余的战俘交给中立国, 以保证公正地解决他们的遣送问题。

在北京的声明中还应谈到以下内容:

我们迈向结束朝鲜战争的新的一步, 也应有助于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国际问题的积极解决, 首先应有助于恢复中国和朝鲜在联合国中的权利。

第三, 关于平壤声明。我们以为, 在金日成同志的这一声明中应该指出, 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声明, 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共同商定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无论对北京声明中关于政治形势的评价, 还是对其中的具体结论和建议都完全赞同。这里不仅要强调完全支持, 还要着重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声明的合理性。

第四, 关于莫斯科声明。我们认为苏联外交部在莫斯科发表声明是恰当的, 它应紧随北京和平壤的表态之后。我们认为莫斯科声明含义在于, 在全世界面前强调苏、中、朝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团结和行动一致。

第五, 关于纽约联合国大会上的苏联代表团。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应按上述对待朝鲜战争的政策计划行事。因此, 只要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波兰的“防止新世界大战威胁”决议草案, 苏联代表团就必定对此草案涉及朝鲜部分提出相应的修改, 并提出苏联代表团和波兰及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必要的表态。

第六, 补充意见。当然, 目前我们不能预见到苏联、中国和朝鲜政府以后将要采取的所有步骤和措施, 然而, 如果我们三国政府在推行此问题的总路线方面能达到我们满心希望的完全一致, 则其余的问题可以在事情进程中商量决定。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 1295 页

敌人被迫停战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原因

——与库兹涅佐夫的会谈

（1953年7月28日）

发自北京紧急密码电报

抄件送：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维辛斯基、葛罗米柯、佐林、波采罗普

关于7月28日会谈的报告

在接受了苏共中央的问候之后，毛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要求我向苏共中央转达深切的感谢。毛注意到敌人被迫提出停战不仅迫于军事上的原因，而且迫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在军事问题上，最近一年的情况已经表明敌人在陆地上不仅不能前进，也不能稳固地保持和守卫前线。中国军队不仅已经开始实施阵地战，也能够打破（敌人的）防线。

在迫使敌人停战的政治原因中，毛提到帝国主义阵营在军事上的矛盾和世界反对朝鲜战争的社会舆论的重大作用。

关于经济上的原因，毛阐述了在战争的头两年，美国的垄断集团在军火定货和交付中积累了庞大的利润。但是随着停战谈判的结束，也随着朝鲜战争停战运动加强的结果，他们的利润开始急剧地下降。

回到军事问题上，毛指出，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大致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以的。但再向南方深入，就会冒过分暴露朝鲜东西海岸侧翼的风险。在这种

情况下，从中朝军队的后方登陆的危险性将会大大增加。

谈到停战签字后更进一步的打算，毛泽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许多相关问题想和苏联政府商量。大约到8月10日，我们将准备一个有关必须要与苏联政府商量的措施计划的建议。

库兹涅佐夫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1323页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答谢电

(1953年7月30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实现朝鲜停战的贺电，深为感谢。

在整个朝鲜反侵略战争和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都给了中国和朝鲜人民以重大的支持。苏联、中国和朝鲜的充分的团结一致，保证了朝鲜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将继续与苏联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保卫和平及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五三年七月三十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下册，第 1325 页

后斯大林时期

感谢苏联对中国制定五年计划的意见

——毛泽东与库兹涅佐夫谈话纪要

（1953年5月7日）

摘自 B. B. 库兹涅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3年5月26日

机密文本第2份

苏联驻中国大使B. B. 库兹涅佐夫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会谈纪要

1953年5月7日

根据苏联外交部的指示，我拜访了毛泽东，并把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任务的意见》交给了他。

毛泽东就苏联政府在中国五年计划问题方面给予的帮助表达了谢意。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中国政府将全权委托谁来签订苏中协议以及附属该协议的关于苏联就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的备忘录，毛泽东说，中国方面将全权委托李富春签订协议。

在随后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实际上中国政府还没有五年计划，只是现在，在苏联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来研究材料，并提出了正确而宝贵的意见之后，在他们的帮助下才能开始制定计划。毛泽东说，今年无法制定出详细的计划，只能拟定控制数字。在这整个工作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意见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接着，在谈论关于中国经济建设工作中的不足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中国领导人分析形势的能力还比较薄弱，在研究和解决个别问题的时候经常会陷入主观主义。在长期的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总是不得不同主观主义作许多斗争。毛泽东说，只是到了现在才明白，要想保证胜利，就必须考虑一些基本的条件。现在不得不由那些参加过革命的人来处理经济问题，他们在建设问题上还没有必要的经验。因此，在中国，近几年还无法从这方面做出安排。毛泽东说，但是中共党员们将会努力把这个时期缩短，因为具有这样的条件，尤其是苏联提供的帮助是重要的因素。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在努力地工作，积极地支持共产党和政府的看法，毛泽东说，成功当然是有的，但是不足还有很多。最大的不足是群众政治工作还很薄弱，官僚主义严重，因此损害了与群众的关系。中国的上级机关向下面发布了过多的笼统的建议、指令，但是并没有给执行者提供有效的帮助，对自己的任务的实质也没有解释清楚。下级机关（区级和乡级的干部）尤其深受其害。毛泽东笑道：“往一个干部的头上压了一万项任务，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发现，下面对许多领导干部采取的官僚主义方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说，在一些地区农民们表达了对大量征税的不满。

对于我提出的如何在朝鲜进行谈判的问题，毛泽东说，今天朝中方面提出了自己新的建议。毛泽东还通报说，昨天也就是5月6日，周恩来召见了印度驻北京使馆参赞（大使当时在上海）并告之，朝中方面在5月7日的平壤谈判中将提出关于战俘问题的第二个方案，并向其解释了这个提议的实质，以便印度政府理解并予以支持。

我对毛泽东提供的信息表示了感谢。

这次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周恩来、使馆参赞 B. И. 利哈切夫

和周恩来的助理马列出席了会谈。

苏联驻中国大使

B. 库兹涅佐夫（签名）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4卷第362页

确认细菌武器报告的真实性是困难的

——库兹涅佐夫致莫洛托夫电

(1953年5月11日)

根据1953年5月7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第1212/487号决议，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瓦西科夫带着苏联政府的指示被派往北京和平壤。

1953年5月11日24时，毛泽东接见了库兹涅佐夫和利哈乔夫。周恩来也在场。

在得知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意在减少揭露美国在中国和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行动之后，毛泽东说，这一行动是在得到在朝鲜和东北的中国志愿军指挥部的报告后开始的。现在要确认这些报告的真实性是困难的，然而，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会再一次对其进行研究。如果发现确实有弄虚作假之处，那么就不应该相信这些来自下层的报道了。毛还说，在和反革命作斗争的过程中，全国有65万人被处死，而事实上，人们并不认为所有被杀掉的人都是有罪的。有相当一些人明显是被冤枉了。

在谈话过程中，可以发现毛泽东有一些紧张，他抽了很多烟，碾碎烟头，还喝了很多茶。在谈话临近结束时，他笑起来，并且开玩笑，平静了下来。周恩来则表现得严肃认真，还有一丝不安。

库兹涅佐夫

文件送：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贝利亚、莫洛托夫、

www.mzdb1.cn

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葛罗米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
中苏关系》第20卷第950页

关于贝利亚事件和王明问题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纪要

(1954年1月4日)

摘自 П. Ф.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4年2月23日

绝密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谈话记录

1954年1月4日

今天在杭州毛泽东的休假地，我向毛泽东宣读了对贝利亚事件的最后判决。在场的还有苏方翻译 B. B. 瓦西科夫（大使馆官员）和师哲（毛泽东的私人翻译）。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他对判决书中的如下部分提出了一些问题：贝利亚在内战中的变节行为，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前和战争中的变节行为以及在斯大林死后的变节行为。毛泽东对关于贝利亚与外国间谍和帝国主义机构的关系也表现出兴趣。毛泽东对贝利亚破坏苏联在资本主义国家情报机构的工作表现出强烈愤慨。

在宣读了判决书之后，毛泽东强调指出，对贝利亚的揭露不仅对于苏联，而且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揭露贝利亚一事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感激。毛泽东认为，揭露贝利亚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形势，毛泽东提到最近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这些现象没有蔓延，但是由于这些现象甚至影响到了中央委员会中的成员，因而不对其引起重视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说，某些人试图使政治局中的一部分委员反对另一部分委员。有些人企图把一些政治局成员的偶然失误或者错误公式化，以此来玷辱这些同志的名誉。毛泽东说：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时刻把保持党的各级组织的团结和凝聚力牢记心头，因为这是完成我党面临的各种任务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正在草拟一份关于党的团结统一的特别文件，它不会公开发表。这一文件将在两或三周内完成。毛泽东说这份文件完成后，他将通知我，让我知道其内容。

接下来，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准备了关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份文件。毛允诺将告知我这一文件的内容。

在讨论中，毛表示了将贝利亚事件的判决通报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和政治局委员的愿望。毛承诺他将以适当的方式将此事通知刘少奇。

当提及判决书中贝利亚在国内战争期间的变节行为时，毛让我注意，在北京从国民党手中解放后，中共获得的档案文件显示，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著名叛徒）早在1920年就被中国的秘密警察收买了。毛还让我注意，1930年王明在上海曾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过。尽管他（王）在当时已经是声名显赫的共产党活跃分子，但竟能设法出狱，同时，一些不那么有名的共产党活跃分子却被国民党处决了。

谈话进行了大约4小时，大使馆官员B. B. 瓦西科夫和毛的私人翻译师哲在场。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 Ф. 尤金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4卷第448页

高岗事件与党内团结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

（1954年3月26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4年3月31日

绝密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

1954年3月26日

根据中央的指示，我拜会了毛泽东，谈到关于召集中国共产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在苏共中央会面，研究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问题，同时向他透露了苏斯洛夫同志信中的内容。我对这两件事情分别做了会谈纪要。

在有关上述问题的讨论结束之后，我正要离开，毛让我再待一会儿，他希望像同志那样跟我谈谈。在我先前对中国的几次访问中，我们也经常这样交谈。

一、他说他在杭州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和疗养。在休假的最后三五天里，他常去爬山。毛泽东说：“在我外出时，他们开始向外散播我有严重的健康问题的谣言，有人说我得了肺结核，还有人说我有心脏病。他们还谣传说，我过世之后，高岗会接替我的职位。不过，你可以看到，我健康得很，离死还差得远呢。”

接着这一话题，他开始谈到高岗。毛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老觉得党内外有什么地方出了点问题。就像一场大地震即将来临前一样，觉察到这儿震动一下，那儿震动一下，但就是不知道震中在哪里。

在去年的6-7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财经问题的会议上，这种感觉尤其明显。不久，在1953年7-9月间，我强烈地感觉到党内存在着两个中心，一个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但是另一个却隐而不现。震动开始变得越来越剧烈。12月24日在政治局内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之后，事情变得明晰起来。现在我们知道这些震动都是从哪儿而来的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地震就不会在其他地方发生。

毛对我详细描述了“高岗事件”的一些细节。他告诉我说，在2月份的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之后，组织了两个委员会，工作了两个星期，最终澄清了大最的事实。一个尤其值得重视的事实是高岗和饶漱石都曾被逮捕过。他们履历中的某些部分以前很含混不清，但是现在清楚一些了。在个人生活上，高岗是个很不检点的人。他有很多女人，其中有几个是敌对分子。现在，中央想弄清高岗究竟和帝国主义者有无联系。很多揭露高岗个人生活的有价值的材料都是他的秘书们提供的。

毛泽东继续说，高岗在因贝利亚一事飞往莫斯科并返回之后，变得异常活跃。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没有对任何人提及苏共中央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即宣扬个人崇拜的危害性和党内集体领导的重要性。另一事件也很典型，从莫斯科回来之后，高岗没有回家，而是立即赶到各省来京出差的党员干部下榻的北京饭店，并在他们中间开展工作。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采用了这一策略来进行其秘密活动：声称拥护毛泽东和林彪，但是首先打击刘少奇和周恩来。毛说：“当然，这并不是针对具体的某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整个党的团结的问题。”

我说，这是分裂分子通常采取的战术，因为他们无力公开反对毛泽东。毛回答说，正是因为分裂分子借他的名义欺骗了很多同志，他才要迅速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否则“党派斗争就会像传染病一样在党内迅速蔓延”。高岗事件暴露之后，绝大多数党员能正确理解党中央的行动，但有些同志会责怪中央的行动稍微迟缓了一些。

接着，毛半开玩笑地说，是毛泽东提议让高岗成为政治局委员，并提名他当中央政府副主席的。现在同志们一方面通过了处理高岗事件的各种办法，一方面询问中央为什么没有及时注意到这件事。毛回答说，显然是因为他自己瞎了眼。于是同志们又问道，既然你眼瞎了，怎么还能工作呢。对此毛回答说，他现在又复明了。在这方面，毛注意到自己在去年年底心情很不好。苏联对贝利亚事件的处理有助于中共中央找到一个揭露高岗反党活动的恰当方式。那时他怀疑高岗在进行反党活动，但还不是很确定，这是他在与高岗交往时保持警惕的原因。

我说，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杭州会议时，当你要求把贝利亚一事通报给政治局成员，却没有提到高岗。毛说，那时中央还没有把事情完全搞清楚。起初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后来决定必须召开一次全会。毛说，他自己现在感觉好多了，因为这些都有利于形势的好转。目前不断有关于高岗的新材料揭露出来，很多细节得到了澄清。最后的决定将会在下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宣布。

我引用列宁的话说，当一个党清除了自己内部的敌人后，它就巩固了自己，目前中共正是处于一个巩固自己的时期。毛说，这并不排除以后还会出现党内分裂分子的可能性。我回答说，只要有阶级存在，就会有阶级斗争，即使在党内也是如此。毛泽东说，外表看来党的一切都很好，但实际上其内部并不一定是这样。

后来，提到高岗是科瓦廖夫的朋友，毛问我是否看过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信。我回答说我没看过，但是斯大林同志跟我说过。毛泽东说，这封信在他的手里，他说会给我看，其中提到的每一件事都是高岗暗示的。信的大意是除了高岗，党中央没有一个好同志。当然，在高岗说中共中央的某些委员有亲美倾向，其他一些委员则有反苏意图时，他是在企图误导科瓦廖夫。很明显，高岗心怀叵测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毛问科瓦廖夫现在在哪里工作，我说，我曾听说他原来是个铁路

工作人员，后来投身政治，我不太清楚他的情况。他在中国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参加谈话的师哲说，他现在可能是煤炭部的副部长。）

二、然后，毛泽东对我谈到了中央的组织工作。他告诉我，目前他很少处理日常事务，而是交给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去处理。这些同志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会向他征求意见。这样的话，一方面提高了每一位中央委员的主动性，另一方面，也使他自己能抽出精力来研究和准备最重要的问题和决定。经验表明这种组织工作的方式能达到最佳的效果。毛评论说：“在杭州的最后两个月，我干的事情远比在北京被日常杂务缠住时要多。”毛泽东说，在那段时间他编写了以下文件：

（1）关于中共中央工作的一个文件；（2）在中央2月中央全会上关于党的团结的一个决议；（3）周恩来关于高岗事件的一篇文章；（4）有关中央2月中央全会的新闻稿；（5）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草案以及其他一些文件。毛接着说，最近中央开始推行一种新的做法，毛或者政治局其他委员起草的文件可以交给一些中央委员会领导同志联合审议。这种工作方法效果很好，也得到了政治局委员们的赞同。毛继续评论组织工作，并笑着说：“我们已经把中央的年轻同志放到了第一线，我退居第二线。这就像打仗的时候，如果敌人突破了第一道防线，居于第二线的同志就会冲上前来坚持战斗。”……^①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5卷第39页

① 所收集的档案原文至此中断。

中苏协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

——毛泽东与瓦西科夫谈话纪要

（1954年7月5日）

摘自 B. B. 瓦西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4年8月27日

绝密

今晚7时，根据中央的指示，我拜会了毛泽东同志。我通知他说，苏共中央认为，利用法国有利形势的发展来找到一个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必要的。在这次接触中，（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同志将在7月7日抵达日内瓦，计划在正式会议开始之前会见（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我还通知他，苏共中央的意见是，如果周恩来同志能在7月10日之前到达日内瓦，那将是很好的。我还告诉他，通过苏联驻巴黎和伦敦的大使馆，法国和英国的外交部长将得到通知，B. M. 莫洛托夫将在7月10日之前抵达日内瓦，以便在正式会议开始之前休息几天。

毛泽东说，他认为我们利用法国正在改善的形势来寻求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是绝对正确的。同时，他告诉我，周恩来正在柳州（广西省）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和武元甲进行磋商，这次磋商在7月5日应该有个结果。情况好的话，周恩来可能不早于7月6日或7日回到北京，他能在7月9或10日从北京抵莫斯科，这样，他实际上只能在7月12日或13日到达日内瓦。

随后，在谈话中，毛谈到（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最近结束的会晤。毛说，他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一篇从7月

3日的《真理报》上翻译过来的针对这次会晤的文章。毛指出，尽管美国政府正在关闭同苏联和其他民主阵营国家的谈判大门，然而英国政府却表示它赞成这些谈判。自诩为反共老兵并立下了功劳的丘吉尔，也仍然对美国人宣称他是赞成与共产主义者谈判，赞成与共产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毛以嘲讽的语气评论说，显然，国际形势是这样的，就连像丘吉尔这样的保守反动人物也开始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交原则了。

至于美国，毛继续说，他们已在全球扩展了他们的势力，但是，如果发生重大的国际纠纷，对他来说也不好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试图借助他的侵略政策去重新武装西德和日本。然而，考虑到这两个国家和其他的国家，尤其是法国对美国政策的抵制，指望西德和日本对美国来说也是靠不住的。

在会谈期间，鉴于我的通知，毛泽东同志把周恩来7月4日从柳州发回来的电报交给了我（我已经把译好的电报电传到莫斯科去了）。这次谈话是在毛泽东的住所进行的，持续了30分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苏联驻华使馆一等秘书И.И.萨夫罗诺夫也参加了今天的会谈。

B. B. 瓦西科夫（临时代办）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5卷第81页

中国的思想教育和对外政策

——毛泽东与尤金会谈纪要

（1955年1月8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1月19日

机密第2份

1955年1月8日与毛泽东同志的谈话纪要

今天我拜会了毛泽东同志并向他递交了通过外交邮件寄来的一封信。毛泽东同志接过公函，立即拆开，通过翻译师哲简要地了解了公函的内容。（公函说的是列宁逝世纪念日纪念活动程序）。他请求今天转告苏共中央，感谢给寄来消息。

然后举行了会谈，毛泽东同志说，对于他们来讲，面临的最迫切的就是党员干部与非党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教育的问题。他说，中国大约有500万知识分子：其中100万是党员干部，150万是小学、中学和大学教师，100万其他范畴的劳动知识分子是文学家、艺术家、建筑师、记者等。大部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都很少。他们的脑子里完全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还在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受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在中国宣传美国意识形态的主要人物是胡适，他直接继承了美国哲学家杜威的主观唯心主义，顺便说一句，杜威1920—1922年生活在中国，在许多大城市讲过学。

中国现在胡适的继承人是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者、文学研究专家俞

平伯。至今还有众多知识分子处在他的影响之下，甚至党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处在他的影响之下。例如，党的文艺报编辑部完全站在俞平伯一边。一部分中共中央机关干部也站在他一边。站在他一边的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和共产党员教育家。

中共中央客观地分析了思想战线的形势，认为这种现象不正常，当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唯心主义者公开进行自己的宣传时，许多党的干部尾随其后。中共中央制定了计划，准备在科学、艺术、文学整个基本方向上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我们打算，毛泽东同志说，用一年的时间，天天在报刊上积极地系统地揭露资产阶级思想，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认为，他说，我们能够认真地揭露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表现，揭露各种科学之中的其中包括自然知识中的唯心主义。在这一斗争中，培养和提拔年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如果不在知识分子中肃清资产阶级思想、肃清历史唯心主义，不做大量工作使广大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原理，那我们便不能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便不能带领全体人民克服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社会主义只有在党内、广大群众中树立起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科学原则的时候才能建成。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使资产阶级和它的思想在党员的心目中和人民群众、非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名声扫地，即使不能做到彻底，至少也得使其极大地名声扫地。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我们在同资产阶级的较量中，我们取得了诸多成绩。如果需要，在某些方面我们还将继续下去。毛泽东同志说，最近他到过上海、长沙等一些城市，同工人进行了多次谈话。在工人眼里，比如私营商贩已没有声誉。工人不相信他们，说私商欺骗他们。与此同时，工人相信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在一些省份的零售贸易中，国家和合作社占70%，私商仅占30%。这明显是超前行为。我们认为，必须限制一下国营零售贸易的增长，否则我们就不能完全满足居民的需求，挤压私人工商业者，此外，急

剧收缩私人贸易还会导致失业。

会谈中还涉及党的干部的经济知识教育问题。毛泽东同志说，现在他正在研究，在政治经济学和一般经济问题方面，在他们的报刊上已写过些什么和正在写什么。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他说，如果我们党的干部和经济干部能够掌握经济知识，能够自觉地管理和领导经济。关于党的干部的经济知识教育问题，我们将专门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讨论。我们很快就将译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予以付印，初版300万份。该教科书我读过一部分，毛泽东说，从我读过的这部分看，这是一本较好的教科书，它将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

接下来毛泽东谈到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总理的雅加达会议。他说，会议开始有很大分歧。印度和缅甸代表发表意见赞成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会议，巴基斯坦和锡兰的代表则坚决反对，而印度尼西亚的代表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毛泽东同志说，在五国会议上，吴努坚持了很好的立场。他说，如不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那缅甸也不参加这一会议。会议休会，休息期间印度尼西亚代表给巴基斯坦和锡兰代表做了积极的工作，同他们商定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

我说，吴努访问北京期间，中国同志们给他做了大量工作。这使缅甸政府的立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接近中国。毛泽东同志回答说：“是的，我们消除他对中国和苏联的疑惑和偏见。”

然后毛泽东同志说，他们，中国的朋友们赋予亚非国家会议以很大的意义。这次会议应大大降低美国在亚非人民之中的威信。美国人害怕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将进一步孤立美国，尤其是在亚洲国家中。他们（美国人）将千方百计破坏亚非国家会议。大概，巴基斯坦和锡兰将帮他们的忙。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朋友们决定在亚非国家会议采取这样的立场，即不把自己打扮成会议的领袖，而仅作为会议的参加者。我们建

议尼赫鲁和吴努应充当会议领袖的角色。这从削弱美国破坏这次会议的立场的观点看是有益的。毛泽东同志指出，美国在亚洲的立场是大大削弱了。美国现在威胁中国，说要封锁中国沿海，对中国发动战争，等等。但是美国人封锁我国沿海不像朝鲜战争时那么容易。现在他们这样做要困难得多，这是因为日本开始采取或多或少比较独立的立场，不希望封锁中国，日本想同中国通商，想从美国的压迫下挣脱出来。如果再考虑到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都采取独立的立场，不希望美国在他们国内占据统治地位，那便十分清楚，不仅美国，而且英国在东方的地位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大大削弱了。

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批评了哈马尔舍尔德^①，说他是美国的走狗。看来，他（哈马尔舍尔德）前来的目的是不想同我们达成任何东西，而是反对中国，进一步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现在，毛泽东同志说，哈马尔舍尔德表现得很不好，带有挑衅性。也许，以后他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只能是在以后而不是现在，才有可能回到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问题上来。

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说，说实在的，中国对美国承认中国和随之而来的现在加入联合国，兴趣不是太大。这些问题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明白，他说，中国进入联合国和美国承认中国有许多明显的好处，但我认为，美国现在不承认中国也有不少好处。这可以给我们自由，以反美的精神教育我们的人民，为在我国消灭剥削阶级做充分准备。如果美国再有8-10年不承认中国，那我们在这段时间将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础。苏联当年比现在中国所处的形势还艰难。美国是在十月革命之后16年才承认苏联的，然而苏联并未因美国不承认而灭亡，而是在这段时间里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

会谈中谈到了前不久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谈到美、英、法采取了准备原子战争的方针，因此展开了原子战争的宣传。毛泽东

① 哈马尔舍尔德，时任联合国秘书长。

同志从美英做反对社会主义阵营战争的准备的角度的详细分析了他们的形势。他说，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形势下不稳定。此时，在东方，他们没有日本不能进行战争，而日本尚未做好战争准备，而且现在它也不想同中国和苏联打仗。在西方，没有德国，帝国主义分子也不能发动反对我们阵营的战争，而德国也没做好战争准备。此外，像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形势也不稳定，摇摇欲坠。同时，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帝国主义分子当然知道这一点并非害怕我们。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每日都在颠覆着帝国主义分子的力量，国际共产主义成了巨大的力量。这一事实不是偶然的，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国会会议，没有一次资产阶级国家代表会议不是大骂特骂共产党员。没有一张资产阶级报纸不在天天咒骂共产党。这一切，毛泽东说，表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国际帝国主义分子害怕我们。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毛泽东同志说，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分子大肆叫喊原子战争是想以此掩盖自己的虚弱。他们想以叫喊原子战争恐吓本国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但是关于原子战争威胁的这种叫喊应该通过共产党的努力反过来反对帝国主义分子自身。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根本不害怕战争，原子战争的威胁反而会进一步激励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反对战争贩子。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将派郭沫若同志前去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扩大会议。

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会谈时在座的有师哲同志和 T. Φ. 斯克沃尔佐夫同志。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И. 尤金（签名）

关于党的代表会议和南斯拉夫等问题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纪要

（1955年3月8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3月12日

绝密

我今天拜会了毛泽东同志，在询问和回答了一个协议中的用词之后，我向他通报了关于1955年4月22日举行纪念列宁诞辰85周年的指示，在提到苏共中央主席团所有成员都将为这个纪念日写文章之后，我说，中央恳请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写文章，并在《真理报》上发表。

毛泽东欣然同意写一篇文章，并说文章的题目可能会是“列宁与中国革命”，大概有6000或7000字。他谈到，他将在4月中旬动笔。他最近无法动笔，因为他在整个3月的后半个月都将忙于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谈到这次大会，毛泽东告诉我，将会从各省、地区和市级党组织中选派约300名代表参加。正如毛指出的那样，这次会议的意义将和党的代表大会一样重要，会议将讨论诸如五年计划和高岗—饶漱石事件这样一些重要问题。1945年以来还没有召开过党的代表大会。根据党章，代表大会应该每三年举行一次。事实上，党章允许代表大会可以根据形势需要提前或推迟举行。在1948年举行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仍在同国民党进行艰苦的斗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些紧急重大的事情也使得代表大会没有机会召开，

如国家重建工作，朝鲜战争，制定及修改五年计划，等等。下一次（第八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将在 1956 年召开。今年的这次会议上对高岗—饶漱石问题做出决议，将会减少在 1956 年代表大会上的讨论。在这里，毛泽东暗示说，高岗可能曾和贝利亚阴谋串通，贝利亚的代表曾来到东北并与高岗会过面，而高岗没有向中共中央提起这件事。毛泽东还说，高岗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联系过，他将严肃地调查这个问题。

谈到 3 月 12 日是孙中山逝世 30 周年时，我说《真理报》的主编谢皮洛夫同志很想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怎样纪念这一天。毛泽东说，计划在这一天大力进行宣传纪念活动，如各城市将举行集会，报纸上将刊载文章。毛泽东说，如果我认为有必要知道关于这个问题更详细的情况，我应该去找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

毛泽东回想起前一段时间我表示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的斗争问题很感兴趣。他说，我应该就这事和陆定一同志谈一谈。我回答说我已进行过这样的交谈。他说，他要交给我们三个中央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为反对唯心主义、宣扬马克思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协调粮食供应紧急措施的指示），他请我转交苏共中央。

毛泽东告诉我们，政治局已经讨论了苏共中央关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政府因巴黎协议（大概是指 1954 年 10 月的巴黎协议，这些协议恢复了西德的独立主权并为西德加入北约铺平了道路）所采取的措施的信。他说，所建议采取的措施是及时的、正确的和必须的。他还谈到了这样的立场：如果不得不再爆发一场战争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接受这一事实。在随后的几天里，中共中央将会对苏共中央的来信和这个条约草案给一个书面答复。

毛泽东还谈到苏中共中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信，他说，苏共中央已经对南斯拉夫事件做出了正确的分析，他是充分同意这个分析，

他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和其他人正在像托洛茨基分子一样行事，总是高喊他们支持列宁，却反对斯大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只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而不认可斯大林。在卡德尔的演讲中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纯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

毛还说，他已经形成坚定的看法，在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是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对待它必须基本上像对待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对铁托和卡德尔是不可能信任的，他们已经把自己和帝国主义国家牢固联系起来。当南斯拉夫人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决裂的时候，我决不会赞同他们。即使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如此对待国际共产主义组织，那么我们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就只能被抛弃。

在这里，毛提到了列宁与第二国际和考茨基的关系的问题。毛泽东说，只是在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投票支持战争以后，列宁才最后与第二国际决裂。尽管考茨基犯了很多错误，列宁也批评过他，但是，列宁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仍然把他看作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而没有与他决裂。

毛泽东说，关于南斯拉夫问题，中共中央已经写了一封信通告各级党组织。他说，我们慎重地谈到了可能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和解。在信中我们还写到，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将取决于南斯拉夫人在愿意同苏共、中共和各人民民主党和解的道路上走多远。

关于停止指控（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苏共中央在这个事件采取的做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在会谈中提到了考涅楚克与瓦西列夫斯卡娅同志访华问题以及他们即将访问新德里和出席和平大会。听到考涅楚克的名字，毛泽东想起他的剧本《前线》，并说，剧本第一次在中国上演的时候，那是

在延安，这个剧本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中国同志帮助很大^①。他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里的旧军官当中，仍然有一些刚愎自用的人。因此已经下达了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可能的地方都组织上演这个剧本。毛泽东说，他愿意在考涅楚克和瓦西列夫斯卡娅从印度返回后与他们一起观看这部电影。

师哲和 Т. Ф. 斯克沃尔佐夫也出席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 Ф. 尤金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5卷第281页

① 《前线》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考涅楚克1942年8月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剧本。主要剧情：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思想守旧，居功自傲，刚愎自用，最后由熟悉现代战争规律的年轻军长奥格涅夫取而代之。该剧得到斯大林的肯定，公演后在当时苏联军队中和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

再次访问苏联和准备召开党的八大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纪要

（1955年3月30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4月7日

与毛泽东同志1955年3月30日谈话纪要

今天我拜访了毛泽东同志。我们的讨论是从一些礼节性的寒暄开始的。毛泽东抱怨说，因忙于党的会议^①，他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他累坏了。他说，在会上他不得不听很多人的发言。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开这样的会议了，所以他必须听每一个人的发言。他说，我们正在考察干部，这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毛泽东说，我想要到南方去休息两三个星期。

接着，我说有一封苏联共产党给他的信件，并把赫鲁晓夫的信交给毛泽东，信中邀请毛到苏联去过1955年的五一节。他很快了解了信件的内容，然后说，政府里的一些情况可能让他无法在今年接受邀请。在这一问题上，他还提到在他和赫鲁晓夫同志讨论访问苏联问题时，访问的时间并没有确定。我回应说，苏联代表团来华访问并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其政治意义是异常重要的；毛泽东访苏的政治意义同样十分重要。毛泽东同意这一点，但再次说国内事务可能会妨碍他访问苏联。他请我不要误会，认为他不想接受这个邀

① 指1955年3月2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请，并补充说，访问苏联的问题会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上讨论，最后的决定会通知我们。毛泽东说，他很想借访问苏联的机会，在苏联一些地方旅行——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列宁格勒，然后从摩尔曼斯克到苏联的南部城镇。而且，在他离开苏联后，他还想要访问欧洲的人民民主国家。

回到正在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问题上，毛泽东说，会上对高饶事件和五年计划草案的讨论非常活跃。

我问他，会上是否有反映高岗和饶漱石看法的观点。毛泽东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条件。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落后，由于缺乏适当的通讯手段，不同的地区之间彼此隔绝。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条件与俄国差别非常大。在俄国，革命在大城市爆发，由于大城市有工业无产阶级，这就为共产党提供了最容易取得成功的条件。但是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出现后，被迫在乡村开展基本的工作。人民解放军是在乡村建立的，它的干部基本上来自农民，也有一些来自旧军官。那些在各自封闭的地区一直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人们，开始彼此接近；在他们中间滋生并发展出一种派别或家族的观念。在人民解放军进入大城市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由很多这样的派别构成，而且这些派别中有很强烈的狭隘地方主义情感。这些地方主义情感致使少数派别开始抗拒中央委员会。张国焘集团反抗中央委员会就是这样的一种抗拒，类似的情况还有李立三和王明的无原则派别。甚至在国民党被赶出大城市而解放军进入大城市以后，派系之间的联系仍然保留下来。这些派别已经习惯于自治性更强的农村地区，在解放军进入大城镇后，中央委员会开始试图对此进行控制，他们就表现出不愿接受中央的控制。这种情况发展得如此过火，以至于那些彼此相互支持的人在宴会上或其他集会上，从他们所属派别的立场出发，可以谈论关于本派在党内的地位等广泛的问题。如果不属于该派别的人在集会上出现后，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就会立刻停止。

高岗、饶漱石和其他一些在内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指使那些来自解放军的党员（当时这部分人在党内占绝大多数）来反对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党员。高岗和饶漱石并不把在国统区工作过的党员视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把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一些人归入此类。根据高、饶的划分标准，我本人也不应该被视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我开始做党的工作时也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

进城以后，那些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很好武装的党员，被城市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倒。这些人丧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观点，滑入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这些人很多是嘴上高呼斯大林和毛泽东，但实际做的是反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事。在革命时期，这种人还可以同党走在一起，但以后他们就离开了革命阵营。这就是在高岗和饶漱石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毛泽东说，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已开始认真地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教育干部，所以我们党才会基本上保持团结。虽然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取得一些成效，但是还远远不够。目前召开的会议对我们很有好处。我们不仅正在考察和评估这些干部，而且利用这次会议来教育我们的干部，以期在建立一个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真正团结的党的问题上取得进一步的成效，并克服种种自治和狭隘地方主义的倾向。

毛泽东还谈到，即将举行的 1956 年党的代表大会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一点，他说他必须尽最大努力为代表大会做好准备工作。他说，由于政府各级机构的组织工作，事情进展很顺利。虽然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可他做的事情并不多，因为有任劳任怨的国务院在开展各种实际工作和治理这个国家。

毛继续说，目前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层是很久以前选出来的，主要是由军人构成的。在即将到来的党代会上，考虑到党和国家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将需要认真考虑选举新的领导层。毛泽东说，我可能再

次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但我们得找到一些可以领导党的人，这些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取代我的主席职位。可能我们将不得不选举一位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或者设置党的总书记的职位。

谈到了过去5年来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我提到，中国共产党在所有领域里取得的巨大成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她可以使用以往任何中国政府所没有用过的语言来和美国人谈判，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和力量，激发了印度、缅甸和印尼在处理与帝国主义国家关系时的勇气。

毛泽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帝国主义的正面交锋，这可以让印度、缅甸和锡兰不至于卑躬屈膝，而是挺直腰杆”。那些促成并召集亚非会议的国家并未提到要与共产主义抗争，反而提到要反抗帝国主义，这个事实准确地反映了上述说法。

我补充说，这些国家没有什么理由害怕共产主义。在进一步的会谈中，我口头转达了赫鲁晓夫同志3月12日信件的内容。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意见表示赞赏。

想起我们曾经在一次会谈中讨论过写一篇文章来庆祝列宁诞辰，毛泽东说，很可能他不能写了。我告诉毛说，我已经向苏联共产党报告说他同意写这样一篇文章。毛泽东问，能否让刘少奇来写这样一篇文章。他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有一篇文章来庆祝列宁诞辰，但至于让谁来写则会由中央委员会讨论，而且他会告诉我们。

师哲和 T. Φ. 斯克沃尔佐夫出席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 Φ. 尤金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5卷第307页

胡风、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纪要

(1955年5月25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6月17日

绝密

与毛泽东同志会谈纪要

1955年5月25日

今天我拜会了毛泽东同志，向他转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5月23日给参加共产党情报局的各党中央委员会信件的文本。毛泽东对这封信和来自苏联的建议表示赞许，他说，这些措施是原则性很强的，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对苏共中央委员会送来上述信件表示感谢。

在随后的会谈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一些党内性质的问题。关于反动人物胡风的行为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很清楚，胡风是反动地下组织的核心人物，该组织曾经获得来自国民党或日本秘密机构的支持。毛泽东说，胡风1925年领导北京的共青团组织，同年，胡风告诉北京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陈毅说，他从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原因是，这份工作困难很大，也很危险。那时，胡风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张荫达。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胡风与云南军阀的部队在一起。这些军队名义上都是蒋介石的部下，但实际上他们在云南省独立行动。在那里，胡风负责政治工作，身居云南部队政治指挥部门要职。国民党两次逮

捕过胡风，不过他很快便重获自由，他对此解释说是他逃了出来。在日本政府严厉压制进步势力和人士的那段时期（1928-1937年），胡风在日本。在那个时候，日本政府并没有压制日本作家白桦子（中文发音）——现在是中共中央委员易边（中文发音）即胡风的妻子。毛泽东暗示，在这个时期，胡风可能参加了国民党或日本的秘密机构。

目前对胡风的斗争以及由中国共产党有关机构对他展开的持续调查表明，在一些责任重大的领域工作，胡风过去有、现在还有他的代理人。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他的支持者，他的一名主要顾问在北京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系当副主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一个主编也是他的支持者。在中国的一些主要城市（如上海、杭州、西安、重庆等），他都有代言人，这些人过去（现在仍有一些）在党政机关或文化战线工作。据我们估计，在胡风的比较有名的支持者中，有200人是中共党员，但肯定还有其他一些人。胡风及其支持者控制着一部分知识分子，比例可能达5%。在我们呼吁胡风的支持者承认错误，站到党一边时，他们沉默不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到现在还在保持沉默。胡风的一些不寻常的支持者，在党的面前认罪后，却跑到胡风那里忏悔，声称他们的坦白认罪是错误的。毛泽东说，一个人应该这样做：或者融入党内，或者自甘堕落。对此他提到，在最近党员干部的坦白中，有35万党员（在700万中共党员中）被审查出有罪，他们反党反人民，道德败坏，或受某野心和其他动机驱使而入党等。然而，党内仍存在一小撮这种类型的人，与他们的斗争正在展开。所有的这些证明这一事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阶级斗争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毛泽东说，我们正在利用胡风及其支持者的例子来教育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

毛泽东进一步谈到高岗和饶漱石反党集团。就这个问题，毛泽东说高岗和饶漱石在反党行径中采取两手策略。高岗这人没有道德，企图夺权。高岗在他的支持者中说，毛泽东周围已产生两个不值得信赖

的集团：一个是由刘少奇领导的，包括薄一波、李富春、刘澜涛、安子文和其他一些人；另一个则由周恩来领导，包括很多人。另一方面，高岗却说，要公开反对这些集团来捍卫毛泽东。

毛泽东说，高岗一周之内举行8次晚场舞会：什么时候他想要跳舞，他就下指示召集女人。毛泽东提到高岗在政治上非常无耻。他说，高岗与一个幕后人物张明远关系密切，高岗让张明远作为他和沈阳总领事之间的联系人。张明远于1926年被开除出党，但在高岗的坚持下，张重新获得党的认可，并进入党校接受再教育。在东北解放后，张被高岗调到沈阳，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

毛泽东说，高岗在捷沃相同志访问中国期间，寻找各种手段要参加捷沃相同志访问东北的行程，尽管当时中央已经派李富春陪同捷沃相同志。由于李富春感冒病倒，高岗得以与捷沃相同行前往东北。我回应毛泽东说，我也与捷沃相同志前往东北，可在行程中，高岗只和我们谈过两次话，谈话主要是关于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组织问题，高岗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手段接近我们。

毛泽东提到高岗与捷沃相同行这个问题后，明显暗示高岗想要亲近到中国访问的苏联政府要员，以便从他们的口中获取信息。

毛泽东说，饶漱石曾经从事地下活动，为国民党和外国秘密机构服务，而同时在党的面前假装忠诚。潘汉年与美国的、日本的和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有联系，饶漱石就插手任命他做上海市副市长和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饶漱石、杨帆和潘汉年共同领导了一个反革命组织。潘汉年向蒋介石集团通报一切情况。一些相当重要的资料于1950年1月至2月送到台湾。苏联的一个空军师抵达上海地区的消息就是由潘汉年传给台湾的。在潘汉年的要求之下，国民党的飞机于1950年2月6日空袭上海。蒋介石被赶出大陆以后，由于潘汉年为蒋介石集团所做的贡献，他四次获得蒋介石的授勋。关于这些授勋的档案文件以及其他证据已经掌握在中国相关部门的手中。

毛泽东说，1953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极为困难的一年。他讲到，在离开杭州前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1953年12月24日）上，中国共产党有两个指挥部，其中一个行动公开、为克服困难奋战；而另一个指挥部则行动诡秘，利用困难向正式的指挥部——党的中央委员会发难，并散布各种谣言。据毛所说，当时他并没有点出该地下“指挥部”领导人的名字，但在那次会议上，高岗和饶漱石显得十分沮丧。如毛所说，当他们听到宣读贝利亚反党行径的资料时，垂头丧气。

转到国际问题上并提到梅农^①访问北京一事，毛泽东说，在梅农访问北京10天的过程中，梅农谈论到中美就台湾问题直接谈判的问题。梅农会见了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政府官员。根据预先商量好的，中共的政府官员向梅农做出了一些完全不同的回答。一些政府官员给梅农的答复让他感到很乐观，而另一些人的答复则让他感到十分悲观。比如，朱德就宣布“如果美国人想要战争，那我们将奉陪到底”，这让梅农战栗不已。中方向梅农讲述了中方在中美直接谈判的态度问题上的一些大体情况。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所有有意充当中间人的国家得知了告诉梅农的一切，那么其他国家可能会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除了印度，那些有意充当谈判中间人的国家有英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梅农被告之，印度将被优先考虑作为谈判的中间人。毛泽东说，接受了这一任务的印度人甚至不会把他们在北京听到的一切告诉英国人。毛泽东提到，（英国首相）艾登自己想从新加坡赶到中国作中美谈判的中间人。但是，在曼谷会议后，中国在对艾登访问北京的提议的回复中，故意说艾登可能拒绝来华。中国政府给出这样的答复，主要是因为这个事实：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政府的立场几乎完全一致。而艾登从新加坡和从伦敦（从新

① 指时任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克里什南·梅农。

加坡返回到英国后) 分别发给中国的两封信中, 基调彼此相差甚远。从新加坡发出的信件中, 艾登恫吓中国, 声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可能导致战争; 而从伦敦发出的信中则没有这样的恫吓。目前, 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还是有点差别的。

毛泽东还谈到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飞往北京的事。他说由于担心在香港引起众怒, 印尼总理没有在香港停留而直接飞往广东。

此次会谈持续两个多小时。师哲和 T. 斯克沃尔佐夫出席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 尤金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5卷第353页

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

(1956年3月31日)

摘自 П. Ф.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4月5日

第289号

绝密文本第1号

与毛泽东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6年3月31日

今天我拜访毛泽东，并向他转交了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苏联提供援助的信函：一是援建51项工程和3个军事工业科学研究所；二是援建乌鲁木齐至苏中边界铁路段。毛泽东请我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转达他的深切谢意。

接着我说，回到北京后的头几天，我就想拜见他（毛泽东），陈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工作，特别是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毛泽东回答说，因为有病，他不得不推迟了同我的会见。毛泽东说，中共出席二十大的代表团成员曾向他谈过一些关于二十大的工作情况，并带回一份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现在这个报告已经译成中文，他已了解报告的内容。在谈到斯大林的错误时，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路线虽然基本正确，但在个别时期，他（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在1926年，斯大林在自己的讲话中过分夸大了国民党的革命能力，把国民党说成是中国主要的革命力量。在1926年，斯大林指示

中国共产党人要依靠国民党，把国民党看成中国革命力量统一战线中的一员。斯大林说，应该依靠国民党，跟随这个党，直截了当地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应服从国民党。这是一个大错误，它束缚了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把群众吸引到共产党方面来的独立工作。

毛泽东继续说，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共产国际实际上的领导人，他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这些错误的和不正确的指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斯大林不考虑中共中央的意见。在那个时候，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经常与斯大林会见，并片面地向他报道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斯大林显然认为只有王明是中共中央意见的唯一表达者。

在共产国际中代表中共的王明和李立三，企图把中共的全部领导权集中到己手里。批评王明和李立三错误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被他们看作机会主义者。毛泽东说，我被他们称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狭隘经验主义者。作为共产国际不正确对待中国共产党的实例。毛泽东援引了以下情况：

中共六届三中今会在讨论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时，没有将对这些错误的彻底批判进行到底，以此为借口并据说是为了纠正中共三中全会的错误，过了3-4个月，共产国际将两名工作人员——米夫和王明——派到中国，其任务为召开中共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然而在米夫和王明的压力下通过的中共四中全会的决议，比李立三的路线更“左”。其中讲到要进攻大城市，夺取大城市，不要为争取农村地区而斗争。例如，在中共四中全会的决议中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即在国民党封锁的中国苏区，甚至消灭了小商业资产阶级，停止了一切内部贸易。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在1929年有30万战士的中国红军，到1934-1935年减少到25000人，而中国苏区的土地减少了99%。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的组织遭到国民党的破坏，党员人数由30万减至26000人。苏区同国内其他部分完全隔绝，没有任何商品，甚至没有盐。所有这些引起苏区居民的极大愤慨。

由于王明的“左”倾政策，中共领导下的大一点的地区基本上在中国北方（陕西省、甘肃省、宁夏省）保存下来，因为王明的影响还没有扩展到那里。王明以共产国际为掩护，实际上力求八路军和新四军脱离中共中央的领导。

王明及其追随者把国民党当作“新生力量”，它吸收一切精华，能够战胜日本。他们反对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政策，反对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和革命基地，反对把所有各阶层的居民联合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周围。

王明分子企图以自己的六点方案取代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革命的十点方案。这个六点方案的作者是王明，不过这实质上是个投降方案。在推行这种政策时，王明总是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义为掩护，以头号权威自居。王明分子利用他们控制着武汉中共中央南方局多数这一点，向军队和地方发出不正确的指示。毛泽东说，例如有一次让我们感到吃惊，甚至在延安，按照王明的命令，把挂在墙上的共产党的标语口号，换成了“和国民党结成牢间联盟”之类的口号。由于中共七大之后，特别是随后4年来严肃的思想斗争和大量的解释工作，大多数犯过“左”的或右的错误的共产党员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也写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然而以后他又回到了自己的老立场上。毛泽东说，过去王明所有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活动，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

毛泽东从整体上评价共产国际的活动时指出，列宁在世时，共产国际在团结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方面，在建立和巩固各国共产党方面，在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方面，发挥了卓越的作用。然而这是共产国际活动的一个短暂的时期。后来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等之类的“活动家”来到共产国际，他们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信任王明胜过信任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最后一段工作时期，特别是季米特洛夫在那里工作时，有了某些改进，因为季米特洛夫依

靠我们和相信中共中央，不相信王明。然而，即使是在这段时期，共产国际也犯了不少错误，如解散波兰共产党等。毛泽东说，这样看来，共产国际的活动可以分出三个时期，其中第二个时期最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最大。然而遗憾的是，正是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最关注东方。毛泽东指出，可以坦率地说，当时中国革命的失败，除了其他原因外，也是共产国际不正确的、错误的活动的结果。毛泽东指出，因此，坦白地说，得知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是满意的。

毛泽东接着说，在以后一段时期，斯大林也不正确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他仍然相信国民党的力量胜过相信共产党的力量。在1945年，他坚持主张与蒋介石分子讲和，坚持主张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坚持主张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特别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不知为何以“联共（布）”名义发来（实际是斯大林发来）的秘密电报，电报坚持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原本反对前往，因为预料蒋介石会挑衅。毛泽东说，但我不能不去，因为这是斯大林的坚决要求。在1947年反对蒋介石集团的武装斗争的关键时刻，在我们的部队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却坚决主张同蒋介石缔结和约，因为他对中国革命的力量抱有怀疑^①。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也就是革命已经胜利以后，在斯大林心里仍然保留着这种不信任。斯大林的不信任和怀疑态度可能是由南斯拉夫事件引起的。毛泽东带几分气愤地说，更有甚者，当时有许多议论，说什么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南斯拉夫道路，什么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

我对毛泽东说，在我们党内不曾有过这种情绪和这种议论。

毛泽东继续说，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左翼社会党人，鼓吹“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的说法，而且大加吹捧，毛泽东指出，斯

^① 原文如此。斯大林向毛泽东通报的是苏联不同意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的意见，时间是在1949年1月。见本书第55页开始的“再次和谈”部分。

大林当时显然不相信我们，而资产阶级和工党党员对“中国的南斯拉夫道路”抱有幻想，只有一个蒋介石为毛泽东“辩护”，叫嚣资本主义大国无论如何不要相信毛泽东，说“他不会偏离自己的道路”等等。蒋介石的这种举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太了解我们，他和我们不止一次打过交道，而且与我们作战。

毛泽东接着往下说，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也表现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我们去莫斯科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我们：苏联会不会和新中国签订条约？为什么时至今日和国民党的条约在法律上继续存在？条约问题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发展前景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毛泽东说，在与斯大林第一次交谈时，我提出以国家名义缔结条约的建议，而斯大林避而不作答。第二次交谈时，我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并给斯大林看了中共中央有着同样的关于缔结条约的要求的电报。我建议为了签订条约将周恩来召至莫斯科，因为他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却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他说，“那样做不妥，因为资产阶级报刊将会大肆宣扬，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在莫斯科”。后来斯大林回避和我的任何会见。我这一方面曾试图打电话到他的住宅与他通话，但回答我说斯大林不在家，并建议我会见米高扬。毛泽东说，所有这些令我很不高兴，我决定再也不做什么，并在别墅里权且度日。后来发生了与科瓦廖夫和费德林的不愉快的谈话。他们建议我去国内游览。我断然拒绝了 this 建议并回答说，我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

毛泽东继续说，过了一段时间，有人把经斯大林签署准备交付报刊发表的我答记者问的草案透露了出去。这份文件报道了在莫斯科正在进行有关缔结中苏条约的谈判。这已经是向前迈出的重大的一步。毛泽东说，可能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在改变斯大林的立场上帮了我们，他们于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以后，开始了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贝利亚参加的

谈判。在谈判时，按照斯大林的提议，他们试图让中长铁路归苏联独家拥有，然而，结果通过了共同经营中长铁路的决定。此外，中国向苏联提供旅顺港海军基地，在中国开设4个合营公司。毛泽东说，按照斯大林的提议，东北和新疆实际上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坚持要求这两个地区只允许中国人和苏联公民居住。其他外国的代表，包括长期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捷克人、波兰人和英国人，应该从那里迁移出去。斯大林唯一避而不谈的是朝鲜人，他们在东北有150万人。斯大林的这类贪婪令我们不能理解。所有这些都给资产阶级报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提供了口实。毛泽东继续说，实际上在谈判过程中，围绕这个条约进行了真正的交易。这是一种很不光彩的做法，它鲜明地反映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和怀疑。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很高兴中长铁路和旅顺港归还了中国，合营公司也不复存在。在谈话的这一部分毛泽东着重指出，赫鲁晓夫没有参加这些谈判，布尔加宁也极少参加。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一系列其他问题上。其中包括科瓦廖夫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反苏情绪的那份臭名昭著的文件。斯大林将这份文件转给中共中央，显然是想强调自己的不信任和怀疑。

毛泽东说，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对我们的不信任，因此我要求派一名苏共中央的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到中国来熟悉中国的真实情况，了解中国理论家的著作，同时也审阅毛泽东的著作，因为中国出版的这些著作事先未经作者审阅，而苏联同志不顾作者的意愿，坚持要求将它们出版。

毛泽东提醒我，当我（尤金）来到中国时，他曾坚定而特意地建议我在全国旅行一次。就此我向毛泽东叙述了从中国旅行归来后和斯大林的一次谈话，当时在场的有几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当时问我，中国领导同志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听到我的肯定回答后斯大林说：“那就好！可以放心了。他们自己成长起来而没有依靠我们帮助。”

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表现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不信任。看来，使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稍有加强的重要因素，是你（尤金）关于中国旅行的情况报道和朝鲜战争，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动。

毛泽东说，由此可见，如果历史地看待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斯大林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便可看出，斯大林曾经犯过一些严重的错误，他们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得到特别广泛的流传。1945年以后在与蒋介石斗争的时期，斯大林由于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和过低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曾试图平息纷争，试图限制革命的发展。甚至在革命胜利以后，斯大林还继续表示对中国共产党人不信任。毛泽东说，尽管如此，我们仍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假如我们动摇和不坚定，那么也许我们早就不在人世了。

随后，毛泽东转而对斯大林的作用作总的评价。他指出，斯大林无疑是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位优秀的、忠实的革命家。然而，在漫长的时间里，他在自己的大量工作中犯了一系列重大的和严重的错误，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已列举了其中主要的几项。这些主要的错误可以归结为七点：

一、非法镇压；

二、战争中犯的错误的，然而主要是在战争初期而不是末期；

三、严重损害工农联盟的错误。毛泽东指出，关于这一类错误，包括对待农民的错误政策，在赫鲁晓夫同朱德在莫斯科交谈时曾经提到过；

四、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这与非法迁移某些民族有关。毛泽东说，但从整体上看民族政策的执行是正确的；

五、放弃集体领导的原则，自高自大地沉溺于赞扬之中；

六、领导中的专制做法和作风；

七、外交政策中的严重错误（南斯拉夫及其他）。

毛泽东接着强调，从整体上说，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社会主义阵营从2亿人增长到9亿人，这一事实本身就能说明问题。然而在某些国家某些党顺利前进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他说，将来也可能出现类似的和其他的错误。我指出，像斯大林所犯的这样一些错误最好别再重犯。对此，毛泽东回答说，看来还会有这样的错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些错误的出现是完全可以解释的，因为我们知道，社会是经过矛盾的斗争，新与旧的斗争，生与死的斗争而发展的。毛泽东说，在我们的意识中还有太多的旧的残余。它落后于不断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落后于存在。

毛泽东继续说，在我们两个国家里，许多东西来自陈旧的资本主义社会。比方说，关于对被告施行体罚的问题。这对中国来说也不是新问题。早在1930年，红军中审讯时广泛采用殴打。毛泽东说，当时我本人就是毒打被告的见证人。早在那时就已通过了禁止体罚的相应决定。然而这个决定在延安也屡遭破坏。的确，我们竭力不许非法枪毙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继续对这种丑恶现象进行斗争。毛泽东继续说，显而易见，按照事物的逻辑，殴打时被打的人开始提供虚假的供词，而审问者却把这种供词当作真话。过去资产阶级传给我们这种和其他残余，在人们的意识中还会长期保留。追求排场、门面和大规模隆重庆典，这也是资产者的心理残余，因为在贫农和工人阶级身上客观上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习惯和心理。这些情况和其他情况的存在，造成了这种或那种错误产生的条件，这种错误共产党不得不认真加以对待。

我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是近但神化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除了这些以外，斯大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虽然知道人总是会犯错误的。毛泽东说道，在浏览列宁的手稿时，他确信即便是列宁，也在自己的著作中删去并重新写上这些或那些句子。毛泽东在结束自己

对斯大林的评价时，再一次强调斯大林不是在一切问题上而是在某些问题上犯过错误。

总的来说，他着重表明，代表大会^①的材料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以及代表大会后形成的气氛，也有助于他更加自由地对一系列问题说出自己的看法。好在苏联共产党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他说，否则我们将难以在这件事情上表现主动。毛泽东说，预计米高扬同志来时，将进一步就这些问题继续交换意见，而在合适的场合也要和赫鲁晓夫同志及布尔加宁同志交换意见。然后毛泽东从这个话题引开，并怀着极大的兴趣简短触及某些哲学问题（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等）。他特别着重指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任何矛盾、没有思想斗争、没有任何残余的社会是不正确的。毛泽东说，连共产主义社会里也有好人和坏人。毛泽东接着说，中国的思想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死啃书本和陈规旧矩之苦，包括中国报刊，仍然不符合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报纸上没有意见的交锋，没有严肃的理论论战。由于时间有限，毛泽东表示愿意再次和我见面，专门谈谈哲学问题。

谈话结束时，我问毛泽东，他是否读过《真理报》关于个人崇拜危害的编辑部文章，其译文刊登在3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他回答说，还没来得及阅读这篇文章。但有人对他说过，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正准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谈这个问题的社论，应该在下个星期内见报。他开玩笑地说，从3月16日起，全世界所有的报纸都对这个问题议论纷纷，唯独中国暂时沉默不语。

随后我向毛泽东简短地叙述了16名苏联知名学者来到中国以及今天在苏联专家俱乐部开幕的讨论二十大的理论会议的情况。会上苏联和中国的学者将作报告。

① 指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怀着极大的兴趣倾听了这一消息。

谈话持续3个小时。毛泽东情绪极佳，经常开开玩笑。

出席谈话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斯克沃尔佐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II. 尤金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6卷第204页

关于国内外形势及斯大林问题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纪要

(1956年5月2日)

摘自 II.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5月2日

机密

文本第2号

第417号

与毛泽东同志谈话纪要

1956年5月2日

今天晚上，毛泽东主动乘车来到我处。这时科学院院士齐津也在我这里，于是他也参加了会谈。

毛泽东通报说，最近他打算休假，想利用这次机会到全国各地走走，了解一下地方上的情况并会见一些地方干部。他说，待在北京，有时不能正确地了解地方的具体情况，这样会导致脱离实际。

毛泽东向齐津详细询问了苏联专家组在中国的工作状况和苏联农业科学的成就。他满怀兴趣认真听取了齐津讲述苏联科学家在培育小麦新品种和植物杂交方面的经验，向他讲述了全苏农业展览会的工作。毛泽东表示，希望齐津院士和其他在中国的苏联科学家能更广泛地向中国科学家介绍苏联的科学思想成就。他衷心感谢苏联科学家在制定中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方面所给予的帮助。

然后毛泽东提到了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同志的英国之行。他强调说，这次重要的访问进行得很顺利，进一步改善了苏英关系。这次访

问，现在和未来将对国际生活产生有力的影响。他说，这次访问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进一步扩大了苏英贸易。

毛泽东指出，苏联对英国立场的改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欢迎并完全同意这一立场。他说，过去错误地把英国同美国一样看待，把英国也看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敌人。他说，实际上，我们过去和目前的主要敌人是美国。毛泽东说在1948年同米高扬会谈时^①，我就强调了必须改变对英政策的思想，指出把英国同美国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在米高扬最近一次来中国时，我曾向他提起了这次谈话。

在确定我们的对英政策时，他继续说，我们该考虑到这样一点，即战后美国把英国降到了小伙伴的地位，从欧洲和亚洲所有重要的阵地上把它挤了出去。毛泽东继续说，中国人是这一事实的见证人：比如，他们看到了当年英国人如何在中国经营，后来又怎样先后被日本和美国从这一阵地挤走。其他亚洲和欧洲国家发生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的这种政策不能不激起英国人的愤恨，使他们努力摆脱对美国人的依附。

毛泽东说，英国人不想要战争也不怕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出现对他们有利的结局，他们的国家也将沦为美国的半殖民地。所以，我们应该努力使英国脱离美国，支持英国努力独立于美国人，然后“借助英国接近美国，对美国也不是没有希望的”。

毛泽东继续说，在当年，斯大林同罗斯福紧密合作，同他亲近，但后来让丘吉尔钻了空子，挑拨他们互相敌视，达到英国靠近美国的目的。斯大林对英国形势估计不足，他说，导致了英苏关系的紧张，使英国继续靠近美国。

然后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情况。他指出，帝国主义集团现在清楚地看到，他们没能力占领和消灭社会主义阵营，

① 原文如此。毛泽东和米高扬的会谈发生在1949年2月。

尤其是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历史经验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希特勒和帝国主义日本的被消灭）。比方说，即使是敌人占领了苏联的欧洲部分，毛泽东说，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还有辽阔而富足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中国情况也是如此：即使沿海地区被占领了，还有大西北、四川和其他地区。即使出现这种不可能的情况，他说，我们还有广大后方可以继续开展斗争。现在的核武器也不能消灭苏联和中国辽阔的领土和众多的居民。他强调说，中国历史已多次证明，即使大部分居民被消灭也绝不意味着民族被消灭。毛泽东举了三国时期战乱的例子。当时中国人口从5000万减少到1000万。这种状况在安禄山（唐朝）造反时也出现过。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毛泽东指出，清醒地分析所有这些事实，意识到，同苏联和中国打仗不可能取胜。这就是为什么，他说，现在越来越激烈地争取两个主要斗争力量之间的中间国家。他列举了拉丁美洲、非洲的这些国家，亚洲他列举了日本、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等等。像法国和西德这样一些国家也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的地位。在这些“中间”国家的领土上，毛泽东说，美国正在建设自己的军事基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奴役这些国家，把他们变成半殖民地，变成自己的附庸。但是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希望战争，他们明白，对于某些疆土小而人口稠密的国家来说（日本等），战争意味着整个毁灭。所以，这些人民努力对抗美国的侵略战策，努力摆脱它的控制。争取这些“中间”国家，他指出，对于使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分析了印度的立场后，毛泽东说，印度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与英国和法国相比，它对美国奉行更加独立的政策。

在会谈时，毛泽东简要地分析了中国的国内政治问题。他指出，今年的春播工作较往年进行得都顺利。在春播准备期间，生产合作社做了大量工作，兴修水利，大搞积肥。这些工作是今年农业丰收的保证，今年农业可望比去年增产2-3成。增加2成是毫无疑问的。

然后谈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毛泽东通报说，中国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钢产量的绝对数字将接近日本，再过10年，将超过英国和法国。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钢产量的任务将超额完成；可以预料，年产量可达450万吨。这样，他（毛泽东）说，再过10年，帝国主义者就根本不敢冒险发动战争反对社会主义阵营了。

然后毛泽东又重新回到斯大林的错误问题上。在很大程度上他重复了以前他对这个问题发表的意见，毛泽东强调指出，直到革命胜利前，斯大林还不相信中共的力量，他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这是斯大林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毛泽东说，倘若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听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便会夭折。我对毛泽东说，斯大林对中国问题所犯错误，其原因之一是他（斯大林）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然后，我给毛泽东谈了我对尼赫鲁两本著作《开发印度》和《自传》的印象。我说，当时在苏联，对甘地主义和甘地的作用认识不正确，大概这也是对印度实际情况不了解的结果。

毛泽东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他说，继苏联之后，在中国对印度问题也出现了不少混乱。可以直言不讳地讲，他说，斯大林对印度、中国和英国作为大国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他对这些国家的形势认识不正确，导致了对这些国家的错误政策。

毛泽东指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于，由于他的过错，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隔阂越来越深，而他没有采取任何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措施。

毛泽东继续说，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于是在资本主义范围里出现了不少议论，在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里也有不少议论。他说，这个问题，在中国干部当中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许多人问，斯大林的错误到底有多大，在他的活动中，是过大还是功大。毛泽东说，如是这样回答他们，在他的活动中过占20%，那

他们认为这太少了；如果给他们说40%，那他们又觉得太多了，所以，毛泽东微笑说，比较能够接受的比例数字应该是30%。毛泽东说，这个比例哪里也没写着，但很可能，斯大林的错误程度接近这个判断。他接着说，在中国人们对待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态度不一。某些老干部对待这个问题所依据的是他在不同的革命时期犯了哪些错误。

接着毛泽东说，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

毛泽东说，他本人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大多数重大问题上实施了正确的路线。至于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说他“可以写一本书，但认为这没必要，对共同事业不利”。

毛泽东接着说，斯大林不信任我，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他微笑着说，至少是“半个铁托”。

在解决了同南斯拉夫的问题之后，毛泽东笑着说，“我也似乎被恢复了名誉”。毛泽东说，“从同米高扬最近一次谈话中得知为什么斯大林不信任我。他甚至差点儿把他最亲密的战友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也看成是外国的走卒”。

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这结束了对他（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

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说，在巴基斯坦总理这次来华时，他（毛泽东）准备向他暗示，希望巴基斯坦对帝国主义国家执行更独立的政策，并向他强调巴印友谊的重要性。

在会谈过程中，我对毛泽东谈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在国内政治问题上所采取的一些最新措施。

会谈以后，毛泽东留在我这里吃晚饭。他心情很好，常开玩笑。在离开时他说，今天晚上过得很愉快，休息得很好，进行了有趣的谈话，在会谈中，他笑着说，“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在

我这里停留了3小时。

师哲同志和大使馆二等秘书罗满宁担任会谈翻译。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 尤金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6卷第259页

附录 关于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方针（十大关系）

——利哈乔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6年8月22日）

机密

文本第1号

致苏共中央

Б. Н. 波诺马廖夫同志：

现随信寄去使馆整理的关于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方针的材料。这十项方针是目前条件下中国党和政府活动的基本方针。这些方针或原则是毛泽东于1956年4月底在中共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提出的。以后在不同时间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在内部报告中也重复过这些原则。

在中国的公开报刊上，还未引用上述毛泽东的十项指示。本材料是根据个别中国同志的谈话记录和其他非正式材料整理的。

附上述材料，共18页。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B. 利哈乔夫

附件：

关于毛泽东所提出的十项方针

所谓十项方针或十项原则，是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的，以后又拿到地方上讨论、修改和补充，最后经中共中央同意的。

在提出这些方针的时候，全国的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巨大的胜利。到3月底，全国90%的农户已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且55%的农户是高级社即社会主义形式的合作社的成员。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私人企业（其产值占整个资本主义工业的92%，其资本占整个资本主义商业的75%）已变成合营企业。全国手工业的88%已联合成生产合作社。

由于改造是在极短的时间里以跃进的形式完成的，改造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共中央预计的速度，现在急需巩固这些成绩。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十项方针是巩固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新的高涨时期所取得的成绩的特别纲领，是当今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面临的基本任务的清单。

从十项方针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加强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进一步发展民主的问题方面。

一、第一项方针毛泽东讲的是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他强调指出，不能为发展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在主要关注重工业的同时还应加强对轻工业和农业的关注。否则，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就将处在困难的境地，而重工业本身也不能很好地发展。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已开始贯彻执行：五年计划规定的重、轻工业投资比例已由8:1改为7:1。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轻工业的重点项目已由计划规定的65个增至99个。从预算拨款看，与1955年实际水平相比，1956年对轻工业拨款增加86.14%，对重工业拨款增加42.08%。在李富春在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里和报刊上（见1956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详细论证了重工业和轻工业投资比例的变化依据，而且作为基本理由还提出了必须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再者，轻工业投资回收快、利润高，这样将保障国家积累迅速增长。

在分析引起重、轻工业投资比例变化的原因时，使人产生一种印象：这一变化首先是出自政治原因，而并非经济原因。的确，中国同志们指出了按人平均中国轻工业生产的落后：中国的棉布生产仅为苏联的1/4，不足印度的1/2，羊毛、亚麻和丝绸布匹生产接近苏联的1/40，而不足印度4年前生产水平的1/3。但中国的重工业生产按人平均更少、更落后。1955年按人平均，电力生产不足苏联的1/40，煤不足苏联的1/12，石油不足苏联的1/220，生铁不足苏联的1/27，钢不足苏联的1/47，水泥不足苏联的1/15。而且现在轻工业生产占全国工业产值的一半以上。

现在还难确定，与原来设想相比，比例调整要使重工业发展速度放慢多少。但是应该指出，按照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工业投资比重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高：中国为88.8%，苏联为85.9%（占工业总投资的比重）。在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讨论五年计划时，中国同志们认为这种情况的根据是，重工业现有基础非常落后，在生产日用品上轻工业和手工业可利用的潜在资源雄厚。

随着比例调整，重工业的投资比重计划达到 87.5%。

二、第二项方针涉及必须充分利用中国沿海地区的能力。

毛泽东指出，如果说在此之前，曾强调不应在沿海地区发展工业和高等教育，应把一部分工厂和高校从这一地区迁往内地，那么现在经验表明，不应这样做。毛泽东注意到，沿海地区集中了旧中国 70%的工业。接着他引用了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发言，说在现在条件，后方也容易遭受打击，现在原子弹可以扔到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毛泽东指出，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新的工业区的发展上，但同时也应最大限度地利用沿海地区的工业和文化中心。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及时的。在五年计划前 3 年的时间里，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速度已经呈现滞后，尽管以前的多数企业都集中在这里，这里还有较发达的生产手段，有较多的高技能的工作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1955 年全国工业生产总产值比 1952 年增长 65.6%，沿海各省市增长 54.4%，而内地增长 96%。如果说 1953 年全国工业产值增长 31.7%，上海增长 34.5%，天津增长 36.7%，那么到 1954 年，全国平均工业产值增长 16.7%，而上海仅为 7.4%，天津为 11.6%；1955 年，全国工业生产增长是 8%，天津仅为 2.1%，而上海的工业生产规模反而下降 4.5%。在这一地区的企业里，现有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上海，对 40 种产品的生产调查数据表明，仅有 10 种产品，其中生产设备使用效率超过 80%，20 种产品的生产设备使用效率在 40%—80%，8 种产品的生产设备使用效率在 20%—40%，2 种产品的生产设备使用效率低于 20%。而按照五年计划，近 70%的工业生产增长应依靠旧的企业，而这些企业正好位于沿海地区。

毛泽东讲话之后，沿海地区的形势成了全国人大三次会议（1956 年 6 月）党组织和报刊上讨论的对象。在上海市委会议上公开讲，对上海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挖掘上海的工业潜力注意不够。《人民日报》在 7 月 8 日的社论中指出，在制定计划时没有规定出发展沿海地区工业的积极措施，或考虑得不充分。这样，有意或无意地在其发展道路上设置了障碍，而国家没能从沿海的工业中得到更多的产品、积累和干部。李富春在人大三次会议上还指出，由于对充分、合理利用沿海地区工业基地的意义估计不足，存在怀疑，没有同内地建设很好地结合，所以在制定计划和实际利用这些基地的工作中没有表现出充分的积极性。认为纠正这种状况的具体出路是，充分挖掘和利用这

一地区所有的现有潜力，把企业改造和它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生产重组结合起来。

据报刊上报道的材料，这一工作已经开始。《人民日报》报道，在上海，5、6月份已有160多家合营企业（重工业）开始被改造，规定充分挖掘他们的潜力，扩大产品生产。据使馆掌握的材料，现在已限制把沿海地区的企业迁往内地。

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工业潜力，除上面所说的以外，还将对居民的工业品供应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全国的主要轻工业都集中在这里。

三、中共加快经济建设速度的计划反映在第三项方针里。国家预算用于经济建设上的资金还不够充分，给国防拨款还依然很高，毛泽东说，第二个五年计划应该给经济建设拨更多的资金。这一方针还有其具体的表现。例如，按照1956年预算，国防开支已由1955年占整个预算的22.15%降为19.98%，国防拨款1956年比1955年下降5.2%。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洒淇在对苏联军事顾问的一次报告中指出，根据毛泽东减少军事开支的指示，打算裁减兵员，减少即将陈旧的武器储备，减少武器进口。

四、接着，毛泽东在第四项里批评了只注意国家和社会利益而忽视工人、农民个人利益的情况。他说，在公布的农业十二年发展纲要里，只讲发展农业生产，几乎没提农业生产合作社成员个人利益。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农业合作社社员每人的收入到底有多少。毛泽东说，我们对工人讲了许多，要开展社会主义竞赛，要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同时我们必须提高工人劳动工资，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他号召，农民和工人的个人收入每年都应不断提高。

这一加强关心劳动者的物质状况的方针有其客观必要性。与国民党时期相比，尽管居民的物质福利有了相对提高，而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还是非常低的1954年，尤其是1955年，出现了拖欠工人和职员工资的倾向。（关于中国基层居民的详细生活状况请见使馆整理并已寄往中央的专门材料）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中共和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整顿劳动工资制度，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状况。1955年下半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劳动薪金实行了改革。从1955年底开始，工业和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的工资改革准备工作也积极开展起来。现在改革正处于实施阶段。1956年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平均将增加13%。

改善劳动者物质状况和生活条件的问题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在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里都认真讨论过，至今报纸上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在企业和机关里正在专门调查工人和职员的生活条件，调查结果拿到党的组织里讨论。党要求各地领导干部详细掌握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并采取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措施。在毛泽东讲话之后，这项工作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至于农民，党组织提出了在1955年让90%以上的合作社社员增加收入的任务。7月9日，中共中央给各级党委下达了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其中规定，今年限制社会基金留成和管理费留成，把大部分收入分配给合作社社员。

由于没有充分的材料，中央还不能对全国执行这项指示的前景作出确定的结论。据某些省的夏收分配结果，这项指示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执行，90%以上的合作社社员增加了收入；四川省21个县，91.93%的合作社增加了收入；安徽省种植茶树的许多县，90%以上的合作社社员增加了收入，而且增幅达到20%—30%，甚至50%。同时也有收入下降的情况。在湖南省，经检查确定，在夏收分配中，40%的合作社不能保障自己的社员（90%以上）增加收入；主要原因是没有重视发展多种经营。类似情况在甘肃省某些合作社也存在。现在党组织正在做工作克服出现的缺点，以求秋季丰收弥补过去的损失，完成中央下达的指示。

如此看来，毛泽东所提出的经济问题方针首要目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考虑到了其他兄弟国家在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状况的事业中所出现的过失和缺陷，并本着这种精神重新考虑它以前提出的原则，揭露缺点并采取措施克服它们。

中共加快速度提高劳动基本群众物质福利的方针巩固着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成就，表明了社会主义经营形式的实际优越性，巩固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领导地位和威信，为在全国进一步加深社会主义改造创造着有利的氛围。

五、在十项方针中，包含许多纯政治因素，其目的是进一步发展民主，让广大群众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国家管理，进一步巩固国内政治形势。

在第五项里，毛泽东提出了扩大地方机关权力的问题。他说，中央机关包揽了过多的事情，直到解决狭小的具体的问题。管理国家，毛泽东指出，权力应集中在中央机关，但同时应充分而广泛地调动各省机关的积极性，不应该什么问题都由中央解决。这一原则也适用于省和县的关系。毛泽东要求给地方机关更多的权力，直至制定某些法令文件的权力，让他们有可能根据本省的情况在贯彻中央机关的指示时作出适当修正。

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代表的发言中，也批评了国家管理中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周恩来在会议总结发言中说，由于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引起了生产力的高涨。为了适应这新的形势，周恩来说，必须进一步具体划分中央和地方机关的权力。划分的原则应是“进一步调动地方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和改进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至于实现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现在只是正在做准备工作。正如李先念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报告中所说的，中央和地方机关的职权范围问题将在国务院召开的……^①会议上详细讨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最近将提出具体措施。

六、在许多至关紧要的问题当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少数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工作的问题。考虑到少数民族占的地方占全国总面积的60%以上，长期以来经受压迫，其中包括来自汉族方面的压迫，居住在边陲以及其他情况，毛泽东指出，必须重视对他们的工作，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不是口头上而是切实地帮助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和经济。

到目前为止，在某些地方，中共的民族政策贯彻得不力，还有严重的错误。这表现在一些地区不重视少数民族工作，依然存在大汉族主义，尤其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上。不少地区还表现出了不必要的匆忙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的具体条件和本身发展的特点，轻视他们的风俗和习惯。在少数民族干部的使用问题上，还存在这样一些现象，如侵犯少数民族干部的权益，轻视他们。汉族干部包揽一切事务，实际上把少数民族干部排挤在一边这引起了少数民族的不满，让反革命分子和敌对分子钻了空子，甚至组织武装暴动。1956年，在云南和四川的交界处、西藏、新疆，在少数民族中间出现了严重的骚动，有的多达几千人。（这方面的情报已寄出）……对这一领域工作中的缺点展开了广泛而尖锐的批评，这突出表现在7月2-5日召开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不久前，民族委员会对各民族地区状况进行了检查。为此成立了7个工作组，分赴云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内蒙古、东北、新疆、西藏。工作组成员有科学院、文化部、中央民族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和其他机关的工作人员，民族问题专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工作者，艺术工作者，等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下同。

等。其中一些人还在中央民族学院接受了专门培训。给这些小组提出的任务是用4-7年的时间深刻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发展水平、所有权系统和阶级斗争状况，尽可能搜集少数民族历史发展、习俗和风尚方面的资料。所有小组，包括西藏小组在内，均已着手工作。

毛泽东关于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指示正在努力贯彻执行。按照1956年预算，全国经济建设拨款比1955年增加17.04%，而内蒙古这一拨款增加了54.31%，青海增加113.14%，西藏增加27.27%。全国社会和文化教育经费拨款1956年比1955年增加预算18.36%，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增加25.06%，内蒙古增加50.36%，青海增加71.38%，西藏增加28.72%。

七、毛泽东在十项方针的第七项里，论述了中共中央对待民主党派的完全新的和重要的政治路线。毛泽东指出，我们将在长时间里允许在中国存在民主党派。在论证这一原则时，毛泽东强调指出了民主党派所代表的“反对派”有重要意义，通过民主党派中的反对派“我们可以知道许多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事实和现象”。提出的其他论据还有：继续把资产阶级吸引到人民政权一边是非常重要的。国内的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分子赞成我们是重要的，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赞成我们对于我们也很重要。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是中共所实行的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首先是对共产党实行监督的政治方针的实质。

正如中国朋友们所认为的，现在贯彻这样的政策不会给中共造成现实的危害。各民主党派本身是非常薄弱的，无论从他们的政治分量看，还是从他们对群众的影响看。他们总共人数到1956年5月底才近4.5万—5万人。这不仅表明，民主党派无论如何都不能与拥有900万党员的共产党相提并论，而且表明他们在人民群众中还很不普及。现在的民主党派按其实质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不像是为一定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多党共存的方针带来了明显的政治好处。中共新方针大大提高了民主党派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这便有可能更有效地利用他们对资产阶级和老知识分子施加影响。同时，这也表明中共打算继续保持统一战线，意味着资产阶级代表和老知识分子有可能参加国家的社会生活 and 政治生活，保持自己已有的权利，意味着“安抚”这一阶层，防止他们的不满，加强他们对中共的依赖性。最终，新的方针将进一步促进国内政治形势的稳定。

毛泽东讲话和新方针颁布之后，民主党派的活动明显地积极起来了。他们开始吸收新的成员。例如在3个月的时间里，到7月底，九三学社增多了700

个成员，人数将近 2000 人；民盟成员从 4 月的 12000 人增加到 7 月底的 17000 人。中共认为，到 1956 年底各民主党派人数将达到 8 万人。（这一问题的详细情况请看关于中共中央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措施的通报）

八、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在镇压反革命和贯彻镇压措施方面的总的政策方针。这方面的基本精神是：大大减轻对犯罪的镇压措施，其中包括对待反革命分子和……一般来说，毛泽东指出，我们对胡风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国民党俘虏不使用死刑……保留反革命分子的生命不会对人民民主专政带来危险；如果在宣判死刑和执行死刑时发生错误，那就不可挽回了。

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下，这一行动完全是正当的。其正当性首先是由继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国家的根本社会变革决定的。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及其强大允许在全国范围内于 1955 年开展群众性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镇压颠覆活动的行动。1955 年下半年和 1956 年前 3 个月共逮捕和判刑几十万反革命分子。还有更大一批破坏分子受到保卫机关、行政和社会组织的监管。1955 年处决 12500 个反革命分子。如果说第一次镇反（1951 年）监禁 130 万人，处决 71 万人，监管 120 万人，反对反革命的斗争好多年没有停止，那么这次很清楚，到 1956 年 4 月，大部分破坏分子已无力反抗。

为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中共对企业、机关、部队和学校里的干部进行了群众性的审查。到 1956 年初，共审查 400 万人。

人民群众积极支持肃反斗争，这表明残留的反革命分子颠覆中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从 1955 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高潮和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大削弱了内部反革命的社会基础。反革命分子自己也开始明白，国内的反革命没有前途。从 1955 年底开始，到安全机关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增多了。到目前为止，自首人数已达几十万。毫无疑问，对反革命分子取消死刑的方针将进一步瓦解反革命。

九、第九项方针的基本内容是讲某些批评的原则。毛泽东反对这种现象：当摸清了中央领导的意图之后，下面便“异口同声地赞同上面同志的意见”，即使他们之中有人有不同意见也不说，只是观望其他人的反应并同意他们。毛泽东还反对不能正确地对待工作中犯错误的人，瞧不起他们，有时还剥夺他们的工作。

应该说，最近几个月中国的批评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首先表现在各县、市、省党委为中共八大做准备所召开的代表会议上。代表会议是在发扬党内民

主和代表积极参加的条件下召开的。比如，在省的代表会议上，通常有60—80人发言，有事不能出席还可书面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书面发言也算发言。在代表会议上，进行口头或书面发言的通常达到120—140人。代表们尖锐地批评领导工作中的缺点，一般情况下，不称职和不能证明自己正确的人被从代表会议主席团拟定的新的党委候选人名单或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中开除。

与以往相比，这次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是在严厉的批评精神之下召开的。在发言中，一反传统做法，每一个发言者都对国家机关、组织工作中的缺点给予批评。

不久前中共提出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进一步开展批评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关于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已递交单独报告）

关于同情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可以举出下面的例子：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犯了错误因而受到严厉批评的薄一波同志和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犯了某些错误的邓子恢同志，如今仍在国家领导人当中占有显著位置。

在开展批评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还应指出，从下面来的批评通常都局限在小事和次要问题上，存在着压制群众批评的现象。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毛泽东关于利用苏联经验的指示。毛泽东说，中国经常这样：如果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做了什么事，中国的同志们就说这一切都好，他们只需照办就行了。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同志们缺少批评的态度。在这方面，毛泽东强调，中国应该向所有人学习，其中包括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学习人家的好东西，他说一党制有阴暗面，必须学习某些西方国家的两党制。

所以，除了学习苏联和民主国家的经验，现在正在积极采取措施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1956年，中国派往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增多。1957年计划从资本主义国家购买多一倍的书藉。

在最近半年里，在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里出现一种倾向：号召以批判的态度利用苏联的成果。作为这一立场的依据，经常提出要反对机械地把苏联的经验搬到中国，反对中国工作人员忽视中国的具体条件和形势的特点。

毛泽东告诫不要骄傲，强调中国还是一穷二白的国家，为继续前进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同时他也反对解放前就存在的一种意见：似乎中国什么都不好。他说中国人没有权利妄自菲薄，相反，为建设伟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动员自己潜在的力量和能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波兰问题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纪要

(1956年10月23日)

摘自 II.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23日

第869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6年10月23日

今天我应邀拜访了毛泽东。

毛泽东告诉我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对波兰局势进行了讨论。对于该问题的详细谈话记录那天已通过密电发给中央。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王稼祥、胡乔木、师哲以及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顾问 H. Γ 苏达利科夫出席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II. 尤金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7卷第64页

关于弹道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纪要

(1957年10月11日)

摘自 II.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7年11月1日

第382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7年10月11日

今天毛泽东邀请我一起去参观在北京举行的印度展览，刘少奇也与毛泽东一起参观。印度大使陪同中国领导人参观了展览。

毛泽东和我在展览期间的交谈，主要涉及的是苏联的弹道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毛泽东对于卫星的发射过程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还热情地谈论了该事件具有的重大意义。他说，“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已经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生了极大的倾斜，”毛泽东说，“很明显，帝国主义现在不会冒险发动一场针对我们的战争了，因为他们无法确定这个卫星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他还对苏联科学家在未来能够成功发送更大更完美的人造卫星表示了信心。

在谈话期间毛泽东问我，赫鲁晓夫和莱斯顿的会谈记录什么时候能够出版。听到我的回答后，毛泽东说，现在他们要将这些材料翻译成中文。我向毛泽东说明了他们谈话的基本概要。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后对赫鲁晓夫的发言作了赞许的回应。对于他们的谈话，毛泽东非

常高兴地表示：“这些事务在我们这里，以及在苏联都进展得很好。”
“火箭、人造卫星和相关的胜利对美国人而言是个打击，这不仅让你们，也让我们感到轻松和高兴。”

会谈由大使馆一等秘书罗满宁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II. 尤金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7卷第319页

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修改意见

——尤金报告毛泽东的谈话

（1957年10月30日）

绝密副本，第1份

致赫鲁晓夫同志：

今天（10月29日）晚上，毛泽东邀请我与他同行。在去克里姆林宫^①的途中，他开始谈起刘晓关于米高扬向他通报的有关苏共中央决定撤消朱可夫苏联国防部长职务的报告。

到达克里姆林宫后，毛泽东说，他非常满意地接受了苏共中央关于撤换朱可夫的决定。他声称，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苏共中央作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决定，从而防止了一场军队不服从苏共中央的巨大危险，一场可能引发重大麻烦的危险。接着毛泽东说，他认为，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组织在军队中的作用、关于加强军队同地方党的机关的联系、关于军队彻底而无条件地服从党、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意义十分重大。

我简要地向毛泽东介绍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军队党组织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情况。对此他指出，近来我们（中国人）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也有所削弱，军队党组织同地方党的机关的联系也削弱

谈到撤换朱可夫时，毛泽东说，这次手术会比撤换莫洛托夫更少痛苦。莫洛托夫几十年来已经作为党的领袖之一深入群众的头脑，而朱可夫则和马林科夫一样，还没有作为一名政治领袖在群众的头脑中扎根，尽管这是不同的两个人。

① 原文如此。这里应该是指中南海，下同。

这时，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到来。毛泽东简要地向來到的同志们叙述了我们谈话的内容。然后，他开始谈到即将开始的莫斯科之行，并说，他再一次重复通过周恩来转达过的请求，无论在伊尔库茨克还是在鄂木斯克都不要举行欢迎仪式，而他为了避免感冒也不准备走出飞机，而在莫斯科，除了在机场发表谈话外，从机场出发沿途也恳切请求不要组织欢迎仪式，因为他也好，宋庆龄也好以及许多其他同志也好，都不能乘坐敞蓬汽车。

毛泽东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从苏共中央收到的关于庆祝十月革命 40 周年之际即将作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文件。

首先，毛泽东说，我先说我们对于声明草案的一些意见。草案要大大删减。这事不难。只保留未来声明的主要的、原则性的内容。声明草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对个别有一些意见，准备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同志们谈。

第一，关于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如果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来判断，那么我们对这种解释有某些不同意之处。

不能仅仅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和平过渡，而且应当看到另一种可能性。这是因为，有些国家或者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或者正处在由和平转变被武装斗争所取代的阶段。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不仅取决于无产阶级，而且取决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可能会迫使工人阶级进行武装斗争，把它强加给工人阶级。因此，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要考虑到这第二种可能性。

宣言在谈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时，应当既写上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同时又指出，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都可能随时将武装斗争强加过来，对此无产阶级必须时刻做好准备。如何表达这个思想，是个文字问题，但这个思想一定要在声明草案中明确地表达出来。

第二，毛泽东说，在草案中说到，近来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一系列政治问题上日益接近。他说，应当为争取与社会党人共同行动而进行顽强的斗争，特别是应当把社会党的普通群众争取到共产党人一边来。对此，我们并不表示怀疑。毛泽东接着说，但是，在声明中最好采用一种对这个问题的更加一般性的提法，说明共产党人不仅同社会党人，而且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政党、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为和平、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种流派等等日益接近。他说，不应当仅仅突出提到同右翼社会党人团结的问题，而是要找这样一种提法，以便能把社会党人、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和进步力量都包括进去。

第三，是关于提到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那一节的问题。在谈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对斯大林与中国共产党和他本人的关系作了长时间的回顾。毛泽东说，莫洛托夫的路线就是斯大林的路线。他在各个方面对待我们都不比斯大林好些。毛泽东回忆起 1949-1950 年在莫斯科关于条约、关于势力范围、关于股份公司的谈判，并且说，实际上更多是同莫洛托夫谈，而他的表现常常像一个商人，也就是说他在同我们讨价还价。

毛泽东说，他在莫斯科时，曾经与苏联商定，在人民民主国家将不搞间谍活动，当然也包括中国，但是实际上是搞了间谍活动。罗申大使就招募了一名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要他提供情报，且不要告诉周恩来。但是，这个工作人员把这事告诉了周恩来。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不会不经莫洛托夫认可。还有别的问题让我们对莫洛托夫不满（这时毛泽东指出，他们对上述罗申的事件并不重视，并请求不要告知苏共中央）。因此，毛泽东说，希望苏共中央能正确理解我们，我们（中国人）对莫洛托夫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好感。不过我们认为，在声明中以不提到莫洛托夫为好。因为，在我们中国某些地区，莫洛托夫的威望并不比斯大林的威望低。这样的人不仅在中国有，关于苏共中央谴责反党集团的决议应当提到，但是不要指名道姓（这时他指出，

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作为个人则不值得注意）。

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完全赞同苏共6月中央全会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当时，他说，我（毛泽东）不在北京，但就在他们（他指了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得到通报的第二天就召集了在京中央委员开会，详细地说明并维护了你们中央全会的决议。毛泽东说，我们提出这项建议并不是因为怜悯莫洛托夫，人们反正以后会忘掉他的，而是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的利益。

此时，毛泽东谈到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知道在你们中央委员会内部曾存在过分歧。曾经有过两派。我们曾几次讨论过你们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局势，结果认真负责地一致同意支持中央主席团中和赫鲁晓夫同志站在一起的那部分人。他接着说，我们（中国人）这里也有过对个别问题的不一致和分歧，但是时间越长，这些不一致和分歧就越小。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日趋接近。我们对于你们解决斯大林问题的做法有过不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分歧变得很小了。毛泽东说，应当承认，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大大地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好比是为我们党揭去了一个经常压抑我们和妨碍我们正确理解许多问题的盖子。是谁为我们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使我们大家更容易正确地理解个人崇拜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

在结束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时，毛泽东说，就是这样，我们对于其他问题的不同意见也是或者消除了，或者观点接近了。他接着说，我们从来不允许从我们方面站出来反对苏共，即使我们不同意某些做法。他还举出通过和平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为例，说他们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与苏共不一致，他们甚至在私下谈话中也不曾提起这个问题。

谈话进行到此，我作了以下的说明：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

决议中以及在苏共中央以后言论中，丝毫也没有讲到要无产阶级放弃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武装斗争。二十大决议只是说，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对于若干国家，工人阶级用和平方法夺取政权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大，也就是说，在存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当前形势下，可能为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创造有利的条件，足以迫使资产阶级后退，并从而避免武装斗争。接着我指出，当您（毛泽东）在莫斯科亲自交谈时，您毫无疑问会轻易地取得一致意见。我想，你们（中国人）在这里对苏共论述个别国家通过和平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的评价，显然是一种误会。毛泽东对我的这一看法极表赞许。

接着，毛泽东转而谈到在共产党代表会议上是否有必要通过宣言。他说，最理想的情况是所有党都同意发表宣言。但是，如果南斯拉夫人和波兰人反对通过宣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给共产主义的敌人提供口实，让他们说我们的阵营发生了分裂，出现了矛盾，莫斯科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的党，而其他党不同意，等等。但是，如果预先通过决定说，即使有一两个代表团反对通过宣言，宣言也要通过，那也可以这样做。毛泽东形象地表达说：“天下不会大乱”，但这一切都要预先讨论好。

第二个方案可以是这样的，毛泽东继续说，通过一个简短的宣言式公报，其中表述一些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问题：

一、关于共产党的统一和团结，关于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劳动人民在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统一行动。

二、关于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斗争等。

三、关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关于争取历史进步而斗争，等等。

四、关于开辟了党的社会主义基本道路的十月革命，关于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中的民族条件和民族特点。

宣言式公报这种方案也要事先讨论。

最后，是第三个方案：由中共和苏共两党发表宣言。毛泽东说，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说，为什么只有两个党发表宣言，那就说明其他党不同意。对此可以回答说，这两个党是最大的党。此外，大多数别的党已经通过了联合宣言，而我们两个党没有参加。这是方案之一，但这个方案也要事先讨论。

毛泽东转向我说，请您尽快将此转达给赫鲁晓夫同志，以便苏共中央主席团知道我们带着什么问题去莫斯科。

此后，毛泽东简单介绍了他同斯彼哈尔斯基^①的谈话。毛说，我努力向斯彼哈尔斯基证明，对他们（波兰人）来说，目前最主要的是巩固同苏联的友谊，消除波兰的反苏情绪，并始终强调说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作用。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问我，我是否和他一起去莫斯科。我回答说，还没有得到苏共中央的指示。

毛泽东说，他乐意和我一起去莫斯科。

谈话持续了约4小时。

П. 尤金

1957年10月30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7卷第329页

① 斯彼哈尔斯基，时任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

中共代表团对莫斯科会议安排的意见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纪要

（1957年11月9日）

今天晚间毛泽东邀我去会谈。

他请我向 H. C. 赫鲁晓夫转达自己与会议筹备有关的几点愿望。

一、他认为，应当在 11 月 10 日前彻底结束中苏两国代表间关于会议声明草案问题的协商，并在这一天将协商过的草案散发给所有兄弟党代表团，包括那些未参加此次会议的兄弟党在内。

二、毛认为，声明草案最好以苏共和中共两党的名义发出，因为“苏共明显不便于仅以自己的名义涉及以下两个原则性问题，即关于苏联的领导作用和关于倡议召集以后的兄弟党会议”。

三、（毛）希望会议能于 11 月 13 日开幕。因为 11 月 10 日所有兄弟党代表团便可收到会议声明草案，并在 11 月 11 日前将自己的意见通报给苏共中央（B. H. 波诺马廖夫和 Ю. H. 安德罗波夫等同志）。而在 11 月 12 日，即会议开幕前一天，（我们）还可以参考他们所提的意见和建议对声明草案再作修改。毛泽东希望，开会时间应不少于两天，如果需要，也可用三天，即 11 月 13-15 日。

四、毛泽东表示同意 H. C. 赫鲁晓夫向他通报的关于波兰人所提的建议，即通过第二个“包含有向世界和平大会呼吁精神”的集体文件^①。毛认为，这份文件应草拟得简洁些。文件的签署既可以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党代表，也可只包括目前在莫斯科的所有兄弟党和其他党派的代表。毛指出，最好能让更多的党派代表签署该文件。

^① 指《和平宣言》，于 1957 年 11 月 23 日公布。

毛泽东请求苏共中央亲自负责该简明文件的起草工作，并在11月10日让所有党派代表了解其内容。

随后，毛泽东说，他对苏、中两党能在宣言所涉及的问题上迅速取得相近的观点表示满意。他指出，苏、中两党代表在对草案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分歧，只是对个别措辞作了精确和完善，对个别观点作了强调，等等。另外，只是就一个问题作了几处改动，例如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过渡方式。毛泽东认为，宣言的特点和积极意义在于，其内容只涉及一些带有普遍性和原则性的问题，并未谈各个国家（如苏联、中国、波兰等）复杂的内部问题。

毛指出，有必要保留宣言中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简要补充文字（该补充性文字是毛亲自写的）。对此，毛强调，斯大林在世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形而上学泛滥成灾，辩证法立场被严重削弱。在人们评价和分析各种现象的过程中，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居统治地位。这是产生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错误的根源。哲学本身有时也会有局限，从而不能完全地为工人阶级服务。他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同志很少讲到和使用辩证法。我建议，我们应经常地大规模宣传辩证法。毛说，他很高兴地看到，H. C. 赫鲁晓夫报告中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回到声明草案的话题，毛希望苏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能再次读读它。毛声称，他已也将再次阅读该草案。在此期间，可能就会有一些没能在宣言中反映出来的新思想和新观点。例如我们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应当在宣言中补充关于农民地位的内容，等等。

之后，毛泽东又谈到关于让所有兄弟党代表事先了解草案内容的必要性的问题。他说，这一方面是坚持民主，另一方面，在此期间，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有意思的思想。只是务必让各代表团最晚于11月11日夜前把自己的意见和愿望报上来。确实，我们给他们研讨草案的时间并不多，但“应当考虑到，会议要持续2-3天，其间每个

代表团仍可以提出自己的补充意见”。

关于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构成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以下几个方案：1，只有中共中央党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不包括国防部长彭德怀和财政部长李先念）；2，代表团所有成员——共产党员（11人）都参加会议；3，包括非党人士（作为特邀代表）在内的来莫斯科的中国代表所有成员都参加。毛指出，应当考虑到，我们代表团中的非党人士也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形，便可以邀请其他国家（如波兰等）代表团中的非党人士也参加会议。关于这一问题，毛说，可以再商议。

接下来的会谈中，毛泽东简要地谈了关于自己在莫斯科与一些兄弟党代表会面的情况。

毛说，他与哥穆尔卡会谈的时间最长。关于对这次会谈的评价，毛指出，宣言中有两点让波兰人有些为难：1，抨击美帝国主义；2，指出关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作用。哥穆尔卡“在与我交谈期间以波兰人民的名义强调，并非他个人，而是波兰人民不能接受（宣言中）这些条款”。毛说，我建议其对民众进行必要的教育工作。哥穆尔卡答：“在这方面工作我们做不了。”他在与毛的会谈中强调，波兰不会接受宣言中有关激烈指责美国的表述。与此同时他也承认，这些内容在苏联和中国会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他预测，会议宣言“将导致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加剧”。毛解释道，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而共产主义运动不过是被迫反戈一击，“遏制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哥穆尔卡表示，在这一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毛与哥穆尔卡会谈的大部分时间都集中在关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问题上。其间，毛强调每个班都要有自己的班长，每个排也得有排长。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团队里也理应有自己的领导，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力量”。毛继续对哥穆尔卡说，“这个

领导的角色并不好当，很麻烦哩”。

毛泽东指出，毫无疑问，仅仅通过一次会谈是很难取得什么根本性的成效的，但我还是极力证明哥穆尔卡的观点是错误的。当然，如果能够如愿，让波兰人在宣言上签字，那是再好不过了。可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毛声明，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我们仍要通过宣言。

“（我们）不希望他们说，自己是被迫在宣言上签字的”。他们拒绝签字，我们可以等，过上3年左右，他们反正还是要签的。与毛会谈期间，哥穆尔卡并未否定宣言本身，但提了许多附带条件。毛泽东说，在将声明草案分发给波兰人之后，他打算到哥穆尔卡那里，与他再好好谈谈。

关于与南斯拉夫人的会谈，毛指出，情况比波兰更复杂些，因为“他们不是脚踩一只船，而是两只船”。

毛说，在与多列士、陶里亚蒂和波立特^①会谈期间，自己对这些国家的形势很感兴趣，因为中国共产党对欧洲国家的情况知之甚少。毛与这些国家的代表还就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在这方面，英国共产党还郑重通过了一个决议。去年，在访问中国期间，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仍坚持“不开一枪”的立场，可“现在如果敌人开火的话，那么，他们也打算还击了”。毛说，会谈期间，我建议英国同志要多依靠自己的力量。毛注意到，波立特对签署宣言表现得相当积极。很明显，英国人是想借此来达到“提高英国共产党声望”的目的。毛说，“我对英国同志的这些想法表示反对”。

毛继续说，在与法国同志会谈期间，他们对意大利共产党表示了不满。“不过，现在我们感到法共和意共与英共的立场已相当接近了”。

① 多列士，时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时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时任英国共产党总书记。

毛泽东还讲了关于自己与金日成的会面情况。毛说，会谈涉及了两个问题：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撤出朝鲜和在中国的朝鲜政治侨民的情况。毛让金日成相信，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是非常必要的举措，并建议撤军分三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平均为2个军。在谈了这样做的理由的同时，毛泽东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保障这些军队在朝鲜的后勤供给，国家预算负担很重。他还强调，中国军队撤出朝鲜有可能促使美国人的两个师也撤离朝鲜，并有助于李承晚军队数量的削减。毛泽东认为，中国志愿军撤离朝鲜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拥有了相当稳固的边境和30万军队”。如果美国和李承晚方面胆敢挑衅，“志愿军还是志愿军，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援助朝鲜人民的”。毛说，以前金日成一直是反对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的，在这次会面期间他答应将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关于中国境内的朝鲜政治侨民问题，毛泽东建议金日成在途经中国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时，将他们都集中到北京，并“宣布予以大赦”。毛泽东向金日成保证，中国永远都不会利用这些朝鲜人去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金日成答，“朝鲜也不需要这些人”。

接下来，毛泽东又与金日成谈了关于周恩来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的问题。对此，毛说，我对金日成讲，“看来，要是我（毛泽东）去朝鲜，你们是不会欢迎的，因为我带去的都是些坏消息”。金日成不同意这一观点，并表示，如果毛泽东来朝鲜，他将组织最盛大、最热烈的欢迎仪式。

II. 尤金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7卷第335页

中国的外交政策与斯大林的错误等问题

——毛泽东与葛罗米柯谈话纪要

(1957年11月19日)

摘自 A. A. 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7年11月20日

第 02429/Γ C 号

绝密

文本第 36 份

毛泽东与A. A. 葛罗米柯的谈话记录

1957年11月19日

今天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毛泽东同葛罗米柯的会谈。

毛泽东对葛罗米柯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首先回顾了 1949-1950 年他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时的几次会谈。

在谈话中，毛泽东对苏联外交部的工作很感兴趣，他指出，中国一直在密切注视着苏联外交部的工作。他说，苏联的外交官“不仅为自己战斗，有时还不得不为我们大家而战斗”。毛泽东指出：至于我本人，我一向支持你们，不错，“是在你们背后”。

葛罗米柯说，在国际舞台上的一切事务中，苏联代表都感受到人民中国的支持。在一切国际会议上，人民中国总是无形地和我们坐在一起。

接着，毛泽东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问题。他说，中国一

向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措施。在同美国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中国力图“离美国更远些”。他强调说，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以下基本方针：在今后10-15年内中国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他说，这个方针对中国有利。“台湾问题的存在”有助于实现这个方针。他指出，美国想把台湾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也对我们有利。他开玩笑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杜勒斯成了兄弟。他接着说，现在只担心一件事，即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或在国内势力的影响下，美国将抛弃台湾的蒋介石并试图渗透到我国大陆来”。在这种情况下，将出现一定的困难。

毛泽东继续发挥自己的想法，他强调说，虽然我们公开声明愿意同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实际上我们并不完全甘心情愿，因为在个别情况下，对我们来说，这样做甚至弊大于利。中国在政治和人口方面是个大国，但在经济方面是个弱国。我们最担心的是美国同我们建立官方关系并渗透到中国大陆来。中国有500万知识分子和70万资本家及其家属。在这些人中，大部分赞成社会主义。但其中一部分是右派分子，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代理人。

中国在经济方面还不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因为中国没有必需数量的商品进行对外贸易，缺少外汇。根据这些原因，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对中国有利。杜勒斯的对华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效劳。他不想承认我们，这使我们很高兴。如果这样长期拖下去，比如说，拖半个世纪不承认，到那时就有可能赶上美国。在经济方面达到这个目标，看来需要十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同时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中国钢的年产量为520万吨；美国为1亿吨；英国为2000万吨；德国为2000万吨；法国1600万吨；日本1000万吨。意大利的钢产量大体上和中国目前的水平差不多。因此，意大利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毛泽东强调说，从上述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在对待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必

须坚定地奉行既定的对外方针政策。

他问葛罗米柯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葛罗米柯答：中共的这个方针是明智的和正确的。他补充说，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这个方针同苏联以及中国其他朋友所采取的立场是不矛盾的。他们经常在国际舞台上提出关于准许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和从而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毛泽东同意这种说法。他说，中国政府在公开声明中也强调这一点，并批评那些不允许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国家的顽固立场。

然后葛罗米柯同毛泽东就美国对中国最近的对外政策有何反应问题交换了看法。葛罗米柯强调指出了这一情况，即中国在同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上的坚定的原则立场，迫使他们像尊重实力和毅力一样尊重人民中国，尽管他们非常敌视人民中国。

毛泽东同意这种说法。他再次指出，中国丝毫不急于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在日内瓦的大使级谈判可以进行 20 年。我们完全可以等待。他接着说，大家知道，在朝鲜同美国人也谈了两年，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直到朝鲜和中国军队在前线打了胜仗，美国人才不得不同我们达成协议。

葛罗米柯接着指出，根据他在美国期间形成的印象，美国统治集团在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方面，现在未必会采取实际步骤，因为他们害怕，在这方面的任何努力都会被看作是美国软弱的表现，从而对美国的整个政策都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葛罗米柯说，由于苏联在军事技术领域取得的最新成就，这种心态就更加突出了。在裁军谈判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美国在整个对外政策方针有可能破产的威胁下，害怕作任何让步，认为这种让步会被看作是软弱的表现，会使许多国家离开他们，从而动摇他们操纵的军事集团。

毛泽东指出，这样认识和评价美国人的情绪是正确的。他接着谈及中国对英国的政策，他指出，中国反对英国奉行的对外政策措施，

避免同英国接近。英国对中国大体上也采取同样的政策。毛泽东在回顾中英建交的历史时指出，在初期，英国极力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级代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谈判，最后达成了关于建立半正式外交关系，互派代办级代表的协议。英国人对此也很满意，他们立即往北京派来了代表。毛泽东接着说，中国长期没有派代表去伦敦。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艾登专门找周恩来商谈这个问题。因为英国和法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了比美国进步的立场（他们甚至同意在越南停火），中国才决定派代表去伦敦，为的是进一步扩大美国同英国之间的矛盾。

然后毛泽东指出了英国对中国的前后矛盾的立场：英国一方面主张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的确，他们在表决时有时弃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他们的立场也表示不满”。因为他们不赞成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毛泽东说，我们一贯坚持，在中国问题上，英国在联合国应像苏联和印度那样去做。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才同意同英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级外交代表。

毛泽东说，至于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等国家，我们不主动提出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在同他们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时都提出一个主要条件：要求把蒋介石集团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由此可见，中国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她承认问题上追求两个目的：使这些国家摆脱美国并断绝同“台湾政府”的联系。

葛罗米柯请求澄清一个问题，即在举行关于建立外交关系谈判时，是否提出必须承认准许中国进入联合国这个条件。

毛泽东答，主要的条件是断绝同蒋介石政府的联系和把它的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他说，英国同意第一条，但不赞成第二条。因此，中国同英国只建立了半正式的外交关系。在一切国际会议上，中国都始终一贯地坚持这一原则立场。他同时举出最近在国际红十字会会议

上发生的一件事：中国代表坚决声明，在蒋介石集团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将不参加这个组织的会议。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说，苏联在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所奉行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苏联代表为维护中国的合法权利而进行的顽强斗争表示感谢。与此同时，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可以再等15年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说，到那时中国钢年产量将达到4000万吨。据波立特同志讲，再过15年英国的钢年产量只能达到3000万吨。由此可见，再过15年中国将超过英国，苏联将超过美国。他对葛罗米柯同志说，站在我们共同的这样的“钢的讲台”上，你的工作将会轻松些。这里还必须加上中苏两国众多的人口。

毛泽东通报了中国钢产量增长的极高速度，来证明中国达到钢产量的上述目标是完全可能的。他说过去，中国于1943年达到的最高钢产量是90万吨，其中大约80多万吨是在日本企业家手里，大约4万-5万吨是蒋介石那里生产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同1943年的“最高年产量”相比，钢产量大大减少了。目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钢年产量将达到520万吨，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2000万-2200万吨，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3000-3500万吨，在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时——4000万-4500万吨。毛泽东在强调了中国的钢产量增长的良好前景后指出，苏联的钢产量是高速增长的，特别在最近几年更是如此。他说，在这样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很难想象，苏联在最近的将来会取得多么大的成就。

毛泽东在谈论中苏两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优越时指出，我们两国的市场的容量是无限的，不需要寻求外部销售市场。

葛罗米柯在谈话过程中谈到了裁军问题。他强调说，在裁军问题上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美国的处境是复杂的和微妙的。葛罗米柯说，一方面美国拒绝同中国直接进行谈判，不同意让中国参加谈判；

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回避涉及中国的裁军问题。因此，在谈判中讨论裁减大国武装力量时，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应当讨论四大国裁军问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另一个问题，没有中国的代表参加，不能解决涉及中国的任何问题。我们认为，这种立场在今后也是可以采取的。葛罗米柯想知道中国朋友对苏联的这种立场有何看法。

毛泽东指出，苏联拒绝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中国问题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是讲原则的。他接着说，中国没有参加裁军委员会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中国放开手脚实行自己的对外政策。“中国感到比较自由，不受任何条约和协定的约束。现在，如果邀请我们参加某个国际会议或某个国际机构的工作，我们还要等一等，等他们邀请三四次之后，我们再考虑是否值得参加。”不错，我们的这种立场很像“贫穷人的立场”，我们虽然穷，但我们有志气，有原则。

毛泽东接着说，在同任何国家的关系中，我们一贯遵守完全对等的原则。在这里，他提起邀请美国访问中国那件事。毛泽东说，去年曾允许一批进步的美国记者访问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提出任何条件。中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搞臭坚决反对访问的杜勒斯的政策。后来，美国国务院禁止这批记者访问中国。今年杜勒斯试图组织另一批美国记者访问中国。毛泽东说，我们坚决要求遵守对等原则，随后在日内瓦大使级谈判时提出讨论这些问题。美国拒绝这样做，从而使他们自己处于防守的被动地位。

然后毛泽东谈及在中国关押的美国人问题。他说，这些人中有些已经刑满释放。某些友好国家的代表曾建议我们释放所有这些美国人。其中一个为尼赫鲁，另一个为莫洛托夫。毛泽东说，莫洛托夫对日内瓦会议的结果很满意，因此他劝我们释放在中国关押的所有美国人。我们拒绝了 this 建议，并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在刑满以后再释放这些人。

毛泽东说，很遗憾，这种人在中国已经很少了（大约只有10个人）。如果有400-500人就好了。

葛罗米柯说，中国朋友在国际事务中坚定的原则立场赢得资本主义世界代表人物对中国的尊敬。

毛泽东问葛罗米柯，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人物的印象如何，在他们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人物接触时是充满信心呢，还是没有信心。

葛罗米柯答，他认为，这些国家的代表人物在最近时期不如以前有信心。他们害怕社会主义国家实力的增长。由于苏联最近在科学技术领域获得了巨大成就，他们的这种心态表现得特别明显。但这些国家的代表人物在表面上还很自信，装腔作势，神气十足。

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于12月前来欧洲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议，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毛泽东对这些现象表示满意，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预兆”。

毛泽东接着简要地表述了他最近在兄弟党代表会议上发表的对国际问题的某些想法。他强调说，从1946年起他对这些问题考虑得很多。毛泽东在谈论这些问题时指出，当时中国革命还未取得胜利，希特勒灭亡了，欧洲建立了一些人民民主国家。他说：我当时充满信心，认为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比西方强大。希特勒被打垮后，美国人来了。从表面上看，他们比苏联强大，特别是他们投过原子弹。当时我写了篇文章，强调说，如果美国进攻苏联，他们不会赢得任何胜利，只会付出巨大牺牲。

毛泽东说，必须强调指出，美国最怕死人。如果打死几百人，对他们来说就非常严重了。如果他们伤亡200万-300万人，那就等于美国的灭亡。因此，他们不敢进攻我们。对他们来说，最好是他们能够剥削其他国家的人民，而不付出任何牺牲和代价。毛泽东说，他认为，美国力图使其他国家的人民依附于他们，占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

中间地带的领土。他们想不通过战争去奴役这些国家，在那里建立基地，同这些国家签订政治、经济和军事条约。他们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反苏反共的旗号下进行的。美国的这种政策产生了两种矛盾：

1，执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恢复了英国和法国的国力，他们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现在他们说，美国的所作所为不是反对苏联，而是反对他们。毛泽东说，这些国家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他们同美国的矛盾对我们有利。据此，在兄弟党会议宣言中，有意识地没有把美国同英国、法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某些兄弟党的代表，如波兰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同苏联同志协商后得出一致的结论：我们的打击目标应集中在美国身上，从而促使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加深。

2，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同前殖民国家和美国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许多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有 13 亿，其中 7 亿人生活在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如印度等）。

毛泽东还指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还没有取得独立。前殖民国家在那里还保留了自己的利益。

毛泽东举埃及为例。他称赞了纳赛尔把西方国家在苏伊士运河的银行资本实行国有化的勇敢行为，他同时强调说，英国和法国在埃及铁路和其他企业的投资并没有实行国有化。仍然保留了英国和法国垄断资本在苏伊士运河的某些利益。毛泽东接着谈到埃及的财政困难，他说，纳赛尔本来指望，用经营苏伊士运河的收入完全弥补经营和完善运河的开支，并提供建设阿斯旺水坝的投资。但现在可以看出，用经营苏伊士运河的收入是不能达到上述目的的。毛泽东随后指出了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说，纳赛尔在对所有外国资本实行国有化方面还不够彻底和坚决。他预料，美国会利用埃及的经济困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葛罗米柯通报说，埃及人现在还向苏联请求提供贷款。

毛泽东指出，“请你们提供贷款，这是另一回事”。他接着说，很难指望，埃及在经济方面会断绝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尼赫鲁对外国在印度的资本实行国有化方面同样也不彻底。虽然他已大张旗鼓开始干起来，但后劲不足。毛泽东指出，一般说来，印度的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比其他中立国家强大。他在谈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说，印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钢产量只增长 30 万吨，而中国增长了 330 万吨。

葛罗米柯同意毛泽东的说法，即印度在经济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依靠美国和英国资本，有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在继续发挥他的想法，他说，中国与印度不同，中国主要靠自力更生。不错，苏联向中国提供了 62 亿卢布贷款。毛泽东指出，这批贷款一部分已经偿还，大部分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偿还，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将还清苏联的债务。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用于以下两个方面：三分之一用于经济建设，购买各种设备；三分之二用于朝鲜战争，购买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中国将用自己的国内积累逐步偿还债务。今后我们打算“避免从苏联取得贷款，因为除我们以外有许多国家向苏联请求援助”。他说，中国不会向资本主义国家借一分钱。

毛泽东接着再次叙述了他在同赫鲁晓夫会谈时已经谈过的关于如何满足中国政府的各种请求问题。他说，这里可能有两种态度：

- 1，满足中国方面的一切要求。他说，苏联同志的想法是这样做可以不得罪中国人，不会搞坏同他们的关系。毛泽东说，他认为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恶化同苏联的关系”。还应当考虑到，中国的经济部门领导人并不经常了解本国的全部情况，总想依赖别人过日子。需要教育他们，使他们一方面依靠苏联，但同时又不力图依赖苏联。这里他又指出，不仅我（毛泽东）依靠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同志，你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我。“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同共同的敌人作斗争”。

2, 对我们的请求持较严格的态度。“对我们的请求也许只需要满足一小半, 或者至少需要减掉 30%”。应当做到, 使中国有关部门“不因吃得过饱而感到腻烦”。对中国方面的请求持这样严格的态度, 可以迫使中国经济部门领导人更认真地考虑如何解决内部困难。这里我们不应忘记苏联人民当年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大家都知道, “只有在困难中才能锻炼人”。

毛泽东在此讲述了中国经济部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一项建议。他说, 前年中国的棉花大丰收, 使得去年的棉布产量大大增加, 因而提高了居民的棉布供应量, 每人棉布供应量定为 12 米。他强调说, 对于中国人, 这样高的定量是空前的。但在确定这个定量时, 没有考虑到以后棉花歉收时如何办。到 1956 年, 棉花收成不好, 我们的经济部门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弥补棉布的缺额。因此, 中国经济部门领导人提出了今后 5 年平均每年从苏联购买 5 万吨棉花的建议。这个建议在北京讨论过, 当时我在杭州休假。我们的同志原则上同意这个建议, 但还没有向苏联政府提出, 因为那时你们正开展反对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斗争。

在回到北京后, 我反对我们经济部门领导人的这个建议, 向他们指出: “不应再麻烦苏联同志, 因为苏联不仅要满足国内的棉花需求, 而且还要满足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棉花需求, 此外还要到国际市场上换取必要的外汇。”最后我们决定不向苏联政府提出这个请求, 为了解决困难, 把每人的棉布供应量从 12 米减到 9 米。的确, 这个决定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毛泽东在谈及棉花困难时还说, 去年播种面积减少了 20 万公顷。他指出, 这项临时措施是因粮食作物面积太少而采取的。从明年开始, 中国打算重新恢复原来的棉花播种面积, 并采取措施提高每亩棉花的单产, 并增加合成纤维的产量。

在会谈中毛泽东广泛地谈论了苏联对中国援助的意义。他说, 应当合理地利用这种大规模的慷慨援助, 把它用在主要的工业项目上。

他强调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向中国提供过这么大的援助。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德国、捷克、波兰）也向中国提供援助，但这种援助远不能同苏联的援助相比。苏联同志公正地指出，在中苏两国经济关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像当前这样大的贸易规模。

然后，毛泽东在谈及中苏两国外交部的工作时强调了这样一个特点，即中苏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主要是通过两党中央解决的。苏联外交官的主要精力看来需要集中放在同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上。他接着说，我们给我国外交部提出的任务是扩大同中间地带国家的联系。对于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目前尚未认真对待，因为这些国家对我国采取不友好的态度。

葛罗米柯指出，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联系确实具有党的性质，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在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领导下，苏联外交部的主要任务是加强苏中关系，加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关系，同时通过某些对外政策措施动摇帝国主义阵营。

毛泽东强调说，这些任务同中国外交部的任务是吻合的。

葛罗米柯赞扬中国朋友对印度、印尼等国进行的大量的有益工作。苏联代表在国外的活动中经常体会到这些工作的效果。

毛泽东再次强调说，兄弟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原则上不同于兄弟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因为前一种关系主要是在党与党之间发展的。兄弟国家的外交部在发展和巩固这些关系方面也发挥而且应当发挥一定的作用。毛泽东预祝苏联外交部在工作中取得新的成就。他说，很明显，“没有莫洛托夫你们的日子也过得去”。

葛罗米柯说，没有莫洛托夫事情进展得更好些，因为他妨碍了苏联外交部及其在国外机构的工作。他是党肩膀上的沉重包袱。尽管他本人认为，没有他天会塌下来，会落在地上。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毛泽东赞扬了上述说法。他说，如果莫洛托夫的路线在苏共中央取得胜利，那么“这不仅对苏联，而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很危

险的。大家都会因此而遭殃”。

葛罗米柯列举了一些事实，如：莫洛托夫实际上曾打算把阿尔巴尼亚和东德让给帝国主义，他曾建议把这两个国家排除在华沙条约之外。这些事实足以说明莫洛托夫执行的是什么路线。

接着，毛泽东回忆他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情况，那时他在苏联停留了两个半月。他说，“在此期间我同斯大林吵过几次”。斯大林憎恨我。在一次会见中，他（斯大林）组织了对我的“攻击”。第一个开炮的是莫洛托夫，第二个是贝利亚，斯大林最后作总结。他们强加给我的罪名大体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毛泽东虽然是共产党人，但充满民族主义情绪。”毛泽东说，他们还表示担心，在中国会出现“自己的铁托”。毛泽东指出，当时担任翻译的费德林是这次谈话的见证人。参加这次会见的只有两个中国人，即毛泽东和周恩来。周恩来极力使斯大林等人相信，在中国没有“民族共产主义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亲美的。毛泽东说，在这次谈话中，我基本上保持沉默，只是“内心里讥笑他们”。我不想反驳他们的说法，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不符合事实。”毛泽东说，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还不敢扣押我，最后为了挽回局面，才签订了1950年2月14日的条约和其他协定，把中长铁路还给了我们。

毛泽东强调说，对于争论的问题，斯大林不愿倾听我的意见。有一次他甚至扔掉了电话筒，中断了同我的谈话。另一次回答我说，斯大林不在家，已委托米高扬同我谈话。毛泽东说，当时曾想“让我们吞下两个我们不愿意吃的苦果”。第一个是所谓合营股份公司问题；第二个是最难忍受的问题，即在东北和新疆的“势力范围”问题。

毛泽东在谈话中叙述了关于这些问题的谈判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他说，当时蒋介石组织了对上海的疯狂轰炸，企图摧毁那里的工业企业。我们请求斯大林派一两个空军师去保卫上海，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空军。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莫洛托夫

问：“我们能否把新疆和满洲看作是苏联的两个势力范围？”原来是这样，只有在我们表示同意的情况下，苏联才会派两个空军师去上海。

关于这两个“势力范围”问题，是指在上述地区只能允许中国和苏联公民居住，禁止第三国公民在那居住。毛泽东接着说，在谈判时我问莫洛托夫：对在东北居住的朝鲜人如何处理呢？在东北有150万朝鲜人，而且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几百年。莫洛托夫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此外，在哈尔滨还有相当多的波兰人、南斯拉夫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在新疆南部有巴基斯坦人（大概200-300人），他们在那里经商。我们根据同斯大林达成的这个协议，不得不把巴基斯坦人赶出新疆。

从前只有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过这种做法。我认为，斯大林具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东北和新疆问题证明了这一点。南斯拉夫事件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是斯大林搞坏了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骂铁托是法西斯分子，是刽子手。

从全局来看，我们认为，斯大林的功劳占70%，错误占30%。或许，历史学家对斯大林的功劳与错误将作出另一种评价。也许认为他的错误占10%，但即使在这10%的错误中也有大国沙文主义错误。苏共中央现在正在纠正这些错误，这是非常正确的。“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的做法好像揭开了我们身上的盖子，消除了宗教式的迷信”。毛泽东说，在个人迷信问题上，我们不完全同意你们，主要是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初期，没有适当地确定斯大林的功劳与错误的范围。不错，在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上，对这个问题讲得比较明确些。“由于这个补充，我们双方的观点接近了”。

葛罗米柯问毛泽东：是“接近”还是“一致”？

毛泽东答：是“一致”。然后他说，他认为，“斯大林的功劳比较大，还是错误比较大，讲得不够明确”。这个问题不仅同斯大林本人有关，而且同苏共全党、同2亿苏联人民有关，因为在斯大林生前

的30年间，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些功劳是同苏联人民、苏共、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相联的。这种联系正确地反映在6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会议上也公开地谈到这个问题。

葛罗米柯在此强调说，苏共中央、苏联领导同志和赫鲁晓夫同志本人都不止一次地谈到斯大林的活动，实际上既谈到他的功劳，也谈到他的错误。他说，他本人认为，确定斯大林的功劳和错误的准确比例和用比例来表述是困难的。采用这种方法有陷入机械主义的危险。既肯定他生活和工作中的正确方面，也认清他的错误不是更好吗？

毛泽东同意这种说法，即这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因为确实“不能用斤两来衡量功劳和错误”。他表示相信，历史学家解决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的。但他接着又说，在中国认为斯大林的功过是三七开。或许历史学家将来纠正我们。总的来看，在评价斯大林方面，我们同苏共的看法是一致的。

毛泽东接着说，苏共和中共在匈牙利问题上也没有分歧。同时他强调说，这个问题是在同中共中央密切协商中解决的。他援引了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来莫斯科商谈的经过。

毛泽东说，中国代表随时准备前来莫斯科，以便商谈需要讨论的问题。他说，如这一次，当需要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时召开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立即来到莫斯科。

毛泽东强调说，今后在国际舞台上可能出现许多问题，我们的同志，如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毛泽东、陈云，任何时候都可以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同志。毛泽东在这里对陈云的评价很高，说陈云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是杰出的“经济管理领导人”。

在谈话中，毛泽东对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同志本人的工作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强调说，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倡议，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很好的措施。例如，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清除一

切不愉快事件和积垢的功劳属于赫鲁晓夫。正是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我们吐出了当年强迫我们吞下的那些苦果”。他接着说，中国赞赏苏联同志的工作作风有很大改善。这种改善也深刻地影响到其他国家。毛泽东说，我们两党中央之间以及其他各兄弟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值得称赞的。这明显地表现在兄弟党会议上。开会时考虑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尽量团结一切力量。毛泽东问：难道斯大林在世时能做到这一点吗？他说，当时“兄弟党”仅仅是一句好听的空话。实际上斯大林是父亲，我们都是儿子。

中国对苏联国内的变化也很高兴，从前，斯大林在世时，谁也不敢对他提出一句批评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苏联同志，特别是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同志都向我讲过。

毛泽东满意地谈到他第一次和第二次访问苏联时所受待遇的重大差别。他说，这次我于11月2日来到莫斯科，11月3日就同苏联领导同志举行会谈和共进午餐。在那次会谈中特别提到，斯大林同兄弟党代表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比作“父子关系，或猫鼠关系”。“你们苏联同志正确地指出，更像猫鼠关系，如果说像父子关系，那就不是欧洲家庭中的父子关系，而是封建制和父权至上的亚洲家庭中的父子关系”。

毛泽东在回到斯大林评价问题时说，斯大林也有个优点，就是不固执己见。过一两个星期后他可以同意他曾经反对过的东西。例如，当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他终于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亲美的，中国革命不是民族共产主义的革命。朝鲜战争开始后，苏联同中国签订了关于援助中国建设156个企业的协定等。对此，中国人民感谢斯大林，感谢苏共中央和苏联人民。

葛罗米柯说，苏联政府对中国的这些友好行动符合苏联人民热爱和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

毛泽东答，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是相互热爱和尊敬的。“我们和

你们是全天候朋友，即使当年你们扣押了我，刘少奇仍然会是你们忠实的朋友。”

毛泽东接着说，我应当向斯大林在天之灵表示歉意，尽管在他生前我们俩吵过架。当然我们没有采取南斯拉夫人的做法。南斯拉夫人在回敬斯大林的漫骂时，指责苏联是“红色帝国主义”。无疑，应当承认，当时犯的错误是局部性质，从全局来看，苏共和苏联还是正确的。在评价一个党的全部活动时，应当对这些活动进行马列主义的分析。

毛泽东说，对中共的活动也需要进行分析。总的来看，中共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但在历史上犯过一些错误。他在这里列举了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和高岗的反党活动。他强调说，“在苏联有个莫洛托夫，在中国有个高岗，高岗是个可怕的人物”。他指出，高岗在自己周围联合了100多个领导干部，特别是在东北。在中国6个大行政区中，在4个大行政区都有他的代表人物。高岗的这些追随者后来承认，他们曾试图把陆军、空军、海军的领导干部拉到自己方面来。毛泽东说，高岗分子提出的口号是：“拥护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分子刘少奇和周恩来。”如果高岗分子清除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计划得以实现，那么下一步就该“打倒我了”。值得注意的是，高岗在最后一个时期，特别关注我的健康状况。“有一天，当他得知我的身体不好时，他立即从南方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说，高岗受到斯大林、贝利亚、莫洛托夫，看来还有马林科夫的信任。高岗曾背着中共中央向贝利亚集团提供秘密情报。毛泽东还说，贝利亚的代表戈格里泽为此目的曾秘密到东北同高岗会见。毛泽东在回忆这件事时说，早在1949年，刘少奇同斯大林在莫斯科曾经商谈：在兄弟国家不搞情报活动。斯大林同意这个建议，并于1951—1952年向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式发了文件，说在兄弟国家不再搞情报工作。毛泽东说，但这是一句空话。“其实，在贝利

亚被枪毙以前，这种活动一直在进行”。

毛泽东说，我在这里所谈的一切都属于斯大林那 30% 的错误。中国有一切理由对斯大林不满。我们的不满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中国革命在 1930 年代遭受到巨大损失，丧失了 90% 的革命力量。在那些年代，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进行伤亡惨重的长征。毛泽东说，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在苏联治病的王明本人会讲得更清楚。不过，他本人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2，在 1945 年，“不允许我们革命”。当时斯大林以苏共中央的名义给我们一个指示：不要开始打内战。原来是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和罗斯福进行过分工。罗斯福负责劝说蒋介石，斯大林负责劝说共产党。毛泽东接着说，斯大林在指示中指出，如果中国共产党开始打内战，“他将袖手旁观，其后果不堪设想”。还推测说“整个中华民族将要灭亡”。毛泽东指出，我们“没有执行斯大林的指示，而且是蒋介石分子首先向我们发动了进攻”。斯大林的这个指示妨碍了中共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开始夺取政权。

3，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革命胜利的事实本身受到怀疑。猜测说“中国共产党人是铁托分子，是亲美分子”。毛泽东说，对我们的这种怀疑直到朝鲜战争后才得以消除。

毛泽东说，确实，关于对斯大林的不满，我们从来没有公开过，为的是不给我们的敌人以口实，使他们用来在中苏间制造分裂。在刚刚结束的兄弟党会议上，我们也不能讲许多。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很多。帝国主义可能从这里了解到许多情况，并用来损害我们的事业。因此，在会议上我们只讲对斯大林的不满，但不讲为什么不满的细节。

葛罗米柯同意毛泽东的上述说法，即他回忆的这些具体细节如果公开讲出去，是会被帝国主义利用的。

毛泽东接着强调说，关于中共中央的这种不满，中国老百姓是不知道的，除中共中央委员外，中共一般党员也不知道。毛泽东指出，

不错，由于国外发表了雅尔塔会议的文件，中国有人知道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协定，也有人从杰吉耶尔写的铁托传略中看到这个协定。在这个传略中还有关于雅尔塔会议在南斯拉夫划分势力范围的材料。

葛罗米柯就此问题对毛泽东说，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引证的那个文件，说在南斯拉夫划分势力范围问题似乎达成了协议。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经过查证，这个文件没有发给苏联，当然苏联也没有答复。葛罗米柯指出，在不久前出版的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通信集中专门对这个问题作了解释，而且英国人对此解释也没有提出异议。

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南斯拉夫同志应该注意到这个情况。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祝贺苏联外交部在加强苏中友谊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再次强调说，中国和苏联是“由永恒的友谊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表示希望葛罗米柯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

会谈进行了3个小时。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

记录：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O. B. 罗满宁

发给下列同志：阿里斯托夫、别里亚耶夫、勃列日涅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基里琴科、科兹洛夫、库西宁、米高扬、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卡伦别尔津、基里连科、科罗特琴科、柯西金、马祖罗夫、姆扎瓦纳泽、毛希丁诺夫、别尔乌辛、波斯佩洛夫、马林、葛罗米柯、帕托利切夫、扎哈罗夫、佐林、谢苗诺夫、费留宾、费德林、波采罗布、察拉普金。

文件3份，送：情报委员会、远东司、档案室

共印 39 份，1957 年 11 月 20 日

印发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

葛罗米柯

1957 年 11 月 20 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 7 卷第 344 页

与金日成谈彭德怀

——南日转告毛泽东的谈话（摘录）

（1957年11月26日）

1957年11月28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10月26日至11月26日第286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11月26日

应邀拜会了南日。……

在同我的谈话时，南日严肃而又表示信任地对我说，在莫斯科，金日成同毛泽东两次谈话时（有金吕满和他（南日）在座），对去年9月彭德怀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事十分注意（见1957年11月27日我的第655号电报）。

在同毛泽东的第二次谈话时，金日成说，彭德怀到别墅去找他，同他谈了很长时间。

毛泽东说：彭德怀去您那儿了，很好，他还没有来得及向我汇报同您谈话的事，但我要告诉您，彭德怀讲的不都是事实，所以彭德怀讲的不一定都是中央的意见。只有我（毛泽东）讲的才是中共中央的意见。

……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7卷第358页

中苏的外交政策和中国的国内形势

——毛泽东与尤金会谈纪要

(1958年2月28日)

摘自 II.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3月15日第74号

绝密

文本第2份

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纪要

1958年2月28日

受中央委托，今天我去拜访了毛泽东并向他阐述了苏联政府在高峰会议问题上的立场，向他通报了有关印度尼西亚的消息。

毛泽东满怀兴趣地听取了高峰会议的消息，并且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新闻中阐述的苏联的立场，他补充说，“是积极的和完全正确的”。

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消息引起了毛泽东的很大兴趣。他说，完全支持苏联政府支援印度尼西亚的措施。毛泽东说，中国也支援苏加诺^①棉布和大米。此外，众所周知，中国已给印度尼西亚提供了2000万美元的贷款。

在会谈中，毛泽东几次强调，必须给印度尼西亚提供相应的援助，“这些援助是它所必需的”。他指出，近几天，印度尼西亚内阁作出了重要决定——采取军事措施反对暴乱者，在这种情况下确实需要支

① 苏加诺，时任印度尼西亚总统。

援苏加诺。同时还需要考虑到，他继续说，印度尼西亚政府，尤其是苏加诺和哈塔，正遭受外来的巨大压力，军事方面有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行动，经济方面有经济封锁的威胁。毛泽东援引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消息说，印度尼西亚政府已决定邀请苏联军舰进行友好访问。“我认为”，他指出：“如果苏联军舰这一访问不伴随什么危险，那么绝对应当实施这一访问，这将是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在菲律宾地区行动的一种对抗。”毛泽东还谈了艾地^①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立场。

然后，毛泽东赞许地谈了他对苏联政府想就印度尼西亚问题同尼赫鲁接触的看法。尼赫鲁，他指出，也许能想出什么有益的东西。从经济援助的观点看，印度可以援助印度尼西亚船只。的确，印度不能提供粮食，因为他现在还从美国购买大批粮食。

于是毛泽东简要地谈了印度的经济形势。指出，印度农业苦于经常遭受自然灾害，这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困难。印度没能力自己解决这些困难。被迫求助于外国援助。

然后就我通报的两则新闻概括地发表了看法，毛泽东强调说，“中共中央完全支持苏联正确而有成效的政策”。最近几个月，他说，“我们在中国高兴地关注着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积极的对外政策行动，满意地看了你们相应的文件。”“我们完全支持苏联最近的所有政策，这些政策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是深思熟虑的。”

这些措施，毛泽东继续说，使资本主义世界处于被动地位，迫使它进行防御。相反，由于苏联的努力，国际形势对社会主义阵营完全是有利的，因为“在我们一边集中了亚洲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巨大力量。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里，他指出，都出现了我们的拥护者。资本主义世界，毛泽东说，处于被迫让步的形势之下，其中包括在裁军问题上。在某些地方，他指出，人们开始明白，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

① 艾地，时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

器的战争会导致什么。大概，要消灭比如说西德或英国，使用4个氢弹就足够了。

不能排除，毛泽东说，人类不能逃避这种状况，“资本主义阵营的疯子们会开始热核战争”。无论有多大牺牲，毛泽东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也不会灭绝，可能得用100年时间才能恢复在这一战争中失去的东西，但资本主义体系将从地球上永远消失。

但也存在另一种结局，即资本主义体系被迫同社会主义阵营妥协。帝国主义者，他强调，可以同意禁止使用原子和氢武器，就像当年他们同意禁止使用化学武器一样。应当注意到，毛泽东指出，双方都明白，在发动热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一阵营和另一阵营国家的人民将遭受什么样的牺牲。而且，资本家还将考虑到，在战争情况下，消灭的不仅有他们的资本，还有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所以他们害怕原子弹和氢弹。“但他们也同样害怕我们拥有普通装备的正规军”。这个问题现在特别使英国人感到不安，他们公开讲，在禁止氢弹的情况下，他们“面对苏联陆军和空军优势的兵力将处于束手无策的境地”。出于这种考虑，英国政府在同社会主义国家谈判之前，急忙建立自己的火箭装置和氢弹储备，而为了掩盖自己的计划和支持军事狂热，他们同美国人一起组织了所谓的“带原子弹和氢弹飞机的安全飞行”。帝国主义国家所煽动的军事狂热以及军备竞赛，毛泽东说，进一步促使了帝国主义矛盾的加深。

谈到美国领导人的最近讲话，毛泽东说，艾森豪威尔的立场看来大大好于杜勒斯的立场，“杜勒斯的发言我没看，因为我清楚，他（杜勒斯）要说什么”。

谈到离中国不远的美军事基地，毛泽东说，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冲绳岛、菲律宾和中途岛上的基地。“台湾和南韩是次要的危险，因为这些地区集中的强大的军事技术装备较少”。

在座谈时，毛泽东还分析了朝鲜问题。他说周恩来朝鲜之行取得

了积极成果。“朝鲜事态朝有利的方向发展是确定的历史条件和所有工作促成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他在莫斯科同金日成的会谈。当时我指出，毛泽东说，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活动中有积极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可归结为三个主要方面——反帝斗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捍卫国际主义原则。除此之外“我还指出，在党的活动中也有缺点，不能认为整个工作从头到尾是绝对正确的”。金日成在莫斯科会谈时承认他们党的作风和地方工作有不少缺点。

在莫斯科，毛泽东继续说，我还向金日成证明，中国志愿军必须从朝鲜撤出，因为“国内几乎驻有百万外国军队，这种状况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

然后毛泽东还谈了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关的其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已电告中央。

我们对朝鲜同志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毛泽东说，开始产生积极的结果。“在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周恩来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回来之后，讲了许多朝鲜劳动党中央工作作风的新气象”。总的来看，毛泽东说，赫鲁晓夫讲得是对的，朝鲜问题，尽管复杂，但毕竟比波兰问题轻。

在会谈过程中，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在提到以往几年的形势时，他指出，1955年冬季以前，“无论是我，还是中共中央，都没有现在这么高兴。只有在中国农业、私营工商业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之时，我们才切实感觉到有可能加快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但之后不久，从1956年6月至1957年6月，“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又进入了严峻的时刻”。在国际生活中——出现了匈牙利和波兰事件，这是世界所有反动势力的反共，尤其是反苏的行动。我们国内1957年春天出现了右派的疯狂进攻。

涉及匈牙利事件和当时工人运动的形势，毛泽东强调指出，这对

共产党和工人党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对他们应成为一次很好的教训。说到这里，毛泽东简短地叙述了他同布克^①就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党内形势会谈的情况。在其来华期间，毛泽东说，布克谈了匈牙利事件过后不久党内出现的严峻形势。毛泽东还分析了美国共产党的形势。莫斯科会议之后，美国共产党中央内部出现了激烈的斗争。毛泽东指出，丹尼斯^②这时期发生了动摇。

现在，他继续说，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事情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变化。比如在中国，中共开展的整风运动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毛泽东继续说，在中国以前历次政治和思想运动中也进行过，尤其是在揭露胡适、梁漱溟、胡风，批判了电影《武训传》和对经典著作《红楼梦》不正确的研究方法时。但所有这些运动只涉及个别的或部分问题，涉及的仅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个别方面。

毛泽东指出，对总的资产阶级思想实施决定性的打击，是从去年开始的，当时解决在中国是要无产阶级自由还是资产阶级自由的问题。众所周知，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阶级的自由观。在资产阶级自由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自由便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比如在波兰，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至今也没得到应有的重视，那里有过多的资产阶级自由。

毛泽东接下来谈到了中国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他强调指出，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不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拖延，没给小私有者留下“生根巩固”的机会。所以在土改之后几乎立刻就开始了合作化进程。

在完成所有制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我们开始了思想领域的革命。众所周知，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指出，‘生产

① 蒂姆·布克，时任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总书记。

② 尤金·丹尼斯，时任美共产党总书记。

关系’概念包括：1，所有制关系，2，生产过程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3，物质福利的分配。”现在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毛泽东指出，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第2个组成部分，在中国我们把它称之为“人民内部矛盾”。

为了解决群众和干部之间，工人和农民、工厂和农村领导之间相互关系中产生的问题，中国采用了大鸣大放辩论的方法。乍看起来，可能认为，他指出，这种方法“会损害党和国家干部的威信，但实践表明，并不是这样”。批评和批判少数工作不好的干部的同时，群众又保护多数好的干部。

解决生产中人们相互关系问题，毛泽东说，还帮助我们解决物质利益分配问题。例如，在整风运动中，工人们自觉宣布，“在未来15年内，他们不要求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给增加工资，发工作服和给予其他优惠，因为现在看到了自己面前的光辉前景和目标——大大提高中国的经济实力，以便赶超英国”。以前，他指出，工人们常常看不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本质区别，即“在某种情况下，劳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一定数量的工资或得到某种供给”。工人有时说，以前他们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所谓的“五大件”，即手表、钢笔、收音机、缝纫机和自行车。

在大辩论之前，毛泽东继续说，厂长、党委书记（工会、共青团）同工人之间经常形成不平等关系，即“老爷和劳动者的关系”。人民群众有时把干部称作“党（行政、工会、共青团）的官僚”。

由于在运动中广泛开展批评和我批评，形势开始得到好转：干部和群众之间建立起正常的平等的关系，工作中的缺点得到了克服。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是，干部勇敢地彻底地开展自我批评，为群众作表率。

由于最近的运动，人民群众的政治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业生机勃勃。看来，农业发展十二年纲要指标要比规定的期限大大提

前完成。全国兴起水利建设，水浇地面积大大扩大了，只要3年时间（1958-1960年）就可抵御一般的水旱灾害了（特大灾害除外）。原来计划完成这一任务需要10年。农业生产增长指标实现也无需10年，5-7年就可实现了。现在我们碰到自然灾害，毛泽东补充说，我们需要外援。但再过3年，“我们就会打个小的翻身仗”。毛泽东指出，不久前，他到各地走了走，有机会亲眼看到了人民群众高涨的生产积极性。

然后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国内的政治措施。毛泽东说，有时候，外国朋友不理解这些措施和工作方法。为了正确地评价这些措施和方法，需要注意中国的历史条件和中国人民的生活特点，他们在很多方面是与其他国家的传统和条件是不一样的。

然后毛泽东说，最近几个月，他到过山东、浙江、江苏、湖南、广东、广西等省。两周前，他刚从东北回来，他到了抚顺煤矿和铝厂、沈阳飞机制造厂和长春汽车制造厂。在高度赞扬长春汽车厂时，毛泽东指出了它的不少消极方面：“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这个工厂似乎太大了；由于缺乏原料，它的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此外，工厂许多零件自己不能制造，还需要进口。”看来，类似的大工厂，毛泽东说，中国不要很多。现在我们提出的任务是多建设中小企业，中小型企业需要投资不大，而在短期内便可建成。

会谈中毛泽东热烈称赞了苏共中央最近（2月）全会的决议。他指出：“苏共中央在全会上制定的措施是前进的重要一步；其目的是进一步加速发展农业，给生产力发展以一个广阔的空间。”苏联的这一经验，他说，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非常宝贵的。

然后我们和毛泽东详细地就机械拖拉机站改组的有关理论问题交换了意见。他赞成这种思想：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没能正确地看到机械拖拉机站的前景，所以作出了匆忙的、不正确的理论结论。

涉及斯大林时期苏联事业的整个形势，毛泽东说，工业当时进步很快，而农业却非常落后，“就像一匹瘸腿马一样，不能正常前进”。他接着说，在斯大林时期，对农民不正常的高税收也制约了农业的发展。斯大林在工业上也犯了错误，例如，对工业管理过分集中。但毕竟，毛泽东指出，斯大林的这些错误和其他错误现在可成为我们有益的教训，“我们不会再重犯这些错误”。

然后毛泽东谈到了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困难。“事情在于，你们和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没有先驱者。”如果在顺利的条件下，毛泽东说，苏联可用25-30年的时间走完自己40年的路程。他同意我以下补充意见：对于苏联来说，严重的困难是苏维埃政权初期国民经济所有领域缺少有技能的干部。

在会谈过程中，毛泽东同在莫斯科时一样，重新谈到“苏联哲学界有一个好的风气，苏联哲学很活跃”。他说，近来他想了解苏联哲学家的一些近作。他请我给他说出几个作者的名字并给他推荐他们的几本著作。

谈到自己，毛泽东说，从东北巡视回来之后他患了感冒，病了两个星期。一般说来，他指出，我在北京比在外地感到累，在外地我有机会同各界人士接近。现在中共中央，他继续说，作出了一个很好的决定，规定中央委员，各省委区委书记一年得下地方4个月，了解情况。这一规定只对那些身体不好不能下去的同志例外。这一决定，毛泽东说，能帮助我们克服领导地方机关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对我说，中共中央非常高兴地看到了赫鲁晓夫同刘晓的会谈记录。“这是一次很好的会谈。我们同意会谈中提出的所有问题。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进行了很好的工作，我们非常高兴。”

会谈持续了近3个小时。邓小平参加了会谈。

出席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使馆一等秘书罗满宁。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 尤金（签名）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7卷第411页

拒绝出席南共联盟代表大会

——毛泽东与尤金会谈纪要

(1958年4月5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4月19日

第128号

机密

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

1958年4月5日

我在武汉毛泽东的临时住所拜会了他，目的是向他递交苏共中央今年4月3日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信。周恩来参加了会谈。

我问他感觉身体如何，毛泽东回答说，现在他无大病，但是感觉不太好，老毛病常犯。毛泽东承认，他非常忙，感到很疲乏，而这引起了各种疾病。

我说，我受委托想再谈谈南斯拉夫问题，并亲自带来了苏共中央的信。毛泽东回答说，他还未看到南斯拉夫纲领草案的译文，并问我是否读过了这一文件。我作了肯定的回答。这时毛泽东请我首先详细叙述一下纲领的基本原则和我对这些原则的意见。我大约用了40分钟向毛泽东讲述了南斯拉夫新纲领最主要的原则。

在听取对苏共中央信的翻译和我关于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通报时，毛泽东时常插话和发表简短看法，表示对纲领中某些论断和南斯拉夫领导人这种行为的不满。

鉴于南共联盟纲领中对苏联的攻击，毛泽东指出，很明显，铁托认为，他可以肆意对待苏共和苏联。毛泽东说，铁托甚至喜欢使绊子：“杜勒斯开始这么做，而铁托紧随其后。”

涉及纲领中攻击苏维埃制度的“官僚主义性质”，毛泽东微笑地指出，南斯拉夫人“看来发现苏联有某种剥削者：似乎出现了剥削阶级，新资产阶级”。这涉及的正是南斯拉夫自身，毛泽东这时指出，据我们（中国）同志的观察，他们那里出现了真正的独裁，权力集中在一小撮人手里。

谈到南斯拉夫歪曲苏联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中的作用，毛泽东嘲讽地说，按照铁托的意见，战胜希特勒原来是用不正确的方法夺取胜利的：本不应该使用武力，而应代之以哲学讨论或向希特勒解释马克思主义真理。毛泽东继续发挥这一想法，指出，应为苏联政府和苏共在努力扩大社会主义力量的影响范围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高兴。至于我们中国人，毛泽东说，我们不满意的只有一点，这就是当时未把中国放入“社会主义范围”。“当时还指望蒋介石，所以达成了协议：罗斯福说服蒋介石，而斯大林说服我们。”

在自己的纲领中，毛泽东继续说，铁托攻击苏联在东欧国家的作用。坚持这种思想，看来对于铁托来说，倘若东欧继续存在资本主义，那将是一件快事。因为没有苏联的帮助，毛泽东强调，东欧国家现在就不会建设社会主义了。我指出，帝国主义分子之所以忍受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是因为它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列存在。毛泽东同意这一点，他强调，没有苏联的帮助，南斯拉夫则不能解放自己的国家，贝尔格莱德是苏联军队解放的。

我说，按照南斯拉夫人的意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应包括两点：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这时毛泽东立即指出，还必须讲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各共产党的统一和相互援助。毛泽东对南斯拉夫人企图阉割和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本原则感到气愤。

我说南斯拉夫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在国际会议上通过属于这些国家宪法法律范围内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微笑着指出，共产党会议宣言可以高出我们这些国家的立法文件。“因为法律”，毛泽东解释说，“总是在一定时间范围里有效，而我们这些党发表的宣言通常是宣布长期有效的原则。”

谈到南斯拉夫指责苏共是“霸权主义”，毛泽东强调说，毫无疑问，南斯拉夫人自己所追求的正是对于其他党的“霸权”。比如，假如说在某种程度上铁托有可能领导匈牙利人的话，那么决定匈牙利事情的将不是匈牙利人，而是南斯拉夫人了。因为众所周知，铁托曾干预匈牙利事件：他想支持纳吉。为了讨论纳吉的问题，毛泽东说，不久前铁托曾会见卡达尔。

我向毛泽东引述了南共纲领中间接驳斥莫斯科声明的一段话。于是毛泽东轻蔑地指出：“铁托根本不是反对所有的国际大会：他也积极主张召开高层次的会议，他也不反对参加这种会议。”毛泽东继续指出，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定没有强加于任何人，实现这些决定，这是各兄弟党自身的事。

我提请注意南斯拉夫人断然批评各兄弟党的活动。同时我引述了纲领草案里的一段相应文字。毛泽东指出，虽然南斯拉夫人没说是哪些具体的党，但十分清楚，他们所指的是谁。毛泽东认为，南斯拉夫人指的是法国、英国、瑞士、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但很可能，”毛泽东指出，“南斯拉夫人不想把这些批评加在意大利党的身上。”

我说，纲领草案对列宁的无产阶级党的原则进行了修正，南斯拉夫人认为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借助工会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在某些国家是可能的，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毛泽东指出，铁托是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积极活动的、时刻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人。很明显，铁托主张资产阶级政党可以继续存在，而共

产党不行。在这方面，他的主张同资产阶级活动家接近。例如在美国，只存在一个不大的共产党，而美国资本家已很讨厌它。美国政府千方百计迫害它。现在铁托说，没有共产党也行。

当我谈到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必须填补马克思理论“真空”的论断时，毛泽东笑了，他说：“可怜的铁托必须好好学习。”“原来，”毛泽东补充说，“不仅阿拉伯人那里出现了真空，我们共产党人这里也有。”

毛泽东非常赞成苏共中央的信中的结论部分，尤其是苏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第七届代表大会。

毛泽东转向周恩来，然后说，关于南共纲领草案和如何对南斯拉夫这一步作出反应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在4月5日和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详细讨论这一问题。接着毛泽东对我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定表态赞成苏共中央关于不向南斯拉夫人派代表团的决定，而且，无条件地同意苏联同志们对南共纲领的评价。

毛泽东说：“在中国支持铁托的只有右派。”毛泽东说：“当时我们公布了铁托在普拉的讲话，结果收到了很好的结果：我们很快查明了我们这里的许多右派分子，他们赞成铁托的口号。”毛泽东通报说：“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正在这里积极地做工作。例如，它给中国各地右派分子写给大使馆的信一一作答复。我们在四川、黑龙江和其他省份发现了大使馆给右派分子的回信。”“您知道，右派分子现在在中国被称作是社会主义的敌人。看来，在我们中国，铁托只在社会主义的敌人中间有影响。”

在翻译完苏共中央的信之后，毛泽东立即问我，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这个问题上持什么态度。我回答说，暂时我还不掌握这方面的消息。这时毛泽东说，根据他的看法，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中，11个党一定不会向南斯拉夫派代表团。看来，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不会派自己的代表去。也不排除，波兰人也不

往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派自己的代表团。毛泽东附带地说，据我看，在许多问题上，波兰统一工人党同意我们对南共纲领的评价。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他提起，在莫斯科会议上，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在重要的问题上实际上采取的是否定的立场。只是在辩论和给他们做了大量工作之后，他们才投票赞成会议宣言。毛泽东强调说，在南共第七届代表大会上，如果波兰人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那么这将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引起不满和许多批评意见，而且波兰领导人这一步将给自己在国内和国外造成很多困难。

毛泽东继续说，对于重大的问题，任何时候也轻视不得和掩盖不得。这时毛泽东引用了中国一句谚语：“纸是包不住火的。”如果波兰人想出席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说，那就让他们去好了。我指出，谁也没禁止波兰人往南斯拉夫派代表团。毛泽东补充说，波兰同志们必须认真地考虑这一切。

毛泽东说，我们总是把类似不愉快的事件看成是对我们共同前进有益的事。他说，我们不仅需要用阐述正确的或对我们友好的思想的文件教育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这是不够的。为了教育我们的人民，还需要利用我们敌人的行动，还需要揭露他们敌对的思想。

所以，南斯拉夫人现在的行动对我们来说还有某些积极的意义，毛泽东接着说。在他们的纲领中，集中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各个时期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所表达的修正主义观点。南斯拉夫人的这一行动迫使各兄弟党认真考虑和确定自己现在的立场。波兰统一工人党也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如果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向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派出代表团，那么它在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面前和其余所有共产党的面前，就将自己置于了非常困难的位置上。

出去同北京通完电话的周恩来到屋里报告毛泽东，说刘少奇今天白天报告：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南斯拉夫的问题。会议赞成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同意苏共中央的观点，不向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派中

共代表团。周恩来还通报说，北京认为4月5日不宜再召开政治局会议，因为政治局委员还未来得及读南共纲领的译文。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这个问题过一天，等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拟好草稿之后，再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毛泽东对我说，考虑到这个问题很紧迫，请我现在就把他们的答复通报给莫斯科。毛泽东说，请转告苏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表示同意苏共中央的立场。在类似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表明完全一致是特别重要的。他补充说，虽然我还未读完南斯拉夫纲领，但我完全相信对我所说的关于纲领的看法。“对于我们”，毛泽东微笑着说，“谈到关于铁托的意见，一切都是明白的。中国有句俚语，叫作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

在谈话过程中，我谈到《共产党人》杂志载文批判南斯拉夫纲领的问题。毛泽东立刻声明说，对南斯拉夫人的类似行动，可以而且必须给予回应。

周恩来指出，苏联大使将作为观察员出席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说，可以这样做。我当时指出，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当年也是苏共二十大的观察员。

南斯拉夫人，当然会指责我们中国共产党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不友好，毛泽东说。他们会说，南共曾派自己的代表团出席中共的八大。当然，他们还会说，中国人这样做是受了苏联同志们的影响。但是这一切，毛泽东说，都吓不倒我们。

毛泽东继续说：“在纲领草案出现以前，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到底该不该派代表团出席南共的代表大会。我们自己常说，由于我代表团应在大会上发言，多多少少得对南斯拉夫拉夫人说些褒奖的话。然而我们类似的发言会使南共队伍中许多人、南斯拉夫的居民以及其他国家误入迷津。这些人会认为，实际上我们几乎赞成南斯拉夫所做的一切。我们在南共七大上的发言可能对南共领导有利，而对我们不

利。”毛泽东总结说：“铁托以他的纲领，使我们避免了一场痛苦的迷惑。”

周恩来问我，苏共中央是否给南共七大发贺词。我回答我不知道此事。毛泽东说，即使苏共中央发，我们也不想发贺词。毛泽东说了这样的意见，他们的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可能被任命为大会观察员。毛泽东说，他非常满意我们共同决定拒绝派代表团出席南共七大。毛泽东强调说，各兄弟党有完全充足的理由作出这种决定。毛泽东满意地说，现在，我们已完全弄清这件事了。

毛泽东说，从整个情况看来，从1948年起，尤其是苏南关系正常化之后，南斯拉夫人早就不想使两党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强调说：“很明显，他们想把关系发展限定在国家范围里，以便为自己留下更多的行动自由，争取时间。”

毛泽东继续说，赫鲁晓夫同志主张采取措施，使两党关系正常化。这是非常好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假如南斯拉夫现在走上我们所期盼的道路，放弃自己的修正主义和其他错误，那当然很好。但现在的事实说明，南斯拉夫领导人不想走这条路。第一个最能表明他们真正立场的事实，就是他们拒绝参加莫斯科会议。第二个事实就是现在的南共纲领草案。我说南斯拉夫人在自己的报刊上没有全文发表莫斯科宣言。对此毛泽东回答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害怕那些原则使他们原形毕露。

毛泽东说，现在南斯拉夫人非常听命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毛泽东指出：“我认为，铁托的新纲领大概很使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高兴。”我指出，美国人对这一文件已作出积极的评价。

毛泽东说，铁托的新纲领表明，南斯拉夫领导人在美帝国主义面前很害怕。南斯拉夫人明显害怕原子战争，想站在这一战争之外。南斯拉夫领导人正在策划建立一个接受南斯拉夫思想领导的亚非国家大集团。他们把自己宣布成军事政治集团的反对者，想以此逃避原子战

争。必须指出，毛泽东说，铁托的计划在亚非国家中没有引起任何兴趣。这些国家有自己的领袖，如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等等。

毛泽东说，南斯拉夫人当然有更高的追求：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力量，能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但是，毛泽东指出：“铁托知道，他的市场不大：他的‘思想’只能在兄弟党中右派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那里找到需求。”

铁托的新纲领，毛泽东重复道，在这种意义上说来对我们大家也是有益的，即它迫使兄弟党更多地考虑反击修正主义。我说，铁托的这一纲领，在集中表现当代修正主义思想方面起着当年伯恩斯坦言论的作用。然后，会谈中，毛泽东又几次回到这一话题上来：南斯拉夫人类似伯恩斯坦，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掩盖自己的修正主义。

我指出，南斯拉夫人制定自己的纲领，看来是想以此博得第二国际社会党的赞许。南共邀请这些党派观察员出席七大。我还讲了英国工党和斯堪的那维亚社会党人拒绝了南斯拉夫的邀请。于是，毛泽东说，对于第二国际社会党人来说，南共的纲领草案显得太左了：其中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毛泽东强调说：“铁托大概不会放弃这些词句。只有靠用这些马克思主义词句，铁托才可以站住脚。而且十分清楚，铁托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从整个事情来看，毛泽东指出，杜勒斯将有利可图。毛泽东说：“顺便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看来杜勒斯是一个大马克思主义者，比如比工党强；铁托的马克思主义词句看来对杜勒斯没有什么影响。”

我指出，南共七大可能不会有外宾参加，到时铁托将彻底孤立了。对此毛泽东说，某些集团还是要支持南斯拉夫人。这首先是修正主义者，毛泽东说，许多修正主义分子不会放弃支持任何反对我们和你们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

在会谈过程中我提起，我们当时把赫鲁晓夫和铁托率领的苏共和南共代表团所进行的布加勒斯特会谈情况通报给了中共中央。我同时

指出了双方签署的布加勒斯特秘密公报中所规定的义务。我强调指出，现在南斯拉夫人完全违反了这些义务。对此毛泽东指出，铁托不止一次表现出他不是个可靠的伙伴。周恩来插话说：“铁托简直是一个流氓。”

然后毛泽东分析了中南关系。他说，我们一直支持1948年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决定，但我们不同意1949年共产党情报局的决定。它把我们大家都置于被动的地位，铁托至今还经常提起这一决定。毛泽东说，斯大林不应该这样粗暴地对待南斯拉夫。斯大林死后，众所周知，我们都积极努力使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正常化。我们希望同南斯拉夫有一个好的关系，但铁托仍和以前一样。他曾两次耍手腕反对我们：一次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再就是现在这次。他耍这些手腕目的是一个：出口他的思想，把他的思想强加给我们。

毛泽东回忆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斯拉夫人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说，我们当时通知苏联驻华使馆。说我们不准备接受南斯拉夫人的承认，但也不公开拒绝。如果中国同意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那么这就可能被人利用来制造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分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完全是有分寸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宣布，现在继续宣布，它准备在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当时自己也说，南斯拉夫毕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他（毛泽东）当时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可以把南斯拉夫归入热爱自由的国家。

毛泽东说，在1955年之前，中国没有理睬南斯拉夫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这打破了企图离间中苏关系的梦想。

谈到目前的中南关系，毛泽东指出，中国开始反右斗争很使南斯拉夫人和波兰人（尤其是他们在中国的代表）感到沮丧。毛泽东强调说：“因为南斯拉夫对我们的右派分了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至于我

们现在全国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奋发建国以及诸如‘大字报’这种发扬民主的形式，这一切都没使南斯拉夫人高兴，而是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毛泽东接着说，南斯拉夫领导人非常盼望中国政府邀请铁托来做客。毛泽东指出，有许多次南斯拉夫人向中国同志暗示铁托有访问中国的打算。但是我们，毛泽东说，拒绝邀请，现在对他来访也不感兴趣。铁托访问中国，毛泽东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被我们的右派分子所利用。

铁托对许多亚洲国家发出了邀请。不久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访问了南斯拉夫。他们也邀请了铁托。当然，铁托很难实现承诺，因为这两个国家之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还没邀请他到这里来。毛泽东说，我们当然不会对南斯拉夫人讲，我们不喜欢铁托来访，但也不表示我们想在身边看见他。

在和我道别时，毛泽东请转达他对赫鲁晓夫同志和其他同志的问候，他再次祝贺赫鲁晓夫同志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时毛泽东说，任命赫鲁晓夫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这是非常正确的加强统一的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保证领导完全统一的一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情合理的一步”。

我简要地介绍了苏共中央最近一次全会的情况。毛泽东坚定地说，他毫无动摇地赞成这一决定。

会谈持续两个半小时。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工作人员阎明复，使馆参赞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尤金

文件共 4 份，

送：A. A. 葛罗米柯、Ю. B. 安德罗波夫、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克鲁奇科夫

1958年4月14日，第282号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8卷第15页

中国同意出席经互会高级会议

——毛泽东致赫鲁晓夫信

(1958年5月9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我们收到了由安东诺夫转交的您的关于召开经互会参加国兄弟共产党高级代表会议的信件。

中共中央委员会愉快地接受了您的邀请，并决定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五月二十日在莫斯科开幕的经互会参加国兄弟共产党高级代表会议。决定通过后，立即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组成补充告知。

致共产主义问候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

科托夫由中文译成俄文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8卷第41页

关于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记录

(1958年7月31日于怀仁堂)

在座的有：鲍·尼·波诺马廖夫同志 邓小平同志

赫鲁晓夫首先转达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问候与祝福。毛泽东对此表示感谢。指出在两党领导人合作的情况下，世界问题很容易解决。

赫鲁晓夫表示赞成。

毛泽东：用不着展望更长的期限，可以说，我们的合作将保证一万年。

赫鲁晓夫：也就是说，9999年之后将再次相见，商讨下一个万年合作。

毛泽东：但是我们之间在一些问题上还是有分歧的。这种在个别问题上的分歧过去和现在存在，将来还会存在。如果用10个手指来比喻的话，那么我们的合作是9个手指，分歧是1个手指。

赫鲁晓夫：是的，或许是理解不同。

毛泽东：这些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之间将永远合作，因此可以签订万年协定。

提议转向讨论感兴趣的问题。

赫鲁晓夫：我们看到了尤金关于和您谈话的报告。通观谈话，有许多不解之处，因此想谈谈，以便澄清所有问题。

毛泽东：同意。

赫鲁晓夫：我不打算谈那些从与我国大使谈话中即可看出观点一致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国际局势、对近东和中东事件的评价、南斯

拉夫问题。我们也赞成你们关于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观点不同的问题的声明。我们为你们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高兴。我想，你们也同样会为我们的成就感到高兴。

毛泽东：是的。

赫鲁晓夫：我想谈的是一个令我倍感惊讶的问题。即海军建设问题。您说您因此事一宿没睡。我接到报告后也是一宿没合眼。

毛泽东：我感到震惊，所以睡不着。

赫鲁晓夫：这事首先和我有关，因为主要是我和尤金谈的，后来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也给他下过指示，我们可从来没人像你们的同志那样考虑问题。甚至连想都没想过什么联合舰队。您是知道我的观点的。斯大林在世时我就反对合资公司。反对他租让菠萝罐头厂的老年人的愚蠢做法。我要强调说明，是老年人的愚蠢做法，因为斯大林还不至蠢到连这都不明白的地步。这里指的是僵化。

毛泽东：我也举过这些例子并说赫鲁晓夫已将这份遗产清除了。

赫鲁晓夫：我作为政治局委员曾直接向斯大林指出，不应该给毛泽东发关于租让的电报，因为这是原则性的错误。政治局其他目前已和我分道扬镳的委员当时也都不赞成斯大林的这项提议。斯大林去世后我们立即提出取消合资公司，现在哪儿都没有合资公司了。

毛泽东：当时还有两个半殖民地——新疆和满洲。

赫鲁晓夫：那儿的不正常状况已经消除。

毛泽东：根据协定那儿甚至不允许第三国公民居住。这些半殖民地您也都废除了。

赫鲁晓夫：没错，因为这有悖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我完全赞同。

赫鲁晓夫：就是在芬兰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也撤消了自己的军事基地。

毛泽东：旅顺港的基地也是您撤消的。

赫鲁晓夫：不能不这么做啊。对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尤其是正确的。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危害外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我们取消了在奥地利的共有财产，将其卖给了奥地利政府。此举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否则它将会成为同奥地利政府发生冲突的隐患。不久前我们接待了奥地利代表团，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这样的会谈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说，我们同中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有利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的方针是纯洁而明确的。我们向前殖民地提供援助，我们的条约中没有一条是有损我们的关系亦或是侵害受援国独立性的。这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所在。我们向前殖民地提供援助没有提任何政治条件，因而赢得了各受援国人民的心。接受援助的国家有叙利亚、埃及、印度、阿富汗等。不久前我们又答应同阿根廷签订条约。这对拉丁美洲，尤其是阿根廷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同意提供价值一亿美元的采油工业设备。其目的就是反对美国，让南美洲摆脱对美国的一味依赖，让它明白办法是有的。

毛泽东：很好嘛。

赫鲁晓夫：如果我们就像在和尤金同志谈话时所说的那样对待你们，您会怎么想？（开玩笑地）对此我已提出了批评。

毛泽东：联合舰队究竟是怎么回事？请您解释一下。

赫鲁晓夫：我不想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大使不在。我向他交待了任务，单独和他谈的，之后又在主席团说过。我在和他谈话时就感到担心，怕他曲解了我的意思。我问他：“问题您清楚了吗？”他说：“清楚了。”但依我看，他并没有把我的话的要点转达给您。

毛泽东：原来是这么回事！

赫鲁晓夫：对此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些问题离他太远了，就像月亮距离地球那么遥远。这个专业问题与他毫不搭边。

海军建设问题极其复杂，我们还没有对此作出最后决定。我们从

斯大林去世后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解除了库兹涅佐夫的海军上将职务，让他退休了，因为，如果采用他的海军建设10年计划，我们就会既建不成海军，钱也花光了。这就是我们在收到周恩来同志请求协商并帮助建设海军的来信后难以作出答复的原因。

毛泽东对该项计划的耗资表示关注。

赫鲁晓夫就此问题进行答复。

有人建议我们建造巡洋舰、航空母舰以及其他大型船只。一艘巡洋舰的造价是很高的，而建造港口和舰队停泊地的费用则更高。我们讨论了这项计划，没有通过。最主要的是我们根据军事装备方面发生的变化对海军的学说本身提出了批评。

1956年在塞瓦斯托波尔召开了水兵会议，伏罗希洛夫、米高扬、马林科夫、茹柯夫和我出席了会议。水兵们报告了他们在战争中使用海军的想法。此次报告之后，不仅应当从海军，而且应当从军队把他们扫地出门。

您还记得吧，1954年我们从您这回国时是经旅顺港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再到共青城的。后来我们乘巡洋舰进行了一次短途航行，航行中搞了一次小型演习。海军上将库兹涅佐夫与我们同行。演习中潜艇和鱼雷艇向巡洋舰发起进攻。鱼雷艇上的鱼雷一发未中。潜艇也只击中了一发。这让我们感到担心，如果舰队如此备战，那我们国家是指望不上自己的海军了。这是我们关系紧张的开始。这之后库兹涅佐夫受托作了报告并提出了建议。建议没有被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他很懊恼，无耻地说什么：“何时中央才能在海军问题上采取正确的立场。”结果我们建立了正确的关系——将库兹涅佐夫开除出海军。斯大林在世时我们造了许多巡洋舰。在伦敦逗留期间我甚至建议艾登购买巡洋舰。现在人们都在绞尽脑汁地考虑在战争中该如何使用海军。您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过什么大的海战吗？没有。海军要么袖手旁观，要么被歼灭。美国和日本可以说是最强大的海上强国了。日

本是借助自己的空军而大败美国海军的。美国人也同样是依靠空军击溃了日本海军。

问题是往哪投资。

我们在接到您的来信时就考虑派军事顾问去，但他们对海军建设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三次了，最后一次决定给他们一个月的期限提出建议。在现代条件下需要什么样的海军？我们已停止建造巡洋舰。把已造好的炮塔重新回炉，要知道这可是金钱呀。船台上尚有一些未造好的巡洋舰。对此总参谋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扔掉算了，另一种是将尚未完工的巡洋舰建好，以后不再造。回来后正赶上解决此问题。海军军人分成了两拨。我也举棋不定：停止建造吧——可惜了已花费的资金，继续造吧——还得花钱。对于战争来说，它们已无用武之地。马林诺夫斯基在动身体假前请求研究这个问题。

我在国防军事委员会上曾提出反对继续建造巡洋舰，但不坚决。鉴于马林诺夫斯基的一再请求，我决定支持他。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举行了会议，会上许多著名的元帅和将军都表示坚决反对继续建造。后来决定将问题推迟到马林诺夫斯基休假回来后再讨论。我想，这次我们会作出决定，把它回炉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军事顾问又能给你们提什么建议呢？所以我们对自己说，应该和中国的负责同志聚在一起，共同商讨并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们是不会指望军事顾问了，因为他们本身没有一个明确的观点。我们想和你们商讨一下海军建设的发展方向。我现在尚不能确定新任海军参谋长对此问题持何种观点。如果我们派他去，那还不清楚他将阐述谁的观点——我们的还是他自己的。所以我们想和周恩来同志及彭德怀同志——军事工作者和非军事工作者一起商讨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而且也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你们或许也不会同意他们建设海军的意见。我们还处于探索阶段。

现在有了导弹谁还需要火力有限的巡洋舰。我在伦敦时曾对艾登说，他们的巡洋舰是一些漂浮着的钢棺材。

海军建设问题十分复杂。军事顾问们提出，既然如此，美国人为什么还要建设海军。我以为，从美国人的角度出发，他们这么做是对的，因为美国位于美洲，而他们打算在欧洲或是亚洲作战。他们需要海军进行运输和掩护。否则他们就得放弃自己的政策，并宣布实行门罗主义。

毛泽东转向邓小平，向他要同尤金的谈话记录。邓小平把记录递交给毛泽东。

赫鲁晓夫：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一再和尤金说，让他向您讲明这个情况。我问他是否全都明白了。他回答得很肯定。但是他从未研究过海军，所以他可能没能准确地转达问题的要点。苏共中央从来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组建联合舰队的打算。

毛泽东：（生气地）我没听见您说，您当时是在莫斯科。我只和一个俄国人谈过，那就是尤金。所以我才要问，您凭什么“逼”我相信您所说的一切？

赫鲁晓夫：没这意思。

毛泽东：（生气地）这事责任在谁——毛泽东还是尤金？

赫鲁晓夫：我这么没完没了地解释您不烦吗？

毛泽东：不。您还没说正题呢。

赫鲁晓夫：根据已说明的理由，我们真心希望你们的同志能来和我们一起共商需要什么样的海军、海军的技术和战斗使用问题。我确实和尤金这样说过，毛泽东同志是赞成我们共同努力对付战争的。这一点您在我们 1954 年来访时以及您 1957 年出访莫斯科时都提到过。可惜的是，目前还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所以我告诉尤金，让他说明情况。我们知道，需要建设装备有空中导弹而不是海上导弹的潜水舰队和鱼雷艇，因为潜水舰队的主要任务将不是对付敌人的水上舰队，而

是摧毁其港口和工业中心。所以我和尤金就是这样谈的。最好是把我们驻扎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的海军撤回来。那里不再需要海军，如果要建的话，也只是小型潜艇。如此说来，我们到哪去建呢？建在摩尔曼斯克地区，可从那里很难到达美洲。况且英国和冰岛都会采取阻截措施。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会好一些，但那又紧邻着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这些岛屿虽然会对我们起到保护作用，但也为敌潜艇监视我们出海提供了可能。我说过，中国有极其辽阔的海岸，宽阔的海域，由此同美国进行潜水战轻而易举。所以最好是和中国讨论一下关于利用这些条件的问题。具体说就是你们需要在哪条河（黄河或是其他河）上建设能够大批量生产潜艇的工厂。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是需要商讨的，至于说建设联合工厂或联合舰队的事，我们没想过，也没必要谈。

毛泽东：尤金不止一次提到过建立联合舰队，并说黑海和波罗的海没有出口，舰队从摩尔曼斯克出击会很困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出路被日本挡住了，等等。他也指出，中国有极长的海岸线。据尤金说，苏联正在制造核动力潜艇。他的整个讲话的意思就是建立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海军并能够使用它。这是一件威力极强的武器。无疑，使用它挺费劲，但对敌人来说也不容易。战争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毛泽东：我曾问过尤金，舰队将属于谁——中国、苏联，还是共同拥有。我同时强调，在现代条件下，中国需要的是属于中国自己的舰队，至于说属于其他什么人的则请免谈。战争一旦打响，我们会向苏联提供一切。然而尤金却坚持说，舰队应该是联合性质的。尤金第三次会见了刘少奇同志和我们的其他同志，在这次会谈中他重复了自己过去的观点。我们的同志对联合舰队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就改变了说法，将“联合舰队”换成了“联合建设”。对此我们的同志亦提出批评，说，这种说法让我们理解还像是共同拥有舰队。这时尤金开始提出“共同努力”建立舰队。

赫鲁晓夫：这是我的错。不应该让尤金去向您通报这件事，他不了解情况。但是我们也不想就此问题给您写信。我们只想口头告诉您。

毛泽东：对他的话我们的理解是，如果我们想得到帮助，就必须建立主要用来对付美国的联合舰队。我们的理解是，赫鲁晓夫想和中国同志一起解决建立联合舰队的问题，并打算让越南参加。

赫鲁晓夫：我说过，战争打响时，我们需要广泛利用包括越南在内的海岸线。

毛泽东：我也说过，战争一旦打响，苏联可以使用中国的任何部分，俄国水兵可以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港口采取行动。

赫鲁晓夫：我可不想说什么“俄国水兵”。战争时期需要共同努力，有可能是中国海员采取行动，也有可能需要携手作战。但不存在什么哪国领土或是我国基地的问题。

毛泽东：假如说舰队有 100 艘战舰，那你们该得多少，我们又该得多少呢？

赫鲁晓夫：舰队不可能属于两个国家。舰队需要服从指挥。如果有两个指挥的话，就无法作战了。

毛泽东：说的是嘛。

赫鲁晓夫：您可以不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是这样看的，而您可以说：我们不同意。而如果您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们同样可以提出反对意见。

毛泽东：要是这样的话，一切就都好办了。

赫鲁晓夫：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好解决的。

毛泽东：可是我们都被搞得一宿没睡。看来，我这一宿的工夫算是白搭了。

赫鲁晓夫：毛泽东同志怎么会认为我们会把完全非党的原则强加于人呢？

毛泽东：我甚至和自己的同志说，从原则的角度讲，我不明白这

个建议，这可能是一场误会。您纠正了斯大林所做的错事。我本人，还有其他一些同志都怀疑，这是否是苏联海军参谋部的建议。您的顾问（水兵）曾四次建议我们发电请求帮助建设舰队，并说，这个问题将会得到圆满的解决。

赫鲁晓夫：这样的顾问都该被开除。

毛泽东：顾问们可没提过联合舰队的事。

赫鲁晓夫：反正他们也无权决定此事。他们的任务就是在人们需要时给人出主意。

毛泽东：顾问们提议请求苏联的帮助。这之后周恩来曾致函进行询问，谈的是装备有导弹装置的舰队。

赫鲁晓夫：没让尤金提建议。只让他转达有关共商建设潜水舰队问题的请求。我们怎么会委托尤金去进行关于建设潜水舰队的谈判呢？我们是了解尤金的，处理有关党务问题我们是信得过他的，但他不适于进行有关核动力潜水舰队的谈判。

毛泽东：他说，需要派代表去进行有关共建海军舰队的谈判。我请他转告说，我们是不会举行这样的谈判的。

赫鲁晓夫：他竭力想把问题的实质说清楚，但是看来他自己首先就没有正确地理解我们的任务，所以转达的也不对，他的行为有可能会使我们的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

毛泽东：但是尤金就是那么说的。安东诺夫也在场。这事伤了谁的自尊心呀？

赫鲁晓夫：我看是您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您怎么能这样错误地理解我们的政策呢？

毛泽东：您的代表就是这么解释的。而我对他说，我不赞成也不接受这项提议，我同时声明：“你们去海上、空中作战吧，我们可要在陆地上打游击。”

邓小平：问题出在对中国和苏联海岸的分析上。尤金说中国的海

岸不错，苏联的不好，所以需要联合舰队。毛泽东当时就问，这叫什么，合作社吗？

毛泽东：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合作社。

赫鲁晓夫：我完全清楚。我说说自己的意见。我认为我们的中国朋友对我们一向评价很高。所以有必要解释清楚。我们没有侵犯中国的主权。我们党只有一个立场。我想，你们同样是有这样一个原则的。

毛泽东：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另一种方案——联合舰队。如果不建联合舰队，也就不提供帮助。

赫鲁晓夫：尤金是这么说的？

毛泽东：不是，我转述的是他的话的意思。

赫鲁晓夫：这只是您的推测罢了！

毛泽东：第三种方案是，我们取消全部请求，因为第二种方案对我们不合适。即使是我们一万年都没有核动力潜水舰队，我们也不搞联合舰队，我们能够应付。

赫鲁晓夫：有关核动力潜水舰队您在信中没提。

毛泽东：是的，没提。我们提出了建立装备有导弹装置的舰队的问题。核动力潜水舰队一事是尤金提出的。

赫鲁晓夫：所以我要说：应该讨论建立什么样的舰队。谁给您提的建议——戈尔什科夫？我不信他给我们的建议是对的。他给您提建议，您就以为是我们提的。后来您弄清了，就说——提了一个不正确的建议。

毛泽东：对我们来说，不存在建立大型舰队的问题。我们只对装备有导弹发射装置的鱼雷艇和潜艇感兴趣。这点我们在信中已经说明。

第二个问题是在中国建雷达站。

赫鲁晓夫：我们不谈海军的事了，说说雷达站的事吧。我认为这个问题尤金也没有转达对。看样子他并没有准确地说明，结果使人们对他产生了错误的理解。

毛泽东：当时可有7、8个人在场呢。我当时就说，这是合作社。大家在听到这一建议后都高兴地大叫起来。结果搞得我整宿没睡。

赫鲁晓夫：我都两宿没睡了。我同意承担部分责任。事情因我而起。我给尤金做了交代，但他曲解并错误地转达了我的意思。尤金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对中国和您个人无比尊重。我们是相信尤金的，我们认为他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这是一个诚实的中央委员，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巩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一切误会皆因其没有正确领会所肩负的任务而造成的。我要说明的是，我当时就感到担心，连问了2、3次，是否全弄明白了，因为交给他的任务与他毫不搭边。对您我也有个要求。如果您认为事情已经超出了党的关系范围，那就应该踏踏实实地睡一觉，然后对自己说，这是一场误会，并试着再次弄清事情的真相。（开玩笑地）您看我又在强求您了。

毛泽东：我是说过，这可能是一场误会，我希望这真是一场误会。

赫鲁晓夫：那就应该躺下睡觉。

毛泽东：因为联合舰队的事几次被专门提到，所以我才会转而发起反击。现在您又对我进行反击。可我还是会攻击您的。

赫鲁晓夫：物理学有个定律：作用等于反作用。

毛泽东：（生气地）我是有理由的。我当时就说，我们可以提供中国所有的海岸，但不同意建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我们自己也有很多海岸，还是用自己的好。

毛泽东：这是第四种方案——把所有的海岸都给您。还有第五种方案——我习惯打游击。

赫鲁晓夫：现在时代不同了。

毛泽东：那我们就没退路了，我是说，如果我们把海岸都交出去的话，我们就只剩陆地了。

赫鲁晓夫：（开玩笑地）那这样吧，我们交换一下海岸，不过最好还是用自己的，用着得劲嘛。

毛泽东：我同意献出到越南为止的所有海岸。

赫鲁晓夫：应当请胡志明也来参加谈话，否则他知道的话，就会说，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制造了反对他的阴谋。

毛泽东：根据第五种方案，我们会把旅顺港交给您，我们还有几个港口。

赫鲁晓夫：您这是什么话，您把我们当成红色帝国主义者啦？

毛泽东：问题不在于是红色还是白色帝国主义者。有一个叫斯大林的人，他夺走了旅顺港并把新疆和满洲变成了半殖民地，而且还建立了四个合营公司。这一切都是他干的好事。

赫鲁晓夫：您是知道我的观点的。但在旅顺港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斯大林当时的决定是对的。因为当时在中国还有蒋介石，而苏联军队驻扎在旅顺港和满洲对你们是有利的。这起到了某种有益的作用。但人民中国胜利之后，这种局面就应该结束了。我记得，1954年我们提出从旅顺港撤军时，您还对此举是否合适表示过担心，认为，有苏联军队在此就能遏制美国的侵略野心。我们曾请您研究这个问题。您答应考虑考虑。您考虑之后就同意了我们的请求。

毛泽东：是的。

赫鲁晓夫：您当时说，在你们的议会中提出此举对中国是否有利的问题的不是共产党人。您是说过吧？

毛泽东：是的。但这是问题的一方面。斯大林不只在这方面犯了错误。他还建立了两个半殖民地。

赫鲁晓夫：您曾经是捍卫斯大林的。而人们批评我，就是因为我批评斯大林。现在倒过来了。

毛泽东：您批评他是因为其他事。

赫鲁晓夫：我在代表大会上也提过此事。

毛泽东：我一直都认为，不论是在这里还是在莫斯科，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是对的。我们不赞成的只是，批评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我

们认为，斯大林的10个指头里有问题的是3个。

赫鲁晓夫：我觉得还要多。

毛泽东：不可能。他的一生中功劳是主要的。

赫鲁晓夫：那倒是。我们承认斯大林的成就，可这成就中也有我们的份。

毛泽东：是这样。

赫鲁晓夫：斯大林就是斯大林。而我们批评的是他错误的一面，这种错误上了年纪的人尤其容易犯。但铁托批评他则完全是另一回事。20年后，学生们将到词典中去查找铁托这个人，斯大林的名字则尽人皆知。词典中关于铁托的解释将是一一竭力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分子，而对斯大林的解释则是，与工人阶级的敌人进行战斗的战士，但也犯过一些重大错误。

毛泽东：斯大林对中国所犯的主要错误并不是半殖民地问题。

赫鲁晓夫：我知道。他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力，亲热地与蒋介石通信，还支持王明。

毛泽东：还有其他更重要的错误。首先，正是由于他的错误使中国共产党在某一时期将原有的根据地丧失了十分之九。其次，当中国革命已经成熟时，他不但没有建议我们继续发展革命，反而说，如果与蒋介石开战的话，就有全民被毁灭的危险。

赫鲁晓夫：不对。不可能全民被毁灭。

毛泽东：但斯大林在电报里就是这么说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当时是不正常的。我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还对其性质表示过怀疑。他认为，中国是第二个南斯拉夫。

赫鲁晓夫：是的，他认为这是可能的。

毛泽东：我去莫斯科时，他既不打算与我们签订友好条约，也不打算废除和国民党的旧条约。我记得，费多连科和科瓦廖夫曾转达过他的建议，说是让我到处走走、看看。我告诉他们，我此行只有三项

任务：吃饭、睡觉、上厕所。以后我不会专门为了给斯大林祝寿而去莫斯科。所以我说，如果不想签订友好条约的话，当初就不该让我来。我会完成自己的三项任务的。去年，我们在莫斯科会谈时，当时布尔加宁也在场，人们告诉我们说，斯大林曾对我们进行窃听。

赫鲁晓夫：没错，是我说的。他也曾对我们进行窃听，而且还自己窃听自己。有一次我们一起休息时，他承认说，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他还说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连自己都不信任自己。

毛泽东：对我们来说，不存在建设什么样的海军问题。我们不会建设像海军上将库兹涅佐夫所设想的那种海军。

赫鲁晓夫：有关海军问题我们自己还没解决呢。

毛泽东：我们只是希望在建设潜水舰队、鱼雷艇和小型水上舰艇上得到帮助。

赫鲁晓夫：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应当有强大的装备导弹的潜水舰队，以及同样装备导弹、而非鱼雷的鱼雷艇。

毛泽东：这正是我们在信中所请求的。

赫鲁晓夫：我们认为需要有装备导弹的驱逐舰。有必要建设一支民用船队，以备在战争中使用。我们正在建造一些导弹舰。我们认为需要有装备导弹的护卫舰，还有扫雷舰。最主要的是——导弹运载机。我想，您首先需要的正是这个。从空中射击可以射得远一些。首先要有海岸防御。旅顺港的炮兵已毫无意义。其能力极为有限。需要有海岸导弹防御装置和导弹舰亦或是机动的海岸防御。这是我们海军建设的方向。

毛泽东：方向正确。

赫鲁晓夫：我认为首先需要的是导弹舰。潜水舰队造价太高。而借助导弹舰就可将敌人拦截在距本国海岸相当远的地方。

毛泽东：完全正确。早在莫斯科时就谈过这事。

赫鲁晓夫：飞机更好一些。我们准备将现有的飞机提供给中国。

图-16 作为轰炸机已无意义，但作为海军接近地的导弹运载机还是不错的。所有轰炸机都面临着危机。军事顾问的脑子里还缺少这根弦。歼击机将被导弹所取代。

毛泽东对苏联、美国、英国的导弹武器及其性能和种类感兴趣。赫鲁晓夫回答了毛泽东感兴趣的问题。

毛泽东：这么说，还是不要打仗的好。

赫鲁晓夫：所以我们才要用自己的导弹使敌人感到畏惧。曾写信告诉土耳其人，3-4枚导弹就将把土耳其毁灭。把英国从地球上消灭掉，10枚导弹也足够了。在英国问题上是有争论的：一部分人认为，消灭英国需要9枚导弹；另一部分人则说，6-7枚就够了。当然，在原子战争中，英国肯定会被消灭，这一点他们是深信不疑的。争论仅限于需要几枚导弹而已。苏伊士事件时期，我们给艾登和摩勒去信后，他们马上就停止了侵略。现在，我们有了洲际导弹，我们就扼住了美国的喉咙。他们以为美国是高不可攀的。其实并不是。所以，我们需要利用这些装备，以制止这场战争。现在应当去拯救伊拉克。

毛泽东：依我看，美国和英国是不会进攻伊拉克的。

赫鲁晓夫：我认为，您说的有75%的可靠性。

毛泽东：是90%。

赫鲁晓夫：这已经是在按中国的想法推测了。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分歧”的。

毛泽东：他们害怕打大的战争。

赫鲁晓夫：没错，非常害怕。尤其害怕在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打。伊拉克革命唤醒了这些国家的人民，他们很可能会重演伊拉克事件。

毛泽东：国际局势问题明天再谈。我认为海军问题已经解决了。

赫鲁晓夫：是的，双方既无战斗，也无损伤。

毛泽东：不再建联合舰队了？

赫鲁晓夫：当然，我们本来就没提出过这个问题嘛。

毛泽东：但要知道，有三位苏联同志提到过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现在这里已经有四位苏联同志了。我们说不会建联合舰队的。

毛泽东：我们不会再提这个问题了。

赫鲁晓夫：没有问题。只是场误会。

毛泽东：同意。我们要记下来——问题已消除。

赫鲁晓夫：同意。让我们写下来：问题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是尤金对该问题错误阐述而造成误会的结果。我认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毛泽东：现在我放心了。

赫鲁晓夫：我也是。咱们该踏踏实实地睡一觉了。

现在我还是想说说雷达站的事。对这个问题中央并未作出过决定。我们的军事顾问同志们说，应当建一个雷达站，以便在需要时，能够指挥在太平洋的苏联潜艇。我认为这种考虑是对的。我想，可以就此问题与中国同志进行协商，以便把雷达站建起来。最好是中国同志能答应我们以贷款或是其他方式参与建站。雷达站是一定要建的。不光我们需要它，你们有了潜水舰队后，同样需要。关于运营问题。我认为，雷达站不能有两个管理员。所以我们最好根据平等原则达成协议，以便我们能够通过该站与自己的潜水舰队保持联系。至于所有权，没什么可说的。它应该属于中国。希望就在平等条件下使用的问题达成协议。你们也可以使用我们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库里尔斯克、北方海岸的雷达站嘛。如果你们没有异议的话，那我想，我们的军事顾问们就该考虑这个问题了。如果中国不想建的话，我们也不勉强。

毛泽东：雷达站可以建。它将属于中国所有，并将由中国政府投资修建，但可以共同使用。

赫鲁晓夫：不是共同，而是部分。对我们来说，战争时期需要它，

和平时期可以用它进行演习。

毛泽东：那么就该修改马林诺夫斯基来信的提法了。

赫鲁晓夫：我没看到过信。中央也没讨论过。

毛泽东：还是以合作社的形式。中方占30%，苏方占70%。我们给马林诺夫斯基的答复和我所说的是一致的。

赫鲁晓夫：关于这个问题的往来通信我不清楚。看来是我们的军事顾问们接触的结果，但，是不成功的接触。

毛泽东：马林诺夫斯基在7月的第二封来信中附上了关于该问题的条约草案。按其第一封来信的意思，中国占30%，而按第二封来信的意思，则全部都属于苏联。

赫鲁晓夫：我想，我们的军事顾问们也是出于善意的考虑。我们需要这样的站。它造价极高。所以他们想帮你们。但却忽略了政治和法律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我们以彭德怀的名义作了答复，说明雷达站将由我们来建，而苏联可以使用。

赫鲁晓夫：军事顾问们告诉我说，好像已经与中国同志达成了圆满的协议。

毛泽东：您瞧，这就是全部通信。

赫鲁晓夫：没看到过。如果通信是经中央批准的，那就可能是我们办了这么一件蠢事，并且还提议用我们的资金去建站，可我们在中央从没讨论过这个问题。当然，如果您不愿意让我们出这笔钱的话，就算了。

毛泽东：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站我们要自己建，但可以共同使用。同意吗？

赫鲁晓夫：你们现在还用不着雷达站。它需要耗资数百万。不要拒绝资助嘛。友谊归友谊，工作归工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应该共同克服困难。我们可以提供贷款用于建设。贷款的一部分你们可以

还，一部分可以不还，因为你们也需要雷达站嘛。

毛泽东：可以不借任何贷款建站。

赫鲁晓夫：这不太公正。你们目前还用不着它。

毛泽东：将来要用的。

赫鲁晓夫：但首先是我们需要它。

邓小平：我们已经作过答复，站我们要自己建，但可共同使用。

赫鲁晓夫：我们的军事顾问们告诉我说，中国人已经同意了，看来他们没注意到中国态度的细微之处。他们还直纳闷，问题卡在哪儿了。因为据他们讲，已达成圆满协议了。

毛泽东：我们同意自费建站，但共同使用。

赫鲁晓夫：我还是认为需要我方贷款资助。

毛泽东：如果你们非要资助的话，那我们就根本不打算建站了。

赫鲁晓夫：现在谈谈有关米高扬的问题。我们对您的声明感到惊讶，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们同米高扬同志的关系非同一般。我们认为不可以怀疑他对中国没有诚意，亦或是有什么损害我们友谊的企图。他自己从来没说过，我们也没看到过。他在你们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是经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审批的，里面也没有说三道四。曾建议他把讲话稿拿给您看，目的是一定要征求到您的意见和要求。1954年，当我在此讲话时，也是把报告送给您，请您提意见的。

毛泽东：对您的讲话我们是认同的，因为讲话的语气是平等的。米高扬同志的讲话也不错，但要按好坏的比例说，就是9:1。这里说的是讲话的口气有些教训人的味道。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对此表示不满，我们也不便将此告诉米高扬同志。我们关于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的提法是毋庸置疑的真理。但是许多东西还是应当让中国人自己来说。米高扬的讲话有点像父对子的态度。

赫鲁晓夫：我后来没有再看他的讲话，但我记得，当时我曾经告诫他，千万要特别注意国际关系。或许不该这么做，但米高扬作了某

种解释，我也就同意了。如果说讲话中有一些多余的东西，那错也不在他一人，要知道我们都审看过。

下面谈一谈对米高扬在西柏坡的行为的不满。

毛泽东：他在那里做的一切都还不错，就是有点盛气凌人，像个监察员。

赫鲁晓夫：这让我感到惊讶。

毛泽东：我也感到惊讶。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像是父亲在教训儿子。

赫鲁晓夫：对此我无法解释。您最好跟他本人说。米高扬会听的，他会用心听并有所交代的。

毛泽东：是的。他是一个好同志。我们邀请他到我们这来。

赫鲁晓夫：他现在正在休假。

毛泽东：我们随时欢迎他到中国来。我们认为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觉得他的讲话中有一些东西不太合适。

赫鲁晓夫：他当初是奉斯大林之命到中国去的。斯大林要求他每天都要进行汇报，责令他留心观察，看你们周围是否有间谍。按斯大林自己的说法，他这么做是出于良好的动机。当时斯大林执意要逮捕两名美国人，你们就逮捕他们了。斯大林死后，米高扬说，他们是无罪的。我们给你们去信说明了此事，你们把他们释放了。应当说，米高扬当时的做法并非出于其本意，而是斯大林要求他这么做的。就拿斯特朗来说，她就是先被赶出莫斯科，后又被恢复了名誉的。我想，斯大林这么做的目的是不让她去中国，因为斯大林认为她是间谍。现在斯特朗打算在中国和苏联两处居住。我们没有不同意见，尽管她写了有关斯大林愚蠢行为的文章，并发表在你们的报刊上。

毛泽东：没看到过，但听说有这么回事。

赫鲁晓夫：我看到了，并且听说这是一份中国资本家的报纸。

毛泽东：是的，报纸曾掌握在右派的手中。

赫鲁晓夫：文章带有反对苏联的倾向。我们甚至想就此事给你们去封信，后又觉得不值得，既然它是资本家的报纸。

毛泽东：报纸过去被右派控制，但现在已落到我们手中。

赫鲁晓夫：我们没有任何要求，但她是不对的。

毛泽东：报纸的倾向过去是错误的，现在情况已经改变。

赫鲁晓夫：那是你们的事。我们也曾觉得报纸的倾向不对。

我认为，米高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毛泽东：他是个好同志。但他的比例是1：10，我们就是对此有些意见。我们希望他能来。

赫鲁晓夫：对于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我们主席团的每一个同志都没有任何其他不同的意见。我们视你们的成就为自己的成就，并为此感到高兴。我们认为你们也会同样对待我们的。对此我们毫不怀疑。现在说说专家问题。我觉得这就像是长在健康身体上的一个疖子。

毛泽东：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赫鲁晓夫：我们给你们派去的专家有数千名。怎么能够保证他们所有的人都能提出100%正确的意见呢？

毛泽东：90%多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我们派去的专家对自己的行业一清二楚，但不懂政治。我们甚至无法要求他们搞清我们的关系。明白这些事的人，是不懂专业的人。所以我们才给你们去信，请求撤回所有的专家。到时你们可以派专家到我们那去学嘛。

毛泽东：需要采用两种方法。

赫鲁晓夫：但当时对我们来说，条件是不相等的。我们这没有你们的人，你们当然可以保证他们不做蠢事了。

毛泽东：我们也没要求你们下保证啊。

赫鲁晓夫：你们把我们置于不相等的境地。我们派去了专家，他们做了蠢事，我就得道歉。

毛泽东：用不着道歉。应当进行调整。

赫鲁晓夫：好像我们就干这事似的。

毛泽东：谈的是个别的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赫鲁晓夫：不全是。有些人不是共产党员，有些人是被我们清除出党的。但即使如此也无法保证不做蠢事。

毛泽东：可这关系到中国啊。

赫鲁晓夫：我们并没有获得俄国人蠢事专利特许证。这是世界通病，所有国家都未能幸免。但我们的条件是不相等的。你们可以对我们的专家所做的蠢事表示不满，我们却没有你们的专家。结果，只有我们在干蠢事。

毛泽东：这是历史造成的。

赫鲁晓夫：要我们负责吗？

毛泽东：你们是第一个实行革命的。

赫鲁晓夫：这也错了吗？

毛泽东：所以你们就得派专家。你们还得向伦敦和其他地方派遣专家。

赫鲁晓夫：那时我们将一起做这件事，责任和蠢事也将平摊。

毛泽东：我们只是对军事顾问和国家安全顾问有意见，对经济顾问并没有意见。

赫鲁晓夫：一切都是我们的错，你们没错。对谁都无法担保。

毛泽东：这只是一一些小错误。就算是他们有时提出不恰当的建议或是建设方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赫鲁晓夫：你们干吗还需要国家安全顾问？难道你们自己不行吗？这可是政治问题。

毛泽东：就是军事顾问也完全是指个别人，主要是未经我们同意就经常换人。在这方面有错的是极少几个人。

赫鲁晓夫：我们不清楚谁在你们那里工作，谁又替换了谁。我们

无法负责，也无法监督。

毛泽东：这不是我们的错。看来，错在国家安全部门和军事部门。

赫鲁晓夫：你们为什么需要军事顾问？你们有长期的战争经历。又有丰富的经验。你们怎么还需要他们？我们的顾问是在另一种条件下培养出来的。

毛泽东：我们需要技术专家。

赫鲁晓夫：可以到苏联来学习嘛。

毛泽东：我们是在采取这种方式，也在往你们那里派人，但是派一部分专家到这里来，同样是有益的。

我说的是个别人，而不是要你们把所有的人都召回去。

赫鲁晓夫：我们提议最好是一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你们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有意见，使我们深感不安。我们不想给你们带来麻烦。

毛泽东：同意你们的意见。有关的具体措施可以再议。大多数专家我们是准备留下的。有些人我们不需要。我们将列出他们的名单。

赫鲁晓夫：为了不引起任何误会，我们希望能得到所有人的名单，因为有可能今天做蠢事的是这个人，明天又是另一个人。

毛泽东：我们请求留下顾问，你们却要带走。

赫鲁晓夫：没有你们我们什么也做不成。

毛泽东：他们和我们工作者之间的差别就是国籍。

赫鲁晓夫：没错，这是暂时的差别。最主要的是，这是党的联系。

毛泽东：是的。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也是有矛盾的。比如说，我国北方的工作人员在南方就不太受欢迎。

赫鲁晓夫：我听说，您在和尤金谈话时提到，我们有一个专家提议用无沉箱法建设桥梁，没有得到我们的支持。我告诉您，是谁不支持。卡冈诺维奇。他算什么专家？我问他，为什么不支持？他说，因为这种方法哪儿都还没试过。可是，新方法之所以为新方法，就是因为从来没有使用过。

我把想要说的都说了。即使是在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主妇家里，细小的灰尘也会不时地落下，因此她就不得不停地用湿抹布擦。我们也是，应当经常会晤，以免灰尘越积越多。

毛泽东：说得对。

赫鲁晓夫：所以当你们提出会晤时，我们也认为有这个必要。最初答复说，我不准备去，因为我们以为是在纽约会晤。后来我们从西方人那里得到回信，才弄明白了，是他们在自作多情，于是我们马上就赶到了这里。这是一次最好的会晤——卓有成效且非常愉快。

毛泽东：我们进行了会谈，这很好。不应该让问题堆积起来。我提议，今后有什么问题亦或是根本没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在无任何议程的情况下会晤和会谈。总会找到话题的。比如国际问题，我们在这方面准备采取什么步骤、一些国家的局势；你们可以向我们提供一些国家的信息，我们可以讲一讲其他国家的情况。“合作社”问题纯属意外，而且完全是临时性的，但却闹得我一宿没睡，还和尤金吵了起来，您不也没睡成嘛。这下我们扯平了。

至于说米高扬，那是个好同志。他在中国所做的一切还是不错的。我们会把对某些问题的不满告诉给他的，如果他接受当然好，如果他不接受，那也是他自己的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应当划清界限。至于说顾问，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争执。我跟尤金还有你们所有的同志都说过，顾问们是在从事伟大而有益的事业，他们做得很好。我们经常通过党政部门向地方发布指示，告诉他们应如何对待苏联顾问。我们一再强调同他们保持团结的必要性，并指出，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这些人中，99.9%，或许更多，已在我国呆了7、8年，都是好人，只有个别人干得不怎么样。比如彼得鲁舍夫斯基小组。当然错在他个人，与小组其他人无关。

赫鲁晓夫：您瞧，我都不知道这人是谁。

毛泽东：我也从没见过彼得鲁舍夫斯基。现在这个小组已换了一

位好领导——特鲁法诺夫。

赫鲁晓夫：我是从斯大林格勒防御战中知道他的。是个不错的将军。

毛泽东：我们很器重他。有些国家安全顾问我们是不需要的。

赫鲁晓夫：你们可以派自己的人来嘛。这是内部政治问题。

毛泽东：往军队总政治部派来了一个我们并没有邀请的人。

波诺马廖夫：可以通知大使，马上就可以把他召回。

毛泽东：我想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工作者。我们只对个别人有意见。

赫鲁晓夫：谁应当对划在界限外的人负责呢？是赫鲁晓夫，而不是毛泽东。条件不相等嘛。你们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嘛。

毛泽东：你们真打算撤走所有的人？

赫鲁晓夫：不会的。我们建议讨论一下。我们认为，干部不光是我们的财富，它也是各国共产党共有的财富。我们应当利用他们来推翻资本主义。

毛泽东：我们不会再提顾问的事了。或许我们就不该指出顾问在工作中的不足？

赫鲁晓夫：正相反，你们指出来是对的，要不就称不上同志式的关系了。问题都出现了，你们却不吭声。

毛泽东：问题早就出现了，只不过是我們有意没提，比如说匈牙利事件时期。再比如说苏联军事顾问撤出波兰的时候。意见只是针对少数人，其实也就是针对派遣他们的方式。

赫鲁晓夫：你们做得很聪明。我们将交给你们解决。昨天需要顾问，今天不需要。因为你们也不愿意俄国人手拿襁褓围着中国人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你们走过漫长的斗争道路。

毛泽东：只是对少数人有意见。比如说，有一个军事学院的顾问，他要求教师只能利用卫国战争的经验进行教学。

赫鲁晓夫：他就像根香肠，往里灌什么，就装什么。

毛泽东：或许是想让所有的顾问都成为专家吧？

赫鲁晓夫：大概是。不要管他们。让他们干去吧。

毛泽东：是的，干吧，但多少要按另一种方式。

你们是否住到明天再走？

赫鲁晓夫：你们这么急着赶我们走吗？

毛泽东：哪能啊，你们愿留多久就留多久。关于下次的会晤时间，我们有点矛盾。你们是白天工作，我却白天睡觉。可以在下午4点以后会谈。

赫鲁晓夫：是有点矛盾，但不是冲突。

毛泽东：有关我们的会谈是否要发个公报？或许可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

赫鲁晓夫：没错，这主意好。让他们猜去吧，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在北京都谈了些什么。我们这边可由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费多连科三位同志负责公报工作。

毛泽东：我们将由王稼祥和胡乔木同志负责。该吓唬吓唬帝国主义者，他们会害怕的。

赫鲁晓夫：会的。斯大林之所以不想和你们签订条约，或许是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可能遭到袭击，而他又不想卷进去：帮是可以帮一点，打仗就算了。但这点他对谁都没说。我们和阿尔巴尼亚也没有签订条约。在讨论华沙条约时，莫洛托夫提出不接纳阿尔巴尼亚。我问莫洛托夫，为什么不接纳阿尔巴尼亚。他说，我们会为它而战吗？但如果不保护，它就会不战而被夺走。

毛泽东：是的，这是一个忠贞而坚强的民族，应该帮助它。

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当时不同意接纳的还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觉得应该讨论一下加强阿尔巴尼亚的问题。它需要海军。以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合作社方式还是其他方式，这还要和恩维

尔·霍查商量一下。问题复杂啊。可能需要采用某种合作社的方式。在这件事上请您不要指责我们。

毛泽东：应该和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匈牙利搞合作社，捷克斯洛伐克就算了。那里没有军队吗？

赫鲁晓夫：没有。只有波兰和匈牙利有。我在匈牙利时曾向卡达尔提出撤军建议。他不同意，只同意减少一个师的兵力。他们把我们的军队安置在奥地利的边界上，而奥地利人对他们是没有威胁的。我认为，匈牙利的局势很稳定。卡达尔是个了不起的人。

毛泽东：战争时期必须实行合作。您瞧，有多少个军事基地像钉子似的钉在我们周围：日本、台湾、南朝鲜、越南、马来亚等。

赫鲁晓夫：确实是。欧洲有多少呢？到处都是。

幸亏我们发展了经济，我们的科学家又研制出了导弹。

毛泽东：我们可都靠你们的导弹活着呢。

赫鲁晓夫：没错，说句不太谦虚的话，从某种程度上讲确实是这样。这能阻止敌人。

我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局势是稳定的。

毛泽东：我们也这么认为。董必武同志也是这么介绍那里的情况的。

赫鲁晓夫：没错，我们在保加利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他进行过会晤。

谈话到此结束。

谈话记录者：H. 费多连科、A. 菲列维

原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2001年第1、2期

关于国际形势和两党关系的讨论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记录

(1958年8月1日)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第二次会谈

8月1日于中南海

参加人：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安东诺夫等同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林彪、彭真、邓小平、陈云、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等同志。

会谈开始前，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简短地回顾了一下上次的会谈。

毛泽东：在1954年，你们向我们要中国人，后来又不要了。

赫鲁晓夫：是的，是要过，但之后不要了，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并不是不足，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很好地组织劳动。现在我们的劳动力甚至还有富余。

毛泽东：也许，我那时有些使你们失望了，中国人很难被同化。在美洲和南洋的华侨，他们死了还要把尸体运回中国，埋在家乡。不过，如果你们要人的话，我们可以给你1亿人。但如果他们留在苏联，那么将会很好地组成一个团体。

赫鲁晓夫：在我们西伯利亚地区有中国工人在工作。他们工作了3年并回到了中国，现在这些人又全部返回了苏联。

毛泽东：我讲的是历史。现在社会主义变革后，人们就改变了。

赫鲁晓夫：很多中国人甚至在我们那里结了婚。斯大林从前不允许结婚。

话题转到国际形势问题上。

毛泽东：今天我们组织召开一个扩大会议，我想提出国际形势、工作方法和我们两党关系的问题。马列主义是我们两党的基础。但无论是在我们两个党还是两个民族之间，历史是不同的。虽然很小，但还是有差异。当然，在重大的问题上，我们两党有着共同观点。甚至在民族、政党和国家消亡了，小的差异还是存在的。在座的所有中国人之间都有差异。不能说，他们之间没有争论，但正因为他们争论、打架，所以他们成为了朋友。不要担心我们和你们打架。

赫鲁晓夫：看样子我得准备打仗啰，但今天这个力量对比不利于我们。（笑声）

毛泽东：但你们的国防部长在这儿呢。

赫鲁晓夫：可你们的林彪也在这儿呀。

毛泽东：想跟你交换一下对国际局势方面的看法。资本主义世界正在遭遇很多困难。看上去他们很强，但好像古代中国的一个“三板斧”英雄。他只能打击三下，之后就失去了所有力量。我们说这完全合理，希特勒只砍了三板斧，蒋介石也砍了几板斧，美国和日本也就在最初厉害点。

赫鲁晓夫：别攻击日本。在我们这里有个日本人——费德林，他将是苏联和中国在日本的代表。

毛泽东：好，我们将给他颁发国书，任命他为驻外使节。

美国人试图在朝鲜尝试自己的力量。他们到处调兵，总没调到，始终是7个师，从欧洲和本国都没调到，他们的人口少。而且士兵很多都娇生惯养。他们在战壕里吃巧克力糖，喝牛奶。但是，还是不能小视美国的战斗力的。

至于英国就更不行了，他的力量很弱，共有5万-6万军队^①。但

^① 此处苏方记录与中方记录有差别，中方的是“65万军队”。

它的主力有四部分：在中东有 6 万人，西德有 5 万人，在本国和新加坡大约各有 1.2 万人。其余军队分散在世界各地。好像主要集中在中东和德国。在新加坡和英国本土（包括爱尔兰在内）很少，主力在中间，两头很少。

美国的军队主要由三、四部分组成，即美国、欧洲和太平洋。还有一小部分在黎巴嫩。据我们所知，在美国一共有 19 个陆军师。战争刚一打起来美国就会十分惊慌。从英国传来消息，因为英国军队很少，新加坡和远东又都完全暴露在外。只在西德剩下五万后备军队。现在美国人打算从黎巴嫩撤军，把约旦的英国人丢下，吊在梁上。

在黎巴嫩的空军是针对苏联的。西方对土耳其寄予厚望。在那里有 12 个步兵师和几个骑兵师。土耳其的陆军比英国强大。但是土耳其很慌张。将一部分土耳其部队用来防范保加利亚，一部分防范阿尔巴尼亚。还有一部分用来防范叙利亚和伊拉克。

英国、美国和法国还没有承认伊拉克，但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联邦德国、意大利、希腊和日本已经承认了。

赫鲁晓夫：我们应该彼此祝贺。

毛泽东：所以我们才在这里聚会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过几次战争，首先是朝鲜战争和中东事件。这次的中东事件很好。从前我们什么时候能像这样揭穿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人没有参加军事行动，高唱自由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人家打了二年它才来。二战后，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国人自己越来越积极行动。他们的战略方针改变了。在朝鲜和黎巴嫩的行动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朝鲜他们好像是反对侵略者，在世界人民的眼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好像是安全的保卫者，因为是金日成发动的进攻。

赫鲁晓夫（开玩笑地）：我们不知道是谁先开的枪，中国人应该知道，周恩来知道。

周恩来：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苏联同志也知道。

毛泽东：他们不知道，但美国人知道。那时候美国人很难抓，现在已容易抓了。在中东谁也不招惹他们。但他们却宣称，在黎巴嫩和约旦有间接的侵略者。没有进行动员，他们便将自己欧洲、地中海、非洲和太平洋的部队投入了战备状态。而且这一切作战准备都是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报纸和广播中大肆宣传，调动了哪些军队，将其调到了何处。但是之后，又下达秘密指示，从6月15日起不准许部队之间使用无线电波进行公开联络。从6月29日起，北约地区、地中海和太平洋西部地区除外，其他地区命令取消，无线电联系重新开始。在这些国家和东太平洋地区军事准备情况非常好。

他们到处吹嘘的这次行动调集了多少部队呢？一共1.2万人。他们的部队现在部署在三个地方——黎巴嫩、第六舰队的军舰上和土耳其的一部分。共有1个营由太平洋地区被派出，途经新加坡现在已经到了印度。看来，他们只能以营为单位进行运送部队。虽然宣布在美国的4个师将被调走，但目前他们显然还在美国呢。

在西方，人们经常称美国为山姆大叔，苏联是熊，法国是姑娘。我看有点像。美国极力表现出强大，实际上它已经未老先衰，一共才170多年。资产阶级已经衰落了。除蒋介石和李承晚外，还有谁像美国资产阶级那样还害怕，那样惊慌？尽管他们表面好像很强大，尽管在那里共产主义政党的力量还很薄弱。麦卡锡主义、非美调查委员会等就是证明。美国比英国、德国、意大利都害怕。在意人利共产党的力量很强大。但那里的资产阶级并未表现出特别的恐惧。

这次美国在中东完全惊慌失措了。尽管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相信他们的第六舰队还能在黎巴嫩海岸停留一个月。你们的报纸上说，美国的军舰停留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想插手中东事务。我看，这完全正确。否则伊拉克事件刚爆发，他们一天都不想等，就决定立刻采取行动。伊拉克革命发生在早晨三四点钟，而艾森豪威尔在当天就讨论这个问

题了，并且得出结论：如果不向那里派遣军队，那么就会失去整个中东。

赫鲁晓夫：他们想的是对的。

毛泽东：他们急躁不安。他们很清楚，在那种情况下，他们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决定做个样子，表现出强硬，并好像要进行战争。实际上他们只集结了 1.2 万人的部队，企图吞下伊拉克，然后拿下整个中东。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来了一场暴风，掀起了反美浪潮。

我们在印度、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大使在自己的报告中表示出不满。这些国家在最近的事件中表现得比苏伊士运河危机更谨慎、更沉稳。我不同意这种评价。实际上北欧 4 国家、荷兰、加拿大和卢森堡都表示反对美国的侵略。支持美国的有：英国、黎巴嫩——更确切地说是黎巴嫩的一个总统、约旦的国王、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共 7 个国家，包括美国。而承认伊拉克的，首先是巴格达条约的参加国。世界上有许多令人想不到的事——在伦敦召开了巴格达条约国会议，本来是讨论侵略伊拉克的问题，但结果是承认了伊拉克。杜勒斯去了德国，企图向西德政府施压，但他刚离开，德国便承认了伊拉克。

赫鲁晓夫：西德在伊拉克有重大利益。

毛泽东：美国是最不民主的国家，最独裁的国家。在自己的行动中，除与英国商量外，没有同任何国家商量。但英国并未紧跟美国，他们的军队进入约旦迟到了。我想，英国会很高兴，在这件事上让美国领先了。如果美国人从那里撤军，英国在约旦就会很难受。

我们认真地研究了你对戴高乐的信，并注意到，法国宣布将派军舰到黎巴嫩。他们否认这是显示力量，并让人们相信，他们的军舰派到那里是为了检查法国人在那里生活得如何。好像为此就应该派 2 艘军舰。我认为，法国人是想介入此事，而美国不让它参与。在宣扬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时候，杜勒斯说，他认为在中东行动最好不让英、法

参加，他们的名声在苏伊士运河事件时已经搞臭了。在这次美国人只打算让英国参加。而法国人则被拒绝了，走开了。因此，戴高乐不得不改变口气。

美国军队暂时还没有从黎巴嫩撤离。那里进行总统选举并已经出现传言，说美国人要从黎巴嫩撤军，可英国人对此表现出不安了，因此美国人说，他们将后勤部队留在黎巴嫩，为英国人提供后勤保障。

赫鲁晓夫：那是谁说的？

毛泽东：新闻就这么报道的。

我想，美国打算从那里撤离，这种传闻是可信的。显然，即使不召开政府首脑会议，也要召集安理会，再不行还有联合国特别会议。从前并没有期待这个会议，尽管是苏联首先提出召开会议的这种倡议。我不知道我的情报准不准，但美国对召开联合国特别会议的立场，好像并不积极。是什么让他们推延会议呢？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拖延一下时间。因为他们想先撤兵，哪怕是只从黎巴嫩撤一半，那么他们的威望也会有所提升。那时他们将会说：“我们做这一切就是为了缓和局势，而不是打算进攻伊拉克。”如今黎巴嫩已经选出了总统，而且哈马尔舍尔德^①在那里的观察团也在扩大。

赫鲁晓夫：这就是说，美国赞成伊拉克的方式。我们同意让他们参与进来。

毛泽东：我想，黎巴嫩将沿着自己的道路行进，而不是按照美国的道路。谢哈布^②在那里当选了总统，他是一个基督徒，而在那里应该是一个穆斯林教徒。我记得，在黎巴嫩的反美力量中，有许多是中间派的力量。这样，如果夏蒙^③是个明显亲美分子，那么谢哈布则持中间立场。为什么黎巴嫩不能走自己的道路？美国人在黎巴嫩已经暴

① 哈马尔舍尔德，时任联合国秘书长。

② 谢哈布，时任黎巴嫩陆军总司令，在1958年7月底的大选中当选总统。

③ 夏蒙，黎巴嫩总统，在1958年7月底的大选中下台。

露了。黎巴嫩的民族革命并未受到损失，现在国家已经分裂为亲美和反美两派。这就是美国人做的好事。我们很感兴趣的是，英国的6万军队在约旦将怎么办？英国人比谁都疯狂。

现在他们又像从前的那种倾向，只要英国利益受到损害，英国就会拿起武器。像苏伊士运河事件，英国人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甚至没有同自己的同盟军——美国商量。

赫鲁晓夫：不，他们商量。

毛泽东：商量了，但没商量好。

赫鲁晓夫：这里问题很复杂，可能他们就分配角色的问题商量好了，为了不让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上占优势，而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将反对派力量吸引到美国一边。

毛泽东：这是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是美国不希望与英、法一起来搞艾森豪威尔主义，意味着他们的利益出现了碰撞。

赫鲁晓夫：对，有这方面原因。英、法是赤裸裸的殖民主义者，当美国与英、法搞在一起的时候，阿拉伯人民就会了解事情真相。这就损害了艾森豪威尔主义。

毛泽东：对，那次英、法两国很尴尬，因此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事件的发展就像个台阶一样，美国站在第一级上，英国站在第二级上，随后法国也被牵扯进来，但最后还是没有让它参加。疯子到了一定的时候，是最愚蠢的。他们没有认识到后果，尽管他们担心人们将其当作侵略者，而全世界都说他们是侵略者。但是如果将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进行表决，就可以给一些国家施加压力，多搞些赞成自己的票，像加拿大、日本。这显然是由于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阶级属性而造成的。赞成他们的，毫无疑问，“我们的朋友”蒋介石和前伊拉克代表将会投赞成票。剩下的一些赞成票将是其他一些被说服的代表。

从前任何时候，朝鲜战争除外，美国人都没有遭受过大的损失，

并且始终扮演卫士的角色。美国没有考虑到这次他们被揭穿。刚抓住一个稻草，美国人抓住了日本的提案。美国驻日大使向日本外交部表示感谢，这并非什么新闻。我们已经看到，美国人向日本作揖。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赫鲁晓夫：显然，日本是根据美国的意图提出的。因此美国人由于日本的关键性行动而感谢他。日本的提案为美国人挽回了面子，并且使美国的军队可以不经过讨论就撤出。也就是说，美国的意见是被日本人提出来的。

毛泽东：这说明，美国的力量有限，困难甚多。最大的困难是，世界舆论不在美国方面。这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他们的困难多，占的地方大，人口少，一共 1.7 亿，他们的兵力共 260 万，其中步兵 80 万，也就是说步兵、海军、空军各占 1/3 左右。我同意你的意见：美国的海军是为了吓唬人的，空军有些用。在美国大部分是后勤部队。在第一线可以活动的有 19 个师，不到 30 万人。

马利诺夫斯基：从前 1 个师有 1.7 万人，现在实行五单位原子师制，减少至每个师有 1.2 万人。

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刚从德国休假回来，他得到的情报是最新的。

毛泽东：美国把驻西德的第 24 师的一部分海军陆战队调到黎巴嫩去了。

赫鲁晓夫：所以才破坏了奥地利的领空。

毛泽东：美国这次彻底露馅了。依我看，美国不想在伊拉免和黎巴嫩发动战争。这个问题我们同美国是协调一致的。这是我们的路线。

赫鲁晓夫：杜勒斯是我们的代表，同傻瓜打交道要好于同聪明人打交道。

毛泽东：我不开玩笑，这人的确不错，对我们有利。

赫鲁晓夫：在日内瓦，我们在一起喝过酒。

毛泽东：但那时很猜忌艾登。

赫鲁晓夫：艾登这个人是西方政治家中最聪明的。

毛泽东：现在艾登做了蠢事。

赫鲁晓夫：是的，走进了死胡同。

毛泽东：麦克米伦的处境还好些，他还没有走进死胡同，但是也接近了。

赫鲁晓夫：是的，损失还在最小的程度。在召开大国首脑会议的问题上，他会采取拖的态度，现在不想召开，因为现在召开的话，其结果只能对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有利。要开成的话，也是在英国大选的前夕，这对麦克米伦有利，迎合英国舆论界的要求，可以争取大部分选票。在大选中，保守派可能得胜。

毛泽东：是否有召开会议的可能？

赫鲁晓夫：是的，但会稍晚些。英国议会大选前。麦克米伦感兴趣的是为了在社会舆论面前表现出像一个同俄罗斯调和者。并且那时候保守分子得到多数票。

毛泽东：你对戴高乐这个人怎么看？

赫鲁晓夫：是个坏人，半个法西斯。

毛泽东：难道比希特勒还坏？

赫鲁晓夫：一样坏。

毛泽东：依我看，他好一些，因为他与美国和英国存在分歧。

赫鲁晓夫：对，在国际政治中，我们应该利用这一点，对我们而言，戴高乐比摩勒对我们有利。在国内，他代表最反动的势力。

毛泽东：应该说，最反动的势力。难道从前在国内反动势力还少吗？

赫鲁晓夫：摩勒是社会党人。他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听群众和工人的意见。而戴高乐是自由党人。他依靠军队和大资产阶级。戴高乐实行更厚颜无耻的政策。

毛泽东：这是正确的。你看戴高乐能否继续当选？

赫鲁晓夫：现在还很难说，力量对比还没有确定下来。但是法共正在动员工人阶级说：我们不接受。能否推翻，决定于这一点。人民不接受，有可能被推翻。但也有可能搞军事冒险。目前法国的阶级斗争最尖锐。

毛泽东：我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第一，法共要坚决反对戴高乐，但是从长远来看，戴高乐执政有好处。人民对他有幻想嘛。他下台，谁来代替他？还不是那些寿命只有几个月的政府。这样，人民还会想他，他还会上台的。他上台最多也只能搞三五年嘛。法共自由惯了，让它锻炼一下。让毒素放出来。

赫鲁晓夫：我们应该考虑到戴高乐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并在自己政策中加以利用。

毛泽东：我们既反对戴高乐，又赞成戴高乐。我们的《人民日报》发表过批评戴高乐的文章，《真理报》也发表了批评他的文章。

赫鲁晓夫：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真理报》是党的一个工具。

我们甚至有误会。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对我们没有严厉批判戴高乐表示不满。

毛泽东：可以对他们说：戴高乐越反动越好。

赫鲁晓夫：我们向他们作了这样的解释：这是他们的内政，我们出头评论会使局势复杂化；同时，我们公开反对戴高乐，而法共也在反他，敌人就可能污蔑法共是执行莫斯科的指示；戴高乐上台是不可避免的，在国际上对我们有利，不是对英、美有利。法共政治局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报纸登了杜克洛、多列士的文章，使苏共党员和舆论界正确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问了法共政治局：你们需要什么帮助？他们说，他们同意我们的做法。

毛泽东：我想补充一点。从国内局势来看，戴高乐执政也有利。要准备人民否决不了，怎样向工人解释。这次否决了，他还会上台的。

赫鲁晓夫：法共讲，在国内它可以控制，但在阿尔及利亚它无法控制。戴高乐上台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必然的现象。

毛泽东：希特勒上台也是必然的现象。它是一股毒气嘛。乍一看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欧洲8个国家的解放，应该感谢希特勒。如果不是希特勒上台，怎能搞出易北河以东这样一大片地区？当然，你们的牺牲很大。我在接见日本代表团的时候，他们常向我讲日本侵略了你们，我们觉得很惭愧，很对不起”。我说，日本侵略了我们，我们要表示感谢，没有你们的侵略，我们就不能进北京，你们走了，我们才来了。这一点没有公开登报，但在我的文章里写过，日本人做了好事。

赫鲁晓夫：历史是正确的。

毛泽东：可能，全体法国人民都很难理解，但需要让法国工人和共产党不要害怕戴高乐上台。对人民来说，困难只是暂时的。

赫鲁晓夫：是的，一方面精神上做准备，但同时大力动员群众反抗戴高乐。

毛泽东：当党遭到失败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灰心。

赫鲁晓夫：同意你的这些分析。我记得，在莫斯科周恩来与胡志明同我讨论越南问题的时候，胡志明认为，法国人要将他打败了，请求像朝鲜战争那样派遣**志愿**军。那时，周恩来同志说还是不派志愿军好，我们当时商妥不把这个决定告诉给胡志明。我们实际上是搞了一个反对胡老的阴谋。（笑声）和这一样，我看还是不告诉法共好，免得影响他们的斗志。

毛泽东：有些同志有时在假象的后面分不清事物的实质。例如，胡志明同志，在奠边府拿下来以前，没有看透法国的软弱。

周恩来：是的，我想起来，我们在莫斯科是如何商谈妥的。法国人后来在日内瓦做出了很大让步，向胡志明让出的领土比我们设定的大。这也体现出他们实力较弱。我们为此要感谢孟戴斯-弗朗斯。

毛泽东：在希特勒进攻莫斯科的时候谁预见到，从易北河到千岛群岛，到朝鲜的三八线，再到越南会出现社会主义阵营。

赫鲁晓夫：这样一说，你是想给希特勒立一个纪念碑吧？（笑声）

毛泽东：是啊！应该给希特勒、蒋介石、日本天皇立纪念碑。我们有两个老师，一个是马列主义理论，一个是法西斯主义。当这两个老师教育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变聪明了。需要两个老师教育。对我们中国来说，如果没有蒋介石和日本人，我们就不能教育中国人民。

谁想到会出现吴努、苏加诺、纳赛尔领导的新的民族国家？

马克思这个人就有些冒进，他老说革命就要实现了，即将实现了，但一直没有实现。

列宁的话实现了，但在中国革命这样快就胜利了，我没有想到。现在局势与马克思和列宁时候相比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英国外强中干。中东这次我们胜了，肯定的，敌人要退的。

赫鲁晓夫：这次胜利的后果会是很大的。请允许我谈谈对国际局势的估计。我同意你对国际局势的分析。不过你只是算了美、英的陆军。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并不在人力上与我们较量。它们是在原子弹、导弹、氢弹、飞机和其他方面与我们较量的。有生力量的对比对我们来讲是不算数的。在目前条件下，双方对垒打阵地战的可能性不大，主要是毁灭后方的工业中心，力量表现在导弹上。在估计力量时，不仅要算在黎巴嫩港口登陆的力量，还要考虑第六舰队的原子弹和导弹的力量。这样一来，力量是很可观的。美国第六舰队司令在黎巴嫩登陆以前向我们发表了挑衅性的演说，他说几天以内可以把苏联从地球上消灭掉。这不是偶然的。我们通过塔斯社宣布，我们在三个地方搞军事演习。在伊朗国境上，派格列奇科元帅去。在土耳其国境上，派梅列茨科夫元帅去。

毛泽东：我们不太了解这些人。

赫鲁晓夫：一个是年轻的元帅，另一个是老元帅。梅列茨科夫元帅已经老了，走路都很困难，但人们都知道，他战前是苏军的总参谋长，打日本的时候他是率军从东路进攻的，他的名字完全与那个公告联系在一起。另外，同保加利亚同志一起搞联合演习。我们派了几个空军师去，由斯克里普科元帅率领。过去搞演习没有宣布过，这次宣布是为了钳制西方。我们说，只投几个导弹，土耳其就完蛋了。所以，美国人才去土耳其，给它打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总司令在此之后安慰土耳其说，别怕，俄国人打你，我们在第50天就去帮助你。土耳其人说，那时你们来参加葬礼好了。后来，土耳其同我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总统、总理、外长都向我们有所表示。我们得到材料说：伊拉克胜利后，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准备立即进攻伊拉克，要求美国在道义上给以支持。美国劝他们不要这样做，它说伊拉克已经胜利了，伊拉克国内很团结，土、伊的边境是山区，你们一下子打不垮伊拉克，战争会拖下去。主要意思是怕打仗。这个情报是第一手材料。

毛泽东：我知道第六舰队司令发表的演说，是诺尔斯杰特发表的吧？

马利诺夫斯基：那是在叙利亚危机的时候。

赫鲁晓夫：力量的对比在近东有利于西方。美国宣布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人家不听，于是就要打伊拉克，但结果承认了伊拉克。这是道义上的失败。艾森豪威尔主义已经完蛋了。阿拉伯人明白，不值得采取黎巴嫩和约旦的方式，要采取伊拉克的方式，因为美国承认伊拉克的方式嘛。

毛泽东：是的，瞬间就实现了革命。

赫鲁晓夫：有趣的是，现在伊朗人和土耳其感觉怎样？当费萨尔^①被砍头的时候，美国连一个手指头都没有动。这样，反动力最就失去

① 费萨尔，伊拉克国王，1958年7月被推翻，在政变中被打死。

了信心，危机的时候，美国会不会来帮助？

我们一枪不放，就赢了美国三次：第一次是苏伊士运河；第二次是叙利亚；第三次是伊拉克。最耐人寻味的是伊拉克。

毛泽东：所以，我们才能在这集会庆祝啊！

赫鲁晓夫：伊拉克政府里有3个共产党员。暂时还不清楚事件的进展。纳赛尔想使伊拉克走埃及的道路。这对我们并无害处，但让步也是不可以的。不能让埃及像对待叙利亚一样来对待伊拉克，使其加入阿联。要使伊拉克保存多个政治党派并建民主和自由。

毛泽东：这是最好的方案。

赫鲁晓夫：是的，马克西姆方案。如果他们将伊拉克并入阿联，这即使不是失败，但也意味着将要从阶级斗争转向民族斗争。不应该屈服，应纳赛尔的倡议我与他举行了会谈。

毛泽东：他在莫斯科待了多久？从哪来的？

赫鲁晓夫：从南斯拉夫来的，在我们这儿待了一天。事情是这样。他在南斯拉夫结束访问后，坐快艇去埃及。这时伊拉克爆发了革命。关于这件事他一无所知。直到事件结束了，他才知道这一切。南斯拉夫大使拜见我，并转达了纳赛尔和铁托的请求，希望苏联提供飞机送纳赛尔回埃及。铁托说，纳赛尔坐快艇回国，有可能被美国俘虏去。在这里他是对的。当铁托向纳赛尔转达俄罗斯人提供飞机后，过了2个小时，南斯拉夫大使再次到我这里来请求会见，并且说纳赛尔想来会谈。纳赛尔与我会谈，这一点铁托是不高兴的。纳赛尔是深夜来到的，夜里，我们俄罗斯人并未像中国人那样睡觉了。与纳赛尔商量好，在第二天早上10点举行会谈。会谈过程中只休息了2个小时。他想同自己的外长法齐商量，这是一个聪明人。晚上会谈重新开始，并且一直持续到早晨4点纳赛尔离开。因为担心飞机被打下来，我建议他经南斯拉夫飞回，而经过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纳赛尔说：“对，但如何才能得到允许？”

毛泽东：从前是按这个航线飞行的吗？

赫鲁晓夫：我担心伊朗一天之内不能发下许可。我们与纳赛尔商量好，我们来同伊朗说，而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由他来说。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允许过境飞行，那么将经伊朗、伊拉克直到叙利亚。纳赛尔担心伊朗人将飞机打下来。我们安慰他，这是不可能的，伊朗人如果这么做就意味着战争。当把伊朗大使召到外交部佐林那里时，他一进门就发抖，以为我们要向伊朗宣战。

毛泽东：如果是我，我也要发抖。

赫鲁晓夫：佐林告诉伊朗大使，我们要派一个代表团坐飞机去埃及签订文化协定。大使回答说：我立即报告给我国政府，我相信政府会同意的。飞机起飞了，沙特阿拉伯不同意过境。纳赛尔说，不同意，也过。我回答他说，我不同意，这样他们会说我们不尊重沙特阿拉伯的主权，会把我们自己束缚起来，无法抗议美国破坏奥地利的领空。我们命令机长只能去大马士革。纳赛尔回到大马士革以后，同阿列夫^①进行了会谈。阿列夫是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反共，很反动。显然他们谈的是如何反对我们。

与纳赛尔进行会谈时，我对他说，让他以个人名义劝告伊拉克政府发表一个声明，表示伊拉克将严格遵守以前同各国签订的协定，照常供应石油。这样在西方可以造成一种错觉，对我们有利。这样做，仗就打不起来了，否则现在要打仗。西方有关国家的舆论会说，你看人家照样供应我们石油嘛。至于政变，那是人家的内政。纳赛尔听了很满意。

毛泽东：这是一个好的想法。

赫鲁晓夫：但伊拉克派去联合国的代表说，伊拉克并不退出巴格达条约，这并不是我们建议他们这样表示的，但这也对我们有利。伊

^① 阿列夫，时任伊拉克共和国副总理。

拉克希望我们派遣大使，但是因为我们的大使与他们国内有广泛的联系，所以他们不希望他马上到任。看来，这是纳赛尔的影响。他们想在我们的大使到任之前削弱伊拉克共产党在政府内的力量。纳赛尔怕我们直接同伊拉克接触。伊拉克的武器很不好，我们说我们可以帮助。纳赛尔说，你们可以把武器交给我，由我转交。我们想直接交给伊拉克，不经过纳赛尔。

毛泽东：实际上运了吗？

赫鲁晓夫：是的，经过叙利亚。是经纳赛尔同意的。我们并不反对纳赛尔。但我们希望武器直接运到伊拉克。现在我们正暗中与纳赛尔进行斗争，但这不是主要的。万不得已时，我们也可以同意通过纳赛尔转交武器。主要的问题是保护伊拉克。在任何情况下，事情都是对我们有利的。

毛泽东：伊拉克加入大阿联是完全可能的。

赫鲁晓夫：是的，但是我们不能马上将共产党员交给纳赛尔来随意支配。现在共产党在伊拉克有很大影响。根据伊拉克共产党中央的计划，革命发生了，卡塞姆^①是一个好人。但是他并未使纳赛尔满意，因此很可能他的命运会像纳吉布^②一样。

毛泽东：请讲一下纳吉布。

赫鲁晓夫：纳吉布曾领导起义反对埃及国王，是埃及的总统。纳赛尔推翻他的政府并将其囚禁在家里。

毛泽东：纳吉布不是亲美分子吗？

赫鲁晓夫：不是，他与纳赛尔观点完全相同。因此，很可能纳赛

① 卡塞姆，1958年伊拉克政变后出任伊拉克共和国总统。

② 纳吉布，1952年埃及政变推翻帝制后成为第一任埃及总统。同年纳赛尔发动政变，仍保留纳吉布的领袖地位，但自己掌握实权。1954年纳赛尔担任总理后，将纳吉布长期软禁起来。

尔会不信任卡塞姆，因为他同情共产党人。

毛泽东：关于这点在西方报纸上已经刊登了。

赫鲁晓夫：因此可能让阿列夫取代他。卡塞姆很早就与共产党有联系。还在1956年，我们就得到消息说，卡塞姆领导的那一个师打算利用国王和总理在一个节日去他的师里检阅的机会，把国王和总理打死，取得政权。后来，国王去了，总理没有去，卡塞姆怕把国王杀了，总理不死，革命不会成功。我们没有同意这个计划，我们想这个情报可能是英国人的挑衅。他们的政变当时未能实现，是因为时机不成熟，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建议。这次卡塞姆奉命带兵去约旦，途经巴格达时搞了政变。纳赛尔可能达到目的。伊拉克共产党可能支持不住，因为伊拉克工人的觉悟很低，民族主义分子有可能使他们失去领导。

毛泽东：伊拉克的共产党难道不强大吗？

赫鲁晓夫：不出现意外的话，伊拉克共产党将失去领导地位。该国的阶级觉悟还很低。

毛泽东：伊拉克600万人口，有6万共产党员^①，这还少吗？

波诺马廖夫：没有，伊拉克共产党一共才有一二千人。这是在地下活动的时候，伊拉克共产党领导人提供的情况。

赫鲁晓夫：现在我们力争尽快向那里派出自己的大使。

毛泽东：如果他们不接受你们的大使，怎么办？

赫鲁晓夫：他们会接受的，但是他们想拖延我们大使派驻的时间。

波诺马廖夫：已经得到伊拉克同意苏联大使赴任的消息了。

赫鲁晓夫：很好。这可能是我们给在埃及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下指令的结果。他已经被委任为驻巴格达的参赞。他从叙利亚去了巴格达，并且我们在伊拉克设使馆可以同伊共保持联系，至少能把我们

^① 据中方的记录，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伊拉克共产党比较大吧，据说有2万多人？”

的观点告诉有关方面。

毛泽东：你讲得很好。我们已经转到了问题的实质——有关工作的方法。你们的方法好，因为很灵活。你们将诺尔斯杰特的反苏言论变得对自己有利。现在你们的策略很成功。当双方都有核武器的时候，他们就害怕被消灭了。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就说过，双方都怕。不可能不害怕，否则就我一个人害怕。问题是谁更害怕些。我几年前就开始问这个问题了。我认为，是西方更害怕。我能在诸多的事件中验证自己的说法。有时候一些事件对我的看法不利，但多数时候还是符合我的观点的。

在与葛罗米柯会谈时，我感兴趣的是他关于西方外交的动向。葛罗米柯回答说，他的印象是那些王八蛋表面很神气，实际上他们心虚得很。我想，这就是我逻辑论证的理由。

赫鲁晓夫：埃及战争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西方曾经两次把我们引到战争的边缘，即埃及一次和叙利亚一次，但都未打起来。

毛泽东：对，那时候在会谈中，我曾经说过，苏联派志愿军的问题最好不要宣布，以免自己被动，吓唬一下，他们就不敢了。葛罗米柯不知道怎么向纳赛尔解释，如果不得不派志愿军。我问他，在有限战争的情况下能否派遣志愿军？他那时回答，如果派了志愿军，将会引发战争。是否相信这点？我对此表示怀疑。我们在朝鲜这么做过。

赫鲁晓夫：在同我会谈时，纳赛尔向我表示过，如果美国进攻伊拉克，埃及主动参战。我说不赞成，我举中国的经验。中国没有正式同美国进行战争，但是却赢得了战争。

毛泽东：我们在那里有150万人。

赫鲁晓夫：我对纳赛尔说，在志愿军的名义下，埃及可以派全国所有部队参战。纳赛尔不同意。

毛泽东：依我看，美国人我们的敌人赞同以这种方式进行战争。按他们的观点，最好同志愿军打，而不是同国家打。依我看，总的来

说，最好不派志愿军。但如果发生战争，那就可以这么做。有人说，志愿军是中国人的发明，其实是苏联和美国创造的。你们和美国都派兵帮助过蒋介石。如果召开各国首脑会议，请您建议杜勒斯采纳志愿军制度。

赫鲁晓夫：我可以告诉杜勒斯，毛泽东同我谈过，他建议采纳志愿军制度。

毛泽东：但他不会同意的，我和他的交情不深啊。

赫鲁晓夫：但有时观点一致啊。

马利诺夫斯基：派志愿军有好处，关键在于，如果投原子弹的话，可以说我们是志愿军，并不代表我们的国家。这将对进行核战争具有实质性意义。

赫鲁晓夫：根据国际法不可以使用核武器。因为派出志愿军的国家并未处于战争状态。

在与我会谈时，纳赛尔坚决不同意。纳赛尔问我：一旦打起仗来，是否宣战？我回答说，您是国家元首，可以独自决定，而我不是国家元首，因此我没有权利回答这个问题。我劝说他，他明白，我不想向他保证。我说现在解决那样的问题还早。也许没有实施打击就赢得了战争。一切均取决于条件。纳赛尔向我们要轰炸机和导弹。我们没给。我们说，这些武器在我们手里比在你们手里更有效。他向我们要 60—70 公里的中程导弹。我们说中程导弹是 2000—2500 公里。

纳赛尔提出对本次会谈发表个声明。他说，在西方会晤后就发表声明，而我们能不能那样做？我们同意，效果很好，对我们有利。

毛泽东：是的，这很有利。

赫鲁晓夫：然后，纳赛尔通过自己的通讯社制造舆论，赫鲁晓夫说了这，说了那。这都不是真的。

毛泽东：记者的证据并不是准确。

赫鲁晓夫：在离开北京之前，我接见了印度记者。他们向我提问，

我向纳赛尔做出了那样的声明，是真的吗？我回避了该问题，没有说是或不是，让他们自己猜。

毛泽东：我想，在斗争的任何时候都需要有正确的斗争策略。我想，当我说我们与资产阶级阵营对比局势对我们很有利时，我故意绕开了导弹武器的问题。你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补充。昨天我问你，在他们和你们之间导弹数量的差额时，你说，差额不大。

赫鲁晓夫：是的，差别主要在于质量。

毛泽东：你说生产导弹很贵。

赫鲁晓夫：是的，是很贵，但是应该生产，并且我们将继续生产。

毛泽东：打仗的时候，我们将从你们那拿导弹。

赫鲁晓夫：到时候你们自己就有导弹了。

毛泽东：我们国家很穷，很难说，将来能不能有。

赫鲁晓夫：谁说的，你们的国家穷吗？你们的国家的财富是人。你们的国家能够生产出作为财富的孩子。

毛泽东：什么意思？

赫鲁晓夫：我们两国背靠背。我们都向前看，不担心自己的后方。你们可以向前看，不要担心自己的后方，因为我们可以保护你们，这很好。

毛泽东：所以才在齐齐哈尔建设工厂。

赫鲁晓夫：要搞个潜艇工厂。

毛泽东：一定搞，借助于你们的帮助，我们就如虎添翼了。不过，另一方面，也有你们的帮助。

赫鲁晓夫：是朋友往我的菜园子里投了一束荆棘。

毛泽东：你想让我们清除它？

赫鲁晓夫：没关系，我们会轻装前进。

毛泽东：也许，你还没看清，这不是荆棘，而是抛了一把金子。

赫鲁晓夫：别人的金子我们不要。列宁说过，革命胜利以后，金

子就没有用了，只能用它盖厕所。

毛泽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厕所时，我们将助你一臂之力。

赫鲁晓夫：那是啊！让我们一同来建设吧！那时共产主义就不可能是中国的，不可能是俄国的，也不可能是南斯拉夫的，而是世界的。

毛泽东：那时候联合国怎么办？

赫鲁晓夫：将飞到天上去喽。

毛泽东：我建议在地上建一个水上城市，从各个国家派代表到那里。

赫鲁晓夫：对那时要有一个中心，组织、协调经济条件。你们会比谁去划船。

毛泽东：我们自己划船。昨天你在顾问的问题上不同意我的意见吧。

赫鲁晓夫：中国人很聪明，总想处在一个有利的地位上，要我们的顾问，还让我们因为他们而受批评。

毛泽东：到那时候，我们不带任何人上船。

刘少奇：我们只是当面提，背后我们不向任何人讲。

赫鲁晓夫：最好让我责备中国顾问，让毛泽东听。

毛泽东：昨天你说，你们处于不利的位置，谁让你们是第一个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呢？

赫鲁晓夫：这就是出错的原因，为此我们总要受中国人的责罚吗？

毛泽东：这是列宁弄的。

赫鲁晓夫：但他已经去世了。

毛泽东：他留下你们来处理。但是列宁无处不在。他现在在哪？也许在美国的第六舰队上空？

赫鲁晓夫：在中东，第六舰队是个幻影，如果没有苏联在那里，它就蛮不讲理，现在它担心受到呵斥。

马利诺夫斯基：强大的敌手什么时候都不会大声喊叫的。

毛泽东：对，正是这样美国才在全世界大声喊叫。

赫鲁晓夫：一个人在森林里走，感到害怕的时候，或者是唱歌，或者是吹口哨。

我想，我们需要在地中海采取积极的政策。就如我昨天所说，需要积极地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要搞导弹、飞机、潜艇、装有导弹的快艇以及装有导弹设备的海岸工事等等。到那时，我们再看看美国的第六舰队该怎么办。

毛泽东：在中东事件中，南斯拉夫持什么立场？

赫鲁晓夫：这次态度还好，但是不够。它一方面讨好纳赛尔，一方面也要保持西方的面子。这个立场，铁托是不会改变的。我请纳赛尔说服铁托，让他同意和苏联、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其他黑海沿岸的国家一起搞军事演习，一旦和平遭到破坏，采取共同行动。纳赛尔说，铁托不会同意的。我说，你看，这是你的什么朋友？

毛泽东：纳赛尔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和铁托商量好吗？

赫鲁晓夫：当然没有。这件事不可能与铁托商量好的。但我也向他友好地扔了一个荆棘。

会谈记录：H. 费德林、A. 费列夫

原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2001年第1、2期

关于国际形势及两国的 教育制度改革等问题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记录

(1958年8月2日)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第三次会谈

8月2日于丰泽园

参加人：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安东诺夫等同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林彪、彭真、邓小平、陈云、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等同志。

毛泽东简要地谈了一下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情况，通报了钢铁和黑色金属生产的情况。

赫鲁晓夫谈了苏联本年度生铁产量增长了470万吨，并指出，在苏联按总产量来说，钢还比铁多些，因为我们还用废钢炼钢。

毛泽东：中国现在没有用废钢炼钢，因为我们还没有废钢。

赫鲁晓夫：中国还没有那么多机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在工业化初期会生产更多的生铁，然后才会有更多的钢。

会谈转向国际问题。

毛泽东：今天可以谈谈北大西洋公约。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这3个集团包围着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性质，毫无疑问，是侵略的。西方人宣传是防御性的，我们宣传是进攻的。我看，两种宣传都是对的，是符合双方的需要的。他们不好宣传是进攻的，我们也不好说是防御的，实际上该如何评价？我记得，

在莫斯科期间，我和你谈过。这些组织是个钙化组织，就像生过肺病的人一样，在生病的地方长了疤，在周围形成了钙化组织，防止细菌渗入别处。我看，这些组织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灭亡，从而防御“共产主义细菌”的组织。有时，他们是进攻的，譬如在匈牙利事件期间。要不是我们反击的话，他们都可能把军队开进匈牙利了，然后再到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去展开斗争，都可能会引发大的震动。谈到进攻，我指的是在对他们有利时机，给了他们思考的机会，为什么不向我们进攻，不消灭我们。这样有利的时机，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后来他们做事更现实了，因为他们知道，在苏联和中国搞反革命活动是根本不会成功的。匈牙利事件是个教训，我们能使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政权更巩固，我们的力量会更强大。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些组织是防御性的，是为防御共产主义“细菌”的。你曾经说过“钙化”是不稳固的，在任何时候共产主义“细菌”是会渗入的。你记得这些话吧？

赫鲁晓夫：我记得很清楚。

毛泽东：你说得对。他们的组织是不牢固的，这次中东事件证明了在他们的阵营中缺乏团结。

赫鲁晓夫：这次在巴格达的街上砍下了国王费萨尔的头，美国人向土耳其和伊朗说：“如果你们这里也发生伊拉克事件的话，我们来帮忙。”这就是说，在国王的头被砍下来以后才去帮忙。我认为，这种帮助是软弱无力的。马尼拉条约是个软弱的组织。它的情况就像巴格达条约一样，这个条约的背后有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为反对殖民主义而斗争的北非国家。

毛泽东：换句话说，巴格达条约夹在这些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中间。它们是一个薄板墙，左右受攻，更何况墙角本身也不巩固。其主干是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东面是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那里的情况也很不牢固。

赫鲁晓夫：譬如在泰国，就出现了很有趣的情况。他们的国会反

对外国在泰国建设军事基地，这很明显，甚至菲律宾也不巩固。

毛泽东：是的。马尼拉副市长现在就在中国。感觉他怕打仗，他说，国内有很多军事基地，打起仗来就是个死。他试探我们的想法。这个人是菲律宾总统派来的，美国人想从中破坏，没有成功。他问我们能否卖机器给菲律宾，看来，美国人不会卖机器给菲律宾。都知道，甚至菲律宾国会中反对党领袖也要访问中国。

陈毅：美国未必能完全控制住菲律宾。

毛泽东：泰国这边也希望不大，这面墙也不牢靠。这种不牢靠在于两面受敌：一面是中国，一面是印度、缅甸、锡兰。他们的3个条约中，北大西洋公约的处境比较好，比较巩固，因为它的参加国连在一起。至于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的情况，也是两面受敌，而且都是强大的敌人。这首先是中东和东南亚国家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人民。还有一个第四泛美同盟，但是这个组织越来越弱了。

赫鲁晓夫：我同意你的看法。

毛泽东：所以现在我们经常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联系起来，是有理由的。

过去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表现得不是太明确。有时我们在强调民族独立运动时只提亚、非，不提拉丁美洲。现在我们把三者一起提。我的观点是，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发展起来了。

美国和加拿大发生了不小的冲突，彼此闹矛盾。美、加的情况，你们更清楚。

赫鲁晓夫：美国企图在经济关系上打压加拿大，称之为加拿大资本主义的反作用。因此在加拿大发生了执政党的更替，反对美国统治的保守党取得了执政权。

我们如何评价这些条约？北约和巴格达条约国家离我们更近，但是北约国家的侵略力量更强大，他们有最敌视共产主义的力量。现在这个组织已经削弱了。例如，在准备首脑会议的问题上，他们之间的

意见不一致。戴高乐所持的立场就有些特别，这不是分裂，但也并非一致。这个集团的基础已经动摇了。美、英在拼凑这个组织的时候，散布了一些地方的现象恐吓他们：一是战后，一些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二是朝鲜战争；三是封锁柏林；四是越南战争。他们说，社会主义国家在积极展开军事活动，扩大势力范围。所以，他们开始谈论要建立防御性的组织，于是就签订了3个条约。后来又出现了新情况，朝鲜战争结束了，苏联以及人民民主国家为和平共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取消在芬兰的军事基地，签订对奥地利和约和撤出驻奥军队以及其他一些措施等。基于我们所做的一切，甚至连英国工党都说，苏联没有发动战争的意图。这很重要，因为北大西洋公约和美国在英国的军事基地，是工党搞起来的。现在他们说，我们不是侵略国家，这是我们取得的成就。苏联的武力行为迫使他们这样做。他们使得我们处于有利的地位，动摇了他们的基础。甚至在美国现在也有人说，我们将不通过武力解决同资本主义之间的争执，不是用导弹和氢弹来解决，而是用意识形态。诚然，尽管用了这个词，但他们所说的并非真的是“意识形态”，而是指通过经济手段和苏联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来打败我们。这样，通过恫吓小国，使共产主义在这些国家失去力量。这有很大的意义，例如，挪威和丹麦拒绝在本国建立导弹基地。

毛泽东：这很重要。是否可以说挪威、丹麦、瑞典和芬兰这些北欧国家将成为一个和平地区。

赫鲁晓夫：现在还不能完全这样讲，因为在法律方面挪威和丹麦是北大西洋公约的参加国，芬兰和瑞典不是。我们正在用我们的政策分化这些国家的人民，削弱他们对美国的好感，缓和我们之间的国家关系。我们还要继续分化他们，组织运动削弱北大西洋公约。荷兰和比利时也是一个不稳固的、薄弱的环节。

毛泽东：还有卢森堡。

赫鲁晓夫：是啊！卢森堡是最可怕的对头。

毛泽东：这也是个薄弱环节。

赫鲁晓夫：希腊只是在形式上加入了北约，它与土耳其、英国都有矛盾。

毛泽东：正如所报道的，最近几天在塞浦路斯有几千人被捕。

赫鲁晓夫：为争这个岛，正在进行一场争执，希腊要塞浦路斯岛，土耳其则主张在土、英之间瓜分，所以这个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土耳其国内反美情绪很高。在伊朗，有一个反对派的民主政党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很积极。

美国是这些侵略性条约的组织者，它强使条约的参加国维持巨额的军事开支，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受到了损害。美国的援助都是军事援助。它每援助1个美元，受援国就要付出5个美元。美国根本不给这些国家什么经济援助的。如果援助的话，也只是一些粮食和日用品。美国的垄断资本家怕这些国家的资本发展起来，与它竞争。

甚至在北约各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受到了强大的抵抗。这些国家想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独立发展自己的经济联系，反对禁运。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同西德的克虏伯公司签订了协定，向他们购买两个化学工厂的设备。这个公司在某些塑料的生产方面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连美国也向他们购买了设备。在我们购买的设备中，有些是属于禁运项目的。为了逃避禁运，该公司代表建议在协定中写上这部分设备是根据苏联的图纸制造的。我们同意了。其实，都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图纸。如果我们今后的政策是明智的，北大西洋公约集团是可以被我们瓦解的。当然单靠明智的政策不够，还要有实力才行。今年上半年，苏联的经济发展震动了西方。我认为，在泰国、菲律宾和柬埔寨所发生的变化，甚至在巴基斯坦和其他一些国家发生的变化，都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对整个东方起作用。

毛泽东：是的，这是共产主义细菌的渗入。

赫鲁晓夫：没有任何装甲可以防止这种渗入。

我们现在要做工作，争取西德。方法是通过东德和西德的竞赛。东德的生活水平高于苏联，但是我们还要帮助他们提高。我们放弃了东德负担的那部分苏军驻军费用。我们准备多给东德订单，使他们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充分就业。

对阿尔巴尼亚也是如此，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水平，使它成为吸引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力量，说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提高生活水平，当然，阿尔巴尼亚很小，不是一个典型。

毛泽东：它是阿拉伯民族吗？

赫鲁晓夫：不是阿拉伯民族，但是他们是穆斯林。

我们在接待来自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代表方面有优势。因为我们南面的几个共和国，像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共和国的生活水平很高，工业很发达，农业的耕作技术水平也很高。接受代表团对我们有好处。如果说，过去资本主义国家派代表团是想影响我们，腐蚀我们，现在他们派代表团来苏联则怕被我们影响。而我们在完成重工业规划的同时，如果我们在生活建设、食品生产、化学品生产方面完成自己的规划，那么10-15年以后，我们就可以在一系列产品方面赶上美国的水平。

毛泽东：是按人口计算么？

赫鲁晓夫：是的。这对西方的知识界影响很大，不用说工人阶级了。卫星上天给他们很大的震动。落后的俄国在40年后的今天搞出了卫星。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用战争的力量来消灭这些侵略集团，要靠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来消灭它们。

毛泽东：对。

赫鲁晓夫：芬兰过去是反苏的前哨，今天芬共是国会内的最大政党。

为了巩固自己在人民中的权威，芬共向我们请求援助。芬兰国内有失业，所以芬兰政府要求我们雇用他们的劳动力。因此，我们同意在苏、芬边境上由他们派工人给我们建设价值2,5亿卢布的电站。在建设过程中，这样就解决了他们成千名工人的失业问题。芬兰的资产阶级就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担心经济危机。我们说，能够向他们订货，但是拿我们的机械和原料作为支付的报酬。

挪威政府也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也打算在挪苏边境上建设个电站。挪威政府要求我们用他们的工人来建设。我们准备让他们来搞。

奥地利政府代表团这次也要求我们在经济上同他们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我们现在也在土耳其进行试探，虽然不是很积极。土耳其和伊朗怕我们就像怕鬼一样。我们也想在这些国家进行些工作。土耳其、希腊和西班牙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伊朗和意大利比他们好不了多少。

我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很好，帝国主义还没有准备好打仗。局势对我们有利。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被抛在后面了。

毛泽东：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原定12年完成，现在看起来，5年就可以完成。已经过去2年半了。我们想，我们甚至可以超额完成。我们的钢铁方面如果今年不能，明年就一定能够超过英国。尽管我们公开说是，在15年内赶超英国。煤今年已经超过英国了。钢去年是500多万吨，今年要搞1100万吨，明年2500万-3000万吨。英国明年的钢产量可能下降，最多也就是2200多万吨。如果不发生下降的因素，明年我们搞2500万吨，可以超过英国。

赫鲁晓夫：这是令人振奋的成果。应该说，我们认识到我们的高速度，而你们做的那些，如果你们能够完成自己的规划，这对于你们的邻居而言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上，我们经常做比较。社会主义可以按照不同的方法进行建设，或者是慢速或者是快速。我们认为，我们所拟定的速度是比较好的，并且是能够实现的。

对于国家而言——一个是钢，一个是粮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也可以采用另一种方法。无论哪种方法都是社会主义。一种方法是：少、慢、差。另一种方法是：多、快、好。采用哪种方法来发展？我们是采用的第二种方法，并作为一场战斗，我们动员全体人民来完成这个计划。人民满怀热情，并为提前完成这个计划而顽强斗争。

粮食问题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中国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国家。我们提出了从今年开始“进行三年艰苦奋斗”的口号。届时，人均粮食将达到1000-1500公斤。这些数据我们暂时不想公布。

赫鲁晓夫：是人均1-1.5吨吗？这可是很多呀！

毛泽东：在报纸上我们说，在3-5年我们将达到1吨或大约1吨粮食。实际上我们将用3年时间超过1吨。可以做得时间又长又慢，也可以做得又快又好。我们选择第二条道路。

赫鲁晓夫：这就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连文盲也能找到这样的理论，因为他看到这是从前，那是现在。这对西方人的头脑和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很大的。把印度和中国加以比较是很有趣的。印度取得独立比中国晚两年。而看一看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当我们在印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并且确信他在原地踏步，没有什么速度可言。我对尼赫鲁说，看一看中国人的气魄。尼赫鲁请求我帮助其建设飞机制造厂。我对他讲，不应该只建一个生产飞机的工厂。要建设一个飞机制造厂，就需要有几十个，或许上百个工厂。他想要一个工厂，而中国建设了上千个工厂。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利用我们的力量，加强我们的团结，那么任何侵略集团都是没有用的。

毛泽东：很对。

赫鲁晓夫：我们请美国帮助搞化学工业，是一个宣传步骤。艾森

豪威尔关于这个问题的回信很好，因为伊拉克事件的发生，我们没有发表，在这个时候需要发表一些坏的东西。有些美国公司愿意卖给我们设备，买我们的原料。如果我们的原料不够的话，这些公司还表示愿意给我们以公司的贷款。我们的计划并不是指望他们的贷款来实现的。当然，如果给的话，我们也不拒绝。

毛泽东：我看了艾森豪威尔的回信。已经公布在美国的报纸上。

赫鲁晓夫：是的，但是他们并未公布我们的那封信。如果他们公布了这封信，就会使美国人感觉可以挣钱，那就对我们很有利。

毛泽东：有个时期，我们不了解你们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现在才明白，是要买他们的设备。

赫鲁晓夫：这是个策略步骤。美国人说我们只重视发展重工业，不重视生产日用品。我们发展化学工业有两个目的：（1）发展国防工业；（2）生产日用品。我们给他们回信说，你们既然关心人民的生活，那你们就帮助我们发展生产日用品的化学工业吧！他们考虑的是利润和怎样削弱我们的国防潜力。他们不会帮助我们。那封信是一个宣传步骤。我在德国已经说过了，美国是不会给我们援助的，铁托却大有希望得到援助。

毛泽东：讲得很好，很满意。总的来说，是发展自己，破坏敌人。在东方还有一个地区，它在形式上没有加入集团。这与费德林有关系。涉及日本、台湾和南朝鲜。

周恩来：还有南越。

毛泽东：有这种可能，这些国家也许会组成一个东北亚军事集团。他们被绑在美国的车上了。这是美国人的首创。这个组织能否搞成，决定于日本。日本的困难是，搞，就要得罪我们。至于蒋介石和李承晚，他们早已得罪了我们。日本是要台湾，还是要中国？我们同它的贸易关系，已经断了3个月，准备再断上3个月。他们通过四五条线来活动，想恢复同我们的贸易关系。最近，日本社会党的代表来到了

北京。他们甚至通过苏联商会的人来劝我们。怎么你们还有一个商会呀！目前不准备恢复。如果恢复的话，好事要让给日本社会党来做。这次不准备恢复，再等一个时期。恢复要有3个条件：

（一）长崎事件^①要处理，要向我国道歉。

（二）政治上不从事任何敌视中国的活动，放弃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最近3个月岸信介对我们采取了十分粗鲁的行动。抨击和咒骂我们中止了贸易关系。我们劝他与美国和蒋介石进行贸易，因为我们不同日本进行贸易。我们认为必须提出这个政治条件。

（三）不能妨碍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我们并不要求日本立刻和中国恢复邦交，但是它应该促进而不应妨碍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暂时不承认中国，并不妨碍两国间的贸易。我们没有日本还活得下去；日本没有我们，并不一定活不下去，但很困难。

赫鲁晓夫：日本没有中国不行，中国没有日本可以。

毛泽东：重要的是，不仅是中国断绝了同日本的关系，而且东南亚的1000多万华侨也抵制日货。

赫鲁晓夫：这种影响非常严重。

刘少奇：中国的资产阶级掌控着这些国家的经济。

周恩来：这是指那些在印尼、南越、泰国、菲律宾部分地区、柬埔寨、马来亚、缅甸部分地区生活的中国人。

毛泽东：形式上这是一国的代表，但实际上是两国的代表。

赫鲁晓夫：总之，如果把我们的政策用于东方和西方，那么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为了与所有国家发展经济联系、文化联系，更广泛地进行交流。因此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是需要注意，不能向我们派遣间谍，别当蠢货。总之，在保证和平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

^① 1958年5月2日，两名日本人在长崎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上，强行扯下悬挂的中国国旗，制造反华事件。为此，中日贸易于12日全面停止。

基础上，展开和平攻势，但是也要稍微吓一吓他们。

毛泽东：对，吓一吓很有必要。

赫鲁晓夫：当前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国。它离我们很远，与欧洲国家相比它的立场有些变化，但是它在我们附近搞了基地。我们向那些有美国基地的国家说，你们的基地离我们很近，我们的也离你们很近。我们说，上帝离你们远，而我们就在你们的旁边。打土耳其，例如，我们声明：你的朋友——美国很远，而我们却很近。如果需要，我们不用飞机和军舰，只发射一批导弹就可以消灭你。我们也是那么警告德国和英国的。他们明白我们的警告。这是现实的。如果我们攻击，那么将不会有任何生物存活。但是我们不想攻击。

毛泽东：这是必要的，此外，还要那样想，如果谁将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将予以还击。

赫鲁晓夫：这是对的。

毛泽东：应该说清楚，谁会在战争中灭亡——我们，还是他们。

赫鲁晓夫：是的，资本主义将要灭亡，这将是同资本家相联系的最后的战争。

毛泽东：应该做好战争准备。首先，需要在道义方面做好准备。我们的人民忙于和平建设。要让他们明白，他们是不怕战争的。战争并不可怕。如果谁将其强加于我们头上，也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对帝国主义分子说，如果你们真的想进行战争，那么就过来吧。我们没有原子弹，只有手榴弹。但是苏联有原子弹。如果我们不得不打，那么我们将什么都不会吝惜的。我们刚刚进行建设，如果你们把它破坏了，那么我们战后再重新建设。反正我们还没有建设好。放心，因为我们不是资本主义，这是在那种情况下，即如果帝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但是我们不想战争。

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个共同的军事学说，就是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

赫鲁晓夫：我认为，总体上这是对的。但是不要给敌人造成一种感觉，似乎中国要准备进攻了。我们的政策是：一方面要有强大的力量，一方面要使世人知道我们是爱和平的。

毛泽东：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自卫。我们可以向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分子证实，我们这里有一种事实。每个合作社，每个单位都发枪。并且说如果胆敢侵犯我们，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外国的领土，我们一寸也不要，虽然人很多，也不要外国人的领土。我们的领土一寸也不让，土地就是这么多，要保住。

赫鲁晓夫：我们今年的航空节，就没有军事性质，而是一般性质的。军用飞机没有摆出来，结果影响很好。

毛泽东：我们每年搞两次游行，一次是五一，不带阅兵；一次是十一，带阅兵。

赫鲁晓夫：看来，我们也可以采用你们的办法，11月7日搞阅兵，五一劳动节不搞。

毛泽东：我认为我们可以保证7年的和平共处，而有可能是15年。

赫鲁晓夫：过10年以后，也许战争就打不起来了。

毛泽东：我是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周期来算的。一个周期是20年。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已经13年了，还有7年。再过7年，我们两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更可观了。

赫鲁晓夫：那时敌人的表现就不同了。那时，他们一听说中苏会谈，就会发抖的。

毛泽东：7年要争取到了，再争取10年、15年、20年就不成问题了。

赫鲁晓夫：从杜勒斯的政策中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他的政策首先是“推回去的政策”，就是把共产主义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界限上去。结果把谁抛回去了呢？后来，他不得不改变了政策，采取

所谓“遏制政策”。结果把谁遏制住了？把伊拉克遏制住了吗？

周恩来：把自己给遏制住了。

赫鲁晓夫：对，失去了纳赛尔。埃及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高涨。情况很好。

毛泽东：法国失去了摩洛哥和突尼斯。

赫鲁晓夫：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正在进行着。目前，殖民地人民的战争正如火如荼，而没有减弱。我们的成功将促进殖民地人民为自己的独立去奋战。我认为，我们的事业进行得很好。艾森豪威尔帮助伊拉克的国王，是在死了以后才来帮助。一项很不错的“援助”。

毛泽东：现在无论怎样都帮不了伊拉克了，费萨尔已经死了。

赫鲁晓夫：这种帮助是无济于事的。

毛泽东：最近拉丁美洲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其中最主要的一件就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机降到海地。

赫鲁晓夫：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当然现在做结论还早。资产阶级在它的发展初期，是反封建的，提出过民主的口号，并且依靠民主的口号在议会斗争中取得了大多数，他们依靠这个巩固和发展了自己的阵地。现在可否讲：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把议会当作据点，抛弃了民主的口号，而走上了公开法西斯和军事独裁的道路。

毛泽东：可以这样讲。

赫鲁晓夫：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资本主义世界的脓疮已经破了。资产阶级无法用民主和议会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了。

毛泽东：美国就是。

赫鲁晓夫：法国戴高乐也是。

毛泽东：的确，在那里几乎已经没有国会了。

赫鲁晓夫：在危地马拉，美国用军队把人民选出来的总统赶跑了。黎巴嫩也证明了这一点，那里的所谓人民选出来的总统不得不要求美国派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毛泽东：国会无用，他们就用；没有用，他们就把它变成了形式。戴高乐的宪法还要国会，但把它变成了咨询机关，和美国一样。美国的国会只是通过一下预算，争吵一下增加或者减少美元的问题，除此以外，其他什么权利也没有。

赫鲁晓夫：我们正处在一个很好的时代。

毛泽东：谈谈紧张问题。紧张对谁有利？西方制造紧张是想对他们自己有利。我看，如果西方再继续搞下去，他们自己会发现，维持紧张局势是对我们比较有利。缓和对他们不利，所以就搞紧张。中东的紧张局势是最近的最高峰。这种紧张局势最有利于动员人民，使人民想一想：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知道，美国怕打，英国更怕打。一开始的时候不得了，做出要打的样子，这使尼赫鲁和世界都很着急。尼赫鲁是真着急了，因为这样的紧张对他不利。英、美从黎巴嫩和约旦是早撤兵好？还是晚撤兵好？我看，不要太快，还是晚些好。

赫鲁晓夫：我同意你的看法。请你把这个意见亲自告诉给杜勒斯吧。

毛泽东：最好半年不撤，大家好有事可做嘛！撤退了，他们就又变成了好人，又变成爱好和平了。我想留他们一下。

赫鲁晓夫：我想从根本上来研究这个问题，最好留杜勒斯多做几年国务卿。他会给我们制造出另一个黎巴嫩来。委内瑞拉就是一个例子。

毛泽东：我同意你的看法。委内瑞拉的事件表明，资产阶级已经走下坡路了，而我们是走上坡路。

赫鲁晓夫：今天我看了艾森豪威尔给我的回信。我想起了当年扎波罗热营地的哥萨克写给土耳其苏丹的一封信，这封信对苏丹讽刺得很厉害。我想模仿这封信给艾森豪威尔写回信。在外交信函中有这么一个老的样本。您看过吗？想看的话，我寄给您。在那封信中，对苏丹就有这样的答复。（接着举出了其中的一些内容）

毛泽东：这样的话，就可以请艾森豪威尔做一做同样的事情了。

赫鲁晓夫：我想模仿这封信给艾森豪威尔写回信。艾森豪威尔在回信里说，他们是保护小国的，我们是侵略小国的。我准备在回信里答复他，既然你们是保护小国的，那么五大国会议除了五大国之外，还可以有伊拉克、瑞典、挪威、东方的柬埔寨参加。提出这些国家请他保护吧，看他怎么办。

毛泽东：柬埔寨和瑞典这些国家表现都不坏嘛。

赫鲁晓夫：对了，还有挪威，尽管它已进入了联合国，但它的总理还是个不错的人。

会议是不会有什麼结果的，我们感兴趣的是争取召开会议的过程。会是开不成的，即便开成，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没有必要害怕紧张局势，紧张局势是我们双方之间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我们要利用才对。

毛泽东：列宁曾经讲过这个意思。在平时教育人民需要几十年，打一次仗就教育过来了。战争可以教育人民。现在还不是战争，但有战争的危險。每出一次“伊拉克”，人民立刻就紧张起来。我和尤金同志谈了5条：

（一）他们的兵少。

（二）他们内部不团结，例如，工党党员和保守党员之间存在矛盾，美国政府成员中间存在分歧等等。

（三）他们的同盟国不满意（如加拿大、法国、日本）。

（四）这次使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更加活跃了，推动了和平运动。真正的和平运动不是斯德哥尔摩的会议，而是这次伊拉克事件中所出现的那些人物。甚至日本首相都被迫承认，伊拉克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东方的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潜力未受到制约。因此，由于中东事件，出现了许多拥护和平运动的人士。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浪潮是对帝国主义的威胁。我看，这对帝国主义不利，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考

虑怎样在保存面子的情况下撤军。在艾森豪威尔给你的回信中有一种观点，那就是现在不存在战争的危險，他还不肯对此情况说得太多，但看得出来，他自己比谁都害怕战争。

（五）在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掩盖下，真正的革命运动正在进行。可以说，和平运动已发展为反帝反封建运动。一有适当机会，这些斗争就会爆发。谁知道这次伊拉克发生了革命？

赫鲁晓夫：这次伊拉克革命杀了前首相努里·赛义德，此外还杀了1000多名反动分子。

毛泽东：这次是比较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世界各地都在酝酿着革命。对西方国家的党也有利，不像匈牙利事件时，有些人退党，这次要增加一些人吧！

赫鲁晓夫：增加了一些人。

毛泽东：帝国主义者广大的社会人士眼中是不公正的，真理没有站在美国那边。比如说，东德给西德写了一封信，抗议阿登纳准许美国利用西德的基地。西德向来是看不起东德的，但是这次也不得不给以答复。西德解释说，不是我们允许的，是美国人自己的搞的。这很说明问题。

赫鲁晓夫：今年9月联大主席就要改选，美国支持南斯拉夫的代表。南斯拉夫和捷克过去曾经谈妥，在联大主席改选时，南斯拉夫支持捷克的代表诺西克，但是南斯拉夫现在不准备支持捷克的代表了，因为南斯拉夫与美国谈妥，美国支持南斯拉夫的代表波波维奇做候选人。哪个波波维奇更坏：是驻贵国的大使或者是那个联合国大会主席候选人的波波维奇，很难说谁好谁坏。看来，姓波波维奇的都是坏蛋。

毛泽东：总之，把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加以比较的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尽管当时有俄国革命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了一些大事件：英国的同盟罢工、摩洛哥的革命、中国的革命。但是，罢工停止了，非洲的革命被镇压

了。在中国，蒋介石北伐取得了胜利，他对国民党组织清洗，换句话说，进行镇压共产党员。但是，这些事件未能引起世界的大动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只是最初2年相对稳定。1947年7月，蒋介石开始进攻中国共产党。1949年我们胜利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整整打了3年，然后是越南战争爆发。胡志明同志他们开始是和法国人谈判，后来也打起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之间的区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保持其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而荷兰则保持对印尼的殖民统治。印度的解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除了印度以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主权国家，这些国家有：印尼、锡兰、埃及、伊拉克、突尼斯。当时，阿尔及利亚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英、美两大帝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时所受的挫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没有的。如果美国真的从中东撤兵，那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没有的。这证明帝国主义在日益崩溃。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下一次大战——可能打起来，也可能打不起来——之间充满着更多的事件。这就证明，资本主义体系不能保持自己的统治了。我同意你的意见。在穿越易北河、朝鲜三八线、越南十七度线的这些国家，我们绝不放弃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寸土地，并为和平而战。

赫鲁晓夫：当前就是这样。

毛泽东：我们要争取7年，最好是15年的和平期。

赫鲁晓夫：在这段时间中也会发生事件的，帝国主义已经削弱了，伊拉克性质的革命还会发生的。

毛泽东：这类事件是在我们与美国之间的地区发生的，这是一个最大的地区。

赫鲁晓夫：譬如伊朗，也是帝国主义阵营较弱的地方。

毛泽东：还有泰国。

赫鲁晓夫：还有巴基斯坦。

毛泽东：还有沙特阿拉伯。

赫鲁晓夫：那里的环境也不稳定。

毛泽东：应该向拉丁美洲做工作。

赫鲁晓夫：应该派我们的人到那里，以使帝国主义的注意力从欧洲和亚洲移开。那里干柴很多，一点就着。

马利诺夫斯基：尼克松的南美之行就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看来，艾森豪威尔也不完全是神经过敏。他在委内瑞拉挨打时，美国向那里派去了伞兵。在伊拉克发生的事情是尼克松一行相关事件的重复和延续。我看，我们的事情好办，艾森豪威尔的事情不好办。

中间休息后

毛泽东谈到中国的党代表大会的性质问题，他说：中国的代表大会是常设机构，其代表任期5年，每年参加一次代表大会会议。

赫鲁晓夫：这类似于党的国会。

毛泽东：对呀。我们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总结了过去时期的经验，制定了党在当前形势下的基本路线。

赫鲁晓夫：我们的代表大会应在1960年举行。看来，我们也要5年举行一次代表大会更正确些，因为制定的经济计划就是一个五年计划。

我们的工业管理体制的改组效果很好，在这个问题上也与反党集团作了斗争。目前，我们准备对中学和大学进行重大改革。秋季，将对此问题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毛泽东：学习与劳动锻炼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

赫鲁晓夫：我们现在的中学都是培养学生考大学的，但是，大学招生有限，能考上大学的只是少数，然而所有的学生都要为此进行准备。需要中学培养有文化的人到生产中工作。因此可以的话，中学的

十年制应改为七年制或八年制。毕业后，所有毕业生都应从事生产工作：去重工业工厂、轻工业工厂、集体农庄。生产企业将创建手工业学校，为考取大学的人进行额外教育，并且这样可以掌握一门职业。但不是所有人都去学习，而是那些想学的人去。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从该所学校的毕业生中选派好的上大学。在这种体制下，每个学生都要经过劳动。我们那时，有的父母教育自己的子女说，你要考不上大学，就要把你送进工厂去当傻瓜，结果导致不尊重体力劳动，好像只有傻瓜才去当工人。而在新的体制下，所有人都将进行劳动。这样更民主。目前，我们大学中很少有工人和农民子女。这是很自然的，知识分子能够更好地培养自己的子女来考取大学，因此，他们孩子的潜力更大些。我们将这种方式从根部切除，首先，所有的毕业生都将去工厂工作，通过社会的挑选，这时，问题将不再由父母决定，而是由工作集体来决定。现在，许多年轻人不知道去哪，学习哪种专业。最终，大学毕业时他们不能通过合格考验，而且不想从事教给他们的知识所能做的事业。在新的体制下，这些人将在工厂检验自己的能力，确定自己的兴趣。要比在大学里通过学习来淘汰好一些。如今，党组织正在积极地讨论学校改革事宜。然后，我们将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更多的人来讨论。我们认为，这将是一项非常正确的措施。这项措施使我们能够挑选精英中的精英到大学去学习。我们将遵循一个原则——只有工作了2年及2年以上的人才能进入大学学习。

毛泽东：这个办法很好。还可以由大学来创办工作间，大学生可以在那里进行实践。

赫鲁晓夫：我还没有说完。工人和农民将在大学学习，大学准备实行半工半读，20%—50%的时间学习，其他时间劳动，最后一年可以全年学习。此外，提倡工厂办大学。

毛泽东：对。

赫鲁晓夫：这将锻炼出一批技能水平非常高的专业人员。

毛泽东：劳动是很好的学习。

赫鲁晓夫：劳动可以锻炼人。

毛泽东：专门读书是不好的。在新的制度下，大学生将不再向家里要钱，因为他们将会有自己的工作收入。中学也要搞些劳动。

赫鲁晓夫：我们打算把农业专科学校附设在国营农场里，这样大学生可以边工作边学习。

毛泽东：我们准备把所有农业大学都赶到农村去。

赫鲁晓夫：譬如，我们的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有的家在莫斯科的学生毕业以后，不愿去农村，宁肯在城里当一个擦地板工人。如果我们把农学院设在农村，吸收农民和农庄干部入学，培养他们，那么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毕业以后就会留在农村工作。

毛泽东：非常正确。

赫鲁晓夫：卫星上天以后，美国派人来我国考察我们的教育制度。他们回国以后，对我们的反映很好。但是，时间不过一年，我们的教育制度又要改变了。

周恩来：好，我们也是本着这个方向做的。

赫鲁晓夫：关于改革教育制度，我们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写了一封信，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可以给你们寄一份来。

毛泽东：愿意看。

赫鲁晓夫：那么我给你们寄一份。

毛泽东：现在，我们正在研究学校改组问题。我们正在试验。

赫鲁晓夫：尽管我们的条件不同，但你们也可以看看信中有关我们的改组方向方面的内容。

毛泽东：这里的问题是劳动和教育相结合。

赫鲁晓夫：在去年的主席团会议上，莫洛托夫向我进攻。他说我对什么都不满意，改组了工业，对农业不满意，改组了农业，可能将来你还要改到学校？他这个人完全脱离了生活。

毛泽东：对，他是脱离了生活。

赫鲁晓夫：他是个老实人，是自己人。

毛泽东：不那么老实吧！

赫鲁晓夫：他是忠实于工人阶级的事业的，但是，他是个蠢人，怕新鲜事物就像怕鬼和阳光一样。他不是敌人，但有时比敌人还危险，因为敌人看得见，而自己人当中的蠢人是容易看出的。

现在我们正在改组学校，还要加强我们的力量，这样，国家才能得到更好的和廉价的干部。

毛泽东：我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做了个决定，还没有定稿。方向和你们是一样的，就是让大学生不死啃书本，而是半工半读。

赫鲁晓夫：很好。匈牙利事件说明在大学生中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大学生里面闹事也闹得最多。

毛泽东：几个月以后，我们的大中学校都要有自己的工厂。

我们的机关干部都要下去参加劳动。在工厂里，厂长这样一些领导干部都要下车间劳动，参加生产。

朱德：军队里的师长要当兵，受排长和连长管一管。

毛泽东：我们的军官过去都当过兵，我自己也当过半年兵。但他们长期脱离了士兵生活。我们一年四季地管别人，抽出一定的时间叫别人管管我们，也是应该的。叫下级批评上级，给他们机会批评上级，是有好处的。

周恩来：还做了一项决定，所有的军官从今年8月开始从事生产工作，一年不少于两个月。

彭德怀：在军队里我们开四级干部会，军、师、团、营四级，还有连、排、班、士兵四级在一起开会，主要是听取下级意见。

毛泽东：不久前我们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约有2000人参加，会议开了2个多月，通过了许多决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互相展开了批评。军委的同志都受到了批评，我和彭德怀同志也

受到了批评。召开这种会议就是由外交部部长陈毅提倡的。我们一直对参加会议的人发号施令，就让他们稍微管一下我们，说出心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8周内，我们自觉地接受他们的批评。当然，不只批评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要受到批评，特别是那些缺点严重的人。

彭德怀：通过会议上的批评，一些军官现在讲到，对他们的批评真好。另一些军官因此明白，他们对下级的批评有时候是错误的。

毛泽东：我们对所有路线的干部实施类似的制度。其实质归结为：第一，所有人都应当从事体力劳动；第二，给下级批评上级的机会。我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将此种情况称之为整风运动。英国人将之称为“肃清”运动。

我们在6亿人民中进行了整风，没有整风，也就没有今天的“大跃进”。他们不满意，领导有缺点，他们批评了，心中就很舒服，因此才有今天这样的热情和干劲。我们中央做了决定，中央委员每年要有2个月在下面。这不会损害政府的工作，反而有益。

消灭盗窃、赌博等现象，也都是采取整风的办法，很有效。

彭德怀：这是一个处理违反纪律情况的好方法。在军队中，我们取消了禁闭室，因为那里无人可关。

毛泽东：不久前我们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许多决议。其中之一就是，除了节日和阅兵式以外，军官和士兵完全穿一样的服装，分不出谁是兵，谁是官，恢复我们过去的做法。战争结束后，由于物质状况的差别和其他一些原因，军官一时脱离了士兵。

赫鲁晓夫：你们在整风中的一些做法，我们在革命初期也有过，譬如列宁参加义务劳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进机关当干部，等等。

毛泽东：我们有一项决定，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在一年内至少有4个月在农村从事生产。只有在处理文件时，才能脱离工作。开现场会议，哪里高产就在哪里开，哪里的麦子好就在哪里开。会议不一定都在北京开，越在北京开会，脑子就越空。今年上半年，开了南宁

会议、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下半年我们还想去。

彭德怀：我们的军队每年帮助农民2个月，而且并不影响军事训练计划的完成。

赫鲁晓夫：我们的元帅对此不敢苟同。

马利诺夫斯基：当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时，我们总是给予协助。

赫鲁晓夫：我们常常使用军队来帮助收割庄稼，特别是最近几年使用军队去开荒地。去年和今年决定不再使用军队。

毛泽东：可以规定这样一种制度，军队按照该制度在一年中从事农业劳动2个月。这样不会妨碍作战训练。

赫鲁晓夫：情况可能有些不同，我们那里的机械化水平高，集体农庄庄员不希望士兵帮助他们做农活，怕他们做不好，反而受到损失。

毛泽东：可以考虑军队办工厂，士兵在那里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

马利诺夫斯基：士兵的劳动就是体力劳动，他们的劳动已经够繁重的了。

毛泽东：不然的话，他们退伍以后，就不会从事体力劳动了。的确，我们的部队现在还没有全部拥有企业，但已经有了一部分附属于部队的农业企业，战士可以在那里参加劳动。

赫鲁晓夫：我们已经具有部队创办农业企业的经验，特别是在远东。但没有成为习惯。

彭德怀：在我们的军队中，普遍实行蔬菜、水果等自给体系。

毛泽东：我们的部队自己种菜，自己养猪，至少半年可以自给。

赫鲁晓夫：我们过去也有过建筑工程部队，进行军事需要的建筑工程施工。我们大大缩减了其数量，因为他们的工作要比专业工人完成的费用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质量不好，因为士兵没有经验。行政管理人员也很多，不合算。既然这是部队，他们就应当学习军事，需要指挥员；但由于他们要进行建筑工程施工，又需要专业的工程师。结果是指挥员多、工人少。用这种方式来建设国家是不合算的，所以

决定放弃了。

朱德：我们转业了 40 个师，他们都掌握了技术，成了很好的工人。

毛泽东：可以考虑实行半农半兵，或半工半兵。

赫鲁晓夫：一般服兵役期限为 2-3 年。这正好是获得技能所需的时间。3 年后，我们使战士们复员，招收新的战士。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就只能成为学校了，而不是兵役了。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既不能将他们变成工人，也不能将他们变成战士，而且这样做会浪费国家一些钱。

毛泽东：我们国家不会对此进行拨款。战士会自己挣钱。

赫鲁晓夫：那么吃饭、穿衣、指挥人员的工资呢？况且，红军做的活是工人的 1/3，并且只能完成非技术的粗活。

毛泽东：我们的战士也只是做一些简单的工作：种种蔬菜，修修道路，建设灌溉系统。

赫鲁晓夫：我看，毛泽东同志，这恐怕是由机械化水平所决定的，就像我们二十几年前的情况一样。我们现在是用机械，譬如掘土，就用自动掘土机，驾驶掘土机的都是有专门技术的工人，如果让士兵去搞，人家并不欢迎。1933-1936 年我当莫斯科市委书记的时候，修运河就是用工人和铁镐。现在这一切都使用机械来完成，很少用人工。如果使用部队来进行建设的话，结果要比使用机械和有技术的工人贵得多。

毛泽东：军队就是军队，训练为主，只是拿出一部分时间劳动。

赫鲁晓夫：在修第一个地下铁道时，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我、雅罗斯拉夫斯基都参加了劳动。现在我们去参加劳动，工人就不会欢迎我们了，怕我们损坏了机器。

毛泽东：1 万年以后，干部也要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

赫鲁晓夫：1 万年以后，就没有军队了。

毛泽东：干部还要有的。

赫鲁晓夫：有些兵种，如导弹、雷达等部队，看来要转上雇佣兵制，因为这些兵种的专业性很强。我们不能叫入伍一两年的新兵来发射导弹，叫他们搞的话，导弹未等发射出去就会爆炸的。这种武器要由工程师们来操纵才行。再一个就是在潜艇上服兵役，难道在2年内能教会士兵操纵潜艇叫？这里需要的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使用他们将更廉价。我认为，在某些作战范围内，将转上永久性兵役制。

毛泽东：这是对的，他们要搞一辈子，但他们是少数。

赫鲁晓夫：部队种出的东西会很贵的。

毛泽东：这些干部需要他们始终搞自己的事情。这种情况与人少有关。但让他们搞搞蔬菜还是可以的嘛！

赫鲁晓夫：这样的蔬菜将会很贵。在市场上没人会买这些蔬菜。

毛泽东：为了对他们进行指导，可以聘请农艺师专家。譬如说，叫费德林学种菜，他的作品可能更好一些。当然，他到日本去，就不好种了。

赫鲁晓夫：我们不会让他干这件事的，太浪费了。

毛泽东：如果请来专家，叫上100名像费德林那样的人跟他学习，会学会的。他已经是文学家了，除此之外，再学会做一些类似的事情。对于他的主要工作（文学创作）是有益处的。我们外交部一共900人，分三批下去劳动，每批300人，每次去3年，9年中每人轮一次。

赫鲁晓夫：过去，我们实行过机关的苏维埃化。那时大部分职员都是旧人员，所以我们不得不抽调一部分工人到机关里，解雇了一部分旧人员，下放了一部分。这是被迫采取的步骤，对工作质是有影响的。

我认为，我们要这样来实施操作：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在国家机关中，干部问题解决得越民主，那么干部更换就越频繁。于是，干部就变得多起来。一些去从事生产，另一些则在他们的

岗位上任职。国家管理机关的民主化多半会使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毛泽东：一件事情占据一生这样不太好。

赫鲁晓夫：怎么办呢？例如，在研究所是培养不出来马克思的。人类培育出马克思只有一次。任何人都取代不了列宁。那么，显然，有一些人将来也需要工作，并且一些事情别人是无法替代的。比如您，毛泽东同志，最好，即使你去了集体农庄去种黄瓜，那么国家就不管了吗？

毛泽东：种黄瓜用不了多长时间。

赫鲁晓夫：但总不能一边种地一边处理国家事务吧。

毛泽东：我能在这个时候不处理国家事务。

赫鲁晓夫：话是可以这么说，现在在我们苏中之间将有一个最大的争论。

毛泽东：当没有那么多特别重要的事的时候，是可以去种地的。比如，在中东发生事件的时候，我就不去种地。

赫鲁晓夫：可这时候该收地了。

毛泽东：我也不是所有时间都种地的。

赫鲁晓夫：我跟您说一下我自己，主席团决定让我做好事。主席团的决定，主席团超过60岁的成员一天只工作5小时，一般的工作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中间吃午饭休息1个小时。因此按决定，米高扬和柯西金的工作日应该是从上午11点到下午5点。我说，真聪明，按条例，就是把我们当成了残疾人，实际上，所有人工作都超过10个小时。看今天，我也在工作，给艾森豪威尔口授回信。今年给我3个月的假期：夏天2个月，冬天1个月。但我实际上这3个月我像所有人一样，真正只休息了1个月。咋休息呀？所有的邮件都是给我的。在大海里游泳时，电话来了，只能上岸接呀。你刚一离开，就有人说：莫斯科来电话。但是，按照条例，我一年应有一个季度什么都不做。但是一部分人离开去休息是很正常，而我的假期则是另一

个样子。

毛泽东：我则是另一种情况。什么邮件都不看，什么报告都不听。我去休假的时候，甚至报纸都不看。这次周恩来同志下去1个月，我们有事也不找他。除非像这次中近东发生的大事，不然我们是不管的。这次，我们许多同志都在下面，因为发生了中东事件，才又叫来。

赫鲁晓夫：是啊！在埃及、叙利亚、印度尼西亚发生事件的时候，都会让你中断一切，无论是在休息还是在种蘑菇。

毛泽东：明年1月我准备辞去一个主席。现在我还有两个职务，国家首脑和党的主席。只留下后面的一个。这样我的事就剩一半了。我将全国走走，少在北京待了。

赫鲁晓夫：我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但我要说，在国家面前我们是有高度责任感、觉悟的。即使你辞去所有的职务，您对中国、对共产党的责任也是无法辞去的。

毛泽东：那倒是啊！

赫鲁晓夫：黄瓜还是不能种了。

毛泽东：不，还是可以的。

赫鲁晓夫：那么那时候你来我别墅种。我那儿有各种作物，也可以种黄瓜。

毛泽东：我要到那样一个地方，那里能游泳，没有电话。在你那我也不和北京通电话。

赫鲁晓夫：可以，如果一切正常，在一周之内是可以的。但看看报，您可以了解发生的事件，不能脱离这些事呀。

毛泽东：我在广东的时候，连中央报纸都不读。

赫鲁晓夫：依我看，从事政治的人就像酒鬼一样是不可救药的。他们总是迷恋政治。

毛泽东：是的，是这样的，但我必须要离开一段时间，到地方走走。

赫鲁晓夫：很好。

毛泽东：我准备每年要从北京离开4个月，做一个漫游者。

赫鲁晓夫：我也是。

毛泽东：到时候，我们两个都走，两个漫游者。

赫鲁晓夫：是的，就像退休一样。

毛泽东：我们有个决议，根据这个决议我们一年不少于4个月当漫游者。

周恩来：我也执行了，因此我不当外交部长了，由陈毅来接任。但应该承认，你们比我们更关心国际事务。

赫鲁晓夫：不一定。

周恩来：我们没有进入联合国，只与十几个国家有外交关系。而在你们那儿，莫斯科一批外交官就有60多个。

赫鲁晓夫：是的，在我们那全部外交都要通过中央主席团。有时候不召开主席团会议，但外交部会议是要召开的。

周恩来：这是因为苏联的威望高，每一个问题都要认真对待。我们感觉自己更安静。我们只与少数几个资本主义国家有往来，并且不急于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最好，这晚点发生。甚至，如果日本答应我们三个条件，为了不引起“两个中国”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在日本设立机构的打算。进一步说，在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之前，我们将不与它打交道，就像从前那样，只是半官方的贸易关系。我们将逐步在政府层面上解决问题。这将保障我们处于更主动的地位。从前我们认为，同日本发展半官方的关系，可以促进双方外交关系的建立。但可以说，日本方面很稳定。现在破裂了，日本方面更难过了。我们并未感到特别的困难。同日本破裂，给日本人民和贸易公司提供了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机会。现在可以向日本施加两方面的压力：正式的可以从你们那方面，非正式的是从我们这方面。对待日本的这个方针是我们政府赞同的。

费德林：也许，中国同志在苏联驻日本大使的活动的方面有什么想法吧？

赫鲁晓夫：也许，应该考虑一下，把中国的一个同志以苏联公民的身份派到我们在东京的大使馆。

毛泽东：但是他也不像俄罗斯人啊。

赫鲁晓夫：没关系，重要的是他要有苏联国籍。我们那里有苏联华侨。

陈毅：是的，可以考虑一下，但是他在日本显然会引起顾忌。

赫鲁晓夫：希望这个人懂俄语。

毛泽东：很难挑选这样的人，懂俄语又弄不明白日文，那样显然是无法骗日本人的。不排除，大使馆的这个工作人员突然暴露了。

赫鲁晓夫：这是例外。

周恩来：这就给你们添麻烦了。现在给日本送去了我们的报纸、杂志，大使馆可以根据这些来确定我们方针。

赫鲁晓夫：让那个人做我们大使馆的参赞。

毛泽东：这太好了，费德林将当我们的大使。

赫鲁晓夫：我希望你们的参赞到我的大使身边当助手，而你却想让我们的大使做自己的参赞。

毛泽东：到那时我们就能够裁减缩编为一个大使。

赫鲁晓夫：我说的可是认真的。

周恩来：很难找到这样既懂俄语，又懂日语的人。那些熟知日本的人通常在日本很有名。

毛泽东：这样只会给苏联大使添麻烦。

赫鲁晓夫：现在日本人也不欢迎他。在我们这儿，如莫斯科的瑞典大使就是俄罗斯人，是一个逃亡的瑞典的俄罗斯工厂主的儿子。

毛泽东：列宁曾说过，一个英国人可能是苏联的代表。

赫鲁晓夫：在日内瓦各国政府首脑会晤时，俄罗斯人是翻评。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在苏联的日本大使馆工作呢？

毛泽东：原则上是可以的，但真的要派，派谁去呢？

赫鲁晓夫：这个你们自己想吧。

周恩来：我们同意应该派一个了解当前局势的人去日本。但我们很难派一个人去大使馆。我们在对日关系方面是经常变化的。他将很难确定方针。如果我们向苏联驻日大使馆传递我们的方针通过莫斯科来进行，那就最好了。

赫鲁晓夫表示同意。他说，关于解决问题的公报我们留下，在我们明天回莫斯科之前做完。

毛泽东表示同意，他说，文件可以在离开前一小时签署。

赫鲁晓夫：我们将怎样签署文件：2份、3份还是4份？

毛泽东：2份。

赫鲁晓夫：好！我们会告知谁来参加会谈。

毛泽东：好的，你们将来几个人？

赫鲁晓夫：我们是否涉及军事问题？

毛泽东：是的，涉及国防部。我们涉及到的人与你们涉及到的人一样多。

赫鲁晓夫：我们将叫4名同志：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和安东诺夫代办。

我们将签署什么公报：是党的还是党和政府的公报？

周恩来：我们不指定公报的性质，我们签署《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公报》。

赫鲁晓夫：我们能不能最后指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等”？

毛泽东：可以。

赫鲁晓夫：好，让帝国主义分子头疼去吧，我们将去种黄瓜了。

毛泽东：那么，会谈就到此结束。

会谈记录：H. 费德林、A. 费列夫

关于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等问题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记录

(1958年8月3日)

(1958年8月3日于勤政殿)

在座的有：赫鲁晓夫、马林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安东诺夫等同志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德怀、彭真、陈毅、王稼祥、黄克诚、杨尚昆、胡乔木等同志

毛泽东：我想弄清两个不大、但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关于停止原子武器试验的问题。你们单方面停止了试验，西方却还在继续。您不觉得应当恢复试验吗？

赫鲁晓夫：他们不停止试验倒让我们解脱了自己的责任。我们自己的试验已经作过了。现在我们正在继续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一旦需要，马上恢复试验，当然，这是在各方没有就停止试验达成共识的情况下。

毛泽东：明白了。

您说过，洲际弹道导弹将飞越宇宙。当它再次进入大气层时不会被烧掉吗？

赫鲁晓夫：不会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毛泽东：对美国将自己的军事基地部署在苏联周围一事您怎么看？

赫鲁晓夫：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军事基地离我们很近。但是他们主要的基地离我们很远，在美国。轰炸机很难到达。现在，有了导弹

武器，力量对比扯平了。

目前我们在导弹大射程半径的试验中遇到了困难。我们的领土不够用。

毛泽东：不能往北极方向发射吗？

赫鲁晓夫：这恰好就是最近的距离，遇有战争时我们将通过极地进行发射。所以美国人才建议北极地带的检查机构标出我们导弹基地的位置，以保障自己的安全。

毛泽东：我看到了艾森豪威尔对您关于防止突然袭击的建设的回信。好像是封不错的回信，他似乎同意由专家们对这个问题进行协商。显然，他们是害怕突然袭击的。

赫鲁晓夫：我还没看到这封信。

毛泽东：代表团离京的事宜最好能定下来。或许我们需要改变欢送方式，社会各界人士齐聚机场，仪仗队排列成行，邀请外交使团，您看呢？

赫鲁晓夫：好像昨天已经说好了，走时的安排和来时一样。但愿我们商定的结果能够生效。这样我们就不会给那些歪曲的言论提供更多的依据，否则西方将报道说，代表团秘密到达是因为对谈判成功不抱希望，看来，中国和苏联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后来，说是举行了会晤，达成了协议，并决定举行盛大的欢送仪式。最好是让他们猜去，让会晤本身产生影响。

毛泽东：我认为您秘密来访是必要的，以防帝国主义者借您不在之机搞突然袭击。

赫鲁晓夫：我不认为他们对此已拿定了主意，力量对比对他们不利。现在他们又不得不吞下另一个苦果——承认伊拉克。即使他们已经做好了50%的战争准备，他们也不敢开战。

毛泽东：是的，英国绝对不敢开战。

赫鲁晓夫：法国和德国也不敢。他们知道，我们会把他们碾成面

儿的。如果说二战时期德国的“V-1”和“V-2”飞弹曾使英国人备受折磨，那么这些武器和现在的导弹比起来简直就不算什么了。这一点他们很清楚。

毛泽东：可他们的基地遍布各处。仅土耳其一国就有100多个。

赫鲁晓夫：没有，土耳其没那么多，况且还都处于瞄准线之内。他们打算在希腊建基地，那就更好对付了：把石头从保加利亚的山上推下来，基地就建不成了。美国现在自身难保。

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研制出洲际弹道导弹的科学家们。

毛泽东：也包括德国科学家吗？

赫鲁晓夫：不包括，他们只是在最初参与过研制。不可能把如此重要的事情交给德国人去办。他们现在都回德国了，在那里讲述他们都干了些什么。美国人根据他们的讲述判断，我们没有洲际弹道导弹。当我们宣布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时，他们还不相信，可后来我们发射了卫星。现在美国人已经承认，俄国人自己研制出了洲际弹道导弹。那边有报纸报道说，在美国也有德国人在工作，可是第一颗卫星并不是在美国发射的。

毛泽东：我还是认为，您在政府首脑会议举行时与会有点风险。我劝您最好还是在您不在时任命一位代理人。我们对您出国总感到担心。

赫鲁晓夫：没错，是有点风险，特别是会议在纽约举行的话：那儿有好多充满敌意的匈牙利人，还有其他敌人。日内瓦的环境最好。我又想起了1955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件有趣的事。

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总统外出时，警卫队要在前面开道。但宪法制定的时候，人们乘坐的还都是四轮轿式马车。因此当艾森豪威尔到达日内瓦并钻进汽车后，他的警卫队就跑在了前面，其景象令所有欢迎者大笑不止。当时大家就想，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到了后会怎么样呢？我们到达日内瓦后，坐进了敞蓬汽车，沿城行驶起来。这使所

有的人都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原来认为，我们由于害怕会乘坐装甲车。不错，我们后来是改乘了装甲车，因为瑞士警察通报说，当地有一恐怖组织准备发动袭击。

美国人还写文章说，赫鲁晓夫在匈牙利时不敢在公众面前露面。但我们在匈牙利访问时的情况，大家都是知道的。当时我们应该到位于美国大使馆对面的纪念碑去献花圈。我就建议卡达尔穿过人群走向纪念碑，让美国人看看，赫鲁晓夫是怎么被人“撕碎”的。这以后他们再也不说匈牙利人反对苏联了。

毛泽东：斯大林甚至拒绝去日内瓦，我指的是在没有那种危险的情况下。

赫鲁晓夫：这是老年人思维方式的问题。

我们认为目前不会爆发战争。我们时常责成我们的军事专家根据他们所掌握的资料对局势进行分析。前不久，他们报告说，目前没有理由认为近期有爆发战争的危险。

毛泽东：您认为杜勒斯能留任吗？

赫鲁晓夫：不会留任，看来要离任了，他能留任对我们比较有利。跟傻瓜共事总比跟聪明人共事要省事的。

毛泽东：对史蒂文森有可能当选总统一事您怎么看？

赫鲁晓夫：这是个更有利的人。

毛泽东：毫无疑问，政权一旦落到共和党的手里，总统就将是尼克松。

赫鲁晓夫：没错，多半会是这样。这个人比艾森豪威尔更坏。战争使艾森豪威尔作为民族英雄登上了政治舞台。作为政治家，他并不出色，他没有政治经验。作为军事家，他也不怎么样。阿登战役结束时，他险些被德国人打败。当时还是丘吉尔请求斯大林向西方盟国提供援助的呢。

毛泽东：当时就不该帮他们。不帮他们，现在就不会有西柏林，

更别提什么西德了。

赫鲁晓夫：没错，说不定我们这会儿正在多列士家里做客呢。但当时是另一种情况。德国人不战即向美国人举手投降，而对我们则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当时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我们拿不下柏林。斯大林和艾森豪威尔达成协议，他为我们提供了攻占柏林的机会。在维也纳会战中，德国人同样避开我们投向艾森豪威尔，但他没有抓他们当俘虏。由此看来，艾森豪威尔还算是一个比较正派的人。而他现在却是美国垄断者说什么，他就干什么。

毛泽东：公报的签署工作全准备好了。

赫鲁晓夫：那好。签字吧。

谈话到此结束。

谈话记录者：H. 费多连科 A. 菲列维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8卷第181页

对巴西记者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科托夫报告毛泽东的谈话

(1958年9月10日)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莫斯科克罗波特妮娜大街10号

第286号

1958年9月10日

致苏共中央：

兹发送巴西记者姆利罗·马罗金·索乌扎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

另通报如下信息：巴西记者姆利罗·马罗金和玛莉亚·塔·格拉萨·杜特拉目前正以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客人的身份逗留在莫斯科。她们将一直在这里待到今年9月16日。

上述姆利罗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记录见附录。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秘书长

M. 科托夫（签名）

会见毛泽东——巴西记者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记录

（节录）

毛泽东俯身在拉丁美洲地图上，指着巴西说：

“你们的国家很大，居住着数百万人；它几乎与我们国家一样大；我知道，它也像中国一样富饶。”

毛用手沿着拉丁美洲的轮廓，穿过太平洋，最终停在了中国，笑着说：“请看，拉丁美洲和中国共同构成了美国的后方。”

.....

在继续研究着拉丁美洲地图的同时，毛主席忽然转向我并说道：“拉丁美洲就像日出，而美帝国主义就像日落。他们像什么呢？就像‘纸老虎’；有时，他们也会咬人，因此（我们）必须谨慎提防（他们），但绝对不应怕他们。中国在这方面已作了榜样。”此时，毛的目光里透出钢一般的坚定。

.....

他手拿着燃着的火柴，直到它几乎燃尽，同时思考着如何回答我提出的关于不久前发生的“福摩萨（台湾）事件”的问题。我对他说道，关于福摩萨（台湾）的问题是当前全世界都非常瞩目的一个问题，不仅仅只是中国人才关心它。这里的报纸很少涉及这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提它，那么就没有人会主动谈到它。此时，火柴已几乎燃尽。主席又点燃一支，并开始用比平常更为平静的语调答复道：“台湾属于中国，这是无可争辩的。我们将通过谈判或以武力方式收复台湾。”在作了如此坚定的声明之后他略微深思了片刻，然后又补充道：“美国依然在恐吓中国。即使这样，我们仍将要收复台湾。那么，这种恐吓是否就此停止呢？不，美国的恐吓是不会停止的。因为世界上还有几个与我们情况类似的国家，这是一场总危机——它源自美国的威胁。”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巴西。指着地图，主席请我给他看印第安人分布的区域，并问道：“巴西现在还保留有印第安人吗？”当听说巴西仍保留有印第安人的时候，他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他还详细地询问了关于我们首都迁移的事，对此他已知道了一些情况；他还问了我其他一些问题：如关于巴西的耕地面积、人口分布、农民生活状况以及关于我们工业、农业的发展情况。毛主席问我上述问题共用了15分钟。当我告诉他说目前我们钢的产量不多——只有100万多吨时，他指出：“这是一个好的开端；要知道，在革命前中国钢的总产

量才有 40 万吨。即使现在我们在钢的生产方面仍是很落后的。今年，我们将号召工人们把钢的产量比 1957 年翻一番，这样，我们钢的总产量将超过 1000 万吨。”

……毛泽东微笑着说：“看一下我们国家的面积，人口数量及其需求情况，你就会明白：我们的钢产量还太少，我们还必须更多地生产钢。”……“是的，中国的轻工业生产状况是好的；但在重工业方面我们的需求仍有很多。”

……

当主席邀请我再来一杯花茶时，我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准备如何处理与拉丁美洲的外交关系问题？主席坚定地答道：“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重视这一问题。如果巴西政府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将对此倡议表示欢迎；如果他们只想与中国拥有贸易关系，而不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对之依然抱着浓厚的兴趣；如果他们只想与中国建立文化方面的关系，我们的兴趣依然不会改变。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虽然我们各自的政府在意识形态和组建方式上存在着差异，但我们的目标却是一致的。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都一样。我们都致力于实现民族独立，要知道，中国的台湾依然处于分裂状态。我刚才已经对你说过，即使假设我们收复了台湾，但来自美国的威胁依然存在。因此不论是中国还是在拉丁美洲都需面对一个共同的任务——与来自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作斗争。”在强调自己的批评并非针对美国人民，而只针对“在那里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者”的同时，毛主席继续道：“在工、农业方面中国和拉丁美洲都属于欠发达国家，因此巴西人和中国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得走工、农业并举的发展道路。而在中国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实施社会主义革命，而在你们国家，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这一过程是所有国家都必须经历的，是当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多数国家都必须遵循的真理。历史赋予这些国家

如下任务：赢得国家本身的民族独立，以及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民族独立。”……“另外，我们的国家相距遥远；你们没有理由担心会受到我们的侵略……至于我们，我们也不会担心你们国家的迅速发展：在历史上我们之间从没有发生过针锋相对的战斗。”

我问主席，美国所采取的物资禁运政策是否会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他答道：“不会的，他们这样做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损害。这甚至有利于我们将全部力量集中到国内。美国的这一政策并不会对我们产生特别的伤害，因为我们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内市场。不，我们对美国的物资禁运政策并不感到难过。”

……感到会谈已占用了主席过多的时间，我抓紧机会问主席道：您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有何看法，是悲观还是乐观？毛答：“我持乐观态度。目前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身陷困境，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对世界的一定区域实施统治。他们实现上述目标的企图在各地都遭到挫折，因为美国以殖民者自居。那么，他们为何要美誉自己为所谓‘西方国家’呢？难道巴西就不是西方国家？巴西之所以不是西方国家，是因为巴西并没有为自己设定只有西方才具有的那些特殊目标。事实上，美国与法、英、西德、比利时、日本、新西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一样，他们都是西方国家，他们总想着去统治其他国家。我刚才已对你说过，这些‘西方国家’就像落日。即使这些国家的民众，也不赞成他们所推行的政策。”……“总之，我们不应当怕他们；我们不怕他们，他们从一开始便总想将我们扼杀在摇篮里。这是我从自己的平生经历中所得出的结论。他们就是在不断对我们实施恐吓，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虽然有时他们也会（对我们）发动真正的攻击。关于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关键是不能让自己被他们所吓倒，而是要把一切与此相关的成见、迷信和神秘主义教条彻底抛弃。因为我所说的这些都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在中国，我们正逐渐地清除这些不必要的东西，我们以迷信为例：以前人们常说，帝

国主义的发展水平就是比我们高。可现在我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他们要比我们落后。虽然他们能够生产出更多的钢，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他们跟我们的差距可谓非常巨大。我们应当站在一定的高度来俯视他们。列宁就曾说过，亚洲比欧洲更先进。当列宁说这些话时，中国只有孙中山博士所领导的运动。可是，就是在那时列宁便看到，亚洲已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亚洲必然会超过欧洲。现在，列宁当年针对亚洲所说的那些话也适用于拉丁美洲和非洲，即‘他们（指拉丁美洲和非洲）正行进在世界的前列’。由此可见，‘西方世界’是落后的。可能，杜勒斯不会同意我的上述观点，并会说：‘你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你们的世界是空的，虚假的，而我们手中有钢还有原子弹。’他说自己有钢和原子弹，这都是事实。但他为何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其政治制度是落后的，甚至是原始的，美洲人民根本不买殖民主义者和资本家们的账？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他们还能够炫耀自己的武力，但这种情况并不会维持太久。正因为此，我们必须在亚洲、拉丁美洲、美洲和非洲彻底清除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和影响。因为总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西方世界’比我们更先进，比我们更高贵，而我们则比他们落后和低他们一等。”

……毛继续道：“我再次强调，即使从战略的角度我们也应当自上而下地来看待这一问题；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纸老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会那样做；相反，我们应当认真地对待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一句话，我们应当明白，他们这些纸老虎也是会咬人，我们应当主动地向老虎发起攻击，直到打死它，虽然在一段时期内我们还必须与这些老虎一起生活。”

主席还特别讲了关于彻底扫除一切禁忌的问题。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政治教育的角度着手。对此，他问我：在巴西现代生产活动是否与教育紧密结合呢？我承认并非如此。

于是，毛解释道：“我们就关于彻底改变我们的教育体制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辩论的结果是积极的。我们实行了教育和生产相结合，学习和劳动相结合的体制。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过去我们的教育总是与生产相分离的。而在其他所有国家也几乎都是如此。这种样子又怎么能够推动人类的进步呢？”毛泽东问我，是否曾接触过这种新型的教育体制。的确，他确实对这种新型教育体制有一定了解，也的确看到过这种新体制在大学和技术学校中的使用情况。……

毛主席补充道：“如此一来，当大学生们大学毕业时，他们也就将拥有相当的科学实践知识和经验。我相信，这种（教育）体制对所有国家都是有益的。这种体制也有益于国家机关。国家的每个公民都应当了解全国人民所面临的任务。再如，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做，让外交官们也去从事一下一般性的土方工程和建筑工作等？是的，这当然是可以的。在我们国家里这都是稀松平常的现象。”……

毛泽东继续道：“关于这一问题目前相关部门仍在北戴河进行讨论。前不久，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党中央连续开了几天会，主要讨论了关于组建人民公社的问题。‘共产主义’是紧跟在目前业已实现了的社会主义阶段之后的又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主席说：“我们决定号召人民在今年把钢的产量翻一番，以便使我们的钢产量超过 1000 万吨。我们还决定号召人民组织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是由合作社员们自己主动提出的。（中国的）农业生产已经要求将合作社（这在全国共有 70 万多个）联合成数个更巨大的中心，每个中心将拥有数千个家庭。而由此所组成的公社将包括上万个或更多家庭。公社将能够在农业、工业、教育和贸易等方面为自己提供保障，并通过民兵组织保障军事防御。公社所设立的幼儿园和托儿所将使妇女们能够更积极地投入生产当中，从而为农业提供巨大的劳动力。”

毛泽东还谈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问题。可明显看出，这个问题使

他心情异常激动。他说，对于中国来说，农业合作社阶段已经过去。如今，中国5亿农民已迈向新的征程。集体所有制从各方面来看都已经有些过时。中国建立“新民主”已经近10年了。今天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妥协，是中国进一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积极步骤。

……我问他，对当今国际上两大对立集团之间的中立国或某些国家所采取的第三种立场如何看。我想知道，与世界两大对立集团之间所产生的问题密切相关，此类中立和第三种立场究竟能够维持多久。毛泽东慢慢地点燃一支烟，然后说道，“这个问题很难预测”；“这种立场要长期保持取决于多种情况。就社会主义本身而言，在它之后还有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不过，我认为，这种中立或所谓第三种立场，将一直维持到当它依然能够满足民族独立的需要的时候（换言之，如果它已经不能满足这方面需要，那也就无法再维持下去）。因为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这种立场符合其民族独立的需要。反正帝国主义者并不喜欢这一立场，难道不是吗？因为这种中立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便意味着解除帝国主义者所推行的托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中立也意味着对托管制度的限制。我们欢迎这种中立政策。因为相对帝国主义而言，这种立场更有利于社会主义。也正因为此，我们把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都看作是自己的朋友，并给予他们以支持”。

……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8卷第224页

与社会主义六国代表团谈话记录

——安东诺夫报告毛泽东的谈话

（1958年10月2日）

机密

文本第3份

1958年10月2日

第409号

毛泽东在接见6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

1958年10月2日

在10月2日举行的一次热烈会谈中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一定会战胜帝国主义者，当然，不是在明天早上，也可能不是明天晚上或后天，但终究有这么一天，我们将取得彻底的胜利。

迟早，我们都将战胜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可能采用两种方式：战争方式或和平方式。主要的方式——和平方式、文化方式。我们随时准备采用和平的方式。在（你们）代表团中有很多军队上的同志，你们是如何准备采用这种方式的？（笑声）我们每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军队。当然，我们一定要为采取军事方式做好准备。但是，要知道，战争的方式——这是最后一种斗争方式。如果敌人首先挑起战争，那么我们就得采用这后一种方式予以回击。你们可能会批评我以及我的上述观点，你们也可能会问，为什么你们要等到敌人首先挑起战争之时才可以回击呢？你们的这个问题让我很难回答。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共同来加以思考……并且目前我们的主要的斗

争方式是和平方式。现在，我们不与任何人打仗。我们在华沙与美国人谈判，在此期间，美国人一直要求我们停止炮击。可是，我们并没有同美国开战。问题在于，我们有这样一位“总统”名叫蒋介石，我们现在是与后者在打仗。如果从1927年算起，我们与蒋介石打仗的时间可谓久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究竟还要与他打多久。如果再打上70年，那就也将是一场百年战争了。不过，我们认为，蒋介石也有好的地方。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们才能够使民众团结起来，并对群众进行再教育。蒋介石做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根本无法办到的事。因此，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外，我们还邀请了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来给我们当“教员”。可以说，蒋介石不仅在过去为我们做了许多事，而且现在他仍继续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仍必须存在“一段时间——以我们的教员的身份”。而为此，我们甚至不必交学费。我们的学费是由美国人支付的，而我们自己只是无偿地利用这个教员（大学教师）。希特勒当年也曾完成过“教员”的职贵，正是由于他的活动才教育了欧洲人民。在东方，这样的教员便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如今，既没有希特勒、墨索里尼，也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但却有杜勒斯来顶替他们的角色。如果没有杜勒斯，我们就很难办，但有了他，我们就轻松多了（笑声）。我们一直感觉到，他是我们的“同志”（笑声），为此，我们应当对他表示感谢。在资产阶级中也有马列主义的优秀“行家”，那就是他！此人坚定地推行阶级斗争路线，从不与我们妥协。当然，他本身也是一个很难说话的人。我们的第一个老师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第二个便是杜勒斯，再加上第三个中国老师——蒋介石。

现在，全世界人民已开始对国际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转到我们这边来了。未来，世界人民将更倾向于我们。而杜勒斯则身处困境和防御状态。人们会问他：为什么你们要插手中国的马祖和金门等岛屿呢？作为搪塞，他一直以朝鲜战争为挡箭牌。可朝鲜是朝鲜，岛

屿归岛屿，全世界都承认这些岛屿都属于中国的领土，而美国的行动是在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因此，杜勒斯处境尴尬。

未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杜勒斯的日子变得更加不好过，绝不能就这样放过他。我认为，美国是不会简简单单地就从台湾地区撤走的。另外，我还坚持一点，即美国不会很快就从台湾地区走掉。这次，我们可在台湾抓住了一个小偷。你们还记得否，1956年我们便在埃及抓住了英国和法国，当时美国人装得文质彬彬，但在黎巴嫩他们的行动却像是一群小偷。我的观点是，应当把他们继续粘在那里。关于这一问题，我曾与赫鲁晓夫同志交流过，他也同意我的这一观点。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让他们粘在那里多久呢？3年吗？或许阿拉伯朋友不会同意这样做。但他们——美国人终究要从那里卷铺盖走人的，可能他们甚至很快就会这样做。如果这样的话，我的观点就不对了。不过，还有几个地方，也可能在另一个地方，如台湾，我们可以成功地继续粘住他们，以便以此为契机来教育全世界人民和整个中国人民。可能，你们会不同意我的这一观点。

现在，让我们来简单谈谈我们之间的关系吧。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我们制定了一个统一的纲领。在该统一纲领的基础上我们工作得比较轻松。以此为前提和在苏联的领导下我们将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必须对你们说的是，近年来我们又有了一个老师，那就是铁托。同样道理，如果没有铁托这个人，那么我们和你们可能会更困难些。铁托不愿意成为我们的家庭成员，不想在我们的共同宣言上签字，南斯拉夫人还公布了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纲领，并反对我们所有人。因为我们都承认马列主义和接受苏联的领导。很显然，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的同志，另外可能也包括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同志在内，已经对这位“老师”的做法很不耐烦了。

对于中国而言，在教育我们党和人民方面铁托可谓作出了重大贡

献。而为此，我们同样是不用花钱的，学费都是美国人来交，而且价格不菲。

严肃地说来，当世界上出现了像铁托这样的典型的修正主义者之时，我们在教育人民方面就轻松多了。过去，我们对铁托的作用估计不足，而如今我们应当重新给予他应有的评价，并让他来做我们的主要教员。如果论资排辈的话，那么杜勒斯当仁不让地应属第一，其次便是铁托。没办法，我们的中国教员——蒋介石只好退居第三了。

接着，毛泽东谈了关于苏联的援助问题。他说，苏联同志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另外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向我们提供了重大的帮助。苏联对中国的帮助可谓相当巨大，对此，当你们在中国各地参观时，便会亲眼看到。

我们再说几句关于“大跃进”的情况。我们国家的“大跃进”是否真的存在？我承认，最初我也是不相信的。今年4月份我们举行了一个关于收割的会议。各省党委书记都参加了这个会议。我当时在会上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否真的我们有可能实现大跃进？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他们答道：是的，他们都是亲眼看到了才这样说的。当时，我们国家正在开展关于“苦干三年以改变生活面貌”的口号的辩论。我对此有些怀疑，于是便建议加上这样一个词：“初步”改变生活面貌。但他们都不支持我的观点。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他们列举了一系列具体材料和各种统计数据等。他们——中央委员和各省党委书记均认为应当这样写：“基本改变农村面貌”。只是在此次会议之后，我对是否真正存在大跃进的疑虑有所减少了，但不是全部。你们可以因此而称我为机会主义者，或右倾分子，因为即使在这次会议后我还是有一些疑虑的。8月份，我们在北戴河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党委书记也都参加了。由于在8月份我们已收获了主要的收成，我的疑虑也随之减少了99%。为何这样说，因为我们还没有收获秋季作物。因此，直到收获秋季作物之前我

这1%的疑虑就会一直存在。万一老天忽然不再帮我们怎么办？不过，即使现在我们的粮食产量已达到了3.55亿吨，即比去年粮食产量（1.86亿吨）超过1倍。关于这一点，我现在是可以断定的，但我们的报纸上还没有公布。在报纸上我们只是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今年的粮食产量超过去年的60%—70%。我们暂时将不公布这些情况，因为我们还没有收获全部粮食。因此，我请你们也不要对外公开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些数据，对外只能说的是：今年粮食产量比去年多出60%—90%，但并没有超过100%。因为我还有的疑虑没有消除，因为我们还没有把所有粮食都收到手。

长期以来，我们对钢的生产的意义估计不足。但现在我们都明白一点，即只有提高钢的产量，其他所有生产也才可能提高。让我们以机器制造为例。如果没有钢，机器制造业就无法发展，甚至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也与此类似。为了生产钢，我们就必须有煤和电，可是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还必须发展交通和船舶制造业。否则，我们国家就会天下大乱。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到时候所有人都会喊起来：这个没有，那个不足，机械业落后，交通运力紧张，等等。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制造这样的“混乱”，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所有人才会极力去生产我们还欠缺的所有东西。没有电力——就需要我们去生产电！出现了矛盾——这是件好事。难道我们会害怕矛盾吗？有了矛盾，我们才会去解决，并一定要解决好。

我们以钢的生产为例。去年，我们钢的产量为535万吨。那么，今年呢？按照最初的计划，我们曾打算今年生产620万吨，然后再增加到750万吨，接着再提高到900万吨。

各冶金厂经理都参加了7月1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有人问：为什么要拖延呢，既然我们可能立刻将钢的产量增加2倍。于是，我们决定在今年便将钢的产量提高到1070万吨。但在8月份的

检查中我们发现，这个计划面临着风险。因此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我们便讨论了这个问题。

同志们，你们已经看到，我们的生活水平是落后的。可能，你们会想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中国一切都好，就不存在问题吗？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还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如今，我们已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搞工业。虽然不能说，我们以前没有抓过这方面的工作，但当时我们的确是没有如此高度地重视它……只是从8月份以后，我们才开始真正地抓工业。

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否能把钢的产量提高2倍？我个人对此仍有疑虑。要知道，离年底总共只剩下3个月，甚至还要再减去2天。情况很严峻。我们可能会遭受失败？现在我们仍在认真对待此事，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些钢。我的疑虑也依然存在。

我们，中国人，对这件事的认识是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的，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都是在实践中逐步进行的。

总之一句话，今年我们国家的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跃进。在这一时刻，我仍想对自己的观点作一个小的保留，我不想把关于农业方面的话说得太死。因为这样的话，得等到秋收之后才能说，而关于今年钢的产量，得到年底再看。我相信，如果今年我们能生产出1000万吨钢，那么明年钢产量达到2000万吨，那无疑就变得容易多了。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原有的建设计划是按12年制定的，但很多按12年制定的指标我们只用了3年便完成了。

至于明年的农业生产计划，我们得重新编制。以前我们曾说过，要用12-15年时间来超过英国。但现在，我们已准确地知道，实际上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一些部门只需要2-3年，还有一些部门只需5年、7年或10年时间。我认为，在船舶制造方面我们在这一期间内（12-15年）是无法赶上英国的，但周恩来和邓小平断定我们在12-15年之内能够在船舶制造方面赶上英国。要知道，英国在船舶制造业方面是

相当发达的。

我认为，中国在工、农业方面的振兴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对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对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人们，对所有维护世界和平的人们，都是有利的。

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从哪里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力量？（除了中国的自身努力）我认为，这些力量的源泉包括：首先，苏联的支持；其次，所有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最后，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人民的支持。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极其重要的（有利中国发展的）外界因素。虽然，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将不会发生。但为了和平，为了实现共问的目标，我们依然需要坚定地团结起来。在未来的七八年间，帝国主义者将很难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正走向没落，而我们则不断前进。

索菲亚市党委书记请毛泽东同志讲一下人民公社的相关情况。

毛泽东说：在建立了人民公社之后，党对群众的领导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在政治方面，人民公社组织主要以地方政府的方式存在，但公社不应与党的组织相混淆。因为党是一个由进步人士构成的组织，是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

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大规模地将群众组织起来，更大程度地实现公有制。以前，我们共有 70 万个农业合作社，现在由这些合作社组建了 2 万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人民公社有 7000 个农户。有的人民公社甚至包括有上万农户，或几万农户。

除了将农户大规模地联合起来之外，人民公社还相当程度地提高了社会的公有化。这为我们更容易地同农村资本主义残余作斗争创造了条件。

人民公社基本上可看作是社会主义组织，而不是共产主义性质。虽然其中已包含了某些共产主义社会的成分。

1871 年，法国人曾建立了巴黎公社。最初，马克思并不承认它，

只是后来才对之作了肯定，并积极协助，甚至还写了一本关于巴黎公社的有名的著作。那么，组建巴黎公社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手工业工人，只有一部分是工业工人，而绝大部分都是普通市民。如果在那时法国人都能组建公社的话，那么如今在无产专政的条件下我们为什么不能建立人民公社呢？至于“公社”这个名称本身，并不是我们想出来的，而是人民群众，尤其是河南人民首先提出来的。正是他们第一个创造了这一名称，并将之写在了自己的有关章程里。

今年8月份，我到河南、陕西和山东等省去了一趟。我与农民们讨论关于用什么称谓比较好的问题。之后，我们决定：如果人民想叫作人民公社，那就应当这样做。在8月的会议上，我们采纳了人民自己提出的这一称谓。

那么，人民公社的前景如何呢？它们将获得成功还是遭受失败呢？我们得等几年再说。现在能说的是，人民公社将会得到顺利地发展。因为人民自己希望如此。而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无法为人民生产出足够的粮食。现在，我们有成千上万人在为人们做饭。我们应当将妇女们从厨房中解放出来，应当建立公共食堂。而当妇女们被从厨房中解放出来之后，她们将为农业生产的发展贡献巨大的力量。为此，我们就在全国广泛建立公共食堂、幼儿园和托儿所以及缝纫厂。

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此我们在人民公社方面不会遭受失败。

当然，人民公社仍不是共产主义，因为其中各行业、集团之间仍存在着各种差别，保障水平也不均衡。事实上，今年我们的粮食是能够满足供给需要的，明年如果还是一个丰年的话，粮食供应情况仍将跟今年一样好。只是在穿衣方面我们还比较困难。正是列宁曾经说过的，在一定时期内有一些领域我们将仍保留“资产阶级的权利”，如工资体系中的7-8级差别。但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长期存在。我们将逐渐地消除这些差别。

在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说：“非常感谢你们能到中国访问。这是你们对我们的巨大支持。我们之间的团结将会更加稳固。”

会谈记录者——B. 拉科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 安东诺夫（签名）

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契列德尼琴科（签名）

文件共 6 份，送：A. A. 葛罗米柯同志、齐米亚宁同志、Ю. B. 安德罗波夫同志、A. A. 安德烈耶夫同志、军事情报室、档案室

经办：拉科夫

第 760 号

手写批注：

归档。该信息大使馆已经在电报中通报。已在工作中使用。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 8 卷第 257 页

反修防修时期

关于台湾问题和中印关系的争论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记录

(1959年10月2日)

绝密

特别重要

文本第1份

H. C. 赫鲁晓夫同志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陈毅，书记处书记王稼祥的会谈记录

1959年10月2日

今天，应毛泽东的请求，同 M. A. 苏斯洛夫同志和 A. A. 葛罗米柯同志一起，在毛泽东的住所拜访了他。

毛泽东：我们了解了艾森豪威尔给您赫鲁晓夫同志的信件的内容，该信是根据您的委托在今天上午转交给我们的。

H. C. 赫鲁晓夫：很好。除此之外，我们还想使您了解我在 1959 年 9 月 27 日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谈中有关中国问题的一些内容，然后就我访问美国的问题以及就同美国的关系问题，交换一下看法。最好由翻译将前面提到的我同艾森豪威尔会谈的一些内容在此口头翻译一下。

翻译阎明复和李越然口头翻译了我同艾森豪威尔会谈的一些内容。

使中国人较感兴趣的是有关拘禁在中国的 5 名美国人的问题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如下言论：苏联为什么不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同在德国问题上同样的立场。

H. C. 赫鲁晓夫（在翻译结束之后）：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艾森豪威尔急于把自己的信件送往中国这里了。

毛泽东：就我的理解，艾森豪威尔谈论的意思可以归纳如下：应当克制，推行温和的政策。

H. C. 赫鲁晓夫：是的。

毛泽东：艾森豪威尔还说，有 45 个国家承认台湾，而承认我们的国家要少一些，战争是不必要的。艾森豪威尔的信件中有积极的成分，即谈到了不应让战争爆发的意思。我们也不想要战争。

H. C. 赫鲁晓夫：您说得很对。我想强调艾森豪威尔信件中表达的一个意思，即不能总是急于寻求解决台湾问题，而要使其退居次要位置。艾森豪威尔信件的主要意思是：不要战争。我们希望，不要因台湾而爆发战争。

毛泽东：台湾是中国的国内问题。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可以是不同的：和平的方法和战争的方法。1955 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时就声明过，中国愿意与美国进行谈判。实际上，后来中美之间就开始谈判了。先在日内瓦，后来到华沙。先是代表们一个星期谈一次，后来是两个星期一次，现在是一个月一次。双方都不想中断谈判。有一个时期，美国人试图中断会谈。我们宣布，不谈不好，并提出了恢复谈判的期限。美国人宣布，他们也赞同继续谈判，但不能接受“最后通牒”式的期限。我们同意了这一点。然后，在炮击中国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之后，谈判就恢复了。我们中国人在谈判中历来提出的主张是，请美国人撤离台湾，那么，我们之间就没事了。剩下的就是我们和蒋介石的事了，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蒋介石不想让美国人撤走。美国人反过来害怕蒋介石同大陆建立联系。在这一地区有军事行动，但并不是战争。在我们看来，就让台湾和其他沿海岛屿留在蒋介石的手里，10 年，20 年，甚至 30 年，我们都能容忍。

H. C. 赫鲁晓夫：我要说的是，在第一次会谈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在苏联驻美大使馆的宴会上说，他们美国人已经同中国进行了好多年的谈判，一直没有结果，甚至被拘禁在中国的5名美国人，他们中国人也不同意释放。这只会使局势复杂化，并深深地激怒美国人民。而且，艾森豪威尔告诉我，可以让所有愿意离开美国的中国人离开美国，他们不会阻拦。艾森豪威尔还告诉我，我到中国来是没有用的。

毛泽东：中国同德国不同，不仅是因为台湾的人口比中国大陆的人口要少得多，而且因为中国战后不是一个战败国，是战胜国之一。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是波茨坦协定的结果。朝鲜三八线也是根据以金日成、我们为一方，以美国人为另一方之间的协议而确定的。越南是按照日内瓦协定被划分为北方和南方的。就台湾问题而言，没有任何国际会议对它做出决定。美国占领台湾，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不满，而且连英国、美国本身和其他国家都不满。

H. C. 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明白这一点。但问题在于，他首先应当承认中国革命，然后才能承认中国政府。承认革命是他不愿意做的事。

毛泽东：是的，是这样的。美国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想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进行谈判。美国政府暗示，中国应当声明在台湾问题上不使用武力。美国人想得到不使用武力的保证，而他们自己则是想怎么干，就怎样干。

H. C. 赫鲁晓夫：我一点也不知道中国还扣押了5名美国人。这是真的吗？在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我只是说，作为一个友好的建议，我只能在北京提这个问题。

周恩来：1956年8月1日在日内瓦，我们同美国人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一协议，美国人可以返回美国，（移民）可以在中国长期居住。但协议也规定，如果这些人犯了罪，他们将被逮捕。中国法律也规定，如果犯人在监狱里表现很好，他就可以提前得到释放。协议

中有权离开中国的第二类人是战俘。在中国安东地区而不是在朝鲜击落过一架美国飞机。这架飞机上的 13 名美国军人被俘。后来我们把他们全部都释放了。您记得，联合国曾经讨论过美国战俘的问题，1955 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曾就此事到过中国。在哈马尔舍尔德之后，孟戴斯-弗朗斯也就此事到过中国。美国人通过英国人告诉我们，他们想同中国举行谈判。我们对此表示同意，会谈就开始了。我们采取主动，释放了 13 名美国战俘。因此，在日内瓦会谈期间，美国人没有进行争论的借口。在此之后，我们拘押的还有两名美国人——费克图和多尼。他们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被当场抓住。当他们驾驶的飞机试图逃跑时，他们的飞机被击落了，在飞机上找到了进行间谍活动的特殊装备。中国法庭判他们长期监禁，一个是无期徒刑，另外一个 20 年。当哈马尔舍尔德到中国来的时候，他说，他的使命不是就这 2 名美国人进行谈判。另外 3 个人长期居住在中国，逮捕他们是因为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像这样的美国人约有 90 名，绝大多数已经释放，只有 5 名还关在监狱里。他们都是间谍，按照中国法律被判监禁。我们认为，我们中国人释放的美国人已经够多了。

H. C. 赫鲁晓夫：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但是假如要听听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是你们，就不会这样做。关押在美国的美国人，要么把他们驱逐出境，要么用来交换有关人员，假如你们不打算采取对抗方针的话。列宁当时就这样做，而且是正确的。如果说要“招惹”的话，那当然可以继续把美国人关起来。而且，我们当时曾用一名我们关押的匈牙利间谍交换了拉科西。照我们看来，一句话，最好释放你们关在监狱里的美国人。

毛泽东（带着明显的不高兴和恼火）：当然，可以放，或者不放，我们就是现在不放美国人，要到一个适当的时间再放。毕竟，美国人把我们在朝鲜作战的大批志愿军战士送到了台湾，把许多北朝鲜的士兵送到了南朝鲜。

H. C. 赫鲁晓夫：那好吧，这是你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干预。但是，你们对这一问题的提法，并且，看起来这使你们感到了恼火，这些都使得很难交换意见。我想强调的是，我不是美国的代表，也不是美国人的说客，而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我在此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要搞清这一问题并阐述我们的看法，因为这个问题会激化国际局势。

毛泽东：也就是使美国人感到为难。

H. C. 赫鲁晓夫：这个问题也使我们感到为难。我们有相当多的理由向美国提出我们的要求。毕竟，他们也扣押了为数众多的所谓的流亡者。我们立场中的弱点就在于，其中的许多人都不愿回到苏联。当然，我们不会同美国人讨论关于释放在中国监禁的美国人的问题。我只是向艾森豪威尔许诺，在我访问中国的时候，以友好协商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而且美国人也是间接地提出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台湾问题很清楚，在10年、20年也许30年我们不仅不会碰台湾，而且也不会去碰沿海岛屿。

H. C. 赫鲁晓夫：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们是没有分歧的。至于5名美国人，我们可以按另一种方式解决。您说您可以10年、20年甚至30年不解放台湾。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策略问题了。台湾问题不仅给美国人制造了麻烦，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困难。在我们内部以信任的方式讲，我们不会因台湾而战；但是对外界我们就不这样讲了，我们会说，一旦因台湾而局势紧张，苏联将保护中国。美国也会宣布，他们将保卫台湾，这样就形成了大战前的气氛。

毛泽东：那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要像美国说的那样，宣布在台湾地区不使用武力，把这个问题变成国际问题。

周恩来：关于台湾问题，应当明确两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关系是内政问题，而中国和美国有关台湾的关系，是这个问题的国

际方面。

H, C 赫鲁晓夫：这很清楚，我们对艾森豪威尔也是这样说的，正如你们从我同艾森奈威尔总统会谈的节录中看到的。当然，任何问题肯定有它的许多方面。最主要的是奠定什么样的基础。列宁当时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了远东共和国，列宁还承认了它。记住，这个共和国是在苏联领土上建立的，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列宁临时承认了它。后来，正如它应该如此的，远东共和国重新回到了苏联。

我们对台湾问题没有任何建议，可是，我们认为，应该寻求缓和局势的途径。作为你们的盟国，我们对你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行动丝毫不知，今天我是第一次听到你们在这一地区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是盟国，应当就那些不仅会使你们卷入、也会使你们的朋友们卷入的所有问题交换意见。应当寻找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途径，同时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望和主权。

毛泽东：我们的总参谋长通过你们的军事总顾问，通报了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意图，我们要他向苏联国防部报告一切情况。我现在就要澄清，我们并不打算在台湾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是考虑到美国已经陷在黎巴嫩，想给他制造更多的麻烦。而且我们认为，我们采取的措施是成功的。

H. C. 赫鲁晓夫：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同。

毛泽东：尽管我们对沿海岛屿进行炮击，但不会解放它们。我们也认为，美国不会为沿海岛屿和台湾打仗。

H. C. 赫鲁晓夫：美国人的确不会为台湾和沿海岛屿打仗。我们也知道当杜勒斯去同蒋介石会谈时，他所得到的指示的内容。如果你们有兴趣看这些文件，我们可以给你们看。至于对沿海岛屿进行炮击，如果你们打了，就应该拿下这些岛屿；如果你们认为没有必要占领这些岛屿，那么就不应该进行炮击。我不理解你们的这种政策。坦率地说，我曾认为，你们要拿下这些岛屿，当听说你们没有拿下这些岛屿

的时候，我感到难过。当然，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只是作为盟友谈一谈。

毛泽东：我们在炮击沿海岛屿之前一个月就向你们通报了在台湾问题上的想法。

H. C. 赫鲁晓夫：你们向我们通报的不是关于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而仅仅是关于一些个别的措施。我们表达了我们的立场，同意不同意，现在是你们的事了。我们也不完全了解你们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我们应当协调国际政策问题。看起来，我们应当考虑一下，是否有必要通过外交部长就那些我们尚未达成一致的重大政治问题交换意见。

毛泽东：我已经说过，我们通过我们的总参谋部，向你们通报了我们的想法。但是，我想知道，对我们究竟该怎样做，你们有什么看法。

H. C. 赫鲁晓夫：我们赞成缓和紧张局势。我们只是想让人们了解，我们赞成和平。为了逗弄猫儿而向沿海岛屿打炮，那是不值得的。

毛泽东：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的关系，和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完全是两回事。对美国，我们试图用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如果美国不从台湾撤走，我们就同他谈判，一直谈到他撤走为止。同蒋介石的关系，是我们的内政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可以用和平的手段，也可以用其他的手段。至于建立远东共和国的问题，以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曾经从苏联被分离出去的事实，则应该注意到，在这些地方没有出现过外国干涉。

H. C. 赫鲁晓夫：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问题，完全是另一类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民族自决问题。至于远东共和国，它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毛泽东：台湾问题非常复杂。

H. C. 赫鲁晓夫：我们和你们对台湾问题的理解是一致的。现在只

是关于策略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无论怎样，你们都不愿制定出能够使我们理解的政策。你们会想，我们好像是在干涉你们的内政，但我们是在谈论自己的想法。因此，应当指出，我们不知道你们明天又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毛泽东：我们不想同美国打仗。

H. C. 赫鲁晓夫：不应这样提出问题。谁都知道，您和我都不想打仗。问题是，不仅全世界的舆论不知道你们明天要干什么，就连我们，你们的盟友，也都不知道。

毛泽东：这里有两个方法。第一，照美国人的要求做，也就是保证不对台湾动武。美国人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早在1955年3月就通过艾登提出过。第二，把同美国的关系与同蒋介石的关系明确区分开来。至于同蒋介石的关系，我们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因为同蒋介石的关系，是我们的内政。

休息1个小时，会谈重新开始。

毛泽东：我们做什么？

周恩来：继续吧。

毛泽东：按照美国人的建议做，对我们不利。而美国人也不愿按照我们的意见办。

H. C. 赫鲁晓夫：你们会使我们处于尴尬的境地。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但是，我们是站在苏联的、共产党的立场上的。

毛泽东：也许，我们应该无限期地推迟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明白，我们离美国很远，是美国，不是我们，把舰队派到我们的海岸。

H. C. 赫鲁晓夫：应该指出，我们也并非没有过错。毕竟是我们把美国人拖进了南朝鲜。应当采取这样的措施，使得美国人可以作出回应，采取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您知道，当匈牙利事件发生时，我们对坚决镇压反革命非常果断。刘少奇同志当时和我们在一起，我

们当时一起解决了这个问题。假如还有必要的话，我们将再次坚定不移地履行自己的国际共产主义职责，你们会相信这点。我们认为，需要制订整个的行动计划，要使人民理解我们。斯大林去世后，我们取得了许多成就。我可以对您讲出很多方面，我本人是不同意的。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在莫斯科周围部署了随时以开火的大炮。我们预想随时都会遭到进攻。我们成功地消除了这种局面，并为此感到骄傲。而且请注意，为取得这种成效，我们并没有放弃自己任何的原则立场。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不理解你们的立场，其中包括，不理解你们同印度的冲突。我们同波斯就边界问题争论150年了。三四年以前，我们通过将自己的一些领土划给波斯而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我们的边界多出5公里，或者少5公里，这些都不重要。我要举出列宁的例子，他把卡尔斯、阿尔达汉和亚拉腊给了土耳其。直到今天，在外高加索地区，还有一部分居民对列宁的这一举措感到不满。但我认为，这些行为是正确的。我说这些是要向你们表明，对于我们来说，这一领土问题并不是难以克服的。你们同印度有着多年的良好关系，突然就发生流血事件，结果尼赫鲁就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可以说，尼赫鲁是个资产阶级活动家；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点，如果尼赫鲁下台，又有谁会比他更好？达赖喇嘛从西藏逃跑了，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活动家。我们对这个问题还不清楚。当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尼赫鲁反对我们，而我们也没有因此怪罪于他，因为我们不能期望从他——一个资产阶级活动家那里得到别的什么东西。尽管他反对过我们，这也不妨碍我们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您让我说，我就会说一个客人不会说的话——西藏事件是你们的错。你们控制着西藏，应该在那里有自己的情报机构，应该知道达赖喇嘛的计划和意图。

毛泽东：尼赫鲁也说，发生西藏事件是我们的错。此外，苏联就中印冲突问题发表了塔斯社声明。

H. C. 赫鲁晓夫：你们真的想要我们支持你们同印度的冲突吗？对我们来说，那是愚蠢的。塔斯社声明是必要的。你们终究会注意到我同尼赫鲁的一些不同。如果我们不发表塔斯社声明，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社会主义国家组织了反对尼赫鲁的统一战线。塔斯社声明使得这个问题成了你们同印度之间的问题。

毛泽东：我们的错误是，没有立即解除达赖喇嘛的武装。但那时，我们同西藏的人民群众还没有建立联系。

H. C. 赫鲁晓夫：你们现在也没有同西藏人建立起联系。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不同。

H. C. 赫鲁晓夫：当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可以这样说：我们那里和你们这里都有从金日成那里跑出来的朝鲜人。但这不会使我们有理由破坏同金日成的关系，我们同他仍然是好朋友。至于达赖喇嘛逃出西藏，如果我们处在你们的位置，我们就不会让他跑掉。如果他死了就更好了。可他现在在印度，也许会到美国去。这难道对社会主义国家有利吗？

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当时不能逮捕他。我们不能阻止他离开，因为同印度的边界线那么大，他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跑走。

H. C. 赫鲁晓夫：事情不在于逮捕，我只是说，让他白白地给跑掉了。是你们让他有机会跑到印度去的，那么，尼赫鲁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呢。我们认为，西藏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错，不是尼赫鲁的错。

毛泽东：不对，是尼赫鲁的错。

H. C. 赫鲁晓夫：那么，匈牙利事件错的不是我们，而是美国，你们是这样认为的吗？你们要知道，我们在匈牙利有军队，我们支持那个愚蠢的拉科西。这是我们的错，不是美国的错。

毛泽东：难道可以把拉科西比作达赖吗？

H. C. 赫鲁晓夫：假如你们愿意，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

毛泽东：印度人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就好像西藏是属于他们的。

H. C. 赫鲁晓夫：我们了解这一点。正如你们所知，尼泊尔想在自己那里有个苏联大使，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向那里派遣大使。你们也是这样。这是因为尼赫鲁不想让那里有苏联大使和中国大使。对此也不必感到吃惊，对尼赫鲁不能期望什么。但这不应成为我们同他断绝关系的理由。

毛泽东：我们也支持尼赫鲁，但在西藏问题上，我们要揍揍他。

H. C. 赫鲁晓夫：为什么你们要在同印度的边界上杀人？

毛泽东：他们首先攻击我们，越过边界，持续开火12个小时。

周恩来：你们更相信哪些材料，我们的，还是印度人的？

H. C. 赫鲁晓夫：尽管印度首先进攻，但是，中国没有死人，而印度却死了人。

周恩来：如果他们先进攻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总不能对空鸣枪吧。印度人甚至越过了麦克马洪线。另外，印度副总统拉哈卡里什南最近将要来访。这就是说，我们正在采取措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在我今年9月9日给尼赫鲁的信件中，我们详细解释了我们同印度之间所发生的一切。

H. C. 赫鲁晓夫：周恩来同志，您担任中国外交部长多年，应当比我更清楚，如何以不流血的方式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不会提出边界问题，因为，如果中国人和印度人都不知道你们之间的边界线是如何划定的，那么，我一个俄国人就不需要插手了。我只是反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手段。

周恩来：我们也是最近才知道边界事件的。一切行动措施都是由地方机关采取的，并没有中央的指示。另外，问题是中印之间有三块争议地区。印度人首先越过麦克马洪线，首先开火。中国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承认过麦克马洪线。比如说，如果苏联边界遭到了芬兰人的进攻，你们会不会反击？

M. A. 苏斯洛夫：我们不会对芬兰政府提出要求。

H. C. 赫鲁晓夫：中央对一些事情一无所知，这对于我来说是少见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自己曾反对过什么。1941年6月22日，德国人开始进攻苏联，斯大林禁止开枪还击，开枪还击的命令只是后来才下达的。斯大林的解释是，这也许是挑衅。当然，这是斯大林的错误。他实在是胆怯了。中印边界冲突完全是另一回事。

朱德：印度越过麦克马洪线，抢占了中国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陈毅：西藏叛乱后，在印度出现了多次反华、反共产主义的运动。在我们驻德里的使馆和驻加尔各答领事馆周围组织了游行，游行者辱骂中国领导人，高呼反华口号。我们却没有做任何这样的事情，印度驻华大使也没有一点借口，说我们有不友好的行动。

H. C. 赫鲁晓夫：同你们相比，我们苏联代表在国外遭受的挫折要多得多。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少苏联大使在国外遇害。在我们苏联，仅有一位德国大使在1918年被杀。在我们苏联，美国大使馆和联邦德国大使馆的窗户被砸烂过，那是我们自己组织的。

陈毅：如果讲到工作的效果，把尼赫鲁拉到自己一边，那么，我们的方法显得更有效，而你们的方法则是迁就。

H. C. 赫鲁晓夫：陈毅是外交部长，善于斟酌词句。他这样说不是偶然的。我们已经存在了42年，其中30年是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我们谁也没有迁就过，是推行自己的、有原则的共产主义政策。

陈毅（非常气愤和恼怒）：长期以来，中国人民都主张要有恻隐之心，在过去几十年中，他们遭受了英国、美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压迫。苏联同志应该理解这一点。我们现在正在采取一些措施，和平解决同印度的冲突。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印度副总统拉哈卡里什南可能在10月中旬来访。我们这里也有一些迁就分子。你们应该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路线是更为坚定的，是更加正确的。

H. C. 赫鲁晓夫：瞧瞧都“左”倾到什么程度了。陈毅同志，您在

向“左”走，但会走到右边。橡树坚硬，但它也会折断。我想，最好搁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对此看法不同。

周恩来：赫鲁晓夫同志，甚至印度人自己都不知道，在印度和中国边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是怎么发生的。

林彪：在苏联和法西斯德国战争期间，苏军在消灭法西斯后进入了柏林。这并不意味着是苏联发动了战争。

H. C. 赫鲁晓夫：我这个中将是应该来教导您，元帅同志。

M. A. 苏斯洛夫：林彪同志，您是在把完全不能比较的东西进行比较。在卫国战争时期，成千上万的人死掉了，而这里发生的是一个小事。

周恩来：印度人不想从他们渗透的地方撤军。我们希望和平解决冲突，因此，我们过去建议，现在还建议，一件一件地解决问题。

H. C. 赫鲁晓夫：你们现在所做的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同意你们以前所做的事情。

周恩来：在发动挑衅前的 40 天内，印度人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华宣传。他们首先越过边界，首先开火。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认为是我们挑起了事端？

H. C. 赫鲁晓夫：我们都是共产党人，而他们那里则犹如诺亚方舟。周恩来同志，您对这一点的理解不会比我差。

M. A. 苏斯洛夫：应当理解诺亚方舟的比喻，在他们那里什么样的人都有。

彭真（怒气冲冲地）：纳赛尔在毫无理由地谩骂向他提供无私援助的苏联。其原因在于民族资产阶级反动的一面。如果你们苏联同志可以谩骂民族资产阶级，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

H. C. 赫鲁晓夫：没有人说你们不能谩骂，但是，射击和谩骂是不一样的。

彭真：麦克马洪线是一条卑鄙的界线，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

过。

H. C. 赫鲁晓夫：我们在这里只有3个人，你们有9个，不停地讲着同样的事。我认为这样也没有用处。我仅想表述我们的立场。接不接受，那是你们的事了。

毛泽东：同印度的边界冲突，只是局部的边界问题，又不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尼赫鲁本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据我们所知，他们的巡逻兵越过了麦克马洪线。我们对此了解得都很晚，是在冲突发生之后。所有这些，不仅尼赫鲁不清楚，甚至连我们西藏军区的人都不知道。因此，当尼赫鲁得知他们的巡逻兵越过麦克马洪线时，他下令让他们撤回来。我们也在做工作，争取和平解决问题。

H. C. 赫鲁晓夫：如果在互相射击之后马上这么做，冲突就不会发生了。另外，在很长的时间内，你们都没有向我们通报这次边界事件。

刘少奇：我在9月6日通过安东诺夫同志，向您通报了边界的情况。我们不能更早地通知您，是因为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搞清楚。

周恩来：塔斯社声明，是在把我写给尼赫鲁的信件转交给您之前发表的。信件是在9月6日下午送给安东诺夫同志的。

M. A. 苏斯洛夫：看起来，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因为需要考虑到，北京和莫斯科有5个小时的时差。

A. A. 葛罗米柯：印度驻苏大使对我说，中国的信件不仅没有使事情平静下来，实际上使一切都后退了。

M. A. 苏斯洛夫：现在温度已经降下来了，我们可以抛开这个问题了。

毛泽东（带有怒气地）：温度降下来难道是由于你们的声明？

M. A. 苏斯洛夫：不，不仅是这样，还因你们议会的决定。

刘少奇：今年9月6日我通过安东诺夫转告您，我们将在一个星期之内对印度人进行反击。

M. A. 苏斯洛夫：你们议会的决定要比照会缓和得多。

彭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问我，如何理解塔斯社声明，是不是老大哥还没有弄清楚谁对准错，就对中国和印度各打五十大板。

王稼祥：但首先开枪的是印度，不是我们。

H. C. 赫鲁晓夫：是的。他们首先开了枪，然后自己被打死了人。我们有责任向你们谈谈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因为除了我们，不会有人向你们说这些话。

周恩来：中共和苏共之间会有争论和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对外我们一直强调同苏联的团结。

林彪：印度人首先开枪，他们打了12个小时，直到打光了子弹。我们认为，对问题可以有不同的态度，但事实总归是事实：第一，印度人首先越过边界；第二，印度人首先开枪；第三，印度人打了12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两种方法，第一，印度人越过边界，我们后退；第二，印度人越过边界，我们进行反击。

毛泽东：根据当地军事部门的决定进行了反击。

林彪：上面没有下命令。

毛泽东：我们没能留住达赖喇嘛，因为同印度的边界那么大，他从任何一个地点都能越过边界。

M. A. 苏斯洛夫：需要提前知道他的意图和阴谋。

毛泽东：我们想对西藏的改造暂停4年。

H. C. 赫鲁晓夫：这就是你们的错误。

毛泽东：推迟对西藏进行改造的决定早就做出了，是在达赖喇嘛访问印度之后。我们不能没有借口就发动进攻。但这次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我们就采取了行动。看起来，这正是你们不明白的。以后您会相信，同印度的麦克马洪线还会存在，边界冲突则会被消除。

H. C. 赫鲁晓夫：那就好。但问题不是麦克马洪线。我们不了解这条线，也不想了解。

毛泽东：同印度的边界问题，我们将通过谈判解决。

H. C. 赫鲁晓夫：你们的这种想法，我们欢迎。

周恩来：今年1月22日我们曾向尼赫鲁建议，就边界问题的举行谈判，当时他不同意。现在他同意了。

毛泽东：你们给我们扣了两顶帽子：同印度的冲突是我们的过错，达赖喇嘛的逃跑也是我们的错误。我们给你们扣一顶帽子，叫迁就分子。请接受吧。

H. C. 赫鲁晓夫：我们不接受。我们采取的是有原则的共产主义的立场。

毛泽东：塔斯社的声明，使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兴高采烈。

M. A. 苏斯洛夫：恰恰相反。这个声明和我们最近采取的措施，促进了局势的缓和。如果中印关系搞僵了，那帝国主义者才高兴。我们有情报表明，美国人已经向尼赫鲁建议，对于中印冲突他们愿意提供帮助。我们的行动扑灭了反动派的火焰。

林彪：整个问题是，谁先开的枪，而不是谁死掉了。

周恩来：结果就是，强盗闯进了我们的家，我们把他揍了一顿，我们还犯了错。

H. C. 赫鲁晓夫：为什么你们能批评我们，老大哥就不能批评你们。在同尤金的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同志非常尖锐地批评了苏共中央，我们接受了这个批评。此外，米高扬同志在中共八大上讲话时，您，毛泽东同志离开了会场。这是表示抗议的行为，米高扬同志也可以离开。实话说，我也可以收拾箱子离开，但是我不这样做。当匈牙利事件爆发时，周恩来同志到我们这里来，给我们上了一课。他因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国家而谴责我们。我们也接受了这一教训。结果是，你们可以向我们提意见，而我们却不能。现在，甚至我们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些成员在说：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但实际上，对苏共中央的意见甚至都不尊重。难道你们同我们说话不傲慢吗？

毛泽东：我们是以特别信任的方式来谈论自己的看法。你们这次也是如此。这很好嘛。这有利于事业。但是你们的公开言论，我指的是塔斯社声明，则是不好的。

A. A. 葛罗米柯：塔斯社声明并没有使印度疏远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摘读一些语句）。

彭真：我们也应说出自己的看法。毕竟是印度人首先越过边界，然后开火，持续打了12个小时。毛泽东同志刚才说了，没有人确切知道，究竟在中印边界发生了什么事。

H. C. 赫鲁晓夫：你们不能容忍反对意见，认为自己是正统，你们的傲慢也表现在这一点上。陈毅给我们扣了一顶帽子，而且是一顶政治帽子，他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

陈毅：塔斯社声明是支持印度，支持资产阶级的。

H. C. 赫鲁晓夫：你们想让我们屈从你们，这是办不到的。我们也是一个政党，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不迁就任何人。

毛泽东：那么，我们是在哪一条道路上？

H. C. 赫鲁晓夫：我们过去一直认为，现在也认为，我们和你们共同走一条道路，而且，把你们当作我们最好的朋友。

毛泽东：我不明白，我们的错误是什么？克伦斯基和托洛茨基不也从你们那里跑掉了。

H. C. 赫鲁晓夫：达赖喇嘛跑掉，你们就没有错误？我们也犯错误，这是事实。我们让克伦斯基从苏联跑掉，是我们的错，但应该考虑到，这确实是发生在革命最初的日子里。列宁信守诺言，释放了克拉斯诺夫将军和卡列丁将军。至于托洛茨基，是斯大林赶走了他。尼赫鲁可能会倒向美国。当同我们在一起有利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同路人。当我们给纳赛尔援助时，我们知道他可能会反对我们。当他真的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给他贷款建造阿斯旺水坝，这是一个策略。如果我们不给他贷款，纳赛尔可能会投入美国的怀抱。

毛泽东：你只看到我们“威胁的姿态”，没有看到另外一面，即我们在争取把尼赫鲁拉到我们这一边来。

H. C. 赫鲁晓夫：我们不相信纳赛尔会坚持长期间我们站在一起。维系我们的只是一条很细的线，随时都会断掉。

陈毅：令我非常气愤的是，你们说“同印度关系恶化是因我们的错”。

H. C. 赫鲁晓夫：你说我们是迁就分子，我也很气愤。我们应该支持尼赫鲁，帮助他执掌政权。

毛泽东：西藏事件和边界冲突，这些都是暂时的。我们最好不再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评价我们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我们是团结的，个别的分歧不会妨碍我们的友谊？

H. C. 赫鲁晓夫：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个看法。

毛泽东：我想澄清一下，当米高扬同志讲话时，我根本就没有参加八大的那次会议。我需要同米高扬同志本人谈谈。

H. C. 赫鲁晓夫：你不参加这次会议，是因为米高扬要讲话。周恩来曾经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他是个很好的教师，但是，我不同意他讲的内容。

刘少奇：我们从未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对任何兄弟党谈过我们之间的分歧。

H. C. 赫鲁晓夫：这很好，很正确。你们已经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我们也听了，你们现在应该听我们讲。请放弃政治指责，否则就会损害我们两党的关系。我们是你们的朋友，说的都是实话。我们不愿迁就谁，即便是朋友。

陈毅：但是，你们却对我们进行了两项政治指责，说恶化同印度的关系，让达赖喇嘛跑掉，都是我们的错。我认为，你们仍然是在迁就。

H. C. 赫鲁晓夫：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我只是向你们指出你

们的个别错误，没有对你们进行重大的指责，而你提出的则是重大的指责，如果你认为我们是迁就分子，陈毅同志，就不要把手伸给我，我不会同你握手的。

陈毅：我也不会。应该说，我不怕你发怒。

H. C. 赫鲁晓夫：不要自以为是元帅就瞧不起我们。这不值一提。不要斥责我们。我们有多么美妙的局面：一方面，你们使用“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另一方面，你们不让我说一句话。在这种情况下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不再讲“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原因。我们不想由一个党来当头。所有共产党都是平等和独立的。否则就是虚假的。

毛泽东（用调和的方式）：陈毅说的是特殊性，不应普遍化。

王稼祥：问题在于翻译错了，陈毅没有把迁就当作一种主义来谈。

H. C. 赫鲁晓夫：我们打下的美国飞机不止一架，并且总是在说，它们是自己坠毁的。对此，无论怎样你们都不应称之为迁就。

M. A. 苏斯洛夫：你们现在准备同印度谈判，这很好。

A. A. 葛罗米柯：中国是不是有必要发表一份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声明？我要预先说明，我这样说事先没有同赫鲁晓夫同志交换过意见。

周恩来：不必发表这样的声明。我们已经通知印度方面，在10月15日至12月1日这段时间里，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可以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来访。

H. C. 赫鲁晓夫：我也要提出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我刚才因副总统来访的问题而产生的。如果是副总统，那么人们就会产生迷惑，为什么不是总统和总理访问中国。

周恩来：拉达克里希南的人选是印度自己建议的。印度总统和总理已经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给我们发来了贺信。作为回应，我们再次想到了关于邀请拉达克里希南访问中国一事。

毛泽东：《真理报》在刊登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件的时候有删减，

而塔斯社的报道我们则是全文刊登。我们就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以到此结束，然后谈谈老挝问题？

H. C. 赫鲁晓夫：好吧，让我们谈谈，不过我对这个问题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这一事件本身并不重大，但对其却议论纷纷。今天胡志明来见我们，同我们谈了老挝问题。我让他去见你们，因为你们应该关心这个问题。在波匈事件期间，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曾到过我们这里。我们同刘少奇同志的立场不同，有时是完全对立的。好多天，我们都不能达成一致的看法。我们的立场被改变了，但后来我们达成了一致，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毛泽东：我们反对老挝战事升级。

H. C. 赫鲁晓夫：我们也反对。

刘少奇：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有一个扩大老挝斗争的计划，胡志明反对这个计划，反对扩大军事行动。我们支持他的立场。

H. C. 赫鲁晓夫：不应扩大在老挝的军事行动，如果扩大的话，美国人就会卷入。那时候他们就会出现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上，肯定会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挑衅。这样，他们会直接部署在距越南民主共和国很近的地方，但是我们距越南民主共和国则很远。如果局势变得复杂起来，美国人会极为迅速地摧毁越南民主共和国，我们则来不及采取措施。我们认为，应该建议越南同志不要在老挝扩大军事行动。

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同你们的看法完全一致。我们历来都赞同，不仅不在老挝扩大军事行动，而且应保持台湾地区的现状。我要再说一次，1958年8月当我们炮击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打算采取什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参加会谈的有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С. Ф. 安东诺夫，苏联外交部远东司随员 P. III. 库达舍夫；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翻

译阎明复和李越然。

会谈记录：С. Ф. 安东诺夫和 Р. III. 库达舍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
第12卷，第3210—3222页

关于全面裁军、台湾问题和中印关系

——毛泽东与安东诺夫谈话纪要

(1959年10月14日)

摘自 C. 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10月21日

第424号

绝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谈话记录

1959年10月14日

按照指示，我拜访了毛泽东，并且带给他 H. C. 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的秘密情报。在交给毛泽东这份情报文本的时候，我告诉他说，根据中国的新闻报道和中国同志的解释，大使已经深信我们的中国朋友赞成 H. C. 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毛泽东同志回答说，他们完全赞成苏共的这一外交做法，而且他们在看待这一访问的意义上没有分歧。我半开玩笑地问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中苏是否联合得像十个手指一样？毛泽东说，是的，并且补充说，一般来说，如果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同意见的时候，这些分歧就像十个手指之外的一个一样，或者确切地说，就像是半个手指一样。就这一点，他继续说道，即使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局部的、暂时的。在大多数问题上，我们联合得就像是十个手指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分歧像是出现在许多个手指上，而不是在一个上，但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所有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始终是一致的。

为了回应毛泽东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我简单地向他透露了有关我所告诉他的情报的要点。毛泽东非常感兴趣地听着，并且在许多地方加进了他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评论。他同意在这份情报中包含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结论，即 H. C. 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将真正缓和国际形势的紧张局面。毛泽东表示非常赞同 H. C. 赫鲁晓夫同志在美国访问时提出的苏联政府关于全面裁军并提交联合国检查的提议。毛泽东说，苏联政府关于全面裁军的提议是解决整个裁军问题真正的最好的方法。他强调说，全面的和完全的裁军是必要的。他接着又说，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中一共有将近 200 万人。中国国内并不需要一支这样规模的军队。控制中国国内局势完全可以由民兵完成，而这些民兵并不是军人，而是在工厂做工。全面裁军的真正效果就是军队的规模会明显地缩小。毛继续说，如果美国缩小他们的军队规模，中国一定会相应地缩减陆海空三军。

毛泽东继续说，在 10 月 14 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将要通过一项承认和支持苏联全面裁军提议的决议。通过这样的方法，苏联的裁军提议将得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支持。

我告诉毛泽东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并批准关于苏联裁军决议的做法，是我们的中国朋友采取的一项非常重要和非常有用的措施。此外，我向毛泽东简要地指出了在 H. C. 赫鲁晓夫访美的报告中所讨论的中美关系问题。

对此，毛泽东指出，H. C. 赫鲁晓夫同志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中，已经坚定地和正确地阐述了台湾问题。毛泽东继续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二战后根据国际协定造成的许多分裂的国家不同（如德国、朝鲜、越南），在台湾问题上，从来就没有任何国际条文曾经提到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相反，甚至在战争期间，开罗宣言已经提出，在军事行动完成之后，台湾将摆脱日本占领者的统治而回归中国。

同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打算向美国发起战争。毛泽东继续说，中国可以等上10-20年，甚至30-40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到了苏联的经历：22年（1918-1940年）来，苏联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使波罗的海国家回到苏联的版图。然而，虽然我们在台湾问题上不发动战争，但我们会经常谈起并声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毛泽东继续说，众所周知，在1958年，中国炮击了台湾海峡的沿海岛屿。这是在美国于中东处于困境之后。毛泽东补充说，从去年的形势来看，这一举动确实是加剧美国困境的有效方法。毛泽东进而又说，是蒋介石他们自己希望而且要求这样一种炮击的。在炮击开始后的最初几天，蒋介石确实怀疑过作为炮击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会占领金门和马祖，这是真实的。但是，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蒋介石很快确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没有这个意图。

毛泽东继续说，美国也和蒋介石一样，在两周的时间里，他们曾经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想要占领这些岛屿。后来他们明白了，这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次计划的一部分。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中国朋友的出发点在于这一事实，即美国不会为了几个沿海岛屿发动战争。此外，他又说，去年炮轰这些岛屿是在某些具体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毛泽东提到，情况已经不同了。

接下来，毛泽东主动提到了有关印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边境冲突问题。毛泽东强调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越过喜马拉雅山脉。这是明确规定了的。这是对一块没有意义的领土的争议。”

毛泽东进而又说，尼赫鲁现在一直想在边境地区采取武装行动。他有三个目标：第一，他想给印度共产党一个突然的打击；第二，想要改善印度接受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援助的条件；第三，想要阻

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对印度人民的影响。

接着，毛泽东提到了西藏的情况，并指出，西藏目前正在进行民主改革，这正是尼赫鲁感到最可怕的事情。毛泽东继续说，值得注意的是，西藏的广大群众对这次改革具有极大的热情。在西藏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大约有 12000 人离开西藏去了印度。其中反动分子、大地主、反动喇嘛、拥有地产的管家和一些其他的人，大约有 600-7000 人。大约有 5000 人是因为受到胁迫、欺骗或者是恐吓而逃到了印度。这些难民目前表示愿意回到中国。西藏的所有大地主，有 80% 参与了叛乱，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逃到了印度。但是，仍然有一些大地主留在西藏。

毛泽东说，对于那些留在西藏的大地主，已经对他们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之后能够长期留在中国。

为了表明西藏的特殊地位，毛泽东不得不尽力强调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问题。毛泽东说：“达赖喇嘛是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西藏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看待他的。”毛泽东进而又说，达赖喇嘛去了印度倒比留在中国好，如果他留在中国，许多西藏的农民们就不会投入到民主改革中去了。毛泽东继续说，如果我们逮捕达赖，就会引起西藏人民的反抗。

毛泽东补充说，这一点甚至对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民都是很难理解的；只有在西藏，我们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内蒙古、新疆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的中国地区，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尽管如此，西藏的农奴阶级对地主的仇恨和憎恶感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现在，大部分地主已经离开了西藏，他们的土地都分给了农奴，农奴自发地、热烈地赞成现在正在实施的民主改革。

毛泽东说，西藏的情况的确是非常复杂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毛泽东说，直到现在，在中国甚至还有外国殖民地，比如说澳门。像葡萄牙这样一个小国，400 年前就从中国掠走了这样

一大块土地。这让我们怎么办？中共中央考虑了这个问题，并且制定出现在不触动澳门的方针。

毛泽东特别提到：“当他们说中国是一个好战的国家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这是真实的。但是，有时在一定的情况下，最有利的是向对方显示自己的稳定。比如说去年，在中东危机中，美国国务院出版了指责中国侵略朝鲜、越南和其他国家的备忘录。但是，美国最终是孤立的。在我们炮击沿海岛屿之后，美国并没有履行保卫金门岛和马祖岛的职责，他们处于了一种被动地位”。毛泽东继续说，在这里似乎有一个非常微妙的、不清楚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一切都已经很清楚了。他补充说，当然，所说的这一切都与去年秋天的形势有关。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实施这些措施了。毛泽东继续说，总的说来，我们去年所采取的措施，也许可以看作是为美国制造的一系列麻烦中的一部分。这一系列麻烦中的另一部分是苏联制造的柏林问题的发展。中东危机、炮击海岛和柏林问题的发生，所有这些事件都给美国带来了麻烦。毛泽东特别提到，这些事件的发生，为你们在欧洲取得一些成绩提供了可能性。他继续说：“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与美国发生战争，在台湾问题上，也不会和蒋介石发生战争。”

毛泽东说，至于中美关系问题，我们中国已经尽了我們所能。美国人不想承认我们，并且每天进行反对中国的宣传，在报纸上和官方声明中以各种方式诅咒我们。同时，在中美关系中还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台湾问题。毛泽东继续说，关于美国终止占领台湾的期限问题，我们已经有一定准备在这件事上实行妥协。如果美国履行他们的义务，即在一定时期内，比如说5-10年或者15年内撤离台湾，我们就准许美国在台湾待一段时间。毛泽东说，我们和他们做一种交易：你们美国人喜欢哪一种方式——在台湾地区永远保持紧张的局势，还是在一段时期后履行离开台湾的义务？毛泽东评论说，这种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在华沙和美国谈判的时候由中国方面提出的。如果美

国同意，那么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就会得到缓解。但是美国人太愚蠢，他们寄希望于动用武力和制造高压。毛泽东继续说，中国没有派飞机飞往台湾，就连中国防空部队的侦察机也没有飞到过那里。同时，一直有美国制造的飞机从台湾飞往大陆，实际上，不久以前，借用从苏联得到的武器，我们在北京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飞机。

我对毛泽东说，从这个军事行动的结果来看，目前，这种武器已经从苏联运到中国，而且我们的中国同志已经使用上了这种武器，并且掌握得很好。但是击落这架飞机的荣誉属于中国防空炮手们。我插话说，我们很高兴听到你们对我们的武器的评价，并且将这次胜利与我们的帮助联系起来。

毛泽东说：“是的，我们将他们联系到一起。”听了苏共中央关于H.C.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的结论的报告，毛泽东又说：“你们的估计（比如对苏美关系）是正确的。我们表示同意。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没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进而又说，冷战对美帝国主义者来说，已经慢慢变为一个不利因素了。而只有在冷战真正成为对他们不利因素的时候，美帝国主义者才会结束冷战。毛泽东强调说，在他与H.C.赫鲁晓夫同志在1958年7月至8月的会谈中，他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如果美国现在想要结束冷战，似乎对他们不利。毛泽东继续说：“但是对我们来说，冷战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如果美国像以前一样坚持强硬路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得更强硬，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毛泽东随即又说，1957年12月在莫斯科和1958年7月到8月在北京举行的他与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谈中，曾就关于冷战将要成为美国的不利因素，关于哪一方害怕战争和关于好战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特征这些问题，与赫鲁晓夫同志交换了意见。这些集团的特征不仅仅是具有攻击性，当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遇到一些不利情况的时候，如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们的行动还具有侵略性。如果我们内部非常稳固，那么这些集团的成员将会采取守势。他们建立基地，就像用水坝阻挡洪水一样。上面提到的各个集团，就像是这种水坝一样。帝国主义者害怕共产主义的细菌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

毛泽东进而又说，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西德和日本。目前，这些国家还没有殖民地，而美国、英国和法国在许多范围内都有势力。毛泽东说，比如说美国，每一件事——从台湾到土耳其，其本质就是“美国的世界”。美国人掠夺了许多东西，他们企图在每一个地方抓住每一件东西，不想让任何东西逃避他们的掌握，甚至是我们中国的金门岛。毛泽东继续说，比如说，在我们看来西柏林的版图并不大，人口也不多，但是，美国人非常害怕失去它，他们从各方面抓住它，他们显然害怕失去西柏林之后，会降低他们的国际威信，就好像他们失去西柏林就会失去其他一切一样。

毛泽东进而又说，至于解决西柏林问题的观点，他认为，西方列强应该开始明显地减少他们在西柏林的驻军。这需要很长时间，大约10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那些西方人将被迫完全放弃西柏林。

毛泽东反复说，美国人害怕放弃任何东西。他接着说，但是，现在，即便是在远东，我们也不会碰他们，甚至是在像澳门或金门这些美国力量薄弱的地方。通常，美国不希望我们在任何地方碰他们，哪怕是最轻微的。他们不希望我们碰资本主义势力影响下的任何地方。毛泽东继续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骚扰他们的原因。我们自己有广大的国土，我们可以用20或者30年，甚至更长时间生存、发展，最后完全战胜资本主义。

毛泽东强调，从总体上讲，国际形势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采取了很好的措施。”毛泽东补充说，帝国主义者有许多弱点。他们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反帝解放运动正在迅速壮

大。

毛泽东继续说，至于亚洲，表面上看（这一运动）有所减弱，这是因为在许多亚洲国家，国内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两个大陆为美国、英国和法国提出了难以解决的麻烦和任务。

同时，毛泽东又说，在与赫鲁晓夫同志在北京会谈期间，他已经清楚地表述了这样的看法（从机场到住处的路上），即目前西德和日本对于我们，对于和平事业，是主要的危险。可以说，美国、英国和法国是愿意维持现状的。所以，与美国、英国和法国保持缓和的关系是有可能的。在某些情况下，也不排除联合这些资本主义力量反对西德和日本的可能性。毛泽东说，西德不仅对我们是一个危险，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危险。日前，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因此，它愿意在一定范围维持现状。但是同时，美国人在他们占有有利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的地区制造紧张局势。比如，他们有计划地危害柬埔寨，并且煽动周边国家反对它。美国人甚至想打倒蒋介石，用更加顺从的人替换他。对此，毛泽东讲述了1957年5月24日美国在台湾的大使馆遭到破坏的那天（这件事是由与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关系紧密的人组织的），国民党负责人是如何发现美国讨论推翻蒋介石计划的机密文件的。毛泽东说，这些文件是在美国大使馆遭到破坏的时候，在示威者们用大铁锤砸开的保险柜中发现的。由此可见，美国这个帝国主义者对蒋介石、对苏加诺（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对卡塞姆（伊拉克首相）或者对纳赛尔（埃及总统），实际上没有一点同情心。毛泽东说，所以，资本主义内部有着尖锐的冲突。

毛泽东同志对给他的那个机密报告表示感谢。他请求我们代他向H. C. 赫鲁晓夫同志和那些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的所有的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的成员们表示问候。

我本人对这次谈话向毛泽东表示感谢，并且简要地向他讲述了苏

联 1959 年经济计划的进展情况，及已经开始的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的
准备情况。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取了这些。

大使馆顾问 Б. Н. 魏列夏金同志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翻译
阎明复参加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 安东诺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大使馆以前曾以电报方式发送过该资料。已用于工作中。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Н. 谢尔巴科夫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 9 卷第 18 页

对1960年莫斯科会议文件的评论

——毛泽东与契尔沃年科谈话纪要

(1960年12月26日)

摘自 C. B. 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1年1月6日

第9号

绝密

文本第3份

与毛泽东同志会谈记录

1960年12月26日

根据中央指示，今天我拜访了毛泽东。

我向毛泽东转达了苏共中央和 H. C. 赫鲁晓夫本人对他 67 岁生日的祝贺，祝他健康长寿，工作卓有成效。

苏共中央和 H. C. 赫鲁晓夫的这一衷心关怀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非常感动，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心情，十分热情地感谢友好的祝贺和祝愿。毛泽东说，在自己生日这一天接受这一崇高的祝贺，对他来说是一大荣幸。他请求向 H. C. 赫鲁晓夫同志转达最热情的感谢，并祝他本人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身体健康，在自己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好成绩。

接着应毛泽东提议进行了谈话。他讲道，现在中国领导人的工作很多。他说，“至于我本人，工作比以往少多了。尽管我每天 8 小时工作（有时多一些），但是工作效率却是今非昔比了。读过的东西记

不太住，必须看大号字的文件。”谈到这里，他说：“从工作效率看，老一代人不如青年一代人，看来这是普遍规律。”

接着毛泽东强调指出，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位上退下来，为减少他的国务活动负担创造了条件。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当时他提出这个建议时，只有政治局委员支持他，许多中央委员反对。

“普通党员中不同意的人更多”。他说，现在大家已经都支持这一决定了。

毛泽东继续讲他的工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活动。他说，好多年以来，实际上从1953年、1954年起，他已经不主持政治局会议了。他说，从1956年起，政治局的全部日常工作由刘少奇领导，他只是偶尔出席个别会议。毛泽东说，他平时自己工作，基本上只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一起开会。有时候特邀人员也参加常委会议。

毛泽东接着讲道，个别情况下他也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常邀请地方上党的负责人参加，例如各中央局的书记和副书记、各省委书记。毛泽东说，最近，他几乎不在中共中央全会上讲话，甚至不在中共代表大会上讲话，仅限于致简短的开幕词。他接着说，从共和国主席职位上退下来后，他可以不参加最高国务会议的工作。他还说：不错，我还经常看党和国家系统最重要的一些会议的文件和材料（在通过这些文件和材料之前）。

我说，尽管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职责作了某些调整，但是领导党和国家的重担仍然由他（毛泽东）挑，毛泽东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他常常要连夜工作。“主要的负担是要阅读大量的文件和材料。”他说，比如“我每天不得不两次阅读给我送的两厚本关于国际问题的资料，当然，为了不落后，不脱离生活，必须得看”。

在谈话过程中我说，国际形势发展很快，必须认真关心，及时分析。我还强调了莫斯科会议的重大意义，莫斯科会议对最近的国际形势作了深刻的马列主义的分析。

毛泽东同意我的这番话，对这一话题作了积极的反应，他说：“莫斯科会议开得很好，做了认真准备，由26个党的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工作得很有成效。”他接着说，有些外国代表不理解，问为什么会议开这么长。毛泽东说，看来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81个党的代表每人仅发言一次就要10多天。然后还有第二次发言，就不说研究文件的工作了。他指出：“会上有争论，有辩论，这很好。这是件好事。”

接着，毛泽东同意我关于莫斯科会议文件的论点有深度的看法，他还说，文件在西方帝国主义分子中，在我们共同的敌人中引起了一片恐慌。

在谈话中我简要地讲述了苏联开展的宣传莫斯科会议成果的工作，讲述了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会议文件的情况。

毛泽东讲，中国共产党内也组织了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研究。至于说到总结会议的成果，中共中央还没有就这个问题下达具体的指示。然后他说，1961年1月将要举行中共中央全会（上一次全会是在1960年4月召开的），这次全会将听取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会议的报告。预计全会要就这个问题作一个简短的决议，对莫斯科会议的决定表示支持。除总结莫斯科会议的成果外，中共中央1月中央全会还要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接着，毛泽东说道，中国现在有困难，无法制订远景规划，“在这一方面我们经验不足”。他又说，开始，中共中央有人建议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剩下3年的计划。但是1960年已经过去了。因此，决定制订五年计划剩下两年的各年单独的计划。他说，国家已经有了1961年第一季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实际上已经在执行。

我向他简要地讲述了苏联取得的搞规划的有利条件，讲了苏联最高苏维埃最近一次会议批准了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

毛泽东以批评的口气讲了中国在及时批准经济计划方面落后，他

说，例如 1960 年的计划，1960 年 4 月才通过，还有过在 6-7 月份才在人大会议上批准计划的情况。他解释说这是中国缺乏应有的经验。

我向毛泽东讲了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讲了苏联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发展农业问题，其中还谈到即将召开的全会的几个特点，讲到在这次全会上将审议和解决十分重要的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问题。

毛泽东说中共中央现在也在“专门抓”农业。他还说，正在加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们甚至考虑把工业战线缩小一些”。他在解释这一想法时说，这是指在某种程度上缩小对工业生产投资的规模，其中包括对某些重工业部门的投资，还要压缩对楼堂馆所的投资。

在谈话中他简要地谈了中国工业的瓶颈之处，尤其是采矿业、煤炭业以及运输业，讲了这些部门的相互关系，讲了他们对发展其他部门（钢铁生产等）的影响。

在回到农业问题时他强调指出，对中国这个十分重要的经济部门以及轻工业的发展不给予应有的重视，就不能满足人民吃饭、穿衣以及日用品的需求。毛泽东又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深信，与生产死的产品如金属、矿石和煤炭等相比，组织生产活的植物和牲畜是件难得多的事。”他开玩笑说：“死的从我们这儿跑不了，我们可以缓一缓。”

在谈话时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的物质需要不断提高。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考虑解决出现的困难。当然，问题不仅在于困难。就是在有成绩的地方，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新的任务。讲到这里他指出，再过三四百年，也会产生新的问题要去解决。“不这样就不会有发展。”

我向毛泽东讲述了我陪同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的一些感想，强调了这次访问对巩固苏中友谊和团结的意义。

毛泽东对谈这一话题很积极。他说，中国对这次访问非常高兴，“出访了，这很好”，他强调说，我们两国人民要求采取这一措施。

“我们两党的中央委员会做出这一决定，满足了两国人民的要求。”

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真的，苏联的许多共和国，例如乌克兰，对中国代表团没到他们那里去还“耿耿于怀”。他笑着说，这个抗议应当向代表团成员提，譬如向这次谈话在场的杨尚昆提，因为政治局没有反对继续访问。我也用同样的口吻说，中国朋友说这又不是最后一次访问苏联，这才使“耿耿于怀”的苏联同志消了气。毛泽东说：那就可以说定，他们欠你们一笔债。

当他稍微展开话题讲这种会晤和访问有益时，我对他说，中国代表团访问时，苏联人不止一次地请求向他（毛泽东）转达最美好的祝愿，希望他在自己合适的时候访问苏联，到各个城市，到工厂，到集体农庄走一走，因为上一次访问苏联时，他没能比较广泛地接触苏联。他对此做出了热情的反应，说：“一定得找时间去一趟。”

接着，毛泽东讲道，在中国，外地的工作人员对他有怨言，对他没能到一些城市和地区，如新疆、云南、贵州、西藏、太原、包头、西安、兰州等地去有意见。他说，这些工作人员以前说我是“半个共和国的主席”，当我把主席职位让给刘少奇后，他们又称我是“半个国家的党主席”。

在谈话的最后，毛泽东又谈到了他好像不再积极从事党和国家工作的想法，他半开玩笑地说，现在“我就等着转为一般的政治局委员”。他还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党内还没有征求过任何人的意见，”他又指着杨尚昆说：“甚至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我是和您第一次谈自己的‘阴谋’。”

我肯定地说，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不会接受毛泽东的这一建议。他开玩笑说：“那样的话，只好等大家都认识到这事的必要性。再过几年，他们自己就会可怜我的。”

谈话在非常真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出门一直把我们送到汽车旁。他热情地和我们道别，再次请我

们向 H. C. 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转达热情的问候，对他们的祝贺和祝愿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谈话时在座的还有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和朱瑞真，以及苏联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苏达利科夫和使馆参赞罗满宁。

苏联驻中国大使

C. 契尔沃年科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9卷第257页

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反应

——毛泽东与契尔沃年科会谈纪要

(1963年2月23日)

绝密

文本第2号

苏联驻华使馆

北京

1963年2月26日

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与中共中央 主席毛泽东会谈记录

1963年2月23日

今天19点30分周恩来的助手马列从中共中央来电话，表示毛泽东希望在20点接见苏联大使，以传达他对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来信的意见。

中共中央的同志代表毛泽东表达歉意，毛泽东由于患流感，将在他的卧室接见大使（在谈话中毛泽东半躺在床上）。

在场的中方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苏方有：大使馆参赞 O. B. 罗满宁和二等秘书 P. III. 库达舍夫。

整个交谈实际上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由毛泽东主导。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刘少奇、周恩来以及伍修权会偶尔补充和评论。

在谈话开始的时候，毛泽东非常热烈地欢迎了我们，并为没能在1963年2月22日接见我们表达了歉意。就解释的原因，他说在最近访问中国南方的过程中得了轻微的感冒，而他现在已经基本恢复，还

留下“一点尾巴”。

鉴于他对所有在场苏联同志都相当了解，毛泽东评价说和我们今天的见面有家庭聚会的特点。

毛泽东对我说，作为一名大使我不算幸运，因为我在中国逗留的整个期间中共与苏共之间充满了争论与分歧。

我回答说，我们苏联共产党人希望这些争论能够尽快结束。

毛泽东继续说，现在苏联大使正在变得越来越幸运，因为两党之间结束论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

我强调，我实在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希望实现的了，就像俄罗斯人经常说的那样，上帝保佑！看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压力都影响到了上帝。

毛泽东答复说：“现在马克思已经成了世界的上帝，而列宁是他的总理。”

然后谈到苏共中央在1963年2月21日发出，由我在1963年2月22日转交到中共中央的来信，毛泽东说他看过了这封信。

在整个谈话中，毛泽东手中握着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来信的中文印刷文本，不断参考，并引用其中的一些提法。这封信是在一个文件夹内，它有一个标题，大红色的标题：“中共中央收到的文件”。在这封信的内容及空隙处覆盖了许多标注以及在许多提法下都画了线。从手写的字迹判断，这些批注是出自一人之手，最大的可能是出自毛泽东之手。

他进一步强调，我们欢迎这封信，因为其中有些很好的提法。我们支持这些提法，尽管我们不同意其中的某些东西。（信中）积极的地方包括两党之间的平等和协商的想法，特别是这些地方，它说（毛泽东引用信的内容）：“在此基础之上，苏共中央认为特别重要的是立即采取具体和现实的步骤，目的在于加强我们之间的团结，旨在改善各兄弟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气氛。正是出于这些考虑产生了一项提案，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为我们党的代表，在德国统一社

会党第六次大会上提出结束共产党之间的论战，结束在自己党内对其他政党的批评。这项建议，如你们所知，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引用信中的这段之后，毛泽东说，这是好话。但是我们对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在建议结束公开论战时的发言中批评中共感到不高兴。总之，苏共推出了4份文件，其中都包括对中共的批评：2份是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2份是《真理报》的社论。

他继续说，在4天中——今年2月20-23日，他发表了所有这些文件。我们这样做是使我们的人都知道你们的观点。中方报刊也将会发表批评法国共产党的文章。然后，我们将发表批评意大利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文章。我们已经回复了意大利共产党，但我们会再做一个声明。在目前我们不打算发表批评苏共的文章。

在目前，毛泽东说，在42个兄弟党——如果算上苏共是43个党——都在谴责中共。在本质上这种批评是正常的现象，毛泽东有些生气地说，人们当然可以发表言论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这些词汇中的一些是由刘少奇和伍修权向毛泽东提示的）。一句话，一个人可以附加各种标签。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如果批评是正确的，那么，显然，这是正常的。

这时，毛泽东问我是否害怕批评，并询问了我的生活和过去的工作。

我简要地谈了谈自己，并表示我不害怕批评。当然，我会因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偶尔受到批评。

毛泽东说自己一生都受到责骂。他强调，在我看来，害怕批评的人是什么都做不好的。就我们而言，我们会回应所有对我们的批评。由于我们受到了批评，我们就会作出回答。我们有句古语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同样非礼也。

毛泽东强调，正是苏共和其他 42 个党给了我们“往”的权利。你们可以骂我们，我们也可以骂你们，但是某些地方必须有限制。我个人希望能有个间歇。我们不打算立即回应这些给我们的批评。让它们像过去一样，保留在我们的账单上。虽然我们现在不打算回答，但任何我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都有权回应。也许，我们一年不会回应，甚至两年。总之，我们视情况来决定我们回应的的时间。正如我说过，我们打算发表 3 篇文章，其中包括批评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共产党。现在我们无意批评你们，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回应你们那 4 份文件。如果我们去回应所有 43 个党，这将需要半年的时间，甚至整整一年。在和我们的谈话中，毛泽东说，英国的同志说他们属于广大的多数党，在暗示中国共产党是少数派。嗯，毛泽东说，我接受我们确实在少数的事实。

他继续说，我们在所有党之前，早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就做出了关于结束公开批评和攻击的提议。但是比利时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大会上对我们进行公开的和人格上的指责。在此之后，许多其他党也做了同样的事情。那么，毛泽东说，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问题在各国人民、各国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面前被提出来了，也在帝国主义和整个世界的反动派面前被提出来了。

既然这样，他说，“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者，而全部真理属于 43 个党。那好！但是，我们要提出这项建议：让苏联的报刊和其他 42 个党的报纸刊登我们的文章。就我们而言，我们不害怕批评。既然论战开始了，那就让它继续下去。事实上，如果论战开始，天会塌吗？中国西山的草会不长了吗？不！天不会塌，草木还会生长，女人还会生孩子，鱼还会在水中游。正相反，如果这 43 个党的行动结果让天塌了，草木不长了，女人不再生孩子了，鱼从水中消失了，那才是奇迹呢！”

毛泽东进一步引用苏共中央的来信说道：“公开的，越来越尖锐的论战只会破坏兄弟党之间的团结，损害我们的共同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出现的争论，阻碍着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削弱了在国际舞台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对兄弟党的活动产生不利的影响，尤其是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的活动，那里有着复杂的国内局势。”但问题是，他说，谁发起的这些攻击，谁组织起40多个政党的攻击，将这些攻击不仅引向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还引向中国共产党，谁在大会上第一个挑起对其他政党的公开批评？最近一段时间，5个兄弟党的公开声明里，都包括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

毛泽东继续说，你们来信中说：“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对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些问题的理解上，有可能产生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分歧。这在具体情况下，即在这个或那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枝节问题上，是可以理解的。”也许，就是这样，毛泽东说，但是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而且不是最主要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理解。

毛泽东再次引用来信说：“但是，这些意见的不同，如果他们不是被人为地夸大了，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如此尖锐的冲突，他们可以通过联合的、同志间的协商充分得到解决。”他指出，这个观点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问题还在于：究竟是谁在“人为地夸大这些意见的分歧”？谁在散播谣言说毛泽东已经没用了，还有说他现在已经奄奄一息，快死了？当然，这些谣言是有客观原因的。举例来说，我真的生病了，感冒是我的常客，而今天我只能躺在床上接见你们，何况，我也似乎快死了。

散播的谣言还说，我（毛泽东）只是一个傀儡，或者说中国对老而不死的毛泽东有个人崇拜。还说，刘少奇、周恩来他们都和我差不多老，他们是65岁，他们也会很快死去。你，大使同志，是比我们年轻，觉得自己身体更好，但你也会生病。他说，看来你有时也生病。

他再次回到来信上。毛泽东说，总体上，他对此表示欢迎。他继续说，现在我要讨论那些“我们的不满”，那些没有让我们满意的事情。我认为在别人背后议论是不礼貌的表现，特别是在同志关系中。信中有一些很好的提法。尤其是它说：“为了加强我们的友谊和加深互相了解，我们苏共中央提议，进行一次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晤”，并进一步说：“这次在苏共和中共代表之间的会晤，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发挥重要作用，创造有利的环境，没有这一点（这次会议的）工作不能成功。”毛泽东说，这是真的，我们已经争吵了好几年，而且最近开始走向公开化。他继续说，在我看来，像这样的争吵，一个人难以应付，就是有 50 个人也不够。争吵后应该休息。

毛泽东继续说，在 1962 年 4 月 7 日回答苏共中央 1962 年 2 月 22 日的来信中，我们建议停止公开攻击，要求召开一次协商会议，最后召开一次兄弟党会议。在这封信中，你们甚至没有提到中共中央 1962 年 4 月 7 日的回信，好像这封信提出的建议完全被你们忽略了。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新西兰、英国和瑞典共产党也提出了这个方案。是的，英国和瑞典提出要开一次讨论关于国际组织的群众路线上差异问题的会议。

刘少奇补充说，他们特别记得在斯德哥尔摩出现的差异。

毛泽东指出，印尼和新西兰提出召集会议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以及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继续说，苏共中央 1963 年 2 月 21 日的来信根本没有提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参与了 1960 年会议并签署了声明。南共参加了 1957 年会议，但拒绝签署该宣言。南斯拉夫人不想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他们已经有自己的纲领了。在 1960 年会议上，苏联同志告诉我们必须批评南共。在 1960 年会议上的 81 个政党正确地指出，南共在后退，在背叛马克思

列宁主义，这一提法到现在一直持续。中共正在执行 1960 年会议的这项决定，即使是现在。目前，社会主义阵营有 12 个国家。阿尔巴尼亚已被驱逐出去，虽然这项制裁不是通过集体的方式进行表决的。

我强调说，没有人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重复说，他们正试图驱逐阿尔巴尼亚，把这个小国从社会主义阵营中驱逐出去。美国正试图驱逐古巴。阿尔巴尼亚哪里变得如此可怕了？如果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有错，应该予以党内批评，而苏联同志们却发起了公开批评。同时，信中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困难，是临时的，是可以完全被克服的”。

毛泽东说，苏共中央的来信还提到一些问题，它们正被提上议事日程：“创造有利的环境，没有这一点（会议）工作不能成功”，“我们认为，此次会议关注的中心应该是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计划斗争的任务，为了各国人民自由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为了加强凝聚力和发展所有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加强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所有这些问题，毛泽东说，都是好的。

然而，伴随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为了加强凝聚力和发展所有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提法，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是否包括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在内？在任何情况下，这封信都没有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对毛泽东说，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无疑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人把它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问了一个问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否能参加会议？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我想，应该由各党决定，由会议的参加者决定。

毛泽东问：那南共是否参加会议？

我回答说，也许，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兄弟党之间的协商方式决定。

毛泽东表示，南共已参加了意共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会议。

我说，关于邀请南共参加会议的问题应该由与会的各党自行决定。这是每一个党的权利。至于兄弟党之间的会晤，请谁参加的问题，可能应该由各党通过正常的方式集体解决。

在此刘少奇指出，《真理报》在今年2月10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从本质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即是否接受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补充说：也许大使的看法和《真理报》上文章的作者不大一致？

我解释了苏共对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原则立场。我指出，有关南共的问题当然是重要的，但最终，它不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又向毛泽东引用了赫鲁晓夫在与刘晓的谈话中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声明，在那次谈话中，特别是提到了对铁托的原则性评价（关于铁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众所周知的摇摆不定）。

毛泽东似乎是对在场的中国同志说，他读过那次谈话的备忘录，但不能准确地想起这些内容。

我说，此外，与南共的相互关系还具有复杂性，一如既往，各兄弟党的共同努力可能对南斯拉夫有一定积极的影响。

我提到，南斯拉夫是一个整体的问题，必须要将这个国家拉近我们，而不至于使它更接近帝国主义国家。

毛泽东用一种生硬的语调说，对我们来说，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明确的——“应该遵循的81个党的决定”。南共的领导人以及他们的文件不仅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我表示了对此问题的不同意见，并指出应对南斯拉夫采取更好的一些举动，我引用了铁托从苏联回来后谈到所谓“特殊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我强调，我们中央在与南共的关系中，严格区分了意识形态问题和国家间关系的问题，对此，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应

该了解。如果毛泽东同志你向我们党的任何组织发问，他们都会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回答你。我还补充说，与南斯拉夫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将促进党派之间关系的改善，纠正某些错误，这些都已经反映在南共的纲领中。

关于我对苏共中央在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中严格区分意识形态和国家间关系的解释，毛泽东说，他很高兴听到这个解释。同时，毛泽东继续用同样的方式谈论南共。他指出，南斯拉夫的代表没有被邀请出席比利时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这样做与1960年的声明是一致的，声明说，南斯拉夫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依靠美帝国主义的“钱”过活。总之，这个声明对南共进行了严厉批评。

至于与南斯拉夫的国家关系，毛泽东指出，中国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外交维持在代办级水平。他说，我想，我们实际上也可以互换大使。例如，英国一直试图让中国同意互换大使代表的级别。但我们不会同意互派大使，因为英国是在搞双重游戏：没有正式承认蒋介石，却还同时在联合国支持他们。

再次转向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毛泽东引用了其中一段说：“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了解，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达到了一个重要关头。从我们来讲，从我们的政党来讲，我们的政策的正确性取决于我们是继续走在同一个队伍之中，还是卷入一种艰难且不必要的斗争，后者只能导致相互疏远，削弱社会主义的力量，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毛泽东继续说，关于这一段，我同意这个观点。一个正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将继续走在同一个队伍……”这的确是个问题。

仿佛为了说明这一论断，他转而讨论中方代表团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处境问题。他举例说，中国人在大会上严重地受到阻碍，他们的发言被有意破坏，而最后中国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

也被删节了。

这时，伍修权提到讲话的重点被删节了。

这就是民主？毛泽东问。

他接着说，在兄弟党的5个会议上，就是在最近发生的，中共受到了攻击；而且从你们那边，他说，就有两个声明和两篇文章。他说：“如果你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很有效果，如果你们想在世界人民面前提出这个问题，那就提出来；如果你们不想提，那就停止论战。不管是提出问题还是提出批评，我们都会答复。什么时候回应以及回应什么——这个问题留给我们。”他说，有些事情我们会留着，会回应一部分。现在我们不会直接回应你们的文章，我们打算对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共产党做出回应。

这时刘少奇表示，关于意大利共产党，中国会有第二篇文章，因为意大利已经发出了好几篇。

毛泽东说，法国已经写了几十篇文章，都已经刊登在《人道报》上。他们特别健谈，他说。我们的答复只有一篇文章给他们。关键在于质量而不是数量。

毛泽东再次谈到了之前信中提到的关于被卷入“艰难和不必要的斗争”。毛泽东说，这是一个过于夸张的表述。没那么“艰难”，他说，这也不是一个那么“不必要”的斗争。对此，毛泽东说，如果“这场斗争，不那么有必要，那么为什么你们还要发布4份文件，为什么43个党都公开批评我们”？当然，这一切斗争都是通过文字的。这种对立的斗争，正如我们所说，动笔，动嘴，不动手。

然后毛泽东引用了信中的一段说：“如果我们在两大阵营之间尖锐斗争的形势下，没有勇气和力量按照马列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克服现有的分歧，那么未来的一代是不会原谅我们的。”他对此评论说：“这话说得非常正确，但不应该等到后代，现在广大人民群众都不会原谅我们。”

毛泽东问：事实上，是什么造成了我们之间的敌意，在我们的人民和政党之间？之后自己回答道：“我们之间不是敌人，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

我说我完全同意这些话。

至于信中提到的克服分歧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毛泽东进一步说，我们都有这些品质。如果我们有勇气和力量去争论，我们就有勇气和力量克服分歧。例如，在华沙的中方代表与美国人斗争了7年，而苏联已经和他们斗争了40多年。毛泽东继续说，我们最近和你们讨论的更多是斗争，而不是团结。我们一直在吵架，他说，现在应该休息一下了。

首先提出的一项倡议是在越南、印尼和新西兰兄弟党代表之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在1962年4月7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了这项建议。1962年5月31日苏共中央的来信也在一定程度上说到要支持这一建议，但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而这封信已经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毛泽东然后读到信的提法，“我们双方有责任在现有的形势下寻找出路，这个出路已经出现，就是勇敢而果断地清除所有妨碍我们友谊的障碍。这是唯一的出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采取的”。他对此评论说，这些都是很好的话，他完全支持这些提法。“但是，这只是文件中说的，我们要看看在现实中是什么样的。”

然后，毛泽东引用了信中的最后一段：“我们深信克服那些已经存在的分歧，不仅服务于苏共和中共的利益，也是国际共产主义为了和平，国家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共同奋斗的深层次目标。必须要表现出对目标的意愿和自觉以及对斗争的动力——那么再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阻碍我们加强和发展友谊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读完，他说他很高兴听到这些话，并觉得这是好话。他强调说信中两次提到了这些话来表示必须“表现出良好意愿”。

总体而言，毛泽东继续说，研究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我当即决定邀请苏联大使来并且表达我的想法。

然后毛泽东谈到了苏共中央信中的建议“……召开一次有苏共和中共代表举行的双边会晤”，“如果你同意这样的会晤，可以进一步讨论开会的地点和时间”。他表示在这次接见大使之前，他咨训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康生，他们有一个提案，他们希望能够呈给苏联同志们。

我们已经听说，毛泽东继续说，赫鲁晓夫同志打算去柬埔寨，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去。不知道赫鲁晓夫同志在去柬埔寨的途中或是回国的途中是否方便来中国访问并且同我们在这里会晤。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们将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莫斯科。请您将此转达给赫鲁晓夫同志。（可以感觉到，毛泽东对此次会晤非常有兴趣，多次回到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赫鲁晓夫同志来中国，毛泽东继续说，我们希望避免这种情况：在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庆的时候，在这里公开地责骂我们。

当我表示不同意这些说法时（我提醒说，我当时也在中国），毛泽东在谈话参与者的帮助下，回忆起赫鲁晓夫在北京发言的几个片段（“不应以武力考验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然后提到他回莫斯科途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次集会中的发言以及一次接受《新时代》报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话。

刘少奇提醒有这样一句：“他们像好斗的公鸡一样。”

这时，毛泽东有些生气地提到，嗯，那么，我们中国人，像好斗的公鸡，而你们，像好斗的母鸡，是不是？事实上，他接着说，我们中国人，是好斗，特别是我。美国人就是这样说我们的，其他人都跟着美国人说话。

再次回到了他对赫鲁晓夫访华的提议上，毛泽东说，我们欢迎赫

鲁晓夫同志的访问，并希望他会表现出良好的意愿，努力改善关系并实现停战。毛泽东仿佛继续自言自语地说，就个人而言，无论是他，还是刘少奇，还是周恩来和朱德，都不会允许在中国报纸上公开进行批评。

我强调，对我来说中国同志不应该把这些词句当成是针对个人的，此外，也不应该怀疑苏联领导人有不友好的言论。我指出，在我们之间关系恶化的过程中，很多东西都是表面的；资产阶级的宣传和帝国主义的情报人员利用一切手段来煽分歧的火焰，使我们吵架，用这样或那样的表述来达到某种目的。我本人表示对赫鲁晓夫发言这种解读的明确异义。

周恩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和陈毅早在1959-1960年就同苏联大使谈及此事。

随后，毛泽东拿起苏共中央的来信说，不超过两个星期，中共中央将会给苏联同志一封信进行答复。不过，他接着说，我认为我有责任在收到信后立即告知我们对此的看法和意图。你，大使同志，和我，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见面了。

我说，1962年底我接到指示向毛泽东转达（生日）问候。然而，他那时没有在北京，因此我将此问候转达给了周恩来。

毛泽东对此表示感谢。

我表达出我个人对于中国同志回应苏共中央关于举行双边会晤的建议的满意之情。我强调，如果我们两党代表举行包括最高级别领导会晤在内的会议更频繁的话，中苏之间就不会有现在出现的这种紧张关系了。我说，我会转达给苏共中央在此谈话中表达的所有想法。总体来说，毛泽东表达了可能访问莫斯科的愿望。

毛泽东说，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身体非常虚弱，而且，在你们（国家）我总是挨骂”。他说，我更愿意远离挨骂。将来我希望能够访问贵国，他说。

带着讽刺的口吻，他开始回忆他是如何“与斯大林争吵”的（中国与会者发出会意的笑声）。谈到他1949年对莫斯科的访问，毛泽东说他不想去那里“听斯大林的批评”。他继续说，原来，那时斯大林不想与中国签署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还向我建议（在科瓦廖夫和费德林的陪同下）去列宁格勒旅行。毛泽东说，我对他们说，在莫斯科“我只做三件事：吃饭，睡觉，拉屎”，并拒绝了这次旅行。他说，“我在桌子上挥舞着拳头声明，我不是来苏联参加斯大林70诞辰庆典活动的，我对与国民党分子继续维持关系的条约表示了不满”。

毛泽东继续说，最后，我当时表示几天之内就会离开莫斯科之后，斯大林才改变了他的看法。

毛泽东继续回忆说，他收到一个文本，是斯大林事先准备的“他（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在这个文本的问题中，有一个问我打算继续留在苏联多久。“准备好的答复”说：“还要一段时间，以便签署条约。”

毛泽东继续说，在我的同意下公布了这个消息，此后，我开始等待周恩来的访问，他是总理，必须由他签署条约。然而，他没有立即获准来莫斯科，给出的理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出现在苏联会被资产阶级报刊看作是中国政府向莫斯科的靠拢。但周恩来最终还是来了苏联。之后联系到长春铁路和其他问题的一些争论开始出现。

毛泽东说，当时斯大林不相信中国革命。这种怀疑是在朝鲜战争（1950-1953年）中被解除的，在我们手持武器与美国人的斗争中，我们的关系开始改善了。他说，这些回忆属于“旧账”。我们“告诉你们这些事不是为了要公开”，只是对了解我们的人说的。我们不会告诉其他任何人。

再度回到了赫鲁晓夫同志可能访华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指出，他们希望能够实现此行。对于我补充的中国同志如何看待赫鲁晓夫访华的问题，毛泽东与周恩来简短地交换了意见之后说，这次赫鲁晓夫

到中国来举行两党会谈将采取公开的方式。毛泽东同志回顾了 1958 年“与尤金关于共同舰队问题的争论后”赫鲁晓夫访问北京的情况，第一，他说，赫鲁晓夫同志的那次访问本来决定是一次秘密访问，结果有关发表公报的问题就来了，后来决定对访问“解密”。

在随后与毛泽东的谈话过程中，他主动谈起国内的生活问题。他说：你们的情况比我们好。你们有一个强大的重工业。他说，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的情况比前些年要好些，但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困难问题上，就会影响农业和工业。他说，按照英国的数据，中国宣称 1962 年收获 1.85 亿吨粮食，是夸大了。实际上，粮食的平均收成应该在 1.5 亿-1.6 亿吨之间。与 1961 年相比，1962 年的粮食生产增加了 1250 万吨。

他继续说，我们的工业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我们确实能够自己生产很多东西了。在这一方面的主要困难是，我们不具备生产大型精密机床的能力。

周恩来补充说，困难在于，他们无法生产整套的合金原料，而且生产技术水平整体上是低下的。

毛泽东进一步说，我们缺少精密机械、轧钢机和原材料。至于农业，我们拖延了 5 年才开始着手。为了发展农业，必须首先发展化工，生产各种化肥，各种农业机器和机械，这些机器可以在农业生产的各个阶段使用——一开始是播种，之后是照看庄稼，最后是收割与运输。毛泽东这时重复说，他们把农业拖延了 5 年，晚了。

我评论说，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向人民公社的调整。毛泽东回应说，在生产大队的调整过程仍在进行中（他说，准确地讲是“生产大队”而不是“公社”），大约有 15%-20%还没有作调整。

毛泽东表达了中共中央对中国城市和农村自发出现的私人贸易的顾虑，投机、受贿和腐败现象一直在增加。他说，中共中央现在正在制定一个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办法。在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说，

新资产阶级分子将会产生和发展。“如果我们不掌握他们，他们就会超出我们的控制之外”。

谈到国际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和集团之间的关系在近来一个时期急剧恶化。目前，不仅美国和法国的矛盾激化，美国和联邦德国之间也是如此。英国与美国也有很多矛盾。日本与美国的矛盾也开始激化。通过这一点，毛泽东指出，我并不仅仅指日本人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还指美日垄断者之间的斗争。他说，这种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对我们是有利的，他们之间的矛盾“成为我们的间接同盟者，他们的争论对我们是有利的”。

再次转向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必须有凝聚力，在可能的程度上，解决我们中间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无法解决的，可以暂时搁置。总体上，他说：“我们之间停滞的关系应重新活跃起来。我们相互批评只会让帝国主义国家高兴。”

毛泽东一再重复，中共中央打算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并“对指责中共的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共产党部分地给予回应”。他着重强调说，此后，我们会暂时停止我们的声明。

随后，毛泽东表示自己的主要思想就是一个“停战”与“和平”的概念，这是在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来信中建议的。他说，他谈论更多的不是和一场血腥的战争相连的“停战”与“和平”，因为“我们之间的战争”，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是由“舌头和印刷字”进行的。此时，毛泽东对我说，我们的使馆人员不该怕这个，也不该觉得过于紧张。

即使在家庭中也有争论，更何况两党和两国之间了。人们应该讨论这些产生的问题，并逐步找到消除分歧的办法。有争议的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人们可以）耐心地寻找途径来逐渐解决它们。

这时，毛泽东再次转向了苏共中央来信的内容，并引用了信中的提法：“在会谈中人们可以逐点讨论所有关系两党利益的最重要的问

题，尤其是他们所关注的，这涉及我们斗争的共同任务。一旦这些问题被考虑，就从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不同的意见的存在，那么就on应该同意采取措施，这将有利于拉近彼此的立场。”

表示出对这些提法的赞成态度，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些意见都很好。不过，他立即表示，苏共中央的信中只是笼统地讲了可能存在的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我们相信，“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要达成一致，即可以做出决定，有争议的问题将被暂时搁置，而不是写在长篇的文章里相互指责”。

我指出，鉴于我们之间的美好意愿，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是完全能够克服的。我提起1962年10月赫鲁晓夫同志与刘晓大使的谈话中有关党派团结的主要观点，特别是渴望重新开始我们的关系，就好像“从一张白纸”一样开始。

在概括地谈到即将举行的会议以及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时，毛泽东说，也许，从现在起，要避免1960年9月中共代表（由邓小平任团长）和苏共代表（苏斯洛夫、科兹洛夫等同志参加）之间的那种双边会晤的情况。在那次会议上，“两方都是谈自己的意见和为自己辩解”，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意见。我们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同一年，在1960年，毛泽东继续说，有一个由26个兄弟党的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在委员会的努力下达成了一项协议，但有些问题仍未解决。还有一次经历是在1960年的81个党的大会上，大家都在争先讨论自己的事情。

刘少奇在此时加入了谈话，补充说，这种情况实际上一宣持续到会议工作的最后几天。他继续说，直到我见到了赫鲁晓夫同志，起草委员会才就会议中的所有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经过了事先同意的。

人们可以使用不同方法进行协商和会议，毛泽东继续说。如果第一次会议没有结果，他说，好像在自言自语，人们可以将这些有争议

的问题推迟由起草委员会来处理，如果部分问题不能当即解决，人们可以推迟到以后的协商会议中。根据 1960 年 81 个党协商会议的经验，很有可能最终我们两党将要承担起有争议的问题，在两天之内达成协议。

另一种方法也有可能，毛泽东说，即按照 1957 年莫斯科协商会议的经验召开协商会议。当时邓小平同志和苏斯洛夫，与其他同志一起，在一个组里，来完成最后联合宣言的草案的编辑工作，然后它以苏共和中共的名义提到会议上讨论。因此，有两种方法，毛泽东说。在您看来，哪一个更好，大使同志？

我回答说，我们支持后一种方式，这样的方法，将会以最快的方式结束争论，消除分歧，增强凝聚力，并加强团结。

毛泽东表示支持我的说法。

加入谈话后，刘少奇说，我们可以达成共识，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并在中共和苏共的双边会谈中制定共同文件的草案，只有在那时才能召开协商会议。1957 年的协商会议，他说，在会议前很短的时间里解决提出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别人等待。”毛泽东同意地点了点头。刘少奇继续说，如果我们两党没有马上达成协议，我们在其他场合仍然可以走到一起。

毛泽东说，总之，我们可以用上述方法之一。重要的是所有的会议和磋商最终都能加强团结。他指出，虽然 1960 年协商会议有许多争论，但是他们采用了闭门的方式。

刘少奇指出，西方报纸公开了 1960 年莫斯科会议的一些细节。对着毛泽东，他说，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公布了莫斯科会议上他们代表的发言。

毛泽东回答刘少奇说，他不知道这件事。

对本次会议和谈话表示感谢之后，我说，从毛泽东同志今天的谈话来看，苏共中央非常渴望加强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凝聚力，加强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种愿望在1963年2月21日的来信中再次清楚地表达出来——得到了中国同志的支持。我强调说，我们的凝聚力会是对那些试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从内部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帝国主义伎俩的最好回答。

毛泽东表示支持我所说的话。

在谈话结束时，毛泽东问我是否反对向报纸公开他此次接见苏联大使的短讯，还问我是否要向莫斯科询问。

（在与安德罗波夫同志于当地时间24点通过高频电话后，我向中国通报了我们同意公开此短讯。）

临别，毛泽东做出友好关系的保证。我表达了毛泽东尽快恢复健康的祝愿，也希望他在将来能够访问苏联。

毛泽东在感谢（我）之后，回答说，将来他不排除这样一次访问的可能性。

刘少奇、周恩来、伍修权在谈话结束后把我们送到车上。

总体而言，毛泽东用一种平静的语气进行交谈。如果和他在过去两次会议上留下的印象相比，这次毛泽东看上去更具活力。毛泽东说话时没有使用笔记，只是不断地参考苏共中央来信的译文以及他在信上的批注。我们没有留下他身患重病的印象，尽管他在谈话过程中一直半坐或半躺在床上。

在中方，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一名工作人员阎明复参与了谈话。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 契尔沃年科（签名）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10卷第24页

关于中苏关系及国际形势等问题

——毛泽东与柯西金会谈记录

(1965年2月11日)

柯西金和毛泽东的谈话记录

1965年2月11日

绝密

这次谈话在位于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大楼里举行。

毛泽东一边同柯西金打招呼，一边说，苏联代表来到东方是很好的。东方是独一无二的，是应该来看看的。

柯西金：您说得对，但有一天您也应该来西方看看。

毛泽东：没有人邀请我们去。

柯西金：我们现在就邀请您。

毛泽东：这样的话就可以去了。接下来，当谈及他的工作，毛泽东说，他是党的领导人，但是现在很少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了，他也很少参加中央全会的工作了。他说他很老，快死了。

柯西金回答说，所有现在活着的东西，都是有生死的；这就是生存的辩证法。很难说，哪个会**先行**一步。然后他说，毛泽东肯定在关于建党和建国的理论问题以及辩证法和其他重要理论问题上给予了关注。这些工作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是无法避免的，没人能够逃避。

毛泽东：您说得对。我对辩证法尤其感兴趣。我对不以人民、党派和政府意志为转移，甚至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感兴趣。事件的过程都是被生存的客观法则所决定的。

举例来说，越南人中，有哪个愿意和美国人打仗？但是面临的情况逼得他们不得不打。在1954年日内瓦协定之下，法国人从越南逃

走了；他们撤离了军队，大概有 20 万人。然而吴庭艳开始杀人了。这些血腥的镇压引起了仇恨，结果民族解放阵线形成了。有时候，南越人民试图进行政治斗争，那时游击战扮演了补充的角色。然而现在很清楚了，只通过一场政治斗争并不能获得所有东西。有些人认为必须同时进行政治和军事斗争，这显然不对。谁能说事情的发展是依赖于人的意志呢？

柯西金：美国人想到处移植资本主义，我们希望到处都是共产主义。只有愿望是不够的。特定条件和客观条件是必需的。

毛泽东：现在越南的主要问题是游击战，政治斗争成了次要角色。战争范围越来越大。现在美国人开始轰炸北越了。但是，这又怎样？死掉一些人又有什么可怕？今晚我们得到消息说在南越的游击队空袭了位于 14 度以南的防御区，摧毁了 3 个伪军连，还杀了几名美国人。

柯西金：这是个好消息。我们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我们提供的援助是很有效的，包括提供武器。关于向北越提供地空导弹，我们与越南同志达成了协议，用来防御河内和其他地区遭受美国人空袭。我们还打算提供大炮、坦克、鱼雷艇和许多其他武器。显然越南人在使用这些武器方面会遇到困难，我们还打算在必要的时候派出我们的军官去训练他们的士兵。虽然我们与越南没有共同边界，但是我们认为不能将越南抛在一边是社会主义者的责任。

毛泽东：一个人必须吸取经验。飞机现在毫无用处。

柯西金：在和周恩来谈话时，讨论了在越南问题上我们协调行动的问题。我们也和越南人谈了这一点。我们感到在这件事上我们意见一致。至于英国人，他们逞强和挑衅的方式只能是软弱的信号，而不是强大的信号。

毛泽东：他们有什么强大？现在 13 艘航空母舰里有 4 艘在南海。1958 年我们开始炮击美国人占领的岛屿时，他们派了更多的航母来。我们继续打炮，他们甚至派了部分地中海的第六舰队来，甚至后来旧

金山的第一舰队也来了。可是，当他们来到南海，我们已经停止打炮了，他们无所事事。水手们在新加坡休息了两周，就回母港基地了。现在中国拖住了第七舰队这支最强大的舰队。

柯西金：苏联军队在德国遏制着美军。我们不得不在欧洲保持强大的军队，就像亚洲这边，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前沿阵地。只要稍有松懈，帝国主义马上就会抓住机会。

毛泽东：那么，你们照看好西方的阵线，我们在亚洲这边保持斗争。是美国人迫使我们协调行动。

柯西金：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我们的军队必须联合起来。

毛泽东：美国军队遍布世界。他们总共有 270 万，其中欧洲和亚洲就有 100 万。

柯西金：他们不得分散兵力，这不会增加他们的实力。

毛泽东：他们只有 18 个师，其中一半部署在国外。

柯西金：从人数上说，美国的师是我们的两倍，但是在技术上比不上我们。比如，美国的师装备的坦克比我们少，大炮比我们多。

毛泽东同志，我想问问您，有一次您通过我们的大使询问赫鲁晓夫，我们是否有机会坐下来讨论一些成熟的问题。您那时说如果是最高层的会谈，两个小时就能解决许多一般会谈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是不是这个机会？

毛泽东：我还说了其他的话，那就是，我不赞同你们的方法。我说如果继续公开论战，天也塌不下来。我说过，现在也讲，天塌不下来，树照长，鱼照游，女人照样生孩子，这些都跟我们的论战没关系。毕竟，公开论战就是用钢笔、毛笔和纸的方式进行的斗争，死不了人。就是说，我（毛泽东继续讽刺地）喜欢你们的公开论战。我不赞成停止公开论战。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停下来！我和罗马尼亚同志们谈过。他们问我这个问题时我回答说：大概再过 15 年，因为在公开论战过程中很多问题都会弄清楚。你们到什么时候开始说必须停止论战，不

允许分裂活动，到时候我们再出价。我们现在说所有这些都要再持续一万年——少一点都不行。

至于所谓的分裂活动，既然我们是教条主义者，那么我们当然愿意支持你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排除的一些共产党人。当前，许多国家纷纷成立新的共产党，比如澳大利亚、斯里兰卡、印度、比利时、巴西和其他国家。你看得出来，他们都是站在教条主义立场上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条主义者无条件支持他们的原因。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只有一件事没做，就是你们指出的（分裂）活动。不用比较也知道，你们会更积极地支持你们的马列主义政党。

现在也有很多人支持你们。至于我们，并不是很多。有人说，100个党派里面62个站在你们一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少数派。而且，我必须指出即使在我们党内也有人站在你们一边。比如，陈毅、周恩来——他们就站在你们一边。他们敦促你们不要在3月1日召开会议。我个人赞成你们开这个会。刘少奇、邓小平、康生和我，我们这些顽固不化的教条主义者赞成你们开这个会。你看看，我们这里也是有派系的。他们总是督促你们，我认为一个人说服不了你们。将会期从12月15日改在3月1日没有必要。毕竟，这对你们不利，会削弱你们的权威。我认为也没必要改掉会议的名字。比方说，不叫起草委员会，叫协商会晤？你们最好用原来的名字。你们总是改来改去，这样不好，毕竟你们是伟大的列宁的党。这就是为什么我站在你们这边。我尊重你们，认为你们应该开这个会。是周恩来和陈毅反对你们。

柯西金：毛泽东同志，你说的树啊、鱼啊、女人啊都是正确的。毕竟，进化的客观规律是存在的，这不会改变我们之间继续公开辩论的事实。这不是我们担心的问题。问题存在于另一面。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 and 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力量，我们共产党的团结很重要。我们党赞同用一切力量来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这是我们党和人民非常珍视的。

毛泽东：当然，对这一点，我毫无异议。

柯西金：我并无讽刺之意。这个话题是很严肃的，我说的是问题的实质，不是出于客套。当我说对中共的尊重时我没有违心。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团结。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十倍的力量。您说钢笔和纸杀不死人，但是它们是意识形态，比任何武器都厉害，可以在人们中间造成巨大影响。您应该是知道这一点的。另外，当我们谈到与你们党的代表会谈，消除我们分歧的时候，我们遵从的事实是情况在改变，形势在改变，和平讨论和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当然，一些事情的解决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也认为解决它们需要在一个理论框架里进行研究。但是毕竟很多问题是次要的事情。我们应该从中解脱出来。论战也可以发生。但是必须是一种从科学的角度进行的论战，必须是踏实的，以一种友好的精神进行，而已经存在的分歧必须通过科学的，建立在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之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式来讨论。

毛泽东：您所说的这些论战，没有任何意思。我倾向于你们在7月14日的来信和你们1964年2月的大会上所进行的那种论战。

柯西金：您以为我们不害怕公开论战？我们的确不害怕。但是当人们斗嘴的时候，至少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争吵什么。我举一个例子：现在我们正和你们进行一场争论，有关依靠自己的力量。你们谴责我们说苏联违反了这一点。是的，这是一场制造出来的争论。毕竟我们所有人都在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还能依靠谁？也许你们认为我们在依靠美帝国主义？这不是正是我们澄清这些故意制造出来的分歧，会见并探讨一些问题的时候吗？我们现在没法达成一致的问题可以放在一边。你说要把它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推到一边，推迟一万年。如果这对我们的党和国家有益的话，我们可以把它们推迟两万年。然而，革命运动存在，而我们正在这场运动之中，我们应该一同走出来，而不是相互反对。我们要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超过把我们分开的力

量。

毛泽东：应该推迟一百年。

柯西金：可以顺其自然地推，比如说，X年。但是这将会损害我们共同的事业。有一次我在一个欧洲国家会见一群西欧共产党人。他们一直在说，中共和苏共的分歧正在把他们的运动引向反面，使他们不再解决主要矛盾。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在反对剥削者、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拉开，来考虑谁在争论中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共还是苏共？他们问我一个问题：如果帝国主义可以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共识，为什么共产主义国家不行？我相信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整个社会主义世界，我们两国的人民——他们正在等待我们解决分歧的看法。这些分歧现在没办法解决，但是可以通过一种理论的角度进行讨论。甚至可以创造一份理论报纸。

至于理论上的争论，可以不损害我们的团结而进行，在我们任何一份理论报纸的专栏里。

毛泽东：你们在布拉格已经有这种报纸了。

柯西金：它叫做《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但是那不只是我们的报纸，而是所有共产党的报纸。

现在说说3月1日的会议。我们不打算召开这次会议，但是一系列共产党都希望召开。是通过咨询的形式还是通过起草委员会见面的形式召开这次会议有着很大的差别。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式。您反复说在现有条件下有必要召开一次由81个共产党参加的国际会议。

毛泽东：我们在过去说过，要准备一次会议，我们需要4到5年，而现在，显然，需要8到10年或更多。毕竟，争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见面？你们，比方说，还在支持范燕东。你们派遣了一个代表团，由波诺马廖夫带领，去参加他们的大会。对印度共产党的第二次大会我们没有派遣一个代表，我们甚至没有送给他

们一个电报。在斯里兰卡也是这样。我们提供不充足的支持，而你们提供了全部支持。

柯西金：正因为这样他们在北京访问了你们。这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

毛泽东：时间会流逝，到时候会有接触，多边和双边协商。

柯西金：3月1日的会议正是一次想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各党进行多边协商的会议。

毛泽东：这就是为什么我赞成这次会议。请开会吧，别改日期也别改名称。把26个党的代表叫到一起；只有少数人不会来。毕竟你们看不到这样做有什么不好。

柯西金：但是请解释一下，为什么您反对几个党见面商讨何时以及如何召开一次81个共产党参加的大会？您认为这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什么害处？如果有人想要为将来的会议出台某些统一政策，又是另一回事。

毛泽东：在你们7月14日的来信以及后来11月24日的来信中说道，如果我们不参加，你们就会无视我们继续开会。

柯西金：您应该考虑到在10月中央全会后莫斯科的新情况和形势。毕竟，你们不想这样。

毛泽东：我们看到了一些。

柯西金：我们正在想办法让你们适应，像同志们之间做的那样，我们对你们是尊重的，我们正在报刊上发表关于中国情况的客观报道。

毛泽东：不一定。你们在报纸上不会发表我们的文件。

柯西金：我们正在发表一切对我们来说合适的文字。我们已经发表了周恩来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报告的详细内容。但是，没有提到这是来自苏联最高委员会的报道。

毛泽东：这说明我们犯了个错误。但是你们打算对阿尔巴尼亚怎么做？毕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谈不上开会的问题。另一方面，这

个问题只能在阿尔巴尼亚和你们之间解决。绝不能折磨阿尔巴尼亚这个小国；那样是很不好的。我们很高兴你们会恢复之前的关系。

柯西金：你们没有注意到吧，在10月的大会之后再也没有发表过关于阿尔巴尼亚的负面评价了。当（华沙条约）的政治协商委员会在（1965年1月）华沙举行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代表也是被邀请了，但是他们对此的回复是一封侮辱性的回信。无论如何，这次会议的参与者没有回应这些漫骂，并且和阿尔巴尼亚人沟通，表示这个邀请依然有效。告诉你们的同志们准备好所有材料，看看是不是在10月的会议之后再也没有一个声明是针对阿尔巴尼亚的，再来和阿尔巴尼亚那一次说的话比较一下。我们愿意恢复和他们的外交关系，但是阿尔巴尼亚人把所有写给他们的派遣书都原封不动地返回给我们。你们对此怎么评论呢？

毛泽东：首先，我会建议你们把之前所有对阿尔巴尼亚所做的事情放在一边。很有必要让你们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一个错误。毕竟，你们在你们党的大会上公开地批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破坏了和这个国家的关系。那么，必须宣布这些都是错的。但是你们更想不再讨论过去的事情。

如果你们希望我们参加这次会议，那么宣布7月14日的来信和你们2月的会议都是错误的，把它们废除。我们反对你们的纲领。

柯西金：您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真的赞成减少分歧，如果你们想找到解决的办法，那么我们应该会面。如果要严肃地讨论这些分歧的事情，以特定的方式，实实在在地谈，那么结果就是你们将不得不否定你们过去所做的很多事情。当你们谈到阿尔巴尼亚，你们说的不准确；你们显然依据的是不真实的消息。不是我们破坏了与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而是阿尔巴尼亚中断了与我们的外交关系。

彭真：那么你们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是怎么攻击阿尔巴尼亚的呢？

毛泽东：我就是攻击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我不同意这些会议的纲领，说斯大林如此的坏，还有某种个人崇拜。而现在你们说赫鲁晓夫也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很难搞清楚到底在搞什么。你们说赫鲁晓夫是个好人，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把他赶下台？我们都没有拿掉他的画像，他的著作还在传阅，但是告诉你们实话，不幸的是没什么人看。

我们从没有撤掉斯大林的画像；我们还支持个人崇拜。赫鲁晓夫有什么感觉？

柯西金：应该去问他。

毛泽东：我同意。我通过您向他发个邀请。让他来访问我们。我要和他进行论战。

柯西金：当然由您自己决定和谁进行论战。赫鲁晓夫既不代表我们党，也不代表我们政府。至于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从他的位置上下来，我们已经在周恩来同志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详细地告诉他了。

毛泽东：但是他过去是代表。毕竟赫鲁晓夫做过许多好事。他是个伟大的领导人；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们，全都是教条主义者，教条主义者里不缺乏马克思主义者。另外，我们是好斗的人。这也是正确的描述。首先，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其次，我们是好战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名声不好。他们在世界各地抨击我们。他们叫我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者。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邀请我们去开会？你们应该巩固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要团结教条主义者？

我们的确是好战的人。和你们不同，我们不相信广泛和彻底的裁军。在现实中，以我们的观点来看，广泛和彻底的裁军正在世界各处发生。因此，你们尽可以继续会面讨论了泛和彻底的裁军。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世界各地，广泛和彻底的裁军正在发生。如果你们的同志看重广泛和彻底的裁军这样的幻想，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怎么能够接近？

柯西金：您真的相信你们比我们更多地进行了反帝斗争？

毛泽东：无论如何不比你们少。

柯西金：我们对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指责你们没有怎么进行反帝斗争。同时，事实是没有我们的参与，反帝斗争在哪里都不可能进行。这些斗争到处都有我们的贡献，有我们的武器和我们所冒的风险。然而，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你们特有的好斗，除了言论。言论根本没有反映现实，光是言论在反帝斗争中是不够的。

毛泽东：我们两党可能在10年之后再聚在一起。客观的形势会逼着我们团结。帝国主义者正在采取违背人民意愿的行动；他们对你们和对我们一样，都不会客气。

柯西金：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团结推到一万年之后，而必须现在就团结。

毛泽东：我们会在10到15年之内团结起来。紧张气氛会减缓。毕竟，紧张关系还没有放松；这也是一个幻觉。你们每天都在做关于减少紧张气氛和裁军的宣传，而这全都是谎言。在某些情况下，帝国主义会同意任何条件。他们会支持一个协议吗？比如，他们可能重视波茨坦公告吗？

柯西金：他们也不会重视日内瓦协定。

毛泽东：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要走他们自己的路。他们不仅要吞掉我们，还要吞掉你们。

柯西金：我们，在军事上最强，应该是第一，帝国主义仅有想法是不足以发动战争的——我们的团结是发动一场新的战争道路上很大的阻碍。

毛泽东：他们最可能先攻击我们。毕竟，我们只有手榴弹。我们没有原子弹这样的武器；我们还只是在实验。另外，我们不相信原子弹，那只是一种吓唬别的国家的办法。还是得依赖传统武器。我们已经打了25年的仗了，我们对此很了解。

柯西金：每个人都打过仗或者见过打仗。我们国家已经受够了战争，已经到了忍受的边缘。

毛泽东：但是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消灭。为什么你们要带来一个元帅或者将军？很显然文官已经没法解决问题了。必须依靠军队，主要是正规军。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让军队和国家失望。在你们党内以及我们党内都有些修正主义者。他们写小说，他们拍电影，一点不鼓舞士兵的战斗精神。他们减弱了士气。很不好。必须准备战争。如果我们能够保证10到15年的和平，将会是很有益的。我们反对世界战争，但是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有所准备。这是为什么我说在10到15年内，当帝国主义举起手反对你们，或者反对我们，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战争会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为什么争吵？因为我们活在和平的环境下。如果帝国主义用你们“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广泛和彻底的裁军”之类的口号武装自己，那是很糟糕的。现在美国和苏联的口号没有很大的差别。美国和苏联正在决定世界的命运。请尽管决定吧！但是在10到15年内，你们不可能决定世界命运。命运掌握在世界各国的手里，不在帝国主义、剥削者或者修正主义者手里。

柯西金：既然您提到这全人类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也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以及与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我要说，我不懂您提到加强军队和积累武器的必要性的目的是什么。您真的以为我们不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毛泽东：我刚才说的是到处，包括我们，都在全面而彻底地进行军备。

柯西金：进行军备的确正在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进行着。我必须说，如果我们要比较国民收入中用了多少进行军备，很显然苏联比你们国家要多。我们国家在军备上承担着更大的负担。而且，我们正在将20亿卢布用于和安全相关的教育中，成千上万的工程师正在苏联

进行安全问题上的工作。我不是要炫耀，只是为了回答您说的武装的必要性的问题，好像我们已不懂这一点一样。

毛泽东：我所谈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言论——那只是一个说法，是为了骗人而说的。自然，他们甚至可以欺骗美国人，但是，这些幻觉也会对他们自己的国家造成很坏的影响；他们会解除自己的武装。

柯西金：您说——“必须武装”。我们说，我们正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做到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毛泽东：你们预算中百分之多少用于军事目的？

柯西金：我不会说这个数字，因为它不能完全反映我们在安全上的支出。但我重申，我们在这方面正在做所能做的一切。如果谁要在安全上花费得更多，那会制约他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

毛泽东：近年来你们在军事支出上减少了500万卢布。

柯西金：我不会具体谈减少花费是什么意思。至于您的话，毛泽东同志，里面有矛盾的地方。您一边说10到15年没有战争是好的；另一方面又说要发动战争。

毛泽东：在接下来10年到15年内没有战争是很好的。

柯西金：谁都会同意这点。我深信，在现实中，您是反对世界大战的。

毛泽东：我们反对世界战争，但是我们赞成目的在于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战争。

柯西金：我想在场的中国同志们没有一个是赞成世界战争的。我相信这一点。

周恩来：但是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就应该打仗。

柯西金：那还能怎么样？1941年德国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发动战争，占领了最重要的工业区，我们的国家没有投降，没有把手举到空中。我们向帝国主义发动了残酷的战争，最后赢得了战争。

毛泽东：那时候苏联打得好。

柯西金：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新的战争，苏联会打得更好。关于革命战争，我们也觉得应该支持这样的战争。你们一定知道我们向进行这样战争的国家提供了多大的帮助。

毛泽东：我们知道。

柯西金：那么为什么您要公开地提出这一点？

毛泽东：你们对南越只帮了很少一点。

柯西金：我们在地理位置允许的条件下帮助到这一步。现在美国已经轰炸了北越，不是越南南边。不幸的是，我们在那里没有能够和美军基地进行反击的空军力量。只有你们可以做到，但是你们不做，你们没有以适当的方式驱逐美帝国主义，虽然你们可以做到。为什么？显然这里面是有些原因的。我们早就看到这一点，也没有指责你们不去轰炸在南越的美国人。有人会认为你们最熟悉那里的情况而你们有自己不去的理由。

毛泽东：南越的人民没有我们也会战斗得很好，他们自己会把美国人赶出去的。

柯西金：可是美国人已经在轰炸北越了。

毛泽东：这对美国人来说是很愚蠢的。他们的轰炸没造成什么伤亡。

柯西金：我们深信必须要赶走美军。现在我继续说刚才说的。您说如果我们在未来 10 到 15 年里获得和平的机会，是很好的。同时您说只有战争才能团结我们。这两点是有矛盾的。

毛泽东：美帝国主义不会给我们这个时间的。

柯西金：我并没有提出这个时间表，是您提出的。

毛泽东：我刚才提到这点是因为一些人来向我们提议结束公开论战。我们回答说我们不能同意。但是随着时间，帝国主义会逼着我们同意结束论战。我们正在接受敌人的教育，但是我们自己有很好的老

师，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还有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他提到赫鲁晓夫的名字时毫不掩饰讽刺之意）。

柯西金：还有毛泽东？

毛泽东：我不属于这个圈子。我们是在蒋介石的血腥镇压下成长起来的。

柯西金：既然说到这个，我们要提起尼古拉二世。

毛泽东：我们是跟着日本人长大的，接着又是帮助蒋介石以及在朝鲜打我们的美国人。总之，我们有很多老师。

你们有 14 个国家的加入。你们国家两次卷入世界大战。德国两次侵略你们的领土。所有这些都是让你们骄傲的历史。当你们国家的工人群众武装起来的时候，他们推翻了在那时有着最先进武器的政府。您多大了，柯西金同志？

柯西金：我马上 61 岁了。

苏联人深知战争是什么样的。至于您刚才说武装力量必须在比较高的层次维持以及必须支持革命斗争以及民族解放斗争，我们之间都没有分歧。当您说，你们是好斗的民族而我们不是，不能同意这样一个比较。我们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你们一样好斗。

毛泽东：我们是教条主义者。

柯西金：也许们已经注意到，我们最近没有再将你们称为教条主义者。然而你们却经常叫自己为教条主义者，而显然你们认为我们是修正主义者。我们认为必须同时与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作斗争。这是列宁教导我们的。

毛泽东：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这件事上我们之间没有矛盾。必须对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作斗争。

柯西金：在河内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我在我的发言中说，我们反对修正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这样来说，我们对于评价武装力量和反帝斗争这些问题上都没有不同意见了。但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

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延长和平的环境，不制造战争的局面。我们采取这样的政策并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战争，尽管有些人会这样解释。至于对帝国主义，我们也不怕他们，但是我们反对制造战争的形势。

毛泽东：必须创造革命战争的形势。

柯西金：每个民族的人民会表达他们自己，当他们起来反抗压迫者和为了他们的目标进行斗争的时候。具体情况和客观因素在这里起作用。

毛泽东：但是我们应该鼓励人们进行这样的斗争，应该支持。

柯西金：在这件事上我们没你们做得多吗？

周恩来：你肯定是搞错了。

毛泽东：我们认为你们在支持革命斗争方面做得太少了。

柯西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邓小平：如果您不带外交辞令地这样说，显然你们害怕一场革命斗争。

柯西金：如果我不带外交辞令地说，那么你们在帮助进行革命斗争上比我们做得少。你们只是说空话，不做事。

毛泽东：你们帮助印度的空军，你们给他们装备武器来对抗中国。就这个问题你们和周恩来有过冲突。

柯西金：毛泽东同志，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之间没有任何冲突。最多，发生的只是意见不一致。

毛泽东：你们的大使契尔沃年科刚一来访问我们，周恩来就和他争吵起来。很显然是有事情要争吵。比如，刚果问题。你们投票让联合国军进入刚果。

柯西金：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反对派联合国军进入刚果。

毛泽东：这是后话，但是刚开始你们投票赞成派联合国军进入刚果。

库兹涅佐夫：当问题在联合国提出的时候我正在纽约。苏联一直

都反对派联合国军进刚果。

毛泽东：现在您看到你们已经面临了一场广泛的战争。

柯西金：这不是一场战争，而是在讨论一个问题。当这样的问题被讨论的时候，必须要提供真实和具体的信息，而周恩来同志给了错误的信息。我们从不赞成联合国干预刚果。

康生：但是你们也不支持在刚果进行自由斗争。

柯西金：现在，我回答康生同志的问题：我们的飞机正在刚果，全都由苏联的驾驶员操作。有了这些帮助，苏联的武器可以从阿尔及利亚和埃及运到刚果。我们在那里的任务是帮助刚果人民操作这些武器。我们绝对支持刚果民族的斗争。我们正在动员公众舆论。除了这些，在您看来，我们还要做什么？

周恩来：是的，你们的飞机正在刚果飞，但是我们正在为这些飞机交租金，我们交了不少。

柯西金：周恩来同志，您为什么要扭曲事实呢？您为什么要故意使讨论升温呢？毕竟，你们不是在为我们现在说的这些飞机交租金，你们一分也没有付，而你们和这些飞机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让我本·贝拉总统将相关消息发给毛泽东同志，如果你们不愿相信我们的话。你们把两件事都搞混了。周恩来同志建议给阿尔及利亚4架安-12飞机，以礼物的形式，你们的政府让我们把这些飞机卖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送给阿尔及利亚。我们马上就同意了。是你们在扭曲事实。当我们收到这样的询问后，我们马上指示外经贸部立即卖掉这些飞机。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不同的飞机。我们谈的是正在非洲由我们的驾驶员操作的飞机，他们正把武器运给刚果反叛组织。因此你们说的和事实不符。给人的印象是有人为了挑拨的目的在散布谣言，并制造文件作为证据，以便把我们之间的，你们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关系搞复杂。我很了解阿尔及利亚那些飞机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在莫斯科就负责这件事。

毛泽东：周恩来也在负责这件事。你和他之间有一场战斗，你可以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

柯西金：我不想赢周恩来，我觉得他也不想赢我，因为我们在为同样的理想而斗争。

毛泽东：不不，应该攻击他。他有很好的借口；他想成为赢家。

柯西金：我不认为周恩来同志想这样。

毛泽东：你太小看周恩来同志了。

柯西金：我已经认识他很长时间了。

毛泽东：是的，毕竟，你在莫斯科就见过他。的确，真理就在争论中产生——针锋相对——就像你和他进行的那样。如果只是谈论天气，那么这样的对话毫无帮助。

柯西金：我们只在北京待一天，我们没有时间谈论天气。在您看来，应该从我们的对话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应该如何总结呢？

毛泽东：今天进行了一场真的战斗。对于一些事情的共同观点已经很明显了。对于世界大战来说，必须尽力保证在未来10到15年不会发生。我们之间的争吵本质上是我们为相同目标而奋斗的一种途径。为了在争吵中解释谁是对的谁是错的，需要整个时代来做这件事。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这样或那样的观点不是在争端中证明的，而是在实践中证明的。

柯西金：您认为我们之间的见面和联系是有益的？

毛泽东：见面和联系总是有用的。我们不隐藏我们的观点。我们不考虑外交。

柯西金：那您肯定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也是坦率地说我们的想法。对我们这边，我们认为，我们两党和国家代表之间的见面和谈话是有用的。我们同意应该更多见面，我们认为应该比一万年要早一点解决争议。

毛泽东：可以缩短期限。

柯西金：那么就让我们这么做吧。

毛泽东：如果从10000年里减去9000年，就还剩1000年。这是最大的让步。

柯西金：最好能够从1000年里剪掉三个零。

毛泽东：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把期限减少至10到15年，甚至7到8年，都是可能的。如果帝国主义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我们又会在了一起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完全分开。我们接受你们，但是我们不接受美帝国主义。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英国代办。不久前这里还有英国的贸易部们，我拒绝接受他们。

柯西金：如果是您，周恩来同志，作为我们在莫斯科的客人，我们不会做出这样的对比。

毛泽东：为什么？

柯西金：如果你们来访问我们，我们会说，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们，并准备和你们像共产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一样讨论所有问题，我们不会把你们和帝国主义世界的代表作对比。

毛泽东：我经常唱高调。我是个好斗的人，一个教条主义者。而且我已经得罪了苏联政府的总理。

柯西金：我们不是爱生气的人。

毛泽东：不。你们应该被得罪了。还有，我们的情况不同：你们还和美英保持正式的外交关系，而我们没有。

柯西金：你们和法国保持着外交关系。

毛泽东：的确是。

柯西金：你们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会到来的。

毛泽东：但是不会这么快。当时赫鲁晓夫劝我们加入联合国。我们回答说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过去想，现在想，没什么理由要加入这个组织。

柯西金：我们在这件事上不想强加任何立场。

毛泽东：我们在联合国以外有更多的自由。只有帝国主义才想加入联合国。

柯西金：我们相信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就继续做你们觉得合适的事情吧。

毛泽东：我们瞧不起联合国。最好能摆脱整个组织，然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厨房。

柯西金：最好能立刻除掉所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就算到那时也会有人想出点事情造成我们之间的争论。

毛泽东：会有争论，也会有停战。你们会看到没过多少年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10到15年——这是一个确定的时间表，只有教条主义者才会这样提。你们做不到。

柯西金：您喜欢“教条主义者”这个词。

毛泽东：是你们把这个帽子戴在我们头上的。事实上在冬天我既不戴帽子也不穿大衣。昨天在巩固越南团结的集会中我们就没有穿大衣，我们也没有感冒。你看我们是如何磨炼自己的——一下冷，一下热。

柯西金：我在西伯利亚待了6年。在那里人们折磨自己更甚：他们在浴室里取暖，然后直接进入雪地，然后再回到浴室。这是为什么西伯利亚人是强壮的人民。周恩来同志在机场接我们的时候，他也没有穿大衣，他说他在磨炼自己。但是我选择另一种方式磨炼自己。陈毅在我们住的地方安装了很好的浴室，我先洗热水澡，再洗冷水澡。

毛泽东：您为什么不带着胜利离开呢？最主要的事情是您赢了周恩来。

柯西金：这可不是我的目标，我怀疑这不现实。整个世界都说周恩来是个伟大的政治家。现在他们会因为我们的会面而推测。

毛泽东：应该采取适当的反帝措施了。就这件事，我们都坚持我们了自己的观点，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可以允许共产主义者之间大的

差异。不同国家的共产党都不一样，就如同帝国主义国家也都各有差异一样。

之后，毛泽东同志表示对安德罗波夫同志以及其他代表团同志的简历资料感兴趣。这次谈话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到此结束。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指了指自己的手表，提示毛泽东该结束谈话了。不过很显然毛泽东看上去并不着急。

参加此次谈话的还有，苏方：Ю. В. 安德罗波夫、Е. Ф. 洛吉诺夫、К. А. 韦尔希宁、В. В. 库兹涅佐夫、Г. С. 多罗维奇、С. В. 契尔沃年科，中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康生、陈毅、罗瑞卿、刘晓……^①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
第17卷，第4288-4299页

① 该档案系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

附录：本书档案资料来源

（一）《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1—12卷，中国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出版。

（二）《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中、下三册，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2003。

（三）《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编。

注：凡引自《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的档案资料，篇末出处所标页码均为其在该书中的起始页。

